



巴尔扎克

中外名人传记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巴尔扎克

〔奥〕 斯蒂芬·茨威格著

吴小如 程毓徵译



青年巴尔扎克



中年巴尔扎克



韩斯迦夫人(巴尔扎克之妻)

目 录

第一卷 青年时期及早年的奋斗	1
第一章 童年的悲剧	2
第二章 对于命运的过早质疑	37
第三章 奥雷斯·德·圣·沃般公司的 小说工厂	66
第四章 德·柏尔尼夫人	89
第五章 经商插曲	115
第六章 巴尔扎克与拿破仑	142
第二卷 巴尔扎克在写作中	173
第七章 三十岁的男人	174
第八章 黑咖啡	203
第九章 德·葛斯特利公爵夫人	236
第十章 巴尔扎克发现了秘密	268
第三卷 巴尔扎克的生活稗史	284
第十一章 不知来历的女郎	285

第十二章	日内瓦	323
第十三章	维也纳一别	337
第四卷	小说家巴尔扎克的光荣和苦难	359
第十四章	祸不单行之年	360
第十五章	桂都邦尼—维斯冈地 伯爵夫人	382
第十六章	第二次意大利之行	404
第十七章	撒丁银矿	417
第十八章	戏剧上的投机	443
第五卷	《人间喜剧》的作者	472
第十九章	追求德·韩斯迦夫人	473
第二十章	《人间喜剧》	499
第二十一章	一些警告的迹象	515
第二十二章	收藏家巴尔扎克	528
第六卷	论定与盖棺	550
第二十三章	最后几部小说	551
第二十四章	巴尔扎克在乌克兰	563
第二十五章	结婚和还家	589
第二十六章	曲终人逝	599
	关于斯蒂芬·茨威格	608

第 一 卷

青年时期及早年的奋斗

第 一 章

童年的悲剧

一位象巴尔扎克这样的天才，禀赋的想象力丰富异常，因而他有本领建立并充实一个完全由他本人创造出来的天地；他决不会是一位拘泥小节的人，对他个人生活中一些不关痛痒的事实真相斤斤计较。他总是使一切事物都置于他那创造意志的绝对权威之下。说来也真够奇特，在巴尔扎克的尘世生活的各色事件里，他的专横的变态却是从通常市民生涯中最不能改变的基本事实开始的——那就是说，他的姓氏。有一天，大约在他三十岁左右，他公开宣布，说他的姓名并非奥璠利·巴尔扎克（Honoré Balzac），而是奥璠利·德·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①，他还宣称，他早就保有这个贵族称号的一切特权和名分了。他父亲只不过开玩笑地吹嘘过，而且仅仅是在他最亲近的家属圈内，说可能他跟古代骑士巴尔扎克·德·昂特拉格（Balzac d'Entragues）家族沾点儿远亲，可儿子的有力的幻想，却挑衅地把虚无飘渺的臆测夸大到无可置辩的事实的地步。他在函件和著作上都签署“德·巴尔扎克”，还把德·昂特拉格家族的纹章漆绘在马车上，有一次他还乘坐这辆马车到维也纳去旅行。每逢不客气的同僚们对他这种妄自尊大有所揶揄，他使用坦然不害臊的神气回答，远在他，奥瑙利，出世以前，他父亲就已在正式文书上确认自己的贵族家世了。因此在他的出生证明书上的贵族身世，一点也不比蒙田^②或孟德斯鸠^③的差。不幸得很，在我们这个不仁的世界上，一丝不苟的文书却有一种可恶的习惯，它总爱对诗人发明出来的炫饰的传奇表示出吹毛求疵的敌意。这对于巴尔扎克这位有真理热爱者之誉的

① “德”（de）是贵族的表征。

② 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 1533—1592），法国著名散文作家。

③ 孟德斯鸠（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 1689—1755），法国哲学社会科学家，男爵。

人实在是一个难堪，因为那份曾被他冠冕堂皇地引证过的出生证明书，竟不期而然仍旧保存在杜尔城的档案里。那上面一点也没有贵族的“德”的痕迹。在“一七九九年五月二十一日”这一栏里，杜尔的文书用冷冰冰的态度一清二楚地记载着：

本日，法兰西共和国七年牧月初二，公民伯纳—弗朗索瓦·巴尔扎克，户主，本城居民，住意大利军队街，沙杜南地段二十五号，莅临此间，向本人，本文书签署人，皮耶尔——约克·都威尾耶，出生、婚嫁、死亡注册员，呈报产生一子。上述巴尔扎克宣称，此子所取之姓名为奥瑙利·巴尔扎克，系本日晨十一时于家中出生。

至于其它有关证件，比如那些有关父亲死亡或姐姐结婚的文书上，也都不能提供任何贵族家世的证明。这件事，以及那些为巴尔扎克所醉心的一切谱系方面的枝枝节节，都应该被认为只不过是浪漫故事的伟大编造家的一厢情愿的创造品罢了。

尽管就法律之严格字句而言，各种文件的证明会使官司不利于巴尔扎克；可是他的威权意志，他那燃烧着的、创造性的意志，到底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克服了羊皮纸上冷峻的真实。不管事后会有多少为了冷峻的真理而产生的纠正，“诗”总是要战胜“历史”的。固然从来没有一位法国国王曾对他或他某位祖先恩赐过贵族的特许，然而当后人被询及这位法国最伟大的小说家的姓氏时，他们总会听从他的嘱咐，答以“奥璘利·德·巴尔扎克”，而非“奥璘利·巴尔扎克”，更不会是什么“奥璘利·巴尔萨”（Honoré Balssa）了。

* * * * *

因为巴尔萨，既非巴尔扎克，更不是德·巴尔扎克，才是他祖先的真名实姓。他们既无城堡，也没有纹章能让这位天资卓绝的后裔来彩饰马车门。他们既不曾穿着辉煌的甲冑奔驰，也不曾参加过罗曼蒂克的比武，他们干的只不过是把牛群驱向牧场，再汗流满面地去耕种郎格多克地方的土地而已。巴尔扎克的父亲，伯纳—弗朗索瓦，于一七四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出世，生在奴该瑞耶村中一间破烂的石头小屋里，离康奈扎克不远，那地方当时正住着不少位姓巴尔萨的人。这些巴尔萨中唯一出名的事，其名声的性质也是极为可疑的。一八一九年，即奥璘利离开大学的那一年，他父亲的一个五十岁的兄弟以谋害一个怀孕村女的嫌疑被捕，经过一场耸人听闻的审判，在

翌年被送上断头台。也许巴尔扎克希望尽量不要让世人想到他和他那位声名狼藉的叔父之间的关系，因此他心里产生了第一个冲动：给自己的姓氏冠上贵族字头，并且为自己创造出另外一个家世来。

伯纳—弗朗索瓦，十一个孩子中的老大哥，早已被父亲，一个普通的庄稼汉，决定该进入教会。教区的神父教他读书写字，还学一点拉丁文，可是这精力弥漫、孔武有力、雄心勃勃的小伙子毫不眷恋于薙度出家及贞洁盟誓。有一段时间，他在本村里游荡，帮助本地的录事官做过书记，又在葡萄园里帮过工，还跟在耕犁后面跑；但是到二十岁上，他不干了。以乡下人那种强项的固执和勇往直前的劲头儿——这些后来都被他儿子在小说里着力地、多方面地描写过——他也居然混进了首都的生活圈子，起初很不显眼，消失在不可胜数的年轻人中间，这些人都是想到巴黎来发家的，但对于如何发家心里无数，眼前也没有确定的职业。若干年后，当他已经升为他所定居的那个省中的知名之士时，他便说他在路易十六手下当过王家议院的秘书，甚至还当过王家顾问；但这些早已被人揭穿，只不过是虚诞的老谎言家一时高兴的吹牛罢了。因为从来没有在一本国王年鉴（almanachs du roi）上记载过一位巴尔扎克或者巴尔萨

曾经厕身于如此职位的。后来法国大革命把这乡下人跟许多和他同类的人物一样，推上了浪尖，而且他还在巴黎的革命市参议会上捞摸到一席职位，虽然他对于他一生经历中这个特殊阶段总是讳莫如深。这个职位显然使他得到不少有用的关系，加上他具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本能，知道哪儿有钱可弄，他终于插足于军队的一个部门，那部门是利润与外快流得最多的地方，那就是战时物资军粮处。从军粮处黄金的线路是不可避免地一定会伸到放债人和银行家们的帐房里来的。在这样暧昧的谋生方式下，消磨了三十年后，有一天，伯纳—弗朗索瓦再度改弦更张，又开始了新的生涯，去给巴黎的杜麦尔·丹尼耶银行去当主任秘书了。

五十岁那年，老巴尔扎克终于完成了他的伟大的转变，——那是屡次被他儿子描写过的——从一个不名一钱的，可是奔忙劳碌、雄心勃勃的小伙子，到底变成一个大大为人尊敬的公民，“上流社会”中正正经经的一分子了。直到这时，稍稍有一笔钱和一个安全的地位，他才算真正达到了可以采取次一重要步骤的阶段，这一步骤将使他从小资产者转入高等资产者，然后再达到最后的、天天渴望的高峰——一位有私产的绅士。他想物色一位妻子，一位有过得

去的嫁妆和高尚布尔乔亚门第的妻子。在五十一岁那年，这位身心俱健、仪表动人、惯吹法螺并善于拈花惹草的老手，相中了银行里一位主任的女儿。安娜·莎洛特·罗尔·郎比耶比她的求婚者要小三十二岁，有点儿罗曼蒂克激情；不过，作为有教养的孝顺女儿，她驯服地依从父母的劝告，他们说他们正是一块肥肉。虽然他的年纪和她相去悬殊，可是他的理财本能却极其健全，这在他们的观点上就是决定性的因素。

进入了婚后的局面，老巴尔扎克认为再继续寄人篱下未免于身分有损，且不提已将没有多少油水可捞了。有拿破仑在那里掌握着国家大运，战争这行业好象能提供更快更多的收入，于是他利用故旧关系，再加上有老婆的嫁妆在需要的时刻可做后盾，便又移驻杜尔城，当上了第二十二师军粮处的监督。

在此期间，就是他们的长子奥瑙利出世的时候，老巴尔扎克夫妇业已兴旺起来，并被杜尔城中的上层资产阶级当做同等人物来接待而加以优礼了。军粮处的税收好象足以提供伯纳—弗朗索瓦很可观的进项，因为这一家，既懂节约，又善投机，不久就开始讲究起排场来了。奥瑙利出世不久，他们就从狭窄的意大利军队街搬到自己的房子里。直到一八一四

年这段拿破仑战争的黄金时代持续期间，他们都能享受自用马车、一大批仆从这种外省人的奢侈生活。上流社会，甚至于贵族们，都同这位曾在巴黎当过红色市议员的田舍翁之子时相过从——这些人中间，有上议员克莱芒·德·瑞，他的神秘拐带案件后来曾被（巴尔扎克）写在《一桩可怕的事件》（“Une Ténébreuse Affaire”）里；还有德·庞眉若男爵和德·马尔岗先生，这位先生于若干年后曾在努力挣扎的作家走投无路时帮过他的大忙。老巴尔扎克也曾被邀参加市政活动，他的意见逢到重大决策时每被咨询。尽管他家世寒微，出身卑贱，但他在这个瞬息万变、全面改革的时代里，总算在知名之士群中升到一个无可訾议的地位上来了。

老巴尔扎克之德孚众望，从各方面来说都是可以理解的。他是个乐天的人，体格很魁梧，对自己，对本人的成功，对世上的一切，无不称心满意。虽然谈吐显不出多少贵族腔调，虽然骂起街来粗俗得像个骑兵，也不吝惜一些添油加醋的掌故——他儿子的《笑林》（“Contes Drolatiques”）的某些片段很可能就溯源于此——但他却是一个善编故事的巨擘，故事里老实话常常夹杂着吹牛。他还总那么兴高采烈，而且十分精明，尤其在如此动乱的时期决不会为

了支持国王、皇帝或革命而破釜沉舟走上绝路。虽然没有享受到正常教育的益处，但他却显示出广泛的兴趣，而且还设法通过多种口味的阅读的帮助，囤积了一批丰富的包罗万象的知识。他甚至还写过一两本小册子，竟以《偷窃及暗杀之防止方法备忘录》（“Mémoire sur le Moyen de Prévenir les Vols et les Assassinats”）和《关于被遗弃与被欺骗的少女们之伤风败俗的丑闻回忆录》（“Mémoire sur le Scandaleux Désordre Causé par les Filles Trompées et Abandonnées”）为题目。这些作品，当然不能跟他伟大的儿子的那些著作相比，正如歌德的父亲写的意大利日记之不能跟约翰·渥尔夫刚^①的《意大利旅行记》相比一样。

由于精力过剩，生活中充满了从不减色的欢快，他决心很大，一定要当百岁老人。在他满六十岁以后，他又在四个嫡出的孩子之外，增加了好几个私生子；到八十多岁，他还被控告应为一个荡检逾闲的女孩子的怀孕负责。从来没有医生以职业身分跨进他的门槛。他一定要活得超过同代人的决心，由于一件事而更加坚定，那就是他成为所谓拉发惹养老年金

^① 约翰·渥尔夫刚（Johann Wolfgang），即德国大文豪歌德。

(Tontine Lafarge) 的一位领受人，这养老年金，每逢一位领受人死去时，就要按比例增加。那同样的魔力，在儿子则用以雕绘他自己所创造出来的世界中的五花八门的生活；而在父亲，却集中于他自己肉体寿命的延长。他早已越过了所有其他拉发惹养老年金的领受人，一年拿到八千法郎。后来，在他八十三岁那一年上，他竟死于一次愚蠢的无妄之灾。不然的话，象儿子一样，通过意志的绝对集中，他也许真能达到那个简直不可能实现的希望呢。

* * * *

如果说奥璘利在述说故事方面继承了父亲的活力与欢悦，那么在感情的敏锐方面就是从母亲那儿继承来的。那样年轻，而婚姻又决非不美满，她却有个不幸的气质，总觉得自己命薄。丈夫总是在欢欢喜喜、无愁无闷地打发日子，绝对不让妻子的吵吵闹闹和她假想中的病痛妨害他泰然自若的好脾气。而安娜·莎洛特·罗尔·巴尔扎克却是那种招人厌烦的典型，她用各式各样、闪闪发光的歇斯底里叫喊来显示她经常蒙受的委屈。她觉得她从来没有受到家中任何一个人足够地怜爱，足够地恭敬，足够地尊崇。她不停地抱怨孩子们对她伟大的自我牺牲并未足够地知恩感惠。一直到她生命的终结，她从未停止过用

“居心善良”的忠告和泪眼婆婆的苛责来折磨她那已经举世闻名的儿子。然而她却决非缺乏智慧或者缺乏教育。当她还是少女的时候，她就被选为那位银行家杜麦尔先生的女儿的闺中伙伴。这个经历赋予她以某种罗曼蒂克倾向。那些年间，她曾从纯文学汲取了洋溢的热情；到晚年，她对斯威登堡^①等人的神秘作品显示了偏爱。

不过，她那轻微的理想主义气息，不久便被天生的料理钱财的本事淹没了。出自典型的巴黎小资产阶级家庭，从一个小铁器店一文一文积累起来发了家，她把那个阶级发了霉的狭隘本能都带到婚姻里来，尤其是那卖弄本事的贪婪气息，这倒同她丈夫有利的投资以及赚钱的投机的饕餮渴望并不违背。所谓教养儿女，就她这方面的意见而论，就是去教给他们，花钱乃是罪恶，而挣钱才是一切美德之中最值得称许的；就是去怂恿他们，早早为自己终生创造一个稳定的“地位”，或者，如果是女孩子，则觅得一门好亲事；就是不给任何个人自由，一只严厉的眼睛永远监视着他们。有了她的这些讨人嫌的眈眈注视的操心和她那为了孩子们将来的福利的乖戾热心，她

^① 斯威登堡 (Emanuel Swedenborg, 1688—1772)，瑞典哲学家，写过一些宗教作品。

所得到的成功只不过令全家瘫痪麻木，尽管这是她所谓的善意。多年以后，当巴尔扎克早已成年，他还不时回想到在他孩提时候，只要一听见她的声音，总要吓一大跳。

由这位脾气坏、禁忌多的母亲——她曾冷酷地拒绝孩子们的一切情爱表示——加到巴尔扎克身上的苦痛的程度，可以从他一封信中的哀鸣推测出来：“我从来不曾有过母亲。”事隔多时，现在我们已很难搜寻出来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安娜·莎洛特·罗尔·巴尔扎克本能地对两个大孩子，奥璠利和罗尔，态度冷漠，虽然她对那两个小的，劳伦斯和亨利，却又非常纵容。也许是反对她丈夫转而成为自卫的一种反应吧。但不论怎样，极少有母亲会对孩子表现为如此无关痛痒与缺少爱怜，则是无疑的。她的长子刚一出世，她立刻就把他从家里送走，就象他是个麻风病人似的。那时候她还躺在产床上。婴儿交给一个乳母（是位宪兵的妻子）看管，孩子跟着她一直到四岁。即使到这时，尽管住宅非常宽敞，他还是不准回到父母家中，而是被送到一个陌生人家去当半寄食者。只有每个星期日，才准他回到自己家中一次，好象大家是远房亲戚似的。父母不让他同较小的孩子们玩，他没有玩具，也收不到礼物。有病时没有母亲在他床边看

护，也从来不曾从她唇边听到一个慈爱字眼。当他依依接近她的膝头要拥抱她的时候，一声严厉的呵斥自会抑止住这种亲昵企图，仿佛那是太有碍观瞻了。到了七岁，这个没人要的孩子便被打发到旺多姆（Vendôme）一家寄宿学校去。她唯一的愿望，就是他应该到一个离得远一点的什么地方去，远在另一个小城里。又过了七年，当孩子因不堪忍受的惩罚以致回到父母家中而（使寄宿生涯）告一段落时，她竟使得他生活是如此痛苦（用他自己的话说：“la vie si dure^①！”），终于在他满十八岁时，他就毅然决定扔下他那个实在容忍不下去的环境而出走了。

不管他多么温顺——这种温顺已成为他生性中所具有的内在部分——他在成年之后也不能忘记他所尝受过的忽视。过了好久，甚至当他已经把童年时期的虐待者接到自己家里同住，而自己的头发业已斑白，他仍不能忘怀在那些遥远年月里她因拒绝给与怜爱而对他做出的事情，并且以软弱无力的违抗的悲鸣向德·韩斯迦夫人倾吐积愆：

“你真不知道我母亲是怎样的女人！她既是

① “生活是多么艰难啊！”

妖怪，又是妖精般的怪人。目前在当了可怜的劳伦斯和祖母的摧毁者之后，她又在从事驱赶我妹妹进入坟墓。她有一大串的理由恨我，甚至在我出世以前她就恨我。我跟她的关系已濒于决裂，决裂几乎是必要的事了。然而我还是宁愿继续受罪。这个创伤是治不好的。我们曾相信她是发了疯，还请教了一位大夫，他跟她已有三十三年交情。可是他说：‘不，她并不疯，她只是存心不善。’……我母亲就是我一生中降临到我身上的一切灾病的根源。”

这些话，许多年后才从他嘴里吐露出来，正是无数隐痛的答案，而这些隐痛却是在他成长期中最敏感的一个阶段，由那样一个人（按自然规律说，她本该是对他最接近的，本该向他表示最慈爱的献身的）所加给他的。然而，在事实上，她却是唯一要对他遭受痛苦负责的人，用他本人的措辞，“那是曾经落到任何人的命运上的最最可怕的童年。”

* * * *

巴尔扎克消磨在王多姆的那座精神监狱——就是欧瑞多修士学校（The School of Oratorian Brothers）——的六年岁月，是记载在两个非常不同的文件

上的；一件是学校注册簿里的严肃的官方文字，另一件则是一本文学巨著，叫做《路易·蓝柏尔》（“Louis Lambert”）。学校当局只是做了这样枯燥无味的记载：

第四百六十号，奥璘利·巴尔扎克，年龄八岁零一个月。出过天花，但未留残疾。体质是充血性的，有过度亢奋倾向，体温有时上升。一八〇七年六月二十日入学，一八一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离校。信件应寄其父巴尔扎克先生，住杜尔城。

同学们只记得他是 “un gros enfant jouffluet rouge de visage”（一个肥硕、红脸蛋儿的大孩子）。他们所能提供给我们的关于他那个时候的材料，只是他的外表和几桩也不见得很确切的轶事。所以《路易·蓝柏尔》一书中自传性的篇章就更显得动人了。它把一位天才孩子的悲惨的内在生活透露给人们，他的磨难由于他的天才而使他受到双倍的痛苦。

在描写自己的成长年代时，巴尔扎克选用了双重肖像的手法。他自己既是诗人路易·蓝柏尔，又是

哲学家“毕达哥尔”^①。就象少年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和靡非斯特^②两个形象一样，他把自己的个性也分裂为二，把他天才中孪生的基本方面注入于两个不同的角色——一个是创造性成分，它按照活的原形的原始形态形成了幢幢世相；另一个是支配成分，它要把表现在日常生活的伟大舞台上的暗中规律显示出来。事实上，路易·蓝柏尔之为巴尔扎克的小影，要比毕达哥尔真实得多。至少这个看似虚构的人物的外在经验是他自己的。在众多影射他自己的人物中——如《驴皮记》（“La Peau de chagrin”）里的拉发埃尔，《幻灭》（*Illusions perdues*）里的德·阿尔太斯，《十三的故事》（“L’histoire des treize”）里的蒙泰若将军——都不如这个故事如此完全而明显地充满了他个人的经验，故事中孩子的命运，正是被抛掷给教会寄宿学校的斯巴达式的训练。

这所学校，以及它那黝黑的高楼和厚大的墙垣，立于旺多姆的市中心，前临小罗瓦尔河，外观上象是

①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死于公元前 497 年），希腊哲学家及数学家。这里的毕达哥尔（Pythagore）用引号，显然是带有绰号性的名字。

② 浮士德和靡非斯特（Faust and Mephistopheles），歌德《浮士德》中的两个人物。

监狱，而不象一所教育机构。从入学那天起，二三百个学生就受着严格的寺院训练。从来没有假日，父母只有在特殊情形下，才被准许来看望他们的孩子。在整个那些年里，巴尔扎克几乎不曾回过家，于是为了强调与自己童年经验的相似，他把路易·蓝柏尔写成一个无父无母的人。学校的费用，不仅学费，连衣食费用也包括在内，数目是很小的，因而孩子们连最低限度的必需品都十分缺少。那些从父母那里得不到手套和暖和内衣的孩子们——多谢母亲的不关心，巴尔扎克也是不得使用这些舒服东西的孩子们中间的一个——在冬天就得蜷缩着熬过，手指冻裂，脚生冻疮。象他那样肉体上和精神上都特别敏感的人，巴尔扎克——蓝柏尔比起那些农民同学们，更是早早就感到格外受罪了：

由于习惯于乡村空气，习惯于顺乎自然的自由教育，习惯于一位怜爱他的老年人的慈祥照料，习惯于躺在日光下冥想，因而他感到服从校规是非常艰难的：跟其他孩子随行逐队地走路；生活在四面高墙之中；屋里有八十个少年人默坐在木凳上，每人面前一张书桌。他的肉体感官具有高度敏锐性，因而非常脆弱，他身上每根

纤维在这种群居生活的束缚之下都是痛苦的。毒化了空气的呼出的气息，混入了永远是秽恶的教室气味，教室里还零乱地摆着孩子们的残羹剩饭，真使他的嗅觉难堪——而一个人的嗅觉比起所有其他的感觉来，是格外同大脑系统紧密联系着的，所以任何加于嗅觉的损害，势必暗中影响到思维机构。除了从以上这些使空气污浊的贡献以外，还有从那些柜子里，那里是我们每人保存自己的小宝贝的地方，诸如为节日而杀的鸽子啦，从食堂悄悄偷来的吃食啦等等。还有一大块石头，上面总立着两个装满的水桶，当作水槽来用。我们每天早晨一定要一个挨着一个在教师监督下到那儿去洗手洗脸。从那儿我们再前进到一张桌子跟前，那儿有妇女给我们梳头搽粉。我们的寝室，每天只在我们起床以前打扫一次房间，永远是脏的，虽然有不少窗户和高大门洞，空气却永远是沉浊的。臭气来自洗脸处和梳头的那个角落，来自柜子里，来自每个孩子都有的上千件东西，还有最后，却不是最少，来自八十个挤在一起的肉体。缺乏乡间的洁净、芳香的空气，而他向来是住在乡下的；习惯的改变；严格的训练——这一切都使蓝柏尔充

满了忧郁。他左手托着下巴，臂肘放在书桌上，以眺望天井里的绿树和天空中的云彩来消磨他在教室里的时间。看上去他在用功，可是当教师觉察，他的笔并没有移动，面前仍是白纸一张的时候，他就会叫道：“蓝柏尔，你又偷懒了！”

教师们下意识地觉察出来，当他们对他加以诱导时，这孩子内心里却有一种力量足能抵制他们的影响。而他们却不曾理会，他内心正经历着一种特殊的变化，他们只知道他不按正当、通常的方法去读和学。他们认为，他不是笨就是懒，不是固执任性就是胡思乱想，因为他不象其他的孩子那样保持平稳步伐，而是有时落在后面，有时又一跃而赶上他们。不管怎么样，反正再没有一个孩子比他挨打挨得更厉害的了。他不断受到惩罚。对他来说从来没有游戏和闲暇的时候。斥责复斥责，他经常受到禁锢，有一次在两年期间，竟没有过上六天以上的自由日子。更频繁、更残忍的乃是体罚，亦即他的严酷的老师们的“最后手段”，那是这位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时时身受的：

这孩子非常软弱，却又非常坚强……他的

确把肉体 and 心灵的两杯苦酒都饮到了最后一滴。他象船上奴隶被拴在凳子上一样拴在书桌上，挨着棍子敲打，受着疾病磨折，每种感官都受到迫害，象被老虎钳子钳住，因为周围事物对他极其可厌，他就这样被迫地任凭只不过是外壳的身体去承受学校里的千般暴政了。……我们肉体所承受的痛苦中，最剧烈的无疑要算是皮带的抽打了。皮带约有两指厚，教师以其最大限度的气力和愤怒，把它向我们伸出的手掌抽来。为了接受这种惩罚，犯人从凳子上站起来之后，在同学们好奇而常常带有侮慢神气的睽睽众目之下走到教师书桌跟前，他必须在教室中间跪下。这些准备动作之能加强精神格外敏感者的苦痛，恰如昔日从囚牢走向绞架行列更增加被判刑者的磨难一样。有些人在挨打以前以后都有几声尖叫和哭出的热泪，另一些人则以面不改色的表情来承受苦难，他们都各自按照自己的性格。可是即使意志最坚强的孩子，当他在等待第一下抽搥的时候，也罕能制止脸上一阵阵痉挛的抽搐。

路易·蓝柏尔被单独挑出来不知挨了多少次抽打。这要怪他天性中的一个特点，而他自己

却长久不曾觉察。当他从白日梦里被老师一声“蓝柏尔，你又偷懒了！”的尖叫突然惊起时，他常常要对干扰者投去桀骜不驯的轻蔑的一瞥，这一瞥蓄足了秘密的思想，就象莱顿瓶里蓄足的电荷一样。这种眼光的交换定然给了老师不愉快之感，于是学生眼光中缄默的侮弄所引起的怨恚便使他急于要矫正孩子的这个习惯。当教士首次感觉到这种蔑视的眼神象一道闪电对准这个方向投来的时候，他发出了下述的警告，那是我至今不忘的——“你要还敢象那样看着我，蓝柏尔，你就得挨揍！”

在整个这些年里，这些苛刻的教士在发现巴尔扎克的隐秘这件事上绝无一个是成功的。他们在他身上只见到一个在拉丁文以及词汇知识方面落在别人后面的学生，却丝毫不曾察觉他对一些事物在未经充分解释之前便能顿悟的奇才。他们认为他松散懈怠又漫不经心，却未能识透他所以对功课感到烦扰困惫，实在是因为功课太容易了，而他表面上的游手好闲，只是由于 *Congestion d'idées*（概念堆积）所带来的筋疲力尽。没有一个老师发现这个面团团的孩子，这个 “*enfant gros et joufflu*”（又肥又大的孩

子)早已被智慧飞翔之力带到那窒息的教室之外的天地中去了。老师也不知道在这些年轻的学员中,他是唯一的一位在暗中度着双重生活的人。

那个另外的世界,在他十二三岁时使他真正所寄居的,是书籍的世界。一个工业大学的图书馆员,那时正在给他私下补习数学——这就是巴尔扎克一生一直享有一个文艺界里哪儿也找不到的那么坏的数目字头脑的理由了——答应这孩子可以把他的课余喜欢阅读的任何书籍拿走,虽然他未曾想到这位贪婪的少年读者利用这个优待会达到如此无节制的程度。这些书籍成了巴尔扎克的救星。它们慰抚了学校岁月里一直压抑着他的一切苦楚和屈辱。“假如我们当初未能读到图书馆里的书以维持思维活跃,这种制度早已彻底摧毁我们的生命了。”他在学校里和操场上的真实生活虽然褪入薄暮,而书籍却将他引入一个世界,这对他才是唯一的真实的世界。

“从这时起,”他谈论路易·蓝柏尔,他的化身,“他发展为无餍的饥饿,那是绝对制止不了的。他吞噬了各类书籍,他吸取各种神学、历史、哲学、科学作品。就在上学期间这些暗中读书的时间里奠定了巴尔扎克后来的无所不知的深厚基础。亿万的事实与细节,靠着若有神助的警觉和迅速的记忆力,都牢

牢地浇注在他的心灵里。没有别的东西比他描写路易·蓝柏尔暗中读书的秘密的欢乐能够更清楚地说明巴尔扎克悟性这个无双奇迹了：

通过阅读吸取思想，在他这情况业已达到了非凡的比例。他一目可下七八行，行间的意义被心灵摄取，其速度堪与眼睛的敏捷配合。常常是，一个单字就足够给予他整句的意思。他的记忆力惊人。他能真切地记住阅读所获得的观念，并不下于他自己悟出来的或在谈话中听到的那些观念。干脆说，他的记忆力并非属于某一类型，而是各型具备的——地点的、名氏的、字句的、事物的、相貌的各种记忆力。他不仅能记住他想记住的事，而且，用他内在的目光，他还看到它们的情况、姿态、色彩，仿佛这些事物是曾经一度呈现在他面前的真实。若是谈到那难以理解的推理过程，他也赋有同样的才能。他能，用他自己的说法，不但记得第一次涉猎过的书本上各种观念的安排方式，还能记住很久以前自己心灵各个阶段上的状态。那也就是说，他的记忆力具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本领，能够回想心灵所曾经通过的各个不同阶段，和有助于

它的成长的全部活动——从进入他心灵的第一个思想，到他最近捕捉到的一个观念，最复杂的和最简单的都一样。他的脑子，自早年就习惯于这种集中人类能力的复杂机构，现在从富饶的贮藏所中吸收了一堆丰富的影象，都非常明晰、新鲜，并且在心灵积极深思时构成营养。十二岁时，他的想象力为从不间断的运用所激发，已经发展到一个高度，能使他把那些只是从书本上得到的事物构成非常真切的概念，它们的影象，即使他实际上见到了，也不见得呈现得更清楚些。他也许最善于举一反三，也许先天赋有一种第二视觉的本领，使他理解大自然的整个轨道。

“当我读到一段奥斯特里兹（Austerlitz）战役的描写，”一天他向我说，“我就看见发生的一切。连珠炮声、士卒喊杀声震荡我耳鼓，激动我的心田深处。我嗅到火药味，听到马蹄声以及士兵们的各色噪音。我凝视平原，只见两族酣战，宛如我正立在散登（sanlon）山上，这幅景象就如《启示录》中的一节那样惊心动魄。”

当他身上的每根纤维都这样集中于他所读之物，他好象就已不知肉体之存在，只凭潜在的力量而生存，而这种潜在力量已扩大得超出正

常。用他自己的说法，他已“遗世而忘我”。

然而在茫乎若迷地神游于太空之后，精神上带着狂欢后的疲倦，这个困惫不堪的孩子又不得不穿上他所厌恶的僧服去与村童为伍，他们愚蠢的头脑在哼哧哼哧地跟随着教师的讲授，就象跟随着犁耙一样。当他的心灵还为那些奥秘问题兴奋着的时候，却又被人期待着去留心 *mensa, mensam, mensae*^① 以及拉丁文法的规则了。倚仗他优越的才智，能使他只要大略翻阅一遍就可以背下一页书，他不必嘀咕去听老师讲些什么，而可以继续去回味从书里发现的种种思想。对于他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物质世界的轻视，常常要付出昂贵的代价：

我们的记忆力非常之好，不必为准备功课费事。我们只需要听同学们背诵法文或拉丁文的章节，或是重述文法规则，也就能照样来干了。可是，很不幸，有时候老师心血来潮，变更了平常招唤孩子们的次序而首先招唤我们，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甚至于常常连功课是什么都

① 这里是指 *mensa* 这个字的语尾变化。

不知道。最巧妙的遁词也挡不住避免不了的斥责，但这种斥责不到最后一刹那，我们也是不去理睬的。如果有一本书我们想把它读完，或是我们迷失在白日梦里了，斥责便被忘得一干二净，这样却又引出了更多的受处罚的功课来。

这个早熟的孩子受到的严厉惩罚愈来愈多，直到最后，甚至连 *culotte de bois*^① 也都用上了，这是中世纪的一种足枷，是李尔王（King Lear）用来惩治诚实的坎特（Kent）的^②。直到他感到神经崩溃之时——这个使他从僧院式学校里脱离苦海的病痛的性质至今尚未被人发现——他才得以离开了童年的这所监狱，在那儿，“Par tous les points où la douleur a prise sur l'âme et sur la chair”^③，他都受到了。

* * * * *

在这次精神奴役获得最后豁免之前，在路易·蓝柏尔的 *histoire intellectuelle*（智力经历）中还有一段插曲，有极大可能并不是纯属子虚的。巴尔扎克描

① 木裤，一种刑具的名称。

② 见莎士比亚《李尔王》剧本

③ 无论在精神还是肉体方面的每一点上所受的苦。

写了他的 *altere go* (第二个自我), 即假想的路易·蓝柏尔, 在十二岁时曾怎样写了一篇 “*Trailé de la Volonté*”^①, 一篇讨论 *psychophysical*^② 的哲学论文, 这篇文章被几个不怀好意的同学给抢走了, 他们对这种 “*muette aristocratie*” (沉默的贵族精神) 甚为忿恨。教师之中最令人害怕的一位铁面无私的家伙, “*terrible père Haugoult*” (可怕的奥古尔神父), 他是巴尔扎克儿时的太岁星, 听到了骚扰就把稿子拿走, 交给了收购废纸的小贩, 而 “*sans connaître l'importance des trésors scientifiques dont les germes avortés se dissipèrent en d'ignorantes mains*” (一点不知道这些科学宝藏的重要, 使其尚未成形的萌芽消灭在无知的手中了)。这一场面连细节都被描绘得生动而忠实, 还包括被触怒的孩子无力的愤慨, 因而说它是编造出来的, 就很不象。然而, 究竟是巴尔扎克曾以他幼年的文艺创作领略过这一类经验呢, 还是他真的在这么小的年纪就已经撰述过这么一篇《意志论》, 并且把意志的观念与原则阐述得如此周详? 他真的是如此地早熟, 以致敢于着手这一类的著作? 是巴尔扎克, 那个活生生的孩子巴尔扎克,

① 《意志论》。

② 心理与肉体之联系。

作出这篇论文呢，抑或只不过是其所虚构的路易·蓝柏尔，他的想象力所创造出来的精神弟兄呢？

这些都是永远也不能找到圆满答复的问题。不过有可断言者，在他幼年——因为思想家基本观念的焦点，总是在他发育的年代就发现的——巴尔扎克确乎想到过要写这样一篇论文，后来他才把具体的形式给予了《人间喜剧》中的角色们所表现的冲动力的无数方面和人类意志的性格。不然的话，在他第一部小说《驴皮记》里，主人公也研究《意志论》，那就未免过于巧合了。这个想要有所发现的计划，“lois générales dont la formule sera peut-être ma gloire”^①，必然是个支配巴尔扎克幼年的中心意念，一个根本意念。我们有比推测更坚实得多的理由来相信，研究心灵与肉体之间的关系的第一个诱因刺激，就是在他初上学校时来到的。

他的一位先生，戴赛因，也象许许多多同时代的人一样，倾倒于梅斯美尔和高勒^②那种被曲解了的学说的魔力，是题为“Etudes de l'homme moral fondées sur les rapports de ses facultés avec son or-

① 其发现恐怕将是我的荣誉的普遍定律。

② 梅斯美尔（Mesmer，1734—1815），奥地利医师。高勒（Gall），未详。

ganisme”^①一书的作者。无疑地他曾把对这个问题的观念传达给学生们，唤起班上唯一的天才儿童要当一位意志化学家的雄心。当时所流行的一种所谓运动的主权物质（A Kinetic sovereign substance）的概念满足了他的自觉的冲动，他想要发现藏在无秩序的宇宙的背后方法。一生都被势不可当的众多心理现象所困惑的巴尔扎克，在写《人间喜剧》很久以前，就打算把这个庞大的浑沌世界改造成外表上颇有秩序的体系，还要把它的法则与组成部分记录清楚，目的在于把精神活动背后的状况给树立起来，就象居维埃^②关于兽国所做的那样。至于他是否在这样的幼年年纪就确立了写作中的观点，那是很难知道的。在路易·蓝柏尔的《意志论》里所阐述的那些混乱的原理，并非十二岁的巴尔扎克所有，这已由一事实证明；原来这些原理在一八三二年印的小说的初版中并未出现，而是在后来的版本里以一种即兴方式插进去的。

*

*

*

*

*

当他在十四岁时如此突然地离开学校的时候，他才算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了父母的家庭。父亲和

① 《就财产与肉体之关系论人之精神》。

② 居维埃（Cuvier，1769—1832），法国生物学家。

母亲，他们以前只是在他偶尔探省的时候接见过他，现在发现他外表和内心都完全改变了。那个圆面孔、健壮、好脾气的“又肥又大的孩子”，在六年多僧院式的苦修之后，现在不见了，回来的竟是一个形容枯槁、非常亢奋的儿童，带着睁大的惊怖的眼睛。他回到家来竟象一个有过怕人的、一言难尽的经历的人。他妹妹后来描写他的举止，说他象一个怔忡的梦游人，以茫然的凝视摸索着道路。你要问他问题，他象是听不见，只是懵懵懂懂地呆坐一旁，并以那种隐秘自己优越感的缄默惹得他母亲大为不快。最后——跟他一生中所有危急关头一样——他那种由继承而来的活力又占了优势。他又变得愉快而健谈了。可是又过了头，致使他母亲并不高兴。

为了使他所受的教育得到补充，他又被送到杜尔的中学去，到一八一四年底，当全家从杜尔搬到巴黎时，他进了黎毕德先生的寄宿学校。这位黎毕德先生，大革命时期的黎毕德公民，以前曾是担任巴黎过激派市府委员的巴尔扎克父亲的朋友，而且他还在历史上挣得一席之地，因为他是企图从巴黎监狱里搭救玛利·安朵奈特^①的领导者之一。现在他只是一

^① 玛利·安朵奈特 (Marie Antoinette, 1755—1793)，法王路易十六的王后，在位十九年 (1774—1793)。

个机构的才德孚望的首长，这机构是从事辅助青年士子通过考试的。在这个寄宿学校里，照样，由于没有人向他施与他所需要的爱怜，这孩子总被一种压抑之感紧逼着，觉得自己是被摈逐与被遗弃的。于是他在《驴皮记》里把下面这些话置于拉发埃尔口中，这是他青年时代的另一个反映：

我在我家里从家人那里，和在学校里所受到过的痛苦，现在在黎毕德寄宿学校期间又以不同方式重新遭受到。父亲从来不给我一点零用钱。我的父母想到我有吃有穿，肚子里又塞满拉丁文、希腊文，他们就心满意足了。生活在寄宿学校期间，我结识了上千位同学，却无论如何也想不出遇见过一次某个孩子的父母如此不关痛痒的例子。

在这所学校里巴尔扎克还是不能使自己出人头地，成为“好学生”，这显然是出于他的内心抗拒。于是他那恼火的父母又把他送进另一所学校，而在那儿，他的成绩仍不见佳。在约有三十五个孩子的班上，他的拉丁文列在第三十二名，这个结果使母亲证实了奥瑙利是个 *raté*（废物）、并已成为无用之徒的

怀疑。于是她给这年方十七的少年用直到他五十岁时都感到心灰气馁的泪眼婆娑、自伤薄命的语调，写了下面这封警告信：

亲爱的奥瑙利：

我简直找不出字眼儿来形容你给我造成的痛苦。你真让我太不高兴了，虽然我为孩子们尽了我之所能，本该期待他们会使我高兴的！

善良可敬的让赛尔先生告诉我你的翻译课竟降到第三十二名了!!! ……他还说前几天你又非常顽皮。因而我本来期许的来日快乐又都成为泡影……

本来我们明天八点钟要见面的。我们本来可以一起吃午饭、晚饭，还要仔细谈谈，互相诉说各色各样的事情。但是现在，你如此不肯勤奋，如此漫无检束，如此荒疏功课，逼得我只好让你得到应得的惩罚。我的内心现在是多么空虚！旅程又显得多么遥远！你在班上得到这样坏的名次，我将瞒着你父亲，因为那样他一定会不准你出来，虽然你的学校休假日是为了有用的目的，而绝非仅仅为了个人享乐。跳舞老师明天四点半钟来。我将派人接你，课后送你回去。假

如我用另外的态度对待你，就要算是疏忽了对孩子的钟爱所赋予我的职责了。

可是，不管母亲有多少不祥的预感，不管她把多少斥责堆到他身上，他却居然想尽一切办法完成了学业。一八一六年十一月四日这天，他竟以法学系学生的身分进入了大学。

一八一六年十一月四日，理应标志着奴役生活的结束和年轻大学生的自由曙光。他应该能够以独立自主的意识去追求学业，并且根据性之所好去利用余暇。然而父母却另有看法。年轻人就不应该有余暇。他的时间里没有一分钟应当做为余暇。他应该去挣钱。白天在大学里偶尔听听课，晚上学习六法全书，这就够了。白天他还应该找个职业。在为前程做准备时，是一个小时也不应该浪费，一文不必要的钱也不该乱花的。于是他一面在大学上学，一面又到一位律师，居扬奈·德·麦尔维耶先生的事务所里去干一个办事员的苦差。这位律师，顺便说一下，是他第一位衷心表示敬佩的雇主，还把他写做名叫戴尔维耶的角色而使他垂名后世，因为他有智慧去赏识他的这个办事员的才智，还慨然同这个后生订定了交谊。

两年以后，巴尔扎克被转介到叫作巴赛的一位录事那里去，他是巴尔扎克家的朋友，于此，他之成为一位勤勉公民的未来，看来已是无疑的了。一月四日那天，奥瑙利终于置身于“正”途，获得了学士学位。他不久即将取得才德孚望的律师的合作者职务，一旦主人巴赛告老或者逝世，他年轻的合作人便可独揽其职。那么他就可以结婚——当然对方该是有好地位的阔人家——最后终将给那多疑的母亲，所有的巴尔扎克和萨郎比耶家族，以及他会有的任何亲眷，都增加了光彩。他的传记将是只有福楼拜^①才能写的了，他将成为可敬的、正常的资产阶级生涯中的表率人物，成为另一位波华尔或白居晒先生。

然而，这些年来一直抑制着、憋闷着的反叛的火焰，却在巴尔扎克胸中燃烧起来。在一八一九年春季的一天，他突然从律师事务所的凳子上跳了起来，扔开摊在桌上的灰尘封积的卷宗。他真过够了这种日子，没有一天给过他一点自由与快乐。有生以来第一次他昂起了头，毅然决然以自己的意志对抗了家庭的意志，毫不迟疑地宣告他决不打算去做一名录事、律师、审判官，或是接受任何官方职位。事实上，他

^① 福楼拜 (Flaubert, 1821—1880)，法国著名小说家。下面的波华尔 (Bouvard) 和白居晒 (pécuchet) 都是福楼拜小说中的人物。

不想厕身于任何资产阶级职业。他决意要成为作家，并且，仗着未来的杰作，获取独立自主、财富和名声。

第 二 章

对于命运的过早质疑

我遭受的忧患使我未老先衰。……你简直不能想象我一直到二十二岁过的都是什么日子。

——一八二八年致德·阿伯朗台公爵夫人书

奥瑙利突然声明要当作家而不做律师，象晴天霹雳给始料未及的家庭一个打击！居然要放弃一个有保证的职业！一位巴尔扎克，备受尊敬的萨郎比耶家的外孙，竟去献身象著作这种靠不住的手艺！保障在哪里？拿到固定可靠的收入的把握在哪里？文学！诗歌！这全是多余的奢侈品。一位象德·夏多布利昂子爵^①这样的人才能够耽溺其中，因为他在布列塔尼

^① 德·夏多布利昂子爵（Vicomte de Chateaubriand，1768—1848），法国作家，政治家。

的某处有漂亮城堡；或者一位德·拉马丁先生^①，或是雨果将军的哲嗣^②也行。可这决不是中等家庭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子弟所能搞的。而且不管是谁，这个不孝顺的年轻人又什么时候在这个方面显出过一丝轻微材具呢？有谁曾经读过他写的一篇简练文章？他的诗歌在本地报纸上登载过么？都从来没有过！凡是他上过的学校，他的名次总排列在笨货堆里。拉丁文他考第三十二，数学成绩就更不用提了，而数学毕竟是每个诚实的买卖人最要紧的学问哩！

加以，这个声明又发表在不吉利的时刻，因为老巴尔扎克的财务情况正陷于纠缠的局势之中。波旁王朝的复辟（The Bourbon Restoration）使欧洲的战争告一段落，从而挖掉了在最容易发洋财的整个拿破仑年代里供养卑鄙的战争吸血寄生虫们的老根。对军需供应人和发战争财的人来说，不景气的辰光来到了。老巴尔扎克八千法郎的肥薪，被改为菲薄的年俸，此外，使他更加困窘的是，在杜麦尔银行的破产以及在其它投机事业中他的大受诈骗。不过家庭

① 德·拉马丁先生（Monsieur de Lamartine, 1790—1869），法国著名诗人，历史学家和政治家。

② 雨果将军（Général Hugo）的哲嗣，指法国著名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维克多·玛利·雨果（Victor Marie Hugo, 1802—1885）。

还称得起生活舒适，并且，以后我们就会知道，还放着有好几大千的存款以为未雨绸缪。然而，在小资产阶级中有一条不成文法，它比任何一条国家法律都被更加严格地遵守着，就是每一笔收入减少，必须立刻以双倍的节省与之相抵。因此巴尔扎克一家决计放弃了巴黎的住宅，搬到俭省一点的地方去，于是到了维尔巴黎西，距首都二十公里，在那儿，生活水准的降低，做起来比较不那么显眼。就在这个不前不后的当口，他们的胸无城府的儿子——他们本已认为他从此不再仰仗他们了——选来发表这个吓人一跳的声明，说是他不仅要成为一个作家，而且还希望父母在他游手好闲期间给予接济。

那当然是不能考虑的！父母两人对于这一层是坚决一致的，他们还号召朋友亲戚都起来支持他们，那些人，当然，全都异口同声反对这位年轻废物的异想天开。老巴尔扎克是在这件事情上最心平气和的人。他不喜欢家庭诟谇，最后只是喃喃地、和蔼地说，“为什么就不行呢？”由于本身就是个老冒险家、行险以侥幸者，职业换了十几回，直到晚年才在舒适的资产阶级生活中安顿下来，他并不能在这个古怪儿子的狂妄思想上激起什么炽烈的愤怒。奥瑙利心爱的妹妹，罗尔，也站在他一边，虽然是秘密地。她对诗

歌有一种浪漫主义色彩的倾慕，假如有一位出名的哥哥，这个念头很能迎合她的虚荣心。在女儿美梦中以为光荣的东西，在比较平庸的母亲眼里却被看成一件深重的屈辱。一旦她的亲戚们得知这个倒楣消息，说娘家是萨郎比耶的巴尔扎克太太的少爷当了写书的作者或报纸投稿人，她还怎能在他们面前抬起头来啊！带着资产阶级对于缺乏稳定根基的谋生之道的厌恶，她投入了这场争吵。不行！不行！这个懒惰的下流坯，他在学校里既没有一样是好的，决不准许他耽溺于这种挣不来面包的胡思乱想！为了法律训练所花的费用，都是硬币支付的。一劳永逸，现在必须让这个滑稽的计划马上结束。

可是现在，她竟然头一回猝然遇到阻力，那是她在天性老实、随遇而安的儿子身上从来没有猜想到的——即奥璠利·德·巴尔扎克的不屈不挠、不可动摇的意志。而这种意志，既然拿破仑已经垮台了，在欧洲就再没有堪与匹敌的了。凡是巴尔扎克想做的事，对他就是唯一的现实，而当他打定主意的时候，什么不可能的事他也可以完成。眼泪也罢，诱导也罢，苦求也罢，歇斯底里的痉挛也罢，都不能劝服他改变计划。他已立意要成为伟大作家，而不是律师——而现在，全世界是他的证人，他实现了他的雄心

壮志。

经过了旷日持久的艰苦斗争，全家达成了典型的布尔乔亚折衷协议。伟大的试验被置于健全的基础上。奥瑙利可以走自己的道路。他被允许使自己变成一个伟大而著名的作家的本领受到考验。但是这应该如何去做却是他自己的事。家里将在这件很靠不住的事业上投下一笔数字极其有限的资金。父母准备在不超过两年的期限内对他那很可怀疑的才干进行资助，如果在此期限之末他还未成为伟大而著名的作家，他就得回到律师事务所的凳子上去；否则，他们就要撤销对浪子的支持。

父亲跟孩子订下了一份古怪的合同。在精确计算过的最低生活水准的基础上，父母确认每月付给一百二十法郎，也就是说，每天四个法郎，作为儿子在不朽业绩的探索航程中的生活费。这要算是老巴尔扎克一笔最好的生意了，比起以往他曾在上面签过名的一切军需合同和金钱投机都获利多多。

执拗的母亲第一次被迫在比她自己更坚强的意志面前让了步，我们可以想象得出她在这样做的时候有多么失望，因为她十二分确信她儿子正在把自己的一生毁于对妄想的顽强追求上。她的首要工作就是，要在可敬的萨郎比耶家族面前隐瞒奥瑙利已

经抛弃了可尊敬的职业，正在进行一个荒谬的尝试以图立足于世的这一事实。为了掩盖儿子将到巴黎去的真相，她告知亲戚们，说是由于健康原因他已去南方一位表弟家暂住。她的希望是，要么他不久就会当作转瞬即逝的遐想而抛弃他所选择的这一荒唐可笑的前提；要么就是这不孝顺的孩子认识到自己的愚蠢；那样就无需使任何人听说他的越轨行为，而这种行为多半是会损坏名誉，影响婚姻前景，并使他失去法律主顾的。

在为各种可能做准备时，她在悄悄地安排计划。既然慈爱与恳求，为劝阻她这位倔强的儿子不要从事他所选择的这桩玷誉的行业都属无效，她就该试试诡谲与坚韧。他必须挨饿。他该知道在家里一切是多么舒服，炉火熊熊的律师事务所里是多么温暖。只要他在巴黎不得不勒紧裤带，用不了多久那夸大其辞的计划就会瓦解。只要他的手指在阁楼上冻得发木，他不久就会停止他那愚蠢的涂鸦。于是在照应他的福利的借口下，她陪他到巴黎去帮他赁了一间屋子，但是她选中的这间屋子，就是在巴黎贫民窟中也要算是最穷、最破、最不舒服的宿处了。她的用意就在于软化他的决心，破坏他的意志。

*

*

*

*

*

莱斯底居耶尔街九号现在早已拆毁，这是很可惜的，因为巴黎再也没有比这间凄凉的阁楼更可以用来纪念热情的自我牺牲精神的纪念品了。关于这间屋子的描写，在《驴皮记》中还可以找到。一座黑暗恶臭的楼梯间，经过五段楼梯，就到达一扇破门，那是由几块木板草草拼成的。开门以后，你就可以摸索着进入一间又低又暗、冬天冰冷、夏天焦热的阁楼。即使只要每月五法郎的名义房租——合三个苏一天——房东太太也找不到愿意住到这个窠洞里来的人，而恰恰就是“这间堪与威尼斯铅板屋顶媲美的窟穴”，他的母亲却选中了，为了使这个正在发芽的作家心里引起对于新职业的憎厌：

真没有比这间阁楼的四百肮脏黄墙冒着穷气更惹人讨厌的了。……房间几乎一直斜到地板上，穿过稀疏的屋瓦便清楚地看见天空。……这住处一天破费我三个苏，夜里点的灯油又破费我另外三个苏。我自己收拾屋子。我穿法兰绒衬衫，因为花不起一天两个苏的洗衣费。我用煤炭取暖，那费用在一年里摊开来算，每天合两个苏。……这些开支加起来不超过十八个苏，因而还留下两个苏以备不时之需。我不记得在艺术

桥的漫长、困苦的日子里曾为用水付过钱。每天早晨我从圣米歇尔广场的喷泉取水。……在我的僧院式独居生活的最初十个月里，我就这样在贫乏与蛰伏的方式下生活，既是自己的主人，也是自己的仆人。带着难以形容的锐气，我过着戴奥金尼斯^①的生活。

巴尔扎克的母亲成竹在胸，决不采取任何措施来使这间囚室稍微舒服一点，或者稍微象个住处。她恨不得愈快愈好，能使儿子被这种不适驱回到正常的生活方式。巴尔扎克只得到几件必不可少的东西来装备他的阁楼，这些都是从家中杂物堆房里弄来的——一张死硬的平板床，“象个可怜的架子”；一张小橡木桌子，盖着几块破皮子；两把旧椅子。如是而已。有床可睡，有桌子可用，还有可坐的地方。他所最热切的渴望，是准许租用一架小钢琴，却未被允许；过了几天，他不得不写信回家，乞求“白绵线袜，灰毛丝袜和一块手帕”。而当他弄到一张版画和一面镀金方镜的时候，他母亲便写信给罗尔，嘱咐她对哥哥的“奢侈”要多加责备。

可是，巴尔扎克的想象力要比环境的现实情况

^① 戴奥金尼斯(Diogenes, 公元前 412? —323), 希腊苦行哲学家。

强过一千倍。他的眼睛赋予最不起眼的东西以活生生的趣味，还能抬高可嫌之物的身价。甚至于从他那洞窟里看到的巴黎灰色房顶的凄凉景色也给他慰藉。再从《驴皮记》里引一段：

我还记得，当我坐在窗前吸进新鲜空气时，我多么高兴地把面包浸入牛奶碗里。我的目光漫游于一幅覆盖着绿色或淡黄苔藓的棕色、红色、浅灰色的屋瓦或石板的屋顶形成的风景。起初，这景色投入我眼中显得非常单调，可是不久我就发现那里面的特殊美丽。黄昏被日光照耀，不合扇的百叶窗在这片奇异风景中勾勒成一个个黑洞。还有路灯暗淡的微芒，穿过雾层，向下投散着淡黄色的反光，以微弱的控诉光辉，把拥挤的屋顶起伏映射在人行道上，象是一片建筑物的茫茫大海。时不时有些古怪人影浮现于朦胧平野的中央。在某个屋顶花园的花丛间，我看见一位老妇人刻削、伛偻的侧影，她正在浇金莲花。映在另一家阁楼的破窗框上的是一位正在梳妆的少女的剪影，她还以为没有人注意到她呢。我只能看见她的俏丽额头，还有那长长的辫子，她正用娉婷玉臂把辫子举到亮处。我快活地

凝视着屋顶承溜中那些朝生暮死的植物，都是被疾风吹到高处来的可怜野草。我又观察苔藓和它们被雨滴滋润后的颜色，它们在日光下变成干燥的天鹅绒了，带着各种奇妙的棕色层次。最后，那些富有诗意的飞逝的昼间印象，烟霭的哀愁，日影的突现，夜色的宁静变幻，日出的神秘，屋上的炊烟——所有这些在大自然这个奇妙领地上所发生的事情都变得对我很亲切，使我感到娱悦。我爱上了我这间囚室了。我呆在那儿，是因为我乐于这样做。这些巴黎草原，由许多单调屋顶形成，象浩瀚平野覆盖在伸展其下的生命深渊之上。这草原走进了我的灵魂，而同我的玄想融汇在一起。

当他在晴朗的日子离开房间去耽溺于他允许自己的唯一快乐时——因为这不费一钱——他就顺着布尔东大道向圣·昂徒阿纳镇信步徜徉，同时呼吸点新鲜空气。这种片刻的漫步是一副兴奋剂，也是一种精神生活。他在《发西诺·卡因》（“Facino Cane”）里记载着：

惟有一种迷恋能把我从工作中攫走——不

过这难道不也是工作中的一部分么？我开始观察这个小镇的活动，它的居民，它的性格。我穿得同当地工人一样坏，在外表上随随便便。我能混在他们当中，使他们对我毫无隐瞒。我能加入他们一伙，看他们购买东西，谛听他们下班后回家途中的谈话。这种观察不久就在我身上变成了直觉；我能洞察他们的灵魂，而同时并不影响注意他们的外表，或者毋宁说，我已把他们的外表非常彻底地把握住，以至于立刻就把他们的底里看透。我的观察方法赋予我以才能，使我也能感受到某一位个别的人的生活，跟他自己一样；这种方法使我可以置身于彼人的地位，就象《天方夜谭》里的那位托钵僧，只要他对谁一念魔咒，就可以取得那个人的外貌和灵魂。

我了解这些人的行为，我袒护他们的生活方式，我感到他们的破衣就披在我肩头，我脚上就穿着他们的破鞋走路；他们的愿望与苦难浸入我的心灵，或者说我的心灵走进了他们的愿望与苦难。正象一场醒着的梦。我跟他们一道，冲着那些虐待他们的雇主，冲着各种各样用来逼迫他们反复多次才能拿到工资的恶毒诡计，感到想不可遏了。我自得其乐，一是放弃了自己

的习惯，二是在某种道德力量的陶醉下转化成为另一个人，三是一有兴致就随时做此游戏。我哪里来的这种天才呢？是不是第二视觉？是不是一种如果滥用就会发疯的气质？我至今不曾探索出这力量的来源。我当时据有了它，而且也利用了它——如此而已。

唯一重要的是，从那时起我就能把我们称之为“人民”的那个综合集团的成分，深入分解成若干组成部分。我分解了他们，并且能够辨别出来他们的好气质和坏气质。我深知这个小镇对于我的重要性，这个革命的温床，有它的英雄、发明家、有实践智慧的人，流氓与罪犯，美德与邪恶，一切一切都陷于忧患，制于贫困，沉湎于葡萄酒，毁于白兰地。你简直不能想象，在这座痛苦的小城里展开过多少数不胜数的奇遇而无人注意，有过多少立刻就被别人忘却的戏剧！在这儿能够看到多么可怕、然而又是多么美丽的事情啊！再丰富的想象力也决不能洞察隐藏在这儿、从未被人发现过的现实。你一定要深深潜入，才能发现这些非凡的戏剧，这些悲剧或喜剧，这些产生于机遇的杰作！

屋里的书籍，街上的行人，一副有本事透视一切

——无论是思想还是行动——的眼光，这些东西用来建造一个自己的世界也就够了。从巴尔扎克开始写作的那时起，除了他自己所创造出来的东西以外，在他周围就没有一样是真实的了。

* * * * *

在艰难苦恨地买来的自由的头几天，巴尔扎克用来布置他文学劳作的凄凉寓所。他不感屈尊地亲自动手粉刷、糊贴斑驳的墙壁。他把带来的几本书摆列起来，又从图书馆取来几本。他把白稿纸叠得整整齐齐，它们就要接受他即将写上的杰作了。他又给自己削了几支鹅毛笔，买了一支蜡烛，它的烛台就用一个空瓶子，又弄了点灯油，那将是照临在劳作的无垠沙漠上的黑夜的阳光。

万事俱已齐备——只差一件不算不要紧的小事。这位自命不凡的作家还没有拿定主意，他究竟要写什么呢。他埋首于窟穴之中，不等杰作完成决不离开惊人决心，不过是从简单本能中钻出来的遐想而已。到了现在，他准备开始了，却还没有确定的计划，或者，毋宁说，他还在一百样未酝酿成熟的计划中间茫然摸索。在二十一岁这个年纪上，他到底也不曾弄明确自己究竟是什么样，或者说不知道自己希望变成什么样，是哲学家呢，还是诗人、小说家、戏剧家、科学家。他意识到自己内心的力量，可是不知

道把它使用在什么方向上：

我心中自有如此信念：我有要表达的意念，要建造的体系，一种要阐明的学问。

但是要向什么意念，什么体系，什么文学体裁，奉献自己的天才呢？心灵上的磁极还未发现，意志的罗盘针左右摇摆。他把带来的草稿拿出来一看，全是片段，没有一篇完成的，他也不能从它们当中找到一块助他跃进不朽英名的合适跳板。倒是有几页带着《灵魂不朽的随笔》、或《哲学与宗教随笔》这类标题，部分是讲义与读书札记，部分是草稿，到了今天，那上面唯一引人注目的东西是这么一句备忘的话：“我将于写完悲剧之后，再把这个整理出来。”

还有一些片段诗句，题为《圣路易》的押韵史诗的开头，悲剧《西拉》（“Sylla”）和喜剧《两位哲学家》（“Lesdeux philosophes”）的初步草稿。他一度还计划一部小说，名《考克西格吕》（“Coqsigrue”），一部尺牍体小说，名叫《斯丹尼耶或哲学错误》（“Sténie ou les erreurs philosophiques”），和一部“旧派”小说，题为《斯泰拉》（“Stella”）。穿插在这中间，他还起草过一出名叫《海盗》（“Le

corsaire”)的滑稽歌剧。当他进行那次失望的检阅时，巴尔扎克愈来愈感到难于确定究竟应如何开始了。到底是一个哲学体系，一出歌剧脚本，一篇浪漫史诗，还是一部小说，才能使巴尔扎克的大名流传天壤呢？不论怎样，首要之事乃是得写出一点什么来，无论它是什么，总得把它完成，使他足以成名，并且从对父母的依赖中解放出来。他以激烈的热情，那是他天性的一部分，潜入无穷数的书籍之中，其目的是双重的：一是寻找题目，一是从别人学得艺术技巧。他写信给罗尔说：“我除了学习和发展我的风格，再不干旁的，我觉得几乎要失去理智了。”

逐渐地时间显得挤迫了。两个月工夫过去了，他不断地探索，也做了学徒式的习作，但收获却微薄得可怜。创作哲学作品的计划被搁置了，大概是由于太费心机而又不易获利的缘故吧。从另一方面来说，他尚未觉出他的力量能够胜任写小说。那么只剩下戏剧了。当然，这本戏一定得写成历史的、新古典派的戏，象席勒^①、阿尔费亚利^②、玛利—约瑟夫·谢尼埃^③

① 席勒 (Schiller, 1759—1805)，德国著名诗人、剧作家。

② 阿尔费亚利 (Alfieri, 1749—1803)，意大利戏剧家。

③ 玛利—约瑟夫·谢尼埃 (Marie — joseph Chenier, 1764—1811)，法国剧作家。

诸人所倡导的、适合于法兰西剧院（Comédie Française）的东西。于是他再次从流通图书馆里借了几十部书来辛苦耕读。他总得有个题目！他真愿意拿一个王国去换一个题目！

最后抉择终于确定。一八一九年九月六日那天，他向妹妹报告：

“我到底决定了以克伦威尔^①为题目，因为他是近代史上最好的材料。自从着手这个题目并把它在头脑里反复考虑之后，我就沉浸于其中，几乎对万事都失去了知觉。各种意念积满头脑，然而却不停地被缺乏写诗的才能所阻挠。……听着，妹妹，发抖吧！至少还得七八个月才能把这本戏写成韵文，把思想推敲完善，再把整个戏润色精采。……嗽，你真不知道有多少层出不穷的困难会堆积在这种工作里！伟大的拉辛^②——这会给你一个适当的印象——也还费了两年工夫去修改琢磨他的《费德尔》呢，这是

① 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599—1658），英国将军，政治家。

② 拉辛（Racine，1639—1699），法国诗人及悲剧作家，下文的《费德尔》（“phèdre”）是他的悲剧名作。

每位诗人都无可奈何的事。两年！整整两年！想想看！两年哪！”

然而现在已经没有回旋余地了：“没有天才，就得失败！”

他一定得有天才。这是巴尔扎克第一次给自己安排了一件明确的工作，并且以他不能征服的意志做孤注一掷。当这种意志力已被发动起来，就再没有什么能够将它制止的了。巴尔扎克知道，自己必能写成《克伦威尔》，因为他已决心写成，还因为它也一定要被写成：

“我决计要完成我的《克伦威尔》，即使在这个尝试中我爆炸了。在妈妈到来要我陈述我是怎样度过时光的以前，我一定要弄出一点东西来。”

巴尔扎克既投身于工作，那精力好象着了魔，他自己也说过，是连他的死对头也承认的。这是他有生第一次自愿委身于僧院式、甚至于忒拉毗派^①的隐居生活，后来他一生中，每当工作紧张的时期，他就严

^① 忒拉毗派（Trappist），一个教规最严的教派。

格恪守这种生活。他卜昼卜夜地伏案写作，动辄一连三天或四天不离居室。即使出门，也只是为了去买面包、水果和补充一些咖啡，这是他过度疲劳的神经所必不可缺的刺激品。渐渐地冬天临近了，他的手指，对寒冷是一向敏感的，在这既透风又没有生火的顶楼里，逐渐麻木而有写不了字的危险。然而他的狂热意志却不让步。他始终不离桌子，坐在那儿用父亲的一条旧毛毯盖着两脚，身上裹着一件法兰绒背心。从妹妹那里求来“一件旧披肩”，用来在工作时围裹肩头，从母亲那里还求来一顶为他而织的帽子。为了节省昂贵的燃料，他一来好几天不下床，以便能够继续写他的那本不朽的悲剧。这些与著作工作俱来的讨厌的伴随物，哪一样也不能推倒他的决定，唯一使他担惊骇怕的事却是灯油的开支，因为当白天愈来愈短时他不得不在下午三点钟就把灯点上。否则他倒不在乎什么白天晚上。无论白天或晚上，对于他的工作都是一样方便的。

在整段时间里，没有快乐，没有女人，不上饭馆和咖啡馆，没有任何一点休整作为离开惊人劳瘁的疏散。天然的怯懦，这是他长久都不能甩掉的，使他不寻求与女人为伍。在几个寄宿学校里，他只同男孩子在一起，他也知道自己是笨手笨脚的。他不会跳

舞，也没有学会怎样在上流社会中周旋，他也知道由于父母的吝啬，他的穿着寒酸。况且现在他已步入成年，他在体格外观上的不招人喜欢，正不亚于他的不修边幅。一位在那些年头儿知道他的相识者曾注意到，

巴尔扎克当时是特别明显地、惹人注目地丑陋不堪，尽管有智慧之光在他的一双小眼睛里闪烁。一副墩实肥胖的身材，零乱蓬松的黑发，骨骼粗大的脸庞，一张大嘴，还有参差不齐的牙齿。

既然他在允许每一个苏离开手指的时候总得摆弄三次，他就缺少结交朋友最主要的先决条件。至于谈到咖啡馆，这本来是青年作家和新闻记者聚会的地方，他也只能站在门外对着窗玻璃照照自己的饥饿的面孔罢了。那些饭馆，同样，也是将他屏于门外的。在这个富饶都市所能提供的一切快活与奢华之中，每一件移情之事，即使是最短暂的，都在这位自甘情愿的莱斯底居耶尔街隐士的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外。

只有一个人对这位孤独作家偶感兴趣——矮子

达伯兰伯伯。作为家庭的老友，这位可敬的市民，一位铁器批发商，曾以稍事关怀这位可怜的文学抱负者的命运为己任。逐渐地，在这位年长的人身上发展了对这位孤独青年的感人的关切心情，而且这种友谊一直延续到巴尔扎克终身。尽管他不过是一位郊区的小商贩，这位可敬的人对文学却怀有深切的敬意。法兰西剧院就是他的神殿，往往在一天的买卖铁器的平淡刻板事务结束以后，他就领着青年作家同去看一场戏。这些晚上，拉辛诗句的富丽堂皇，还有一顿盛饌作为先导，就是他那位心怀感激的客人身心两方面的唯一兴奋剂了。

每个星期，矮子达伯兰总要勇敢地爬上被保护人顶楼的五段楼梯，跟他一道，作为自修方法，致力于拉丁文练习。巴尔扎克，他在自己家里至今只知道舍不得花钱的天生本能，以及小资产阶级的那点儿小小雄心；而在达伯兰身上，却察觉出一种隐藏着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常能给中等阶级里这种平凡人物以更纯正的活动力，这可比一切职业吹牛家、文章乱写家高明多了。后来，在《恺撒·毕骆都》里，当巴尔扎克吟诵他的《群歌之歌》以赞美诚实的普通市民时，他心怀恩义地加上了一节，对第一个向他伸出援助之手的朋友致敬，这位朋友曾以“既不藻饰、也

不夸大的完全内在的同情心”来了解、宽慰过他青年时代踌躇不决的痛苦。在和蔼、谦逊、毫不矜持的皮耶饶尔律师这个角色身上，可爱的矮子达伯兰伯伯的形象使我们感到异常亲切。尽管他被包围在日常生活的非常狭隘的眼界中，他却直觉地看出巴尔扎克是个天才，这要比巴黎、文学批评家们与整个世界决心承认巴尔扎克的时间整整早了十年。

虽然他能时时弛缓巴尔扎克外在的孤寂程度，他却无力去减轻折磨这位文学新手的致命的内心犹豫。巴尔扎克在迫不及待的心情驱使下写啊写啊，太阳穴悸动了，手指发烧了，因为这本《克伦威尔》必得在几个星期以内完成，不惜任何代价。但是他也有神志清醒的时刻，这种清醒对于一个既无朋友又无导师的草创者是非常可怕的，在这种时刻他总是对于自己、对于才能、对于全力以赴的作品感到满腹疑惧。他不停地拿这个问题问自己：“我真有足够的才干么？”在一封信里，他恳求妹妹不要用同情的赞美使他误入歧途：

“当你写信给我谈论我的作品时，以你对我表示的手足之爱，我恳求你不要老说，‘那挺好！’你应该只指出我的缺点，而把赞美的话留

给自己。”

为年轻的锐气所激，他决心一定不拿出平庸的作品，陈腐的作品。“见鬼去吧，”他喊，“油腔滑调的东西！我要当格莱特里^①！当拉辛！”

有时候，倒也是真的，在他被文学创作如火如荼的浓云笼罩时，他自以为《克伦威尔》是出类拔萃的，他还骄傲地宣称：“我这本悲剧将要成为国王和民族的祷告书。要么我就拿一部惊人杰作来唱打泡戏，要么就在这个努力中送了命！”

然后另一个绝望心情又袭击而来：“我的悲哀就在于，我已经明白我的材具是多么贫乏。说不定全部苦干都将归于泡影！因为遇到艺术问题，只凭苦干有什么用？世界上的全部劳力也代替不了一丝天才！”这本悲剧愈濒于完成，他自己愈因怀疑而苦恼，不知这究竟是一部杰作呢，还是一部徒劳无功的东西。

不幸的是，《克伦威尔》以杰作的姿态出现的前景实在渺茫。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天才该走的道路，又没有有经验的老手为之前导，这位新作家一上来就走错了方向。以他这个对人情世故和舞台技巧都不

^① 格莱特里，即安德烈·格莱特里（André Glétry 1741—1813），比利时作曲家，擅长写喜剧题材的歌剧。

熟谙的人来说，再没有比写悲剧，尤其是韵文悲剧，更不相宜于他的未成熟的天才的了。他大概也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对于写韵文毫无禀赋，所以，他的诗，包括残存至今的几首诗在内，竟坏到如此不测的程度，并非偶然。尤其是亚历山大式，其整齐节奏需要的是宁静、审慎和濡忍的品质，也就是说，同他的洋溢奔放的天性最不一致的品质。他之能构思和写作，只限于心灵超然高翔之时，这时他的笔头总是跟不上他的字句和思想。他的丰富想象从一个联想跳到另一个，决不能让这个飞翔突然停顿，以便于计较音节与构制巧妙的韵脚。形式的死硬桎梏了意念的狂流，于是他努力摹仿古典模式所创造出来的悲剧，也就显得僵冷、蹈袭与空洞了。

可是，巴尔扎克却无暇去分析他的气质。他急于要完成悲剧，用以争取独立和名声，于是他以尽可能的高速去急就他那东歪西倒的亚历山大式。他的愿望就是要达到终点，想知道一下命运对他的疑问究竟给予什么答案，究竟他是一个天才呢，还是他该要回到律师事务所的凳子上去，继续再做家庭的奴隶。一八二〇年一月，经过四个月的苦心经营之后，草稿算是弄好了，又在亚当岛的朋友家里，他添上了最后几笔和搁笔前的润色。五月里他回到维尔巴黎西，在

寒俭的行囊中带着完成了的手稿，准备读给父母听。决定命运的时刻已经到来，且看对于法兰西以及全世界，是否一位新天才将在奥瑙利·巴尔扎克身上出现。

*

*

*

*

*

父母以难以忍耐的好奇心等待着“问题孩子”及其押韵的悲剧的到来。事情有所转变，于他稍稍有利了。家庭的财政状况略有好转，家庭气氛也愉快了一些，这主要是由于罗尔，他最钟爱的妹妹，得到一位美好的配偶——一位小康的土木工程师，姓德·苏维尔，而且他还出身于贵族。此外，家庭对于奥瑙利在采用禁食疗法期间表现出来的出乎意外的艰苦卓绝，也不是无动于衷，那是一场严酷考验，他居然连一个苏的债都没有欠。后面这个成就本身就是性格和决断的一个证据。而且完成了的两千行的手稿，仅就他在写作过程中所消耗的纸量而言，便足以证明，奥瑙利卤莽地抛弃了法律生活的可靠前途一事，并非仅由贪图懒散的缘故。而达伯兰伯伯关于青年作家俭朴生活方式的恳挚陈述，更增强了父母本已存在的疑心，他们如此苛待儿子，是否只是立足于无稽的揣测？在这一种倔强固执的背后，很可能是有点什么东西的，而他果真是有才能的话，在法兰西剧院作

一次处女公演，那也该是萨郎比耶和巴尔扎克两家决不可轻蔑的一种光荣。母亲甚至于对奥璘利的剧本表示出迟到了的兴趣，她答应亲手给他好好抄写一遍，为的是他在当众朗诵的时候，效果不至于被密布手稿之上的无数涂改之处损坏。平生第一次奥璘利在父母家中被人稍微看重了一点。

公开朗诵，这是要决定奥璘利究竟有没有天才的，五月里在维尔巴黎西举行，它还稍稍带有家庭庆贺的气氛。为了使评判人选完备，父母不仅邀请了新女婿德·苏维尔，还请了几位有影响的相识，包括拿克加尔大夫，他后来与巴尔扎克结成生死之交，还是保健医生、崇拜者。达伯兰当然不会错过这次新奇的首演式，于是从巴黎乘坐了一辆辘辘作响的老式“Coucou”^① 马车，赶了两个多小时的路程。

的确，那真是一次新奇的首演。客厅里的家具为此郑重其事地重新做了安排。摆成半圆形的圈椅上，满怀渴望地坐着双亲大人，患着忧郁病的萨郎比耶老外婆，罗尔，和她的丈夫，他对于修桥补路要比对亚历山大式诗的结构明白得多。在客人中，高居上坐的是拿克加尔大夫——他是皇家医药学会秘书——和达伯兰伯伯。在后面倾听的，也许不太专心吧，是

^① “Coucou”，“咕咕”，即布谷鸟。

两个年岁较小的孩子，劳伦斯和亨利。面对这些不算特别有经验的听众，坐着这位羽毛初成的作家，面前一张桌子，一双又小又白的手，不安地摆弄着手稿。他已经打扮过了，茂密的大堆头发已从前额扫向后面，梳成狮鬣式样。小小的黑眼珠这一会儿失去了火光闪烁，却不停地对着一个一个面孔流眄、好象在寻找一个没有说出口的问题的答案。他开始犹豫不定地念道：“第一幕，第一景。……”然而，马上他就大踏步地走下去了，于是亚历山大式诗句的激流便殷殷而鸣，澎湃而响，潺潺作声，嚶嚶成韵，传遍阒无人声的会场。

莅场诸人中没有一位留给我们关于这场新奇、可纪念的表演的记录，这表演长达三四小时之久，也没有人谈过它所产生的效果。我们不晓得萨郎比耶老外婆是否能一直清醒着，也不晓得那两个较小的孩子是否在查礼第一正法以前就不得不去睡觉了。我们所能断言的只有，听众颇感困窘，因为在这个使人疲惫的排演的幕布甫落，马上就要拿出关于奥瑙利天才如何的权威性判断。一位年迈的军需供应人，一位铁器批发商，一位土木工程师，一位外科医生，都不是理想的批评家，可以选来对一部诗体悲剧的水平发表意见的。而且无疑他们必会感到不安，必需

确定刚听到的这个戏剧怪物，究竟只不过使他们个人厌烦呢，还是确是一部冗长厌人的作品。鉴于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普遍的无把握状态，德·苏维尔建议应该把这部“新索福克勒斯”^①——奥瑙利曾经有点过早地以此自况——的作品提交一位有资格的权威人士。在这方面，他想起当初在工业学院上学时一位纯文学教师乃是几部诗体喜剧的作者，而且这几部戏都在舞台上演出过。他愿意利用同昂德烈先生的关系，居中斡旋，因为他是有正式聘书的文学史教授，此时又被敦聘担任法兰西学院的教席，所以再不会有比这位先生再好的评判人了。

再没有什么比响亮的官衔更能打动上等资产阶级人士的了。一个人既被国家聘为大学教授，还在法兰西学院执教，当然会有万无一失的判断能力。巴尔扎克夫人便和女儿晋谒巴黎，把稿子呈递给大受推崇的教授，教授很珍视此举，因为这样一来，一件久为世人忘怀的事，即他果真是一个世誉称许的作家，便被提醒了。他读了巴尔扎克的悲剧之后所归结的意见一直为后世所承认。他认为剧本没有任何成功的前景。但是必须归功于他的是，他并没有以最终

^① 索福克勒斯 (Sophocles, 公元前 495? —406?), 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

的、决绝的、根本否认奥瑙利的文学才能的方式来起草他的令人失望的裁决。他委婉地给巴尔扎克夫人写信说：

“我非常不愿意使令郎气馁，然而我的意见却是，他能够比写作悲剧和喜剧更好一点地使用他的时间。如果他能赏光，来看我一次，我将乐意向他解释，按我的意见，纯文学应如何学习，以及他能从纯文学得到什么好处，而不必选择诗词作为职业。”

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折中之道，在奥瑙利父母的心上得到温暖的回响。如果孩子还要继续他的写作，又有何不可呢？如果年轻的小伙子愿意坐在写字台旁边，总比优游于咖啡馆中或者在放荡女人堆里消磨时间与金钱来得要高尚一点、也撙节一点。但是，当然，这事一定要象昂德烈教授所忠告的那样——不要去做一位职业诗人，而是单纯地作为文学爱好，同时还有一个象样而赚钱的职业才行。但是，奥瑙利却觑透了这个危险。他不顾《克伦威尔》的失败，仍旧觉得自己是一位天赋诗人，某些神秘的本能警告他，这桩天所授命的任务是如此的令人信服，绝

对不能仅仅当作副业以终其身：

“如果我接受一个职位，我就完了。我将成为一名小职员，一架机器，马戏场里的一匹马，在指定的钟点里围着场子跑上个三四十圈，喝水，吃饭，睡觉。我只会成为专心于日常琐事的人。而这就是大家所说的生活——这种磨盘式的旋转，永无休止的同样事情永无休止地再现！”

虽然不知道究竟包含什么，他总觉得他生到世上是为了完成一件特殊任务的，这任务需要他的全副精力，甚至还需要超出他全副精力的什么东西。他拒绝了那个妥协方案，坚持他的权利。同父亲签订的契约上的两年尝试时期，尚未期满。他还剩下整整一年，他打算好好利用。带着决不受羁勒的精神与倔强的决断，象他一生中每次经过绝望危机之后一样，而且比以前更加坚决，要把自己从事务所的劳役和对家庭的依赖中解放出来，他又回到莱斯底居耶尔街上的志愿囚室中去了。

第三章

奥雷斯·德·圣·沃般公司的 小说工厂

过了多少天，甚至可能是多少个星期，巴尔扎克一直不愿意承认他的《克伦威尔》是一个失败。他跟朋友达伯兰商量，是否这部悲剧就不该送到法兰西剧院去呢。而这位可敬的铁器商人，他同戏院方面本无多少联系，还是请了伶人拉冯的一位相识帮忙，去说服拉冯对这个作品发生兴趣。然后巴尔扎克将去拜望拉冯，并尽最大努力对他劝诱，让他把剧本给剧团里其他人员看看。突然之间，巴尔扎克又反对这个计划了。他为什么要自找这个不必要的屈辱呢？意识到自己内在力量的人是经受得住沉重打击的。《克伦威尔》既已写完，也就拉倒，还是再接再厉的好。他请达伯兰终止奔走，把那个稿子扔进抽屉，终其身也不瞅一眼年轻时代这头一个没有出息的产儿了。

当前的急务乃是设法安顿下来，重新工作。第一次的惨败已使他的骄矜稍事敛抑。一年以前，当他以炽热的心情去写悲剧的时候，他使自己沉湎于丰奢的梦境中，断定声名、荣誉和自由必可一蹴而就。而现在他既已从高处跌下，心目中的主要目标就是颇为实际的了。他一定要摆脱倚赖父母的羁轭。至于杰作啦，还有杰作将会带来的不朽啦，可以先等一等再说。顶要紧的事乃是利用写作挣钱，那无论以什么代价换来的钱，无需为了向父亲和母亲和祖母去报销每一个苏的用处，好象那些钱都是赈济给他的。这位秉性难移的乐观主义者，竟被迫着放弃了他那些幻想，而做脚踏实地的打算了。他打定主意要写一些能够立获成功的作品。

然而哪一种文学在当时是能立获成功的呢？他不知道。于是他寻找一番，发现那就是小说。在前一时期的感伤潮流——这潮流曾产生过卢梭的《新爱绿绮思》（“Nouvelle Héloïse”）和歌德的《维特》（“Werther”）^①——耗尽了它的力量之后，一阵新的小说写作潮流已向大陆袭来，从英格兰海岸开始。拿破仑时代跟所有战争的年头一样，曾使人民的日常生活足够紧张，甚至于比足够还要紧张，因而他

^①《新爱绿绮思》是卢梭的名著。《维特》即《少年维特之烦恼》，是歌德的名著。

们并无内心冲动以虚构人物的命运来激动自己。一份官方刊物,《劝世报》(“Moniteur”),成为小说的代替品。但是随着和平与波旁王朝的恢复,群众又感到了需要以别人的经历来刺激自己的灵魂,搔搔自己的神经,轮番地体验凶狠的恐怖和病态的伤感。于是有了对于小说的需要,兴奋的、传奇的、浪漫的、外域的小说,而新成立的阅览室和赁书店都不能餍饫对此类文学的大量渴求。

现在那些作家的黄金时代来临了,他们能毫不犹豫地他们的巫婆厨房里搅拌眼泪和毒药,海盗和贞女,鲜血和熏香,豪横和高贵,妖术和吟唱,做成浪漫的历史馅饼,还加上令人毛骨悚然的恶鬼冰酱油,把这份杂拌儿端上桌来。譬如说,有一位英国小说家安·拉德克利夫小姐(Miss Ann Radcliffe),她是写恐怖的志怪体小说的,在这些小说里,故事机器就象水车似地轧轧作响。几位够乖巧的、善于抄袭这位勤劬夫人的技巧的法国人,靠他们那些“黑小说”发了一笔大财。甚至水平略高一筹的,以历史,尤其是以中古时代为背景的小说也风靡一时。沃尔特·司各特爵士^①的骑士们用老式大刀、熠熠甲冑所

^① 沃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 1771—1832), 苏格兰诗人及小说家, 著有《撒克逊劫后英雄略》(“Ivanho”)等长篇历史小说。

征服的国家和击败的敌手比拿破仑用大炮干的还多，而拜伦的帕夏^①和海盗，以及他们的罗曼蒂克伤感，使得人们心脏跳得跟当初宣告瑞沃里及奥斯特里兹两次胜利^②公报所造成的悸动一样猛烈。

巴尔扎克于是决定调整船帆，顺应这股流行的罗曼蒂克风向，去写一部历史小说。他也并不是被拜伦和司各特的大孚众望的成功所引诱的第一位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以其《布格—雅加尔》、《冰岛的汗》^③和《巴黎圣母院》，德·维尼^④以其《散—马尔》斯》，就是于（这股风流行）不久之后在此领域里大试身手的，不过他们原是诗人出身，在文章艺术与字斟句酌上早已非常熟练了。而巴尔扎克却与他们不同，在他开始写小说《法尔杜纳》（“Falthurne”）的时候，他刚刚以不稳定的步子走在摹仿的道路上。从安·拉德克利夫的蹩脚小说里他借来一个历史背

① 帕夏（pashas），旧时土耳其的官名，或译作总督、提督。

② 瑞沃里（Rivoli）及奥斯特里兹（Austerlitz）两次胜利，指拿破仑在十九世纪初两次战役的胜利。

③ 《布格—雅加尔》（“Bug—Jargal”），是雨果描写一七九一年法国殖民地圣多明各黑奴暴动的小说。《冰岛的汗》（“Han d’Islande”），一部情节恐怖而荒诞的中篇，亦雨果所作。

④ 德·维尼（De Vigny，1797—1863），法国诗人、小说家及剧作家。《散—马尔》（“Cinq—Mars”）是他的一部历史小说。

景，一个平凡的那不勒斯式的场景，再把无聊色情小说里必不可少的全班人马搬上了舞台，头一个，也是最主要的，便是那无处不有的女巫，索马里的催眠女巫，诺曼人和佣兵队铁链上的高贵俘虏，多情的随从。初步方案标明有战争、围困、地牢，以及靠不住的流血牺牲、英雄伟绩……——就目前来说，这已然超出这位青年作家所能招架得住的范围了。另一部小说《斯丹尼耶或哲学错误》，也只停留在片段上。此书采用书信体，摹仿卢梭的风格，以模糊的轮廓描写了路易·蓝柏尔心爱的主题，“意志理论”。这部稿子的一部分，后来当作补充物给插到另一部小说里去了。

这样巴尔扎克就遭到第二次败北。他既已在写悲剧的尝试中伤了心，作为小说家又告失败。一年工夫早已过去，接着又过了半年，在家里，那位不动情的阿特罗波女神正在等待着割断他细弱的自由命脉^①。一八二〇年十一月十五日那天，他父母发出通知，莱斯底居耶尔的屋子一八二一年一月一日必须腾出。他的涂写生涯就得告一段落！是时候了，应该

^① 阿特罗波女神（Atropos），希腊神话司命运的三女神之一，意指巴尔扎克的母亲。司命运的女神能纺成与割断人的生命线，即所谓“The thread of life”。作者用此典故谓巴尔扎克将被其母抑制自由。而译者在这里把“thread”一字译成命脉。

停止再用父母的金钱，开始为自己挣钱了！

* * * * *

开始自己挣钱！其实，再没有什么旁的事情使巴尔扎克一直为之更多拼命地在奋斗的了。在莱斯底居耶尔街那许多孤独监禁的日子里，他俭省撙节，忍饥劳作，就是为的独立自主。可是一切都成为泡影了。现在，在这濒于绝境的时候，只有奇迹才能把他挽救。

在这种极端无望、穷途末路的时刻，在童话里我们常常看到，魔鬼就要向倒楣的人接近，目的在于收买灵魂。在巴尔扎克这一回，魔鬼看上去一点没有凶恶的样子。魔鬼出现的姿态是位妩媚欢快的青年人，裤子剪裁合体，衬衣一尘不染，而他也并不打算收买巴尔扎克的灵魂，只是想买他会写作的手而已。不记得是在什么地方了，也许是他正在兜售小说的那个出版商办公室，也许是在图书馆，或者在一家饭馆，巴尔扎克结识了这位青年。他与自己年龄相若，带有贵族姓氏，叫作奥古斯督·勒·波阿特万·德·来哥罗维耶。一个演员的儿子，他从父亲那儿继承了聪明伶俐，会用世界上广泛的知识来弥补他在文学才能上的不足。他已经设法为一本小说《两个爱克多或两个布列颠家庭》找到一家出版商，小说的七拼八凑

即将完工。出版商已为此付给他八百法郎现钱，作品将于二月间分两册以“奥古斯督·德·维也尔惹莱”的假名问世，由王宫广场的于倍尔书店发售。巴尔扎克大约曾向这新朋友抱怨过自己的成功无路，也许勒·波阿特万向他解释过，他之所以倒楣，其真正原因乃是对文学的野心过大。艺术良心与写小说何干？何必如此郑重其事？这些恐怕就是魔鬼的论据吧。写小说，容易得很。只要物色或剽窃到一个题材，历史上一点什么事儿，只要是出版商特别关切的题材就行，然后以尽可能的高速度杀出它几百页——最好是几人合作。他已经有了一位出版商肯接受他们的作品。如果巴尔扎克有意，他们可以合伙写下一部小说。或者这样更好：他们两个人一同把情节拼凑一番，然后巴尔扎克独自去写，因为他能写得更熟练更快速。勒·波阿特万则将只照顾生意这一方面。如果巴尔扎克同意，他们便择吉开张，然后二一添作五。

这是一个卑鄙的做法。这意味着，在规定好了的日期拿出一本杀人放火的小说，每本书还有一定的页数，还是同一位冒冒失失、毫无艺术雄心的伙伴合作出来的。这跟昔日的理想不是有着天渊之别吗！滥用才干，说不定会把它毁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这只不过为了凑集几百法郎。一年以前，他还曾想要使巴

尔扎克的姓名永垂天壤，要超过拉辛，要向人类阐释意志万能这个新理论。魔鬼所要求的代价正是他的真正的灵魂——他的艺术良心。然而他毫无抉择余地。他不得不放弃莱斯底居耶尔街的房子，而且，如果他还没有能用笔挣到钱就回家，他父母恐怕决不会再跟他订策二次自由的合同了。何况为自己卖命总还比为别人卖命强些。他同魔鬼谈妥了条件。他们的第一部小说《查理·波安特或靠不住的表弟》的情况是：这部小说勒·波阿特万已经着手，或者说仅仅草拟了个提纲，巴尔扎克将被当作一位隐名伙伴，虽然大部分稿子要由他去写，而姓名则将不出现于扉页上。这家新创办的小说工厂今后的产品将由这公司的两位东家共同署名——阿·德·维也尔惹莱（这是来哥罗维耶的化名）和汝纳勋爵（这是奥瑙利的化名）^①。

于此，跟魔鬼订立的契约就算签定了。在沙密苏^②的著名故事里，彼得·契勒米尔把影子卖给了阎

① 这种化名是将本人原来名字中的字母另行排列组成的。如奥瑙利（Honoré）之改为汝纳（R'hoone）。

② 沙密苏（Chamisso），法国血统的德国作家。卖影子的故事见于他所著的《彼得·契雷米尔的奇妙故事》（“Merveilleuse Histoire de Pierre Schlemihls”）一书。

王爷；而巴尔扎克卖的却是艺术，创作雄心，姓名。为了获得自由，他把自己卖为奴隶了。在此后的几年里，他的天才和他的姓名同样也被埋在木板帆船^①的昏天黑地之中了。

* * * * *

交易谈妥之后，巴尔扎克回到维尔巴黎西家中做一次休假。莱斯底居耶尔街的那间屋子已被迫放弃，在维尔巴黎西他搬进妹妹罗尔出嫁以前所住的房间。他有个坚决的决定，一旦挣到够多的钱，他就要另找一处住所。目前，他把小说工厂安置在这间小屋里，在这里，妹妹从前曾耽溺于哥哥来日成名的浪漫梦想。他日日夜夜从事工作，一会儿就把一张迅速写成的稿纸叠放到另一张上去，因为任务刻不容缓地蜂拥而来、真得多谢他的伙伴兼代理人的积极活动。这架大钟的重锤摆动得十分平衡。巴尔扎克专管写作，勒·波阿特万专管拿出去兜售。

家里面对事态的新转折感到心满意足。看到第一批合同之后——头一本书八百法郎，跟着升到两千法郎，由两个伙伴均分——他们不再以为巴尔扎克的营生是那样荒唐了。说不定这个无能之辈终于

^① 原文是 galley，是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一种单甲板木制帆船，划船的都是奴隶或罪犯。

能立足自给，不再是他们怪囊的枯竭之源了。他父亲尤其由于一个事实感到高兴，就是儿子显然已经放弃了成为著名作家的念头，并且因为使用了许多假名，已经避免使巴尔扎克这个光荣姓氏有所玷污。“他把水倾入酒杯，”好脾气的老绅士心满意足地说，“来日方长，我希望他终能有所成就。”

母亲呢，相反，她本有一种不幸的禀赋，即善于以强加干涉的操心来破坏儿子的每一件事，此时则把这个设立在她家中的小说工厂当成一桩家庭事务。她和她女儿两人都要充当巴尔扎克的评论者与合作者。她倒不是最后一个哀叹他缺乏风格的批评者，但她却的确是头一位抱怨拉伯雷^①把他给腐蚀了的人。她督促他一定要仔细校改稿子，我们确能感到，他对于这些无尽无休的指导该是多么厌烦。这位母亲实在放不下施予这浪子的不受欢迎、泪眼婆娑的焦虑，她宣告：“奥瑙利对他本人和他的才干竟自负如此，已经伤害了每一个人的感情。”他的心灵在这个家里备受压抑，家庭气氛实在不堪忍受。他的唯一愿望就是再次在巴黎有一间屋子，求得自由。

被取得独立的紧迫心情所驱策，他工作得象木板帆船上的奴隶。由二十页而三十页、四十页，以至

^① 拉伯雷 (Rabelais, 1494! —1533)，法国著名的人文主义作家。

一天一章，是他的平均产量。然而他收获愈多，就愈想更多地收获。他的写作就象一个逋逃者在奔逃，气喘嘘嘘，肺叶欲裂，为了逃出家庭。最后他工作得着了魔，毫无约束，连母亲都骇怕起来了。“奥璘利工作得象个野人。如果他继续照这样生活三个月，我就得把他当成癆病鬼儿来照看了。”一旦甩开大步，巴尔扎克就得把全身强悍的精力整个投入他所从事的工作。每隔三天，墨水瓶就得装满一次，他已用坏十支笔。他只要在工作，精力就更加获得动力，那勇往直前的着迷劲儿到后来把他所有的同行们都吓坏了。他大概已帮助勒·波阿特万完成了第一部小说《两个爱克多》，在一八二一年结束以前，他又插手完成《查理·伯安特尔》，这部小说以维也尔惹莱的名字问世，虽然里面许多章节是从巴尔扎克的《斯丹尼耶》里搬过来的。在同一年，另一部小说《比拉克的嗣女》又准备好了，“史料来自贝耐狄丹修道院前院长堂·拉戈的手稿，由他的两位令侄阿·德·维也尔惹莱先生和汝纳勋爵整理问世。”在这部四卷著作印竣以前，一八二二年二月里，另一部四卷作品又接踵而至，名叫《约翰·路易或拾到的姑娘》，也由那位神秘院长的两位令侄署名。此刻巴尔扎克在这家公司已经干够了，他在公司里既是头颅又是双手，既

是大脑又是心脏。他又神速地冲刺完一本叫做《鞑靼人或充军归来》的小说，也在一八二二年问世，用的是阿·德·维尔惹莱的名字。而真正的著者汝纳勋爵，却连一个合作者的名义都未被提到。此时合同结束了，巴尔扎克就把工厂产品用自己的笔名出版。他变成这家买卖的唯一东家了，他决心使它成为法国首屈一指的文学公司。以他搜敛金钱的方式感到的幼年狂欢心情，他洋洋得意地向妹妹宣称：

亲爱的妹妹：

我现在工作得就象亨利第四的马在被铸成青铜的以前一样^①，我希望在今年年底前弄到两万法郎，我要使这笔钱成为我运气的基石。我应该交出《阿尔丹的本堂神父》、《学者》、《奥代特·德·尚蒂凡尔》和《汝纳的一家》……等作品，除了一批剧本之外。

汝纳勋爵不日即将成为头面人物，世上最多产的作家，最迷人的伴侣，而女人将象眼珠一样钟爱他。那时你的小奥瑙利便将昂头傲视，腰

① 亨利第四逝世后，有人送王后一匹青铜马。杜白蕾受命为亨利第四塑雕像于马上，公元一六三五年塑成，竖于新桥（Pont—Neuf）。这里比喻艰辛劳动。

缠万贯乘坐自用马车轩轩而来。当他走近时，你就会听到群众偶像在受到欢迎时的喃喃谄谀之声，人们还将悄悄耳语，“他就是德·苏维尔夫人的令兄呢！”

在这些可怜的作品中，只有一件事使我们认得出那确实是未来的巴尔扎克的本领——即这些作品写成时的那种难以置信的速度。已经由他自己或与勒·波阿特万合作写出了十六册到二十册之后，就在这忙碌的一八二二年，他竟又写出了另外三部每部四册的小说。它们是《克洛蒂尔德·德·吕西酿或漂亮的犹太人》、《百岁老人或两个白令赫尔人》和《阿尔丹的本堂神父》。看起来当时他自己已渐渐悟及群众挡不住这么厉害的炮火了，因为最后的两部书，他放弃了假名汝纳勋爵，而自署为奥雷斯·德·圣·沃般。这个新字号使出版商所付的代价要比付给以前那个公司的多了许多。当初巴尔扎克应同伙伴平分的每书八百法郎，已被汝纳勋爵·圣·沃般提高每印一千五百册两千法郎的款数。一年五本，也许十本小说——如果按这种急促、草率的拼凑，那不过是儿戏——就能使他少年时代的梦想之一如愿以偿了。再过几年他就要阔绰起来，独立自主也将永远

获得保证。

* * * * *

即使巴尔扎克狂的专家协会也拿不出一个详尽的记录来，究竟巴尔扎克在这些年的惨淡经营中一共写了、出版了多少以假名行世的书籍。不过以汝纳勋爵及奥雷斯·德·圣·沃般的名字问世的小说，只不过是并不名誉的活动的一小部分。他无疑插手过《密歇尔与克利斯底纳及其后话》，这是他以前的伙伴维也尔惹莱写的，还有《黑白混血儿》，也全部或部分是他写的，此书以奥诺尔·克罗特的名字问世。没有哪种文学型式，没有哪种委托，没有哪种人事关系，在他二十二至三十岁之间是有辱于他人品尊严的。他那支倚马可待的笔，可以廉价地、不署名地随便归诸准备付出代价的人。就象从前文盲众多时期坐在巴黎街头的那种代笔人，得到几个苏就肯给过路人代写随便什么文章那样——女仆的情书啦，申诉书啦，请愿书啦，恫吓信啦——这位十九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也肯把他的笔随意出租，其轻慢不拘的态度连一位阿芮提诺^①都会自叹弗如的。他还为那些形迹可疑的政客、无名的出版家和滑头的经理

^① 阿芮提诺 (Aretino, 1492—1556)，意大利讽刺幽默作家，其作品极其庞杂。

人即兴地撰写过大小书册，各式各样、有贵有贱的蹩脚货。他按定货炮制一本保王派小册子《长子继承权》，又从抄来的材料拼凑了一本《公正的耶稣会教士史》；一本叫做《黑人》的传奇剧也被抛出来，其马虎的程度同那本《巴黎标帜小词典》一样。

一八二四年，这家唱独角戏的公司为了适应公众口味的改变，便将产品改弦易辙，由小说改为“准则”和生理学，这是一位不知名的文艺掮客提倡的新鲜花样。月复一月，这个磨坊便碾磨出一大串“准则”来，都带有讨好小资产者的生编硬造的趣味。继《正人君子准则或免为恶徒欺弄之技巧》之后跟着出了一本《怎样给他系领结》；又一本《婚姻准则》，后来扩充为《结婚心理学》；还有一本《推销员准则》，后来对他那本不朽的《闻人高笛洒》^① 颇有用处。这些“准则”，还包括一本《文明礼貌大全》，都由奥雷斯·瑞宋署名，并由他以巨利出售（有几种竟卖出不止一万二千册），全部或者大部都是出自巴尔扎克的手笔。这一点是能够证明的。至于他究竟写过多少本小册子，报纸文章，商业计划书，则已无法知道。因为不论他自己，还是宁愿躲在幕后的雇主们，都不高

^①《闻人高笛洒》，是根据高名凯先生所译的书名。原文是 Gaudis-sart，意为花天酒地之徒或饮酒作乐分子。

兴公开承认他们在廉价出版的荒唐邪路上生出来的这些私生子女。我们所能断言而且不用担心有什么矛盾现象的只是：举凡由巴尔扎克在这些可羞年月里所涂写的不可胜数的篇幅中，没有一行字跟文学或者艺术有一丝一毫关系。并且，如果不得不把那些东西算做巴尔扎克写的作品，恐怕谁都会赧颜的。

对于这种粗制滥造，我们只能称其为卖身行为，而且是一种最坏的卖身行为，因为它完全是冷血方式，其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尽快地搞钱。也许，一开头，他只被急于获得自由的心情所操纵，可是一旦陷溺太深，习惯于这种轻而易举的捞钱方式，堕落就愈来愈急转直下了。即使报酬微薄，他也宁肯滥用自己的才能，尽管他已从小说挣得大钱。没有一种文学上的邪恶是他不能容忍的。他简直就是一个妓女，同时伺候两三个文学鸨母。甚至于当《朱安党人》和《驴皮记》已经使他成为法国文坛上杰出人物的时候，他还继续——就象已婚妇女偷偷跑到幽会之所从男人手里去挣一点脂粉钱一样——经常地跑到过去的低级地方，把著名的奥璫利·德·巴尔扎克贬低为廉价文人，就为了几百法郎。今天，当他那件隐姓瞒名的外衣已经磨损得有些露底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巴尔扎克在文学的罪恶渊藪中是无所忌惮的。他用自己

的零星杂碎贴到别人的小说上，又公然露骨地剽窃另外一些作家的情节和场面据为己有。采用灵巧的厚颜无耻的伎俩，他从事各种文学裁剪，于是那些偷来的材料被熨平了，拉长了，翻翻个儿，染上颜色，使它现代化一点。他什么都能提供，只要有此需要，不论是哲学，是政治，还是谈话录，他总是准备妥帖了的，一切遵照他主顾的愿望，永远是个轻快、熟练、肆无忌惮的工匠，一呼即至，随时转换笔锋，生产出风行当时的文章。

想起在这些阴暗年月中他所交往的那一类人，实堪浩叹。他虽说是当时最伟大的小说家，然而却不过是巴黎的那些偷偷摸摸的卑鄙出版商和沿街叫卖的批发书贩子的小伙计。所有这些，都是因为他缺乏自信，对自己的真正命运盲瞶无知。即使天才如巴尔扎克，后来居然自拔而出于泥淖，这事在文学史上将永远会是一件无双奇迹。我们因此想到孟乔森男爵^①提着自己的辫子把自己拔出泥沼这一绝技。的确，他有污点沾在衣服上，带有某种异样坏香水的味道，这来自他习于往还的文坛的淫佚去处。Semper aliquid

^① 孟乔森男爵 (Baron Munchausen, 1720—1797)，德国军人及冒险家，因其本人的夸大的冒险故事而闻名，成为十八世纪有名的传说人物，以说谎吹牛著称。后来这个名字乃成为吹牛大王的同义词。

baeret^①，任何艺术家也不能够陷入阴沟如此深处还幸免于污染。色情小说所需要的厚颜无耻，逼真性的缺乏，下流粗俗的多情善感——这些都是巴尔扎克后来再也不能从小说中完全排除出去的成分；但是长期影响巴尔扎克风格的滔滔不绝、仓促急就、油腔滑调，都是在他大批量的生产这段年月里养成的习惯。

文字是一位善妒的主子，它无情地报复每位艺术家，即使他偶然漫不经心地对待了它。巴尔扎克对于责任感这一点是觉悟得太迟了。在他达到成熟之后倒是拼命地检查手稿，检查铅字盘，检查清样，达到十遍二十遍之多，但是已经太晚了，要想把芜草芟锄竟尽已经来不及了，它们已经极不客气地茂密地扎了根。如果说，巴尔扎克在语言与风格上一直是无可挽回地有所欠缺，那正是因为在他一生发展的决定性年代里，他对自己不够忠实的缘故。

* * * * *

在他沸腾的心情里，年轻的巴尔扎克也曾模糊地觉察到，他正在贬低真实的自我。他从来不把名字印到这些作品的任何一本上。到后来，虽然大胆有余而成功不足，他竟坚决否认那些作品了。对早年唯一

^① 拉丁语，意谓“人总是迷恋一事的”。

的贴心人，那位忠心支持他的少年雄心的妹妹，他连《比拉克的嗣女》也不让她看。“因为，”他说，“那实在是一本文学破烂货。”他给她一本《约翰·路易》，其条件是“不得借给任何一个人，甚至连让人看见也不行，不许跟人谈论，这本书绝不许在伯约或者任何地方传播，以免损害我的生意”。以他所用的“commerce”^①这个词，便足以证明巴尔扎克在当时对待写作是多么丝毫不具理想。他完全受合同制约，必须提供给印刷厂家多少多少印张，还要愈快愈好。计算酬金一事要问的只是数量多少；而在巴尔扎克，要问的只是报酬多少。在他开写新著的急不可耐心情下，他对于结构、风格、统一性、独创性这些艺术问题，都是毫不留心的，以致他竟向妹妹提出过一次颇有嘲弄味道的建议，既然她在家中工作负担不重，她可以借助于一份简短提纲来写《阿尔丹的本堂神父》的第二卷，同时他将把第一卷赶出来。这家小说工厂刚一开张，他就四处物色廉价的帮手了。当他为别人当“鬼”的时候，他也在打算给自己取得一位类似的、也不为外界见到的合作者来为他服务。不过在苦工中也会有罕见的清醒时刻降临，他也会受到尚未完全萎缩的良心的谴责：

① “商业”。

“啊，我亲爱的罗尔！我每天祝福那使我得有这种自由职业的好运气，我相信我还能靠它发一笔大财。可是，既然我已深信自己的本领，却还把思想的精华消耗在如此荒谬的事情上，这确使我很难过。在我的心灵中的眼睛，看到有些东西在向我招手，只要我的物质生活有所保证，我就要安心去做些实实在在的工作。”

就象他的鲁先·德·吕崩柏礼（Lucien de Rubempré），在此人身上，他后来描写了自己的堕落和最后的自赎，他感觉到火辣辣的羞愧感，就象马克白斯夫人^①一样，竦然凝视着那双沾污的手：

“我企图借创作小说这种勇敢行动来解放自己——可是都是些什么小说啊！啊，罗尔啊，我那些辉煌计划瓦解得多么凄惨啊！”

他既蔑视自己所写的东西，也蔑视那些他为之写作的掇客。他有一种不很明确的预感：他那超乎凡人的奋斗必能导致他达到伟大目标，并名扬天下。只

^① 马克白斯夫人（Lady Macbeth），莎士比亚悲剧《马克白斯》中的女主角。因帮同其夫篡位谋杀，后受良心谴责，在昏迷中不断地洗她的双手。

有这一点才使他产生一些力量，去经受那悲惨的奴役，虽说这是他自愿出卖的。象每次一样，这位幻想者中间最真诚的一位，又被幻觉从现实中给拯救了出来。

*

*

*

*

*

巴尔扎克这时已经到了二十三岁。他既没有生活过，也没有恋爱过。他也从来不曾享有别人对他的尊敬和信任，也从没有人援之以手。在学校是个备受轻视的奴隶，在家里受到桎梏，他把成年之初的几个年头都已出卖，以换取可耻的报偿来供赎身之用了。他天天苦干，是为了从苦干的强制中赎出自己；他天天劳累，是为了要从劳累中解放自己。而这个可悲的矛盾后来将决定他的生活的形式与内容。他正在折磨人的圈子里兜圈子。他天天写作，就是为了不再被迫更多地写作；他天天聚敛金钱，更多的金钱，还要更多的金钱，就是为了以后不必再为金钱操心；他把自己摒诸世界之外，就是为了将来可以更有把握地征服世界，以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女人、豪华，还有——它的王冠上最灿烂的宝石——这个世界所能提供的那个不朽令名；他天天节衣缩食，就是为了最终能够纵情消费；天天辛苦啊，辛苦啊，辛苦啊，夜以继日，毫无乐趣，片刻不停，就是为了将来能过一

种自由自在的生活，生活本来就该那样。

这些就是巴尔扎克的梦，这些狂妄的梦使他的神经保持高度紧张，把他身上使他如此拼命工作的最后一分体力也给拽了出来。他的作品尚未显示出他是个伟大的艺术家，但确已表现出极大的喷发力量，这力量持续不断地喷发出由人的天性和人的命运、景色、意念、梦想所组成的一团火。也正象火山的情形，这团炽热的熔浆不光是从表面流出的东西，而是来自神秘深处的一种爆发出来的流质。这是一种原生的力量，被幽闭着，被压抑着，由于自身的过剩而被壅塞，此刻要从压力中寻求解脱了。在黑暗陷阱中疯狂挣扎时，他竭力要冲开道路，以求得光明和空气，那能激发勇气的、有引诱力的自由空气。他忙乱地寻求着去接触生活本身，而不愿总是不得不去虚构生活的一个摹本。他已赢得完成工作的力量，所缺乏的只不过是来自命运的微笑。只要一线曙光，那些当前正在与温暖阳光隔绝的冷窖中即将有哀萎腐朽之虞的一切一切，马上就会盛开出繁花：

“真希望有人向我这种冰冷的生存投下一道魔光！我直至今天还不曾享受过任何生活中花团锦簇的喜悦。……我很饥饿，却没有东西来

满足我的渴望。但是那又有什么关系？……我只有两个热望：爱情与名声。这两个热望，我全没有得到满足。”

第 四 章

德·柏尔尼夫人

巴尔扎克确乎在他的“两个热望”上都没有找到满足。爱情也罢，名声也罢，都还没有找到途径。一切神魂颠倒的梦一直还不过仅仅是梦而已，狂热的努力也都归诸枉然。《克伦威尔》的稿子摆在抽屉里发黄，淹没、弃置在一大堆其它毫无价值的稿件之中。那些大量出产的毫无价值的小说，在假名字下问世不久便又湮没无闻了。当时在法国写作的几千作家之中，奥瑙利·巴尔扎克这个名字从来无人提起。他的才能没有人赏识，尤其不为他自己赏识。他曾竭力贬低身价由后门爬进了文学领域中最不光彩的一隅，这事却对他毫无帮助。他也曾昼夜不停地写作，专心致志得象一只饥鼠一样，决心要咬开一条通向伙食房去的路，因为从那里传出阵阵美味，如此直沁入它的脏腑深处。这事也不曾使他有多少进展。他的

一切发愤图强，并没有使他向前挪动一步。

这些年中阻挡巴尔扎克前途的障碍并非力量的缺少，因为力量被抑塞在内心，正急于寻找出路；而是勇气的缺乏。他具有征服者的气质，具有获取成功的果敢意志。甚至于在他极少有的消沉时刻，他也知道自己在智力、知识、勤勉和强力各方面，都比他所有的同辈人物优越得不知多少；可是他的自恃力，也许由于那些年间受到父母所加的威胁太重了，他并不知道如何去给他大无畏的精神提供一条必要的出路。他自己说：“我有勇气，这是对的，不过它只是在灵魂里，不在外观上。直到他三十岁那年，作为一个艺术家，他还不es敢大胆着手于与他天才相称的事业；而作为一个男子，他也不曾去寻求同女人的交往。初看起来仿佛荒谬，在晚年耽溺声色而且颇为卤莽的巴尔扎克，在他整个青年时期却带有几乎是病态的羞涩。

可是，害羞并不是永远由意志薄弱产生出来的。只有找到内心平衡的人才能把握自己；而无处可用的过剩力量，如果还不知道怎样去发挥作用，就会不停地把这个人在傲慢与恐惧这两极之间推来摆去。年轻的巴尔扎克躲避女人，并非因为害怕坠入情网，而是因为害怕自己的暴躁天性。加以他较晚才达到

性成熟，他谈到他有一个“由于工作过度而不正常地推迟下来的不完全的青春期”，他还说他的男性气质“只不过犹犹疑疑地冒出嫩绿的萌芽”而已。可是这位矮胖、宽肩、嘴唇厚得几乎象黑人的小伙子，后来竟然如此精力弥漫，以至赋予他以男人所能有的最健旺的性要求，一种毫无抉择的要求。无论他的感觉也罢，想象也罢，在女人身上都不要青春的魅力或美貌。这位男巫，他曾经如此克制过自己的意志，以致在他贫瘠的年月里，他能开出一张菜单放在桌上，便相信他是在品尝鱼子酱和肉馅饼了，而其实他却正在啃着一块陈面包。这个男人，一旦他的意志发生作用，就会把每个女人，甚至于赫苦巴，都看成海伦^①。他一点也不在乎青春的消失，不管姿色的衰谢，不管是脑满肠肥，还是任何其它女性瑕疵，譬如使得苛求的情郎即将仿效约瑟夫的屏弃的姿态的那一种^②。他想要爱谁他就爱谁，他想要什么他就拿什么。恰如他曾愿意把他的笔胡乱租赁给任何需要笔的人

① 赫苦巴（Hecuba）和海伦（Helen）的典故出于希腊史诗，前者最丑陋，后者绝美丽。这里犹如我国小说中常说的把媒母无盐当作西施。

② 约瑟夫（Joseph）的妻玛利亚在未婚前便怀了孕，故欲弃绝之。文中所谓女人的“瑕疵”即指内行不修而言，而“屏弃的姿态”则谓约瑟夫与妻决裂。他们即是耶稣的父母。

一样，现在他愿意向任何女人求爱，只要她能帮忙把他从对父母的仰仗中拯救出来，毫不关心她是漂亮还是丑陋，是愚蠢的还是爱吵架的。他的首次求爱——象他的书一样——也是隐姓瞒名的。这位奇怪的理想主义者二十二岁时曾写信给他的妹妹：

“留神一下，看看能否物色到一位有巨额财产的富孀……并且为我向她吹嘘一番——一个超群出众的青年，二十二岁，仪表不凡，眼神充沛，一身是火！真是被上帝烹调出来的充当丈夫的最佳美味。”

象那些在王宫市场的书店里所卖的书一样，那些日子里奥瑙利·巴尔扎克在婚姻市场上讨价也非常低廉，其原因乃是他对自己估价过低。直到他找到有人给他鼓励以前，他从未得到过别人对他本身所值的较高的评价。假如曾有出版商或批评家期许他会成功，假如曾有女人对他笑过，那么他本会把自己的害羞情绪象外套一样扔了开去。可是名誉总踢开他，女人不理睬他，于是他就去努力争取其次的最好东西，那就是金钱以及随金钱而来的自由。

女人们从不给他什么特别鼓励，这实在也并不

奇怪。“一个极丑的年轻人，”这是德·威尼描写巴尔扎克的第一句话。这位年轻人忽略自己的外表并不下于滥用自己的才能。即使他的男性相识们也都以厌恶的心情看着他那鬃鬣上的厚厚油泥，朽缺的牙齿，说话快时就唾沫四溢的样子，还有那未刮的下巴和没系好的鞋带。杜尔城一位本地老裁缝，曾被委托把巴尔扎克父亲的旧衣为他改做一件，在凑足了牡牛脖子和肥大双肩之后，却再没有本事为他裁个时髦的腰身和圆满的下摆。巴尔扎克知道，由于他的短腿和总体的拙笨，如果去仿效时下纨绔子弟们的姗姗步态，或是冒险踏上舞池的话，必使他蹒跚可笑。正是这种在女人群中的自卑感，接二连三地把他们驱赶着回到工作与孤独中来。尽管有着闪烁着熠熠光芒的眼睛，如果一位漂亮女性刚刚走近，它们就怯懦地藏到眼睑下去了，那又有什么用呢？尽管有着足以自炫的智力、知识和内在的丰富充实，如果害羞使他的嘴巴紧闭，如果在窘迫之下只有几句矜矜巴巴的言语（而比他笨上一千倍的人却会用巴结的词句暗示风情），那又有什么用呢？他本知道，他能谈得更无穷风趣；他的男子气概和具有挑动力的本领比起那些标标致致、惯使媚眼、衣着合体、领带精致的年轻人来，也要强胜无数倍。在不可遏抑的恋火饥饿

之下，他本打算用全部未来的著作、智慧与艺术、才力与知识去交换到另一种艺术，而这种艺术是懂得怎样带着温柔神气和闪烁眼色去偎倚女人，以承受荡漾在她肩头的微波的。然而连一丝成功的微光也不曾投射进他的苦命，有了这一丝微光，他的有增无减的想象力的威力就能把它煽成了足以照耀整个世界的火焰。他投向女人的眼波比起他的姓名对于出版商来也并没有更多的意义。巴尔扎克自己在《驴皮记》里就曾描写到他早年在这方面失败后的绝望心情：

我的心灵在它努力寻求表现时会接二连三地受到妨害和阻碍，它就日益深藏固蔽。天性坦白、率真如我，在外表上却不得不显得冷酷、造作。……我既害羞又拙笨；我真怀疑我的语调能否有最细微的表现力；我自己讨厌自己；我自知丑陋，以此自惭。纵然在绝望的时刻，总有那个支持天才者的内在呼声向我呼叫：“勇敢，坚持。”纵然总有那启示的突然闪光来照耀我的孤独，表明我所具有的力量；纵然当我把流行的作品同我从想象力中创造出来的艺术作品作一比较时使我获得了希望——纵然有这一切，我仍

然象个孩子那样将信将疑。我是狂热雄心的俘虏，我相信我是命定要做大事业的，可是同时我又看出我的轻微、渺小、毫不足道。

……在与我年龄相若的年轻人中，我遇到一群神气十足者，他们昂首阔步，言不及义，坐在女人旁边丝毫不感拘束。这些人使我印象极深——他们说的荒谬事情，他们摆弄手杖头的姿态，他们装腔作势的唠叨。他们在谈话中污辱最美丽的女人，声言跟她们每一个都睡过觉，至少也要装出曾经睡过，但同时他们自己却又装出高傲的神气，还唱着高调说这种快活事在他们实在毫无所谓。在他们眼里，最道德的、最贞洁的女人乃是极容易到手的虏获品，只要一个简单的字，一个大胆的小动作，第一次大胆的注目，她们就会被人征服。我凭良心和名誉敢向你说不，在那时对我说来，取得权力与文学名声都不象赢得一位年轻、聪慧、媚人、有身分的女士的欢心那样难。

……在那些日子，有很多女人是我从远处崇拜着的，为了她们我将不辞赴汤蹈火。她们本可把我的灵魂撕成碎片。我本不会逃避任何牺牲、任何痛苦。可惜他们都属于那些傻瓜，给我

看大门我都不能忍受。……无疑地我显得太幼稚了，在这种讲究礼貌的交际场合中，这些人以矫揉造作的姿态行事，把思想隐藏在陈腐套语和流行词句里。我既不懂得如何用言谈把我的缄默表达出来，也不懂得如何喋喋不休却又言之无物。所以最后我被迫把正在消耗着自己的那股火焰隐藏于胸臆。可是我的确拥有一颗灵魂，那是无论哪个女人都要垂青的，因为在其中充满了为她们所渴慕的浪漫热情。我内心实在含有一种力量，这是那些蠢人只不过在口头上吹嘘的力量。然而所有的女人都心怀二意、残忍地对待我。……唉，你想想吧，一个为爱情而生、命中注定会使一位女人快乐的人，却连一个，即使是勇敢高尚的玛色琳(Marceline)^①，或者是一位年老一点的侯爵夫人，也没有找到！一个人不得不在乞丐的行囊中带着宝物，却遇不到识货的人，连一个艳羡它们的小孩子或者一个好奇的年轻女郎都遇不到！我常常感觉到如此失望，几乎都要了结我这残生了。

甚至于连比较轻松的艳遇，年轻人往往为只在

① 玛色琳，法国女诗人。

想象中才经历的恋爱事件找个替代品，对他也没有过。在维尔巴黎西这个小城，他总是在父母的监视之下；而到了巴黎，他每月寥寥无几的收入连请顶穷的女工吃顿晚饭都不够。

然而，挡水的堤愈高，水浪冲击的势头也就愈强，直到裂口形成而后已。有一阵子巴尔扎克有本领用寺院的斋戒和修持的磨练来压制对女人和温存的欲望，这就是对工作的极不寻常的专注。在他的小说里，他最喜欢为超出他所能达到的现实找个替身，并使自己陶醉于他笔下的甜蜜、感伤的女主角。可是，想象力的这条出路却喂足了心中的易燃物，正在等待着一触即燃的星星之火。这是欲望的恶性循环。幼年间的惶惑、苦恼的模糊梦境阶段已经过去，巴尔扎克不能再忍受孤独了。他要生活，他要恋爱，他要被爱。而当巴尔扎克决心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时，他就能从纤尘之中创造出大千宇宙。

锢闭的热情必然同空气、水、火这些自然力一样，当压力达到顶点时，就要在料想不到的地方爆发。巴尔扎克的决定性的经历开始于维尔巴黎西，处在他父母家庭的阴影之下。适值有一对名叫德·柏尔尼的夫妇，他们不仅在巴黎有一所住宅与巴尔扎克家的寓所毗邻，而且在维尔巴黎西还有一所别墅。

这就导致使布尔乔亚的巴尔扎克一家颇以为荣的一段友谊。嘉伯瑞耶尔·德·柏尔尼先生，总督的儿子，本人又曾任皇家法庭顾问，是贵族门第的后裔。他的妻子比他年轻很多，虽没有那么多蓝血^①，却是极有风趣的人。她的父亲，菲力浦·约瑟夫·安耐尔出身于维兹拉地方一个老日耳曼音乐家庭，曾是玛利·安东涅特的特殊被保护人，王后为他找到一位妻子，是她的女侍之一玛格瑞特·德·拉波尔得。安耐尔在三十岁上夭折以后，与王室的关系却更加接近了，因为他的寡妻嫁给了德·热尔瑞耶骑士，他是保王党中最有胆识的人。当他在危险时刻到临时，他从科布连慈舍死忘生地返回，又甘冒一切危险从监狱里把王后拯救出来，这足以证明他献身王室的忠诚。

德·柏尔尼一家的宽敞别墅中，由于有七个孩子，漂亮的男孩和女孩，平添了不少生趣，气氛中充满欢笑、嬉戏、机智的谈话。巴尔扎克先生竭诚款待着那位由于目瞽日增而变得有点阴沉古怪的邻人，而同时，巴尔扎克夫人也成了德·柏尔尼夫人的密友。德·柏尔尼夫人与她年纪相仿，也颇有罗曼蒂克气质。劳伦斯则是德·柏尔尼姑娘们经常的游伴儿。

① 蓝血，指贵族血统。

当奥璁利到家的时候，便把增进两家友谊这个合宜的工作交给了他。父母认为他也该给家里做点有用的事情，以贴补食宿的费用，于是在他写小说的间隙中，他被安排了给弟弟亨利补习功课的工作，而亚历山大·德·柏尔尼既与亨利同岁，这当然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就是他也利用这个机会得到私人的教导。奥璁利，他最欢迎任何用来甩开父母的房子的借口，于是把愈来愈多的时间消磨在舒适、快活的德·柏尔尼家里了。

* * * * *

没有多久，巴尔扎克先生和夫人便注意到正在发生一件或者两件奇怪的事情。第一，奥璁利在他并不该教功课的日子里也动辄踱向德·柏尔尼家去，在那儿消磨整个下午和黄昏。再有，他对修饰比从前注意得多了，对自己有所制约，不象从前那样高傲，而且显然变得和蔼多了。母亲对这个疑团马上找到容易的回答。奥璁利是在恋爱了，而他的选择落在谁的身上也毫无疑问。德·柏尔尼夫人有个年轻美丽的女儿爱玛努爱，关于她，巴尔扎克二十年后写道：“她是令人销魂的美人，一朵异国奇葩！”父母笑逐颜开，满心高兴。这真不坏，这才是这个不可逆测的家伙至今才做成的一件最有见识的事！德·柏尔尼这

一家不但在社会地位上远远胜过巴尔扎克家，他们还很有钱，从这样有势力的家庭得到妻子之后，奥瑙利会立即得到一个肥缺，同时也比为无足轻重的出版商制造一打一打小说，名声要好得多了。他们用秘密的眨眨眼睛去鼓励这种令人满意的亲昵，巴尔扎克夫人恐怕已在快活地盘算新娘子将带来一笔很大数目的奁资了。她痴想着这对青年的婚书上将以两家所有亲属们的签名作为装饰点缀了。

这真是奥瑙利的母亲的不幸。以她的狭隘布尔乔亚本能，尽管她诚恳地关怀儿子的前途，可她却并不真正了解他。这一次又是这样，她的猜想完全错了。并不是那位媚人的少女，而是母亲，实际上已是一位祖母了，罗尔·德·柏尔尼把她的迷人魅力投中了巴尔扎克。按照正常情况，这在可能范围内简直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一位四十五岁的妇女，已经生过九个孩子，竟能够仍旧使一个青年的心中散发出灵犀一点通的热情来，这是一切可能性的事情中最不可能的了。现在没有肖像使我们可以判断德·柏尔尼夫人早年是否美丽，但毫无疑问，在四十五岁的年纪上，她该是早已不会被任何正常的青年视为情欲对象的了。虽然她工愁善病的面容可能仍然诱人，身材必已达到半老徐娘的丰硕，她的女性的妩媚风韵

必已完全融化在母性的慈爱气质里了。

可是，正是为巴尔扎克整个童年所日夜渴慕，而为自己的母亲所不肯给予的这种母性的慈爱，他一直在寻求着，而现在，以符合于他的需要的形式被他找到了，就象守护神似的在伴随着他，这种同每一位天才在一生道路上相与俱生的神秘本能使他感到，他内心蕴蓄的力量需要指导与方向，需要一只恩爱而体贴的手来解除内心的紧张。这样的人能够改良粗糙的纤维而于整幅的绢纱无损；能够给予鼓励而同时以有益、合作的态度指出缺点，却不用恶意的批评；能够进入他的思想深处，而同时却不把洋溢而浮夸的梦想作为妄自尊大的愚蠢加以嘲弄。迫不及待的、要把思想展示、传达给别人的冲动，这是他母亲认为异常跋扈的，现在终于得到满足了。这个妇人，年纪和他母亲相若，当她在倾听着他的时候，给了他一种大可信赖之感；当他谈及那些如火如荼、充满他的白日之梦的计划时，她的明朗、敏慧的双眸在温蔼的情趣里闪光。正是她，以其精心的理解，把他那些由于拙笨，由于不雅的容颜，由于不通世故、缺乏自制所造成的偏差给矫正过来；她善于温雅细心地操纵，善于对他陶冶、教育。只是凭她的周到殷勤的谦恭，他恢复了丧失殆尽的自信心。在《费米安尼夫

人》（“Madame Firmiani”）里，他描写由这种智力接触所获得的幸福：

你曾经有过福气遇到这样一位女人吗，她的歌唱般的声音使她的字句倍增魅力，这种魅力也同样贯注于她的千姿百态。一位妇女，她知道什么时候说话，什么时候缄默，以完美的娇柔感博得你的注意，选择字句妥帖切当，她的语言非常纯洁。她的戏弄很象抚爱，她的批评决不伤人，她不以聒噪的态度处理事情，而是满足于引导一场交谈并使谈话适可而止。她举止总带着微笑的媚姿，她的娴雅决非造作，她能尽力而为却不过分心焦。人们对她表示的尊敬。从来只不过是一阵甜蜜的浮光掠影；她决不使你厌倦，而当你离去时，你总是对她、对你自己都感到满意。你会发现，凡是围绕在她本人身边的所有物品都铭刻着同样令人愉快的雅态。她家里的样样东西都在媚悦你的眼睛，你所呼吸到的空气就是自己家里的空气。这个女人真是丽质天成。她所作所为决无一丝矫情，她从不炫耀自己，她显示她的感情，纯粹由于她诚有所感。……她既温柔又活泼，她的同情心表达得特别沁人肺腑。

你会如此热爱这个安琪儿，即使她做错了一件事，你也心甘情愿承认她是对的。

他所进入的气氛是全新不同的。同这个家庭的交往教会了年轻的巴尔扎克如何从当代去体验历史的活精神，而他对于人民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原有着独特的感情。在罗尔·德·柏尔尼的洗礼上，德·佛龙萨公爵和德·西玛仪公主代表主持人，他们代表高贵的教父、教母，即法国的国王和王后。她接受路易斯·安朵奈特这个名字，以承袭路易十六和王后玛利·安朵奈特。在她继父德·热尔瑞耶骑士家里，她听到这位忠臣的模范讲过他如何拚着生命危险潜入监狱，从监禁中的王后手里接过她写给费尔尚^①的信。也许德·柏尔尼夫人曾经让他看过这封来自王后的感谢信。这封信，连同浸有她的断头台上血渍的手帕，都是作为这个家庭最贵重的宝藏保存着的。这封动人的遗书上写道：

“我们曾经怀抱过美丽的梦想，仅此而已。
然而得到你的献身又一次证明，这对我意义极

^① 费尔尚 (Fersen, 1755—1810)，瑞典费尔尚封区公爵，曾参加美国独立战争。他深恋路易十六王后，一七九一年曾帮助王室逃亡。

大！”

这是何等的追念啊，以千种细节刺激着他的想象，加强他去设想、去创造的意志！人们想起巴尔扎克的孤独少年时代，他那在学校和莱斯底居耶尔街破烂阁楼上的凄凉岁月，他在家里不得不听到的关于高租金、息金的利率、投资和年金等等无尽无休的琐碎悲叹，以及父母的关于开始挣钱、如何安身立命的训诫。人们又会想象，他如何倾听那个温柔、和蔼的声音，讲着垂危的君主国和革命的恐怖。当他的按捺不住的好奇心过分迫切起来的时候，他并不会遭到斥拒，而是在母爱的眼神中得到回答。在这样的谈话中，他的想象力羽化腾空，心胸舒展，从这些温文尔雅的不倦教诲里，鹬莽的诗人满怀感激地获得了第一次关于生活的洞察。

* * * * *

德·华伦夫人那件事情就是这么开始的，当她带了让—约克·卢梭到她家里去的时候^①。她本来也只不过想向一位笨拙、幼稚、暴躁的青年人贡献一点指导与方向而已。她本来也并无其它思想或目的，只

^① 德·华伦夫人 (Madame de Warens) 是卢梭的情妇之一，年纪比卢梭大得多，卢梭称她为“妈妈”。见卢梭的《忏悔录》。

不过想把她的经验传达给一个缺少它的人而已。然而，在老师学生之间的关系却能轻而易举、不知不觉地变质为一种趋于情欲的感情。用不着有意的专心致力，友爱的教导就变成爱情，恭敬化为皈依，那种亲密交往的欲望变成了秘密狎昵的欲望。德·柏尔尼夫人，跟德·华伦夫人一样，起初也把热情的青年学生的害羞，误认为只不过是她的年纪与优越的社会地位的尊敬。她丝毫未察觉，当她渐渐鼓励起他的自信的心情的时候，她正在把他那灼热的、长期被压抑的情火的着魔力量给释放出来了，那是只消一瞥便能燃烧起来的。她绝对未猜想到，她的年龄对于象巴尔扎克这种想象强烈的人是毫无所谓的，那种想象能使她，一位母亲，一位祖母，再一次成为被人需要的。他要去恋爱的这种意志，他这种独一无二的意志，竟造成了奇迹：

“我第一次看见你时，我的各种感官都感到亢奋，我的想象燃烧起来。我相信，在你身上我找到完美的人，……虽然我不能说出是哪一种人。然而后来，被这个意识完全征服之后，我抛弃了其它一切，只在你身上看到唯一的十全十美。”

欣赏于是变成了欲望，而一旦巴尔扎克鼓足勇气去追求欲望，他不会容忍任何阻力。

德·柏尔尼夫人大吃一惊。在她早年，她绝不是一位圣者。二十二年多以前，她婚后不久，就跟一位黑头发的科西嘉青年发生第一次火热的恋情，而这事好象也并不是最后一次。维尔巴黎西的恶意谣传甚至已在窃窃私议，说她所生的最后两个孩子只不过在名义上属于她那位年迈、半瞎的丈夫而已。所以被一位年轻人的热情震动了的决不是一个清教徒的循规蹈矩。她意识到，在四十五岁上又来私通这事的荒唐可笑，在长成的儿女的眼皮底下，而那男人比自己的女儿还年轻。再次屈从于这种甜蜜的诱惑有何意义呢，如果已知这种爱情是不能持久的。在一封不曾流传下来的信中，她曾企图把巴尔扎克的过剩感情锢闭在友谊的界限之内。她不仅未在年龄悬殊的问题上缄默，而且还特别强调这一点。巴尔扎克的答复却极其激烈。他并不象《老小姐》（“Vieille fille”）里悲剧主角阿丹那斯·葛兰松那样胆怯，那个人“害怕社会会向二十三岁的青年和四十岁女人的爱情投来讥笑的咒骂”。他决心克服她的抗拒，几乎是愤怒地喊叫：

“老天爷，假如我是女人，假如我虽已四十五岁而仍然可爱——唉，我定会跟你截然不同！一位年华迟暮的妇女却拒绝采撷把亚当、夏娃逐出伊甸园的果实，做这样的妇女是多么成问题啊！”

正是由于她也爱上了这位热情的青年，德·柏尔尼夫人使她的迫切求爱者处处为难。一连几个星期、几个月，她以全力抗拒。可是，这是巴尔扎克的初恋，他为此目的全力以赴。他需要首战告捷，以树立自信，而一位弱女子，在婚姻上失意与不幸，又已被情火点燃，是缺乏抵抗所需的本领的，而她所要抵抗的意志却是能够征服世界的。溽闷的八月一个夜晚，不可避免的事发生了。黑暗中，通向德·柏尔尼别墅花园的后门轻轻打开。一只颤栗的手引导伫候的情人进了屋子，在那儿就开始了

“那个惊诧之夜，充满如此欢悦之夜！那一夜，这位幸福的、一半孩子一半成年者，一生中只能享受它一次，它永远不会再来了。”

*

*

*

*

*

在小城里没有一件事能够长久保持秘密，奥璘利对德·柏

尔尼夫人的殷勤拜访，不久便引起热闹的揣测与刻薄的谈论。在德·柏尔尼家中发生不少紧张场面，因为对那三位待字闺中的年轻女儿来说，看到父亲受人欺辱，当然只会难过，于是她们竭力不让这位不受欢迎的情夫在这儿的停留感到惬意。巴尔扎克夫人甚至更感烦恼，当她最后终于得到了一点消息的时候。当初，在决定她儿子发展前途的年月里，她完全忽视了他，还会故意压抑他对她所发生的孩提情爱，毁掉了他的自信心，将他置于手边的卑贱屈辱地位。而现在，当她发觉他从罗尔·德·柏尔尼身上找到一位益友兼顾问——这一切她作为母亲本应给他的——还兼为情妇的时候，这位作威作福的女人便被疯狂的嫉妒攫住了。为了把奥璘利从情妇身边弄走，她在一八二二年春天强迫他离开维尔巴黎西，去同妹妹德·苏维尔夫人一起住在伯约。她亲自送他去上马车，使他在最后一刻决没有逃走的机会。虽然过去她从不拿他小说写作当作一回事，不过是赚钱的手段而已；现在却自认是他的文学导师了。她让他在把稿子送给出版商以前先交给她去提批评意见。可是太迟了，巴尔扎克已学会了区别母亲和德·

柏尔尼夫人之间的批评方式。他对于她那为时已晚、装模作样的兴趣和她那一阵阵的歇斯底里，表现出同样的淡漠情绪。他丧失了对她的畏惧，从而也丧失了对她的尊敬。巴尔扎克夫人悻悻然写信给女儿：

“我曾让奥璁利切实答应，他一定要小心地修改稿子。我曾经告诉他要把稿子送交比他自己更有写作经验的人。……而奥璁利的态度却好象我对他所说的话一点都无关紧要。他简直听都不听。奥璁利非常自以为是，拒绝把稿子送交任何人。”

她感到他已从她的控制之下溜走，于是想用强力将他把持住，但是她的能力却被粉碎。巴尔扎克在女人身上首次的成功，给了他成年人的气概。他的自信心巍然屹立，而糟踏了他的青春的她，却不得不承认她二十年来加诸其身的恐怖权力已被永远摧毁了。当她向他妹妹斥责他时，她其实正在无意识地斥责自己的无能，不过她的责备为时已晚。巴尔扎克已经把自己从倚赖父母的境地中解放出来。他已经从不幸的青年时期逃脱出来，就象病人得到了恢复。他陶醉于自身能力的自豪感中了。他生活的中心和焦

点，不再是父母的家而是德·柏尔尼夫人的家了。恳求也罢，斥责也罢，家中一阵阵的歇斯底里也罢，城中秘密的饶舌和窃窃私语也罢，都不能打破他自由、热情地献身于爱他的这位女人的决心。母亲狂怒地给女儿写道：

“奥璘利就是不承认象他这样一天两趟到她家去是多么不检点。他根本看不见清清楚楚摆在他眼前的是什么。我巴不得离开维尔巴黎西千里之遥！他脑袋里除了这一勾当什么也装不进去，他就是不明白，如果他总是让自己过分专注于这桩暧昧勾当，必有一天对此纠缠感到厌倦。”

母亲最后的希望就是，他不久便会厌倦这种使他沉沦的狂热，不久便会放弃这场可笑的爱情，为了一位四十五岁，或者精确一点，四十六岁的女人。可是，她不得不再次认识，她了解他是多么有限。他对罗尔·德·柏尔尼的爱情不但于他决无任何堕落的影响，还帮助他发现了自己。由于这个“一半孩子，一半成人”的神魂颠倒者的人性被唤醒了，爱情便逐渐地、毫不过分唐突地使这位伟大的小说家从隐身

于匆匆忙忙地胡乱涂写的作者中解放出来了。通过罗尔·德·柏尔尼的“经验忠告”，巴尔扎克成为真正的巴尔扎克了。后来他承认：

“她是我的母亲、朋友、家属、伴侣和顾问。她使我成为作家，她给予我年轻时所至为需要的同情，她指导我的情趣，她象姊妹般共我啼笑，她每天来到我身边就象一场能减轻人痛苦的安睡。……没有她，我无疑地早已死去了。”

她为他做尽女人为男人所能做的一切：

“当极大的暴风雨威胁着将我淹没之际，是她以鼓励与牺牲使我的头部浮上水面。……是她在我身体内部鼓舞起自尊心，使人足以抵御世上卑鄙事物的侵袭。……我能活下去，一切都要归功于她。她是我的一切。”

并且，当这种“爱情的友谊”在肉体的狎昵的基础上继续十年之久，从一八二二到一八三三年，渐渐退潮到仅成为一种“友谊”的时候，巴尔扎克的爱慕和忠诚都升华了，而且可以说是更加强了。巴尔扎克

在罗尔·德·柏尔尼生前死后所写的关于她的一切，构成了一组对这位“伟大、崇高的女性，友爱的天使”的一组感恩戴德的、欣喜若狂的赞美诗。这个女人从他身体内部把一个男人、艺术家和创造者给唤醒了。她给他以勇气、自由、外在的和内心的安全感。甚至于在《幽谷百合》（“Le lys dans la vallée”）中那位理想化了的德·莫尔梭夫夫人的画像，他也只称之为“与她相去悬殊的身影……只是那位妇人一些次要品德的轻描淡写”，而他还慚恶地谢罪，说他永远也无能把她在他眼中的形象表现出来，“因为我深恐在公众中糟踏了我的真实感情”。然而，同罗尔·德·柏尔尼这场交结的深度，作为他一生中无比的一次幸福遭遇，曾由他以不朽的言词记载过：

“世上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这一位女人的最后一次爱情，她给了一位男人第一次爱情的满足。”

他与德·柏尔尼夫人的结识，乃是在巴尔扎克生涯中美好的、决定性的因素。她不仅解放了尚未发现其真正自我的男人，使几乎绝望了的艺术家获得

自由，而且她还决定了在他今后一生中所要爱的女人的模式。从此以后，巴尔扎克就在每位女人身上寻求母爱式的保护人与伴侣，这种人曾在第一个原型身上给了他那样多的幸福。他需要的女人不能占据他的时间，因为他总是工作过头；而是有闲暇与能力，在他做完工作之后供他舒心解乏。他所需要的爱情其主要先决条件乃是在社会与精神两方面的出人头地。理解对于他尤重于狂热。能够迎合他的需要的女人仅有那些人：她们被他看重的是由于经验比他多，以及，说来奇怪，年纪比他大。“弃妇”（La femme abandonnée）和“三十岁的女人”（La femme de trente ans）不仅是 he 给小说起的书名^①，而且是他自身生活中的女英雄，她们都是成熟的女人，在生活和爱情上都不得意。她们不再从生存中有任何希冀，而当她们居然又被爱慕、作为伴侣和内助来为这位伟大作家服务时，她们觉得这是一种命运的恩赐。妓女们，娼妇们，所谓狐魅的女人，文学界的势利眼，在巴尔扎克眼里是毫无媚力的。外貌的美丽从来诱惑不了他，他也从不为青春年少所动。他甚至于强调“对少女的深恶痛绝”，因为她们要求太多，付出太

^①《弃妇》和《三十岁的女人》都是巴尔扎克《人间喜剧》里的作品。

少。“四十岁的女人，”他说，“所有的事都为你做——二十岁的女人则什么也不做。”在他全部的爱情经历中，他下意识地只渴望重获那种多层多样的，各方面无不具备的爱；这种爱，他曾在一位女人身上找到过，她是他的一切——母亲兼姊妹，朋友兼导师，情妇兼伴侣。

第 五 章

经 商 插 曲

巴尔扎克对命运的第一次乞惠已经得到满足。恩爱妇人的帮助已经得到，由此而获得的自信心促使他达到了精神方面的独立自主。等到也赢得物质方面的独立自主之后，他就可以着手于自己真正的行业，从事他本该去做的工作了。

一直到二十五岁，巴尔扎克所抱的希望是，依靠笔耕生涯来一点一滴、百折不回地获得这种物质上的独立自主，然而在一八二四年冬末，他突然打定主意去开创一件新的事业。在他的年谱上，那是一个不祥的日子。那天活该倒楣，他走进圣安德烈·德·沙尔广场三十号出版商兼书商于尔班·康奈尔的书店，打算拿出他最近的小说《万一适乐尔》。倒并不是他遇到不欢迎的接待，恰恰相反，康奈尔出版社及

售书店深知这家奥雷斯·德·圣·沃般零售批发小说公司出货总是准时不误，而且有本领满足公众关于凶杀流血、伤感阴谋、异国情调等各种要求。康奈尔先生并不费事便接受了巴尔扎克的稿子。

可是，不幸的是，他又借此机会把心中酝酿的其它商业计划泄露给巴尔扎克。他推心置腹告诉巴尔扎克，说他想出一个很有希望的妙着来印一些适用于圣诞节、坚信礼和暴发户的市民家庭的书籍。法兰西的古典作品还是有不少需要，不过目前销路

不畅，原因是这些可敬的先生们写得太多了。比如说，莫里哀或者拉封丹的全集，它们现有的版本卷帙繁多，在普通中等家庭里太占地方。他想出来了一个高明的主意，就是把所有古典作家的全集都只印成一册。使用小号字体和每页两栏的方法，全部拉封丹或莫里哀便能容易地包括在一个封面、封底之间了。如果书上再加上精美装饰，它们必卖得跟刚出炉的糕饼一样快。这计划连细节都已考虑详尽，实际上拉封丹那一册已经就在手头了。但要使这个宏伟计划以合适的派头兴办成功，还缺一项细微的条件，即必要的资金。

巴尔扎克并不缺少幻想式的热情，立刻为此计划喜不自胜，便向康奈尔提议，他自己也愿当计划中

的一位合伙人。其实他并没有什么必然的理由贸然从事这么一件并不可靠的商业冒险。他自己生产小说的生意相当兴隆，全靠不倦的劳作，不顾文学良心。每个月只靠一束鹅翎笔及几令稿纸的装备，他就挣到相当稳定的收入，一年几千法郎。可是，他新近获得的自信给他带来了较高生活水准的口味。贵妇人的情夫不想继续住在阁楼里了，他眼下在杜尔农街六层楼上的小屋也太狭窄，同他也太不相称了。此外，这事也太屈辱，疲劳而不体面，从长远来说，也太徒劳，天天干这种苦活儿，写出书来一行一行算钱，一页一页算钱，一本一本算钱。为什么不采取勇敢步骤，跳出来发一笔财呢？为什么不冒几千法郎之险去干这一类十拿九稳的投机呢？他还可以继续倾销那些无聊小说、报刊文章和一切匿名作品，这些东西在他那支不费事的笔下滚滚而来。博马舍^①的天才并未因为他曾经作为副业出版过伏尔泰先生的文集而受到损害；而中世纪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又何尝没有做过出版商的校对人与技术顾问呢？对于挣到金钱，不论用什么办法，在巴尔扎克看来都不算丢人，而是多才多艺头脑的表现。一个人以过量的工作挣来过于微薄的一点钱，这得说是很愚蠢的；该干的聪

^① 博马舍（Beaumarchais，1732—1799），法国剧作家。

明事乃是以轻易的一举而获得大量金钱。现在，获得巨资的时机终于到来，这笔巨资，只要在中心目标上集中精力，可以使他创造出一部艺术杰作，这部作品也将签署他的真名实姓，为此而向全世界、向后世承担责任。

巴尔扎克并未多费时间就打定主意。每当他听到有一笔可做的生意，在斟酌得失时想象就会压倒理智，而投机事业给予他以快活的战栗，就象他在写作、创造时所感到的一样。他从不因文学上的尊严而拒绝生意上的机会。他什么都愿意经营，从书籍、图画以至铁路股票，从不动产以至木料、五金。他一心所在就是想给他体内潜在的力量找个出路，并为自己冲出一条路来；至于目的与手段则在所不计。他注意到的只是获得权势。在三十岁上他仍然不能决定是从事政治呢，还是去当新闻记者；正象歌德犹疑了很长时间，究竟是当画家还是当诗人，也象瓦格纳^①不能明确自己究竟要当戏剧家还是要当音乐家。假如机会凑巧，巴尔扎克本也可以同等地变成生意人或者奴隶贩子，不动产投机者或者银行家。把他的天才导向文学渠道的仅仅是机会而已。如果在一八三〇年，或者一八四〇年，甚至于一八五〇年，他还有

^① 瓦格纳（Wagner，1813—1883），德国作曲家。

机会在罗特柴尔德^①和《人间喜剧》的作者之间进行抉择，他究竟是选择做金融界的头面人物，还是去做文艺界的巨子，那是非常可疑的。

任一计划来到他面前时，不论是商业方面的还是文学方面的，都能大大刺激他的想象力，因为那好象是有着无穷无尽的机会。他每看一事，决不会不受他的幻觉支配；他每讲一故事，决不会不大加夸张；每做一计算，决不会不被数字陶醉。正象每当一本小说的意念产生时他立刻就在心目中洞察所有的复杂情节一样，他也挡不住在每一件把它引诱过去的投机事业上看到大笔绝对跑不掉的利润。康奈尔先生只要一提起他的古典作品单卷版的计划，巴尔扎克就平添了不少想象，仿佛他已把装满美观的书籍拿到手里，书是用雪白的纸张精印的，卷头用花饰装点着，第一卷，第二卷，整套的丛书——虽然实际上只有第一卷刚刚排好版的头两个印张。他已看到人们在巴黎和外省各地拥入书店，然后在大楼房里和小茅舍中阅读着、抚摸着这些新书。他已看到康奈尔先

^① 罗特柴尔德 (Rothschild)，国际知名银行家族，本为犹太人。最早的是迈耶尔·安歇勒·罗特柴尔德 (Meyer Amschel Rothschild, 1743—1812)，他在拿破仑战争中发了财。其五子及后嗣均为金融界人物。

生的柜台上高高堆着订货单，搬运工人们在沉重的书捆下嘘嘘喘气，每一天，每一小时，大包小裹都向着四面八方送出。他已看到成千法郎的钞票从钱柜里溢出来，看到自己住在豪华的房子里，门口停着双人马车。他已看到摆在他周围的家具；沙发上覆盖着红色锦缎，那是他前一天在塞纳河左岸一家古玩店里看到的；窗户上挂着的锦缎窗帘；壁炉架上的精致雕像；还有墙上挂着的图画。不说也可以知道，他向站在一旁对他这种热情默感惊讶的康奈尔先生宣称，他将捐出他的区区两三千法郎的股份。再有，他还愿意给拉封丹及莫里哀这两本集子写序，它们将首次向法国阐释这两位是何许人物。总之，这将是前此从未出版过的最精美的丛书，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功。

当巴尔扎克离开书店时，他觉得他已是百万富翁了。于尔班·康奈尔先生为一件小小商业投机获得一个合伙人，巴尔扎克在他的美梦中却获得一笔大财。

* * * * *

这件事情的古怪经过倒可以给巴尔扎克自己的笔找到一个恰当的题材。他的初衷，表面上看起来是，并不想卷入很深。他在整个买卖里的股份最初并

未超过一千五百或两千法郎，也就是说，并未超过他用一本急就篇就能挣来的钱数，这种书他是倚马立就的。然而凡是巴尔扎克所经手的事，总会变得规模庞大。当他写第一部《私人生活之场景》的时候，他并未意识到他是在开始写他那个时代的伟大史诗，《人间喜剧》。当他在康奈尔先生出版计划里承诺一笔不大的股份时，他也同样并未觉察到他将要负担多大的财务方面的责任。

第一份合同是在一八二五年四月中旬签订的，并没有什么害处。巴尔扎克不过成为一个小小财团中的一分子，财团将提供出版一册《拉封丹》所需要的七八千法郎。现在已无人知道，这四个人是怎么凑到一起的。在巴尔扎克之外，一位是医生，一位是告老的军官，加上这位书商，而书商的股份大概就是他已拿出来那笔数目。这四位都不是太有钱的人，他们只准备每人出一千五百法郎左右，投入了被认为大有钱可赚的生意。不幸得很，他们这个以利用拉封丹寓言谋利的合作，寿命并不长久。从那位医生写的极其愤怒的信里可以推定，他们头几次会议就是在粗暴的言辞中进行的，而且几乎要动手了。到了五月一日，巴尔扎克的三位同伙，都是谨小慎微的生意人，便都撤出支持，只留下他们之中的这位理想家，

在他自己肩膀上去承受整个负担。

巴尔扎克现在比起他的初衷来已被推前了一步。现在他是一本《拉封丹》的唯一东家了。该书尚未付排，他得独自支付整个出版费用，总数将达到九千法郎。这对他来说已是一笔可观的数目，而问题是，钱将从何而来？是由他抽暇再去谄出三两部小说呢，还是由他去说服父母，把一笔资金交他调度？只要看一眼账本，就能解答此谜。发票旁边还有三张德·柏尔尼夫人名义下的期票，她显然迁就了他的热情魔咒。这是她第二次扫清他的障碍了。

可是，巴尔扎克的怪脾气总是占上风的。照理来说，本该先等待《拉封丹全集》成功，然后才去着手书单上的第二位作家，然而他那秉性难移的乐观精神征服了理智。他已不再能够拘束于一个小局面中去思想、工作、生活了。那位曾经在每一个苏上打算盘的青年学生已经变成命运的迫不及待的进攻者了。于是莫里哀必须马上紧随拉封丹接踵而至。两本书一定会比一本更容易销售，让生意经上那些婆婆妈妈的顾虑都去它的吧！

巴尔扎克再次使用他的强烈的劝说本领，这一回是德·阿宋威耶先生，一位他家里的朋友，他声称愿意垫付五千法郎作印刷《莫里哀》之用。于是在一

册书还没有卖出以前，巴尔扎克已经投入了旁人的一万四千法郎，而风险却是他自己的。他十万火急地为这两本书进行准备，实际上太十万火急了，因为批发商狡猾地利用了他的经验缺乏与热心过度，把库存过久、已经污损的纸张供应给他。德维里亚^①的卷首图，巴尔扎克曾寄以极高期望的，拿出来竟非常之糟。为了把全部拉封丹的作品印在一册书里，铅字必须非常之小，以致目力甚好的人看后都感疲惫，而巴尔扎克草草杀出来的两篇序文，也并未给这两本在美学上甚不动人的书增添任何动人的东西。

从商业的角度看，这个结局是不可避免的。为了急于净获最大的利润，巴尔扎克将每册的售价定为二十法郎。这一来把书商们都吓倒了；头批的一千册并不象巴尔扎克的美梦所想，成为后来无限量重印书的先驱，却被搁置在印刷厂的堆房里，书商也罢，公众也罢，都无人过问。一本预计畅销的作品，在一年终了时卖出的总数只不过二十本。印刷的，装订的，造纸的，还有其他人，都得付给现钱。为了使自己有喘息的余地，巴尔扎克把价格减到十三法郎一本，然而于事无补。他又减为十二法郎，还是无人定货。最后他把整批存货廉价处理了，还受了一次欺

^① 德维里亚 (Devéria, 1805—1865)，法国画家。

骗。经过一年的拼命挣扎，灾难总算完备了。不但没有获得他所梦想的那笔大财，而且巴尔扎克还负债达一万五千法郎之多。

任何别人经过一次这样严重的失败后，就会低头认输了。可是巴尔扎克还不够坚强，不肯承认一次挫跌便是终结。后来，当他的一部戏剧遭到大众非难时，他就要写一部震撼全球的小说来补偿失败。当债主追着他吼叫，而法院的人也等在门口时，他还以取笑他们为乐，把负债当作胜利来吹嘘。但是在二十六岁时，他既没有过去的成功来维持他，又没有可向债权人作担保的名声。那时他还没有成为文坛的拿破仑，能够不在乎一次偶然的挫折。

也许出于羞向他父母承认失败的心情，他们是一向怀疑他的能力的；也许因为他不愿意向罗尔·德·柏尔尼承认他在第一次掷彩时就把赌注输光，于是他就把赌注翻了一番。他所看到的捞回损失的唯一办法，就是得拼了更多的资金去冒险。在第一次的计算中，一定有点毛病，巴尔扎克认为他已知道毛病在哪里。只做一个出版商必是坏生意，因为你会被索价高昂的出版商欺侮，他们把油水都撇去了。无论写书还是出版书，都不是，而印书才是，有利的营生。只有开办勇敢的、无所不包的冒险事业，即自己写

书，自己选书，自己印刷，自己出版，才能使个人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他决心要挽回在《拉封丹》和《莫里哀》方面的失败，办法就是包办生产书籍必要的各个程序。按照现成的前例，他打算用扩充的办法使破了产的生意能有清偿能力。于是巴尔扎克在他的经商事业上开始跑第二圈了，他决定要开设印刷厂。

在这种性质的企业里，有若干条件是必备的，而这些在巴尔扎克这里却尽付阙如。第一，他在印刷技术上毫无所知。第二，他没有王家执照，在彼时，谁要想当印刷商，这东西是必须事先取得的。第三，他既无厂房又无机器。第四，他没有资本去获取执照、厂房、装备，更谈不到熟练与非熟练工人了。可是，一个人既已决定要在靠不住的基础上创业，他常常发现这恶作剧的命运在一开始时总会帮他的忙。巴尔扎克物色到一位排字老手，安德烈·巴比耶尔，还在《拉封丹》付印时，巴尔扎克的注意力就被他吸引住了。于是巴尔扎克就劝服他来承担奥璫利·巴尔扎克印刷所的技术指导。经过德·柏尔尼先生的关拂（他给一位部长和公安局长写了介绍信），印刷执照也弄到了手。我们自会想象得出那是一只温柔的手指导了这位已被取代的丈夫的笔：

“此少年我深知之久矣。以拙见所及，其信念之正确与文学学识之丰富，实足以保证彼固备悉此种行业加诸其身之责任为何如也。”

这几行推荐就足够了，于是奥瑙利·巴尔扎克（那时他还未自称奥瑙利·德·巴尔扎克）获得了经营印刷业的官方执照。

一旦特许证件到手，去找到一所要出卖的印刷厂是没有什么困难的，他也就在玛瑞街上，这是塞纳河左岸一条黑暗狭窄的巷子，后来叫作维斯刚地街，碰上了他所愿意要的。在一所房子的底层——它的紧邻乃是让·拉辛于一六九九年、阿德莲娜·勒古甫惹^①于一七三〇年于此寿终的房子——有一家又脏又小的印刷厂，它的东家，一位老劳伦斯先生，久想把这个不大赚钱的买卖出手。他很高兴，现在遇到一位有希望的买主，他肯出善价，至少他已答应肯出善价，而且备有妥善的担保。

四项条件中，三项已经没有费多大周折就得到了满足。第四项要困难得多，因为认购总比付款好办。巴尔扎克需要五至六万法郎——三万以取得特

^① 阿德莲娜·勒古甫惹 (Adrienne Lecouvreur, 1692? —1730), 法国女演员。

许权和买卖本身；一万二给技术经理人巴比耶尔，他好象并不十分信任这位雇主的经商资格，因而索取这笔款项作为保障；其余的钱则为杂项开支，诸如主要的改装，这笔开支数目大概小不了，因为这家工厂大部分业已陈旧，经营又久为前任业主所疏忽。在巴尔扎克名下，除了一万五千法郎的债务，是分文不名的。再要筹五六万法郎，其前景自然甚为不妙。总算他运气不错，或者毋宁说，总算运气不佳，他还真的找到了靠得住的保证人，而且还是在毫未料到的地方。他的双亲大人，他们都不会不向往于诱人的投机机会，况且目前又有流动资金二十万法郎左右，手下正有若干资金可供投资，于是，也真够令人吃惊的，竟然对儿子的这项新的冒险未持异议。印刷是一桩靠得住的行业，不象写书那样轻浮。奥瑙利的永恒乐观精神恐怕也颇具说服力，以灿烂的前途说服了父亲和母亲。家庭会议同意，把津贴他的一千五百法郎资本化了，另外，由于父母的作保，他们的一位朋友，德兰诺瓦夫人，愿意拿出三万法郎当作营业资金。不足之数则又由善作自我牺牲的德·柏尔尼夫人供给。一八二六年六月四日，巴尔扎克正式通知了主管部，说他这位印刷商已经开张营业了：

“署名人，巴黎一家印刷厂所有人，兹通告，本人已将住所及营业地点迁至圣·日耳曼镇，玛勒街十七号。”

这出悲喜剧的第三幕于是开场。

* * * * *

这家古怪的印刷厂常常出现在他的笔下，《幻灭》和《绕线猫店》（“La maison du chat—qui—pelote”）的许多生动篇章常常将一道强光投射在那不见天日的窗户后面的活动上。玛勒街的弯弯曲曲的窄路蜿蜒于圣·日耳曼前街与马拉居耶码头之间。阳光从来射不到路上的砾石。巷内通向房子底院的高大街门表明，十七世纪时，它们曾经俯瞰着乘坐辚辚马车来看望这儿的贵族居民的拜访者。可是，在二百年的过程中，趣味和价值两者已经改变。贵族们，不管是由于血统还是由于财产，早已搬到不那么阴暗而比较舒适的住处去了，小手艺人来到这条破烂巷子里开设作坊，于是小巷的荒凉状态由于煤烟、尘土与岁月，就更加严重了。

巴尔扎克和巴比耶尔在这里开设印刷厂所用的房子，却未因这条街以前与贵族有关联而留下什么好处。它建筑在一所旧有的广阔房舍的地基上，并且

不客气地向前伸展到比较规矩一些的邻居的前头，最前的那部分径直伸到当街上了。它建造得很简陋，只图可用。底层就是一间大屋，用作车间，有一架铁制的螺旋形楼梯通到二楼，新业主便打算把自己安置在那儿。这个住宅包括一间前厅，一间黑暗的厨房，一小间带有帝国式壁炉的小饭厅，还有一间两用的书房与起坐室，附带一间小套室。

这是巴尔扎克第一个真正的家。他以珍爱的心情来布置它。他不去用纸糊墙，而代之以悬挂浅蓝色的花布。他把装订精美的书籍排列起来，还弄来各式小巧、便宜的摆设——这一切，都是为了使他的忠实的“内助”感到悦目，在那些最困难的年月里，她是天天必来拜望他的：“她每天必来，就象一场减人痛苦的安睡。”

巴尔扎克在他的商业危舟里建立的这个小小神堂，并不仅仅是对轻浮的奢侈的迎合，因为他对待新事业是十分严肃的。从大清早到夜深，他穿着衬衫，敞开领口，跟二十四个工人在一起，在冒着油墨、湿纸气味的热屋子里，象特罗亚人^①那样浑身大汗，艰苦奋斗，去喂饱那七架饥饿的印刷机。对于他来说，

^① 特罗亚人 (Trojan)，被认为人品好，有勇气，工作努力，成绩出人意料。

没有哪个细节是无关紧要的，没有哪件工作是有失身分的，他无不亲自过问。他校改字盘，帮忙排版，估计成本，并亲手书写票据。他不断地把他那相当肥胖的身躯在拥挤的屋子里挤来挤去，穿过机器和堆放着的大包，时而督促某个工人加倍努力，时而跑向玻璃隔断后面的小办公室，到了那儿，他就跟书贩们、纸商们断断论价，锱铢必争。所有拿着定货单和帐单来找这位奔忙的印刷老板的人——老板就在戛戛而鸣、轧轧作响的印刷机间，双手沾着油墨与墨水来接待他们——没有哪一个有过一丝轻微预感，料到眼前这位矮胖、勤勤的小人物，一头污垢的蓬发，一条如簧的巧舌，竟是，或者将要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

那些年里，巴尔扎克真的向他高傲的雄心壮志告别了。他全身心地、把肉体 and 灵魂都投到了印刷新事业上。他生活的唯一目的就是维持印刷机永远转动，建起兴旺的事业。把法国古典作品送到每家每户、让它们深入人心的理想早已消逝。现在他是手边有什么就印什么，一点不排不拣。他这字号拿出的第一号作品就没有多高文学价值，只是一部叫作《抗蛋白长生丸或生命之粮食》的说明书。第二本是一篇为女凶手辩护的演说，由一位野心勃勃的律师自费印

刷的。第三本是卖假药的广告，《药剂师勒贝尔的巴西合剂》。后面还跟着随便什么主顾拿来的庞杂阵容——小册子，说明书，古典作品重印本，诗歌，广告，目录以及一些消遣性的小读物。至于他自己的作品，他只印了一本，《游荡者所写之关于巴黎标帜之小字典》，据说是他在某个急需现款的时候为某位出版商匆匆写成的。

事情从一开始就不顺利。当巴尔扎克校看一本送来付印的小册子的清样时，心情想必是很复杂的。这本书叫作《偿还债务及满足债主的技巧……或破产者所用商业法手册》。满足债主的技巧就是他从来未能掌握的一种技巧。他所办理的头一次财务就表明，同样的才干在不同的活动范围能产生相反的效果。那种曾使他在艺术领域创造新世界的乐观精神和想象力，当他投身于商业时就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倾家荡产。他在第一步上就跌了交。为了增加流动资金，他把《拉封丹》和《莫里哀》的存货以降低不少的价钱卖给书商包都安，两千五百册拿到两万二千法郎，算起来每册还不到九法郎，而他最初的定价却是二十法郎。他因需款孔亟，便把契约签定，却没有留神到一件事情的严重性。原来包都安并不是付给他两万二千法郎现款，而是宁愿付给他两家书商的

两万七千法郎支票，其中一家还住在外省。巴尔扎克只看到额外五千法郎的好处，没有留神到钓钩便咬住诱饵。钓钩没有多久就令人觉出它的存在。就在他将要求两家书商兑现支票的时刻，两家书商竟同时破产了。他债台如此高筑，等候不起破产手续办清，于是决定，能为自己拿回多少就算多少，便把外省那家书商的存货接收了。因此，他并没有拿到现钱，却收进了大批不值钱的书，一些格斯奈、福洛里昂、费纳龙和基勒贝尔^①的老版本作品，都已趸在外省库房里积尘多少年了。

这倒是个喜剧的好题材。用德·柏尔尼夫人供给的资金他出版了那两本古典作品；因为它们找不到销路，他就用不及原来的半价抛了出去，以获得另一笔资金；现在，并没有得到所期待的现钱，他发觉手上又有另一批书籍存货，同样地卖不出去。他简直是用一堆废纸换来了另外更不值钱的一堆。这倒好象德国童话故事幸运的汉斯一样，他把积攒起来的工钱花在一头牛身上，然后把牛换成一只羊，羊又换成鹅，最后用鹅换了一块磨石，磨石滚到了水里，他就什么也没有剩下了。

^① 格斯奈 (Gessner)、福洛里昂 (Florian)、费纳龙 (Fénelon) 和基勒贝尔 (Gilbert)，都是法国不够第一流的作家。

这些曾经流行一时的作家们的作品，被大包大
包地捆上，堆在印字间里去积累尘土。不幸的是，工
人们需要用硬币支付，巴尔扎克并不能用费纳龙、福
洛里昂等等的书本来解决每周的工资帐额。不久，那
些给这家字号供纸的商人听到了这里事态的风声，
便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巴尔扎克的期票，它们此时尚
未由于他的亲笔签名而获得它们未来的价值^①。他们
坚持立即结清帐目，而这间用玻璃隔开的小小办公
室却做不了喧哗逼债的避难所。巴尔扎克愈来愈不
在印字间里露面了，尤其是快到周末的时候，规避就
愈拖愈长。他一家一家奔走，设法延缓付款期限，同
时探寻从银行家、朋友或亲戚那里获得贷款的可能
性。在那几个月里，当他拼命挣扎，力图应付困境的
时候，他经历了种种屈辱场面，这些，他后来曾如此
不能令人忘怀地写在《恺撒·毕骆都》（“César Birot-
teau”）里了。

他用参孙^②的力气来奋斗，然而最后他还是不得
不撒手作罢。到了一八二七年夏天，他已失掉了一
切；钱柜里可以付给工人的一个苏都没有了。作为印
刷业主，比他当出版商或者当诗体悲剧作家也并无

① 作者的意思是说，由于这些期票上面有巴尔扎克的亲笔手迹，成了历史文物，就值钱了。

② 参孙（Samson），古之大力士。

更多的成功可言。只有两个合乎逻辑的可能性存在，要么公开破产，要么私人清理。

巴尔扎克却选择了第三个可能。正象他的不朽对象拿破仑一样，他不甘心承认失败，被放逐在爱尔巴岛上，而是到滑铁卢去一试运气。他并未因过去的经验而踌躇，巴尔扎克又一次打算以扩大事业的方法去挽救破产。在他出版生意即将消灭在浪涛之下时，他把印字馆当做救生圈加了上去；而当印字馆也开始沉没的时候，他又打算加上一个铅字铸造厂使它浮起。这个企业的悲剧在于，也象巴尔扎克所有的企业一样，其出发观念乃是完全健全的。巴尔扎克一半是幻想家，另一半却是老练的现实者，他有律师的，或商人的清晰睿智。法国古典作品的一卷版计划，其本身决非蠢事。后来它在一种比较有效的方式下实现了，并且证明是一大成功。就是他在印刷事业上的冒险，其事业本身也并非错误。因为对读物的需求，当时正在迅速增加中。

他这第三个计划，就是铅字铸造厂，前景甚为光辉。他听说一种新式印刷方法，所谓的“fonterreotypie”^①，是一位皮耶尔·德瑞晒发明的，据说它能比普

^① fonterreotypie，法语，一种印刷术的名称。其特点即如下文所云。

通铅版的方法效果更好一些——“用不着铸造字模的坩埚，也不必要去翻转、矫正铸页。”巴尔扎克马上被迷住了。他颇有远见，觉察到在工业化兴起的这个时代，凡能促成生产简单化与廉价化的方法，都将带来决定性的成果，本世纪中最大的利润亦将来自这些发明。正如他的小说也证明了的，他在发明问题上从不缺乏兴趣。有一件事并非偶然，大卫·施且尔在《幻灭》里——一部反映巴尔扎克自己做印刷商经验的小说——非常关心一种造纸过程，后来它果然带来了几百万财富。巴尔萨扎·克拉埃在《绝对之追求》（“La recherche de l’absolu”）里，恺撒·毕骆都（苏丹糕的发明者），画家弗朗欧费尔，音乐家刚巴拉——这些人都想用一种崭新力量的组合，把迄今已经获得的成绩再提高一步。在这个时代自歌德以来再没有旁的伟大作家象巴尔扎克那样在科学的进展上具有如此活跃兴趣的了，并且他还有先见之明，料到由于读者数目的巨大增加，在不久的将来，手工排字和手工铸版必将让位于机械化的改进这一不可避免的发展。不论怎样，这种新印刷法看来总是一个大有前途的肇端。以永恒的乐观主义者的迫不及待和迫在眉睫的破产所产生的绝望心情，巴尔扎克于是紧紧地抓住了这个临到面前的新机会。

一八二七年九月十八日，这时他的印字馆已濒于绝境，一个新公司建成了，它包括巴比耶尔和一位叫劳容的，他是加隆西耶尔街四号吉来·非斯先生铅字铸造厂的破产清理人。十二月里，第一次通告撒了出去。看来是劳容供应装备，巴比耶尔接手搞管理，而巴尔扎克则负责为新方法做宣传。现在不需要从前那种小印刷商的琐事上的奔波劳碌了。新事业将在宏大规模之下进行。巴尔扎克准备了华丽的样本，凡是该公司所能供应的新颖字型的式样都精美地陈列其中，加上卷首的花饰和一些装饰性插画，都是归功于新方法才能够为印刷家与出版家利用的东西。就在新样品目录刚要完成的当儿，巴比耶尔突然宣称打算退伙。轮船还没有离开港口就要沉没。在这一发千钧之际，又是德·柏尔尼夫人出面援救。她说服丈夫委她为财产代理人，买进了巴比耶尔的股份。在过去已经赔掉的数目之外，她又扔出了九千法郎，才使这条船暂时得以驶出。

然而，事已过迟。带着各式铅字以兜揽买主和顾客的华丽样本尚未及时备妥，而公司的债权人戒于巴比耶尔的退出——在他们看来，巴比耶尔是唯一可靠的合伙人——便开始围攻这所房子了。纸商与书商要求偿清帐目，放款人追索贷款，工人们讨取工

钱。没有人注意巴尔扎克的保证，什么只要这新企业站稳脚跟金钱就会滚滚而来。也没有人肯再接受期票，不论它是巴尔扎克与巴比耶尔公司的，还是巴尔扎克与劳容公司的，还是巴尔扎克·奥瑙利自己的。一八二八年四月六日这天，这个第三财团，本来打算经营十二年的，宣布无力偿付。于是巴尔扎克破产了，三重破产——作为出版商，作为印刷商，作为铅字铸造厂的所有人。

坏消息不应该再瞒着巴尔扎克的父母了，他们应该立即获悉情况；否则儿子的失败，和巴尔扎克破产对于巴尔扎克姓氏的玷辱，最先情报就将由报纸传达给他们了。这次崩溃的噩耗真象一声霹雳在耳边炸响。起初，母亲打算把他们投入资金的亏折瞒着已届八十二岁高龄的丈夫，这取得了暂时成功。但是马上就来了严峻的问题，究竟是这家人应该干脆放弃这个浪子呢，还是应该再做一次牺牲把他作为商人的信誉挽救回来。

巴尔扎克夫人，她当初连一文零用钱也不给上学的儿子，他在墙上挂了一幅版画还责备他奢侈，似乎很难使人期望她动用家庭存款，虽然存款仍相当可观。不过，她也关心好名声，对公众的说长道短忧心忡忡。巴尔扎克这个姓氏将在所有报纸上“破产

栏”的下面出现，这将使她在闰党姻娅之前羞愧无地。无疑是在绝望心情的驱使之下，她宣布愿意再次牺牲钱财，来避免无力清偿这种公开的丢脸的事。

一位表哥，德·赛地洛先生，应她之请来办理这件困难的清算工作。巴尔扎克将几个商号的帐目和个人的债务混淆一气，竟使德·赛地洛先生用了差不多一年工夫才把资产负债表清理出来，使债权人至少部分地感到满意。他第一个有见识的步骤是使巴尔扎克从歇业的手续中完全摆脱开去。幻想者和宏伟计划的策划者在需要小心翼翼准备性的工作上毫无裨益的。他的惨淡劳役直到一八二八年年中才告结束。这所印字馆，在它身上承担着十万法郎以上的未了债务，由巴比耶尔以六万七千法郎买去，这表明巴尔扎克一家净赔了四万至四万五千法郎。德·柏尔尼夫人，她曾为情夫一共投资四万五千法郎，接收了铅字铸造厂作为抵押，这是一项极不充足的第一笔摊付，她把厂交给儿子阿历山大了。所有曾对巴尔扎克经商天才寄以信赖的人，都受到暂时的严重损失。可是由于命运的嘲弄，这两处买卖却在巴尔扎克退出场外之后马上就开始自给自足了，并且它们还能在经营企业所需要的清醒、有耐力的判断之下向前推进。于是巴尔扎克又回到了他的想象力能

够获取丰硕成果的唯一活动领域——艺术领域里去。

* * * * *

在德·赛地洛先生完成两个商号的善后事宜之后，留给巴尔扎克的事情就是他该给自己也做一张资产负债表。从钱财的观点看，自然是一塌糊涂的。他已二十九岁了，却比以前更加不能自立。十九岁时他虽一无所有，却也一无所欠。到了二十九，他却欠了父母和德·柏尔尼夫人将近十万法郎的债。十年以来他都在徒劳地工作，没有间歇，没有休整，没有消遣。他蒙受过各种方式的屈辱，用化名写作过几千页东西，从早到晚拴在办公桌上，除了寻找主顾以及同债主们较量之外。经商三年所积累下来的债务，就是他的西昔孚斯岩石^①。今后一生中他将一次又一次用尽臂力把它推上山去，而在他达到山顶之前却只能干瞅着它又蓦然滚下。迈错了第一步，竟宣判他终身债台高筑。于是他早年那个有朝一日能够自由自主献身于创作的美梦，也就注定永远不会成为现实。

不过，资产负债表的钱财方面却被一笔无与伦

^① 西昔孚斯岩石 (The rock of Sisyphus)，希腊神话。希腊古国王西昔孚斯，因作恶多端，死后堕入地狱，被罚把大石推上山顶，但推上又滚下，因而劳作永无尽头。

比的宝物胜过了。作为商人他所丢失的，却以作为文学家而得了回来。贷方这笔进帐乃是一笔价值更大、而且得到全球承认的硬通货。三年来的辛苦，无尽无休地与现实力量的搏斗，教会了这位浪漫主义者，在这之前，他一直满足于描写从时髦样式里抄袭来的淡淡影子，而现在，他却能看清这现实世界及其每天上演的戏剧。他后来说，这些戏剧中的任何一出，都跟一出莎士比亚悲剧同样感人，跟一场拿破仑战役同样激烈。他已领会到在实利主义时代金钱所具有的重大的、魔鬼般的意义，他懂得了围绕着汇票和期票所进行的斗争，在小商号里使用的也并不亚于巴黎大帐房中所使用的诡计与权术，这一切所包含的心理力量，跟拜伦的海盗或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的蓝色血液的骑士们经历奇遇所包含的是同样了不起的。由于与工人们共同劳动，与高利贷者战斗以及与批发商们拼命讨价还价，他获得了不可胜数的关于社会情况和冲突的知识。比起同时代的著名人物维克多·雨果、拉马丁或阿尔弗莱·德·缪塞^①来，他们只不过追求生活的罗曼蒂克外表以及它的一些高贵而浮夸的成分而已。巴尔扎克还学会了去观看、去

^① 阿尔弗莱·德·缪塞 (Alfred de Musset, 1810—1857)，法国诗人和剧作家。

描绘蕴涵于贫困之中的残酷，卑贱生活中的丑恶，和潜伏在人们内心的秘密力量。

这位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的想象由于现实主义者的慧眼而更丰富了，现在是不具幻想的怀疑主义了。从此以后，没有什么庄严宏丽会再打动他，没有什么罗曼蒂克帷幔能再欺骗他，因为他已深深看透这架社会机器活动的底里，深知那些缚住负责人手脚的网绳，以及使人有法逃脱的网眼。他知道了财是怎么发的，本钱是怎么赔的，官司该怎么打，人在世上怎么混，怎样挥霍，怎样节省，怎样去欺人，又怎样去自欺。他后来非常正确地说过，正是因为青年时期他曾试过多种谋生之道，学会了观察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所以他才能忠实地描绘他的时代。他最伟大的杰作，《幻灭》，《驴皮记》，《路易·蓝柏尔》和《恺撒·毕骆都》，都是中等阶级的，证券交易所的，商业社会的伟大的史诗，假如没有他那些年里所经历的诸多失望，那是不能想象的。只有现在，当想象与现实融会贯通在一起时，巴尔扎克小说的令人惊异的本质才会以现实与玄想的完美结合的姿态出现。只有当他在现实世界里已经无法获得成功之后，他的艺术家的本能才足够成熟，可以形成一个他自己的世界，并把它摆在现实世界的旁边。

第 六 章

巴尔扎克与拿破仑

彼以剑锋创其始者，
我将以笔锋竟其业。

鉴于冒失的投机事业全盘瓦解，合乎逻辑地总该以为巴尔扎克的自信心必已被埋葬于奢侈愿望的废墟之下了。然而，当他的计划象纸板房子颠覆下来时，他心中却只感到一件事情——他又可以自由自主地重新更始了。从父亲继承下来的生命活力，也许是从茁壮农民的整个血脉继承下来的吧，并不曾因为这次灾难而受到丝毫影响，他也决不算为耗折了的钱财苦块昏迷。再说，丢失了的钱财也并不是他自己的，而且他终身负债数目如此之大，使它们同他想象中所获得的财富一样，都不象是实有其事。挫折从

来不动摇他最根本的乐观精神。折断弱者脊梁的事，在他不过是皮上划道伤痕而已。“我一生中的每个阶段，勇气总能战胜不幸。”

可是，暂时，看起来好象哪怕只是为了外表检点，也还是避免一下锋芒毕露为好。何况，他还有许多充足理由使自己不必独立门户，讨厌的债主们还会去敲门的。就象他非常喜欢的费尼莫尔·库柏^①某一本小说里的红肤色的人一样，他一度巧施了隐匿行踪之计。他既要留在巴黎，一面为谋生，一面又为了接近德·柏尔尼夫人，就非得不时地更动住处，还避免向警察机关登记住址。

他头一处隐匿之所是亨利·德·拉杜摄的家。跟这个人他是在最近几个月中结成友谊的。拉杜摄在巴黎新闻界颇有办法，他将这位后生置于他的羽翼之下。他善于取人之长而短于自我创造，在善意的理解与批评方面颇具女性才思。他在成功的年月里至为和蔼可亲，而当失意降临时他就退入到默默的韬晦之中。自己天赋虽不太高，他对旁人才能的敏感却使他能分享他们的不朽令名。正是他为后代千秋

^① 费尼莫尔·库柏 (Fenimore Cooper, 1789—1851)，美国小说家。

救出了安德烈·谢尼埃^①的诗，谢尼埃的弟兄曾出于嫉妒而把那些诗锁在书桌里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他还后发出最美丽的一些法国抒情诗，那些就是玛色琳·戴斯包尔德—瓦勒莫尔的美妙诗篇，而他就是玛色琳的一位不忠实的情夫。正是拉杜摄敏锐的知人之明，才使他把友谊与款待献给了年近三十的破产印刷商，尽管此人这时连一行显示他未来天才的东西都不曾出版过；而且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积极地鼓励、告诫巴尔扎克，让他再一次在写作上一试身手。

巴尔扎克没有跟和蔼可亲、但很饶舌的朋友相处很久。为了按他习惯的工作方式去工作，也就是说，日以继夜，没有休息，没有间断，他需要完全的遁居，一间自己的小屋，不论多小都行。为了他可以享受重新更始时所需要的安宁平静，德·苏维尔一家允许他使用他们的姓氏，因为假如他用自己的姓名去租房子，门铃必然会整天乱响，也就不会有逃开债主、邮递员、法警的短暂憩息了。一八二八年三月里，一位不出名的房客，某一位苏维尔先生，搬进卡西尼街一所小房子里，然后有九年之久，这儿就是巴

^① 安德烈·谢尼埃（André Chénier，1762—1794），法国诗人。

尔扎克的总部。他使楼中的房间住满他的创造性想象所召唤来的无数角色。

从位置的角度看，卡西尼街具有许多优点。这是一条近郊街道，居住着一些不出名的市民，也没有人会想到上此地来发现一位作家，尤其是一位知名的作家，竟住在城市贴边已靠近天文台的地方。

这里已不是巴黎，可仍算是巴黎。这个地区也有点儿广场、小街、林荫路、堡垒、花园、大路、公路；它已属外地，但也还在首都；所有的东西它全有点儿，可又一点也没有；它就是一块沙漠。

就象响马从城堡上攫袭而下，黄昏时分巴尔扎克也可以降临“我脚下的巴黎，那是我意欲征服的”。否则，他也可以扯起吊桥，以防不速之客的打扰。只有两位朋友知道他的秘密窟穴何在。一位是画家奥古斯督·波尔志，他住在楼下，另一位就是德·柏尔尼夫人。恐怕这所房子就是她帮忙看中的。房子不仅就在她自己住宅的横街上，它还有一种不平凡的方便。有一座狭窄的后楼梯由院子直通到一扇开向巴尔扎克卧室的密的门，因而不论她的来访多么频

繁，都无损于她的令誉。

这个住处只是跟莱斯底居耶尔街相比才显得费用高昂。他占用的三间屋子——起坐室，书房，卧室，还有一间讨人喜欢的小浴室——一年只花他不到四百法郎。可是，巴尔扎克已是老手了，总要把省钱的东西弄成十分费钱的。他刚搬进新居不久，就跪倒在要把它豪华地装饰起来的热情面前。就象理查·瓦格纳一样，此公也是终身负债的，当他仍在辛苦劳动去弄钱发财的时候，就想在他周围环境中预享奢侈了。瓦格纳每搬一回家，第一步便是招呼室内装璜商来挂起天鹅绒窗帘，家具上覆以锦缎，地上铺盖厚地毯，为的是取得作曲需要的气氛。在他这间与世隔绝的书房中，巴尔扎克需要一个装饰精美、过分精美的环境，其实，这环境对于高雅情趣来说，是过于拥挤了。他感到喜悦的是，装饰房间使它们提供投其所好的某种风格的背景，就象在他的小说里，他总爱给角色们建立环境，细节非常详尽，需要建筑师、装饰家、裁缝、鉴赏家的综合知识才行，为的是可以从各方面去看到他们。目前他还不可能获得值钱的物品，象意大利铜器，金制鼻烟盒，饰有纹章的马车以及其它各色俗气的装饰品，为了这些，他后来在二十年中，牺牲了夜里的睡眠和健康中最好的那部分。在卡西尼

街，他暂时限于廉价的无用物品。他搜罗玩物店和古玩铺，去买毫无必要的摆饰。他设法从玛勒街债主们那里偷偷救出来的几件家具，现在添补上时钟、烛台、小雕像以及一般能取悦于妇人之心的玩物。不仅是他父母，连朋友拉杜摄，都觉得不名一文的作家身上这种对钉短玩物的女性口味是十分可笑的：

“你简直丝毫未变。你挑了卡西尼街去住，可又从来不去那儿。你什么地方都去，就是不去那个等待着你、而你又能在哪儿谋生的有用的活动场所。你一心依恋的是地毯、桃花心木柜子、装订考究的书、过多的时钟和铜版画。你搜遍整个巴黎去寻找烛台，可它被买来后却从来并不向你放射光芒，而同时你口袋里则连看望病友所需的几个苏都没有。”

也许他需要在外部环境中有种过分丰盛来平衡他内心的过分丰盛吧。对他的书房，他却一点不加装饰，象间僧房，而后来也永远保持着这个样子。屋里那张小桌，他每逢搬迁必定带着，仿佛有点儿迷信地依恋着它。还有烛台，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他主要在夜间工作。再有一个壁橱，为贮藏纸张、稿件之用。

可是，那间客厅，却一定要卖俏似地有魅力；卧室，更甚的是那间浴室，一定要妖冶动人。从工作所在的那间黑暗、苦行的小屋出来时，他需要周围有温暖、诱人的颜色，精致的物品，和来自财富天堂的金色祥云。就是要有一些东西将他托举于日常世界之上，因而他才不至于立即从美梦中惊醒过来。

然而，他从哪儿弄来钱去买这些新获得物的呢？他当时一个钱也挣不来，还负债达六万法郎之多，一年即须付利息六千法郎。当初在莱斯底居耶尔街，他自己擦洗地板，自己走六条街去汲水，以省下给挑水人的一个苏，才不过仅能糊口；而现在他肩膀上负着如此重债，怎么在必需品之外还能购买奢侈品呢？他的小说主角，那些德·马尔赛，拉斯迪额，梅尔迦特，是可以帮助我们解释这矛盾的。他们接二连三地为一个理论辩护：如果不欠债或只欠小债，这会使人节俭；但是巨额债务却能使人奢华。当他一个月只有一百法郎时，巴尔扎克每花一个法郎之前都要掂量七次。而现在他负了一笔大债，对他乃是天文数字，那么不论他心爱的书是用贱价麻布装订的还是用红色摩洛哥鞣皮装订的，不论他偿还了债主另外几百法郎还是在未清的旧债上再加几千，事情就全一样了。书中的主角争辩——巴尔扎克也如此——说什么事

都好办，只要一个人成了名，或者娶了阔老婆，或者在交易所碰上好运气。与此不同地，如果徒劳而无功可言，那么债主们也不会由于更多一点债款而受到多大影响。

可是，巴尔扎克是决心要成功的。真正的奋斗不过刚刚开始，这他也深知；而且以后决不会只是一些零星战斗，以寥寥的钱财作为胜利的报酬。这次胜利将是决定性的。书房的壁炉架上立着唯一的一件装饰品，那是他准许用来调剂书房的空荡无物的，是一座拿破仑石膏像。因为巴尔扎克觉得这位征服者之凝眸相视乃是对他的挑战。为了鼓舞斗志，他取出一张纸，写上了“Ce qu’il n’a pas pu achever par l’épée, je l’accomplirai par la plume”^①。他把字条粘在雕像底部，不断地勉励自己全力以赴，一直到他有朝一日也跟拿破仑一样攀跻到顶峰。这位他的时代里最大的伟人，在用白刃杀出一个帝国以前，也曾在巴黎的顶楼上年复一年地等待过。巴尔扎克坐到桌旁，唯一的武器就是一支笔。把几令白纸当作他唯一的弹药，毅然决然定要征服世界。

*

*

*

*

*

^①“彼以剑锋所未竟之业，我将以笔锋竟之。”这句法语同章首的引文并不一致。

巴尔扎克现在有了一大优越条件，就是既知道了自己的工作才能，又知道了自己要干什么。过去十年的艰苦奋斗使他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并且他发觉，成功的决定性条件乃是走向目标的坚定不移的专心致志。意志力要想造成奇迹，他必须决不游移，决不在另外的方向上耗费精力。目的的单一，为专注的痴情而献身——只有这样，才是力量的源泉，才是成功的保证。尽管为时已迟，他还是掌握了商业方面失败的道理了。他并未全身心投入其中；并未把全身每根纤维集中在那上面；他未曾以真正商人的炽热本能去追逐每一个苏、每一张订单。他并未调动他每根神经使之紧张起来，也未将全部思想用于促进印刷事业，相反，他用了一部分时间去读书写作。如果他想再度从事文学生涯，他必得比以前更加全心全意地献身。情况十分有利。他以大批匿名作品练就了老练的笔法，又在经过与生活多方接触之后，积累了可用于肖像画无尽长廊的充足材料。他已侍候过一百位主人，办理过所有面临于他之前的工作。如今将近三十，学徒年月已然过去。只要肯将全部意志投于工作，他就会成为自己的主人。

他对于本身及工作的新责任感表现为他决定要用真实姓名去印行下一本著作。只要他还把真面目

隐匿在假名字背后，其目的也无非是高速度与赶快得到代价，他的责任就很轻微，因为无论赞美和责难都送到了一位假托的德·圣·沃般先生或维也尔惹莱那里。可是，一旦事关把新招牌放在自己名下投放市场，一旦事关在蜂拥着的作品和众多作家中间闯出一条新路，他就不会满足于被人看成蹩脚文人之一，那些人只会拿出流行的伤感小说。一八二八年的巴尔扎克，已经决心要打开头盔，厕身于作家之林，并且要同最著名、最有成就的历史小说家一较短长。他已决心不仅仅要媲美，而且要超过沃尔特·司各特爵士。他为新书写的序文就是他参加竞赛的开场锣鼓：

一位作者雅不欲自我束缚于那种叙事风格，把事实烦琐地罗列出来，行动一步一步展开，仿佛在解述一架骷髅，那上面的骨骼都已精细地编号。历史书籍上公开记载的伟大教训如今必须以人人都能了解的方式来描述。这种方法若干年来已被有才能的作家追寻，本作者也希望加入这个行列。作者企图在本书中再现一个时代的精神，并将一桩历史事件呈现于眼前。他将贡献的是生动口语而不是官方记录，是战

争本身而不是战事报告，还有，他没有用史诗叙述体，他选择的是戏剧表演。

自从他在韵体悲剧不成熟的尝试之后，这还是巴尔扎克第一次着手一件需要发挥他全部精力的工作，于是全世界不久即将以大吃一惊的心情去接受他这以极度专心致志所获得的果实。

巴尔扎克早就着手于他选为第一部真正的小说的题材了。在他无数稿纸中有几张关于一本将被称为《少年》的故事的素描，内容是一桩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旺代县叛乱事件。还有一些情节是打算放到另一本以西班牙为背景的匿名作品里的。可是，他的加强了的责任感却使他认识到他在早期历史小说中史料使用的不确实性和错误性，还有，他如果选择了当代题材，那么光用硬纸片搭成的砌末去包围书中的角色们，那是决不够的。他应该在真实的背景中看到现实环境并赋之以生命。在他从前的那些中世纪小说里，只有专家才能窥破他的失误，但是旺代战争在时间上却与他的时代相去不远。无数目击者都还在世，他们都是参加过蓝色连^①或与加都答尔的农军

^① 蓝色连 (Compagnies des Bleus)，法国大革命时共和国的军队，也译作“蓝军”。当时叛军着白装，故称共和国军队为“蓝军”。

共同作战过的。巴尔扎克投身于工作，其精神之彻底真令人钦佩。他从图书馆借来当代人的回忆录，研究军事报告，作了大量摘录。他发现，正是那些细小的、显然无足轻重的、然而真确的细节才能给小说以令人信服的生动活泼。没有真实与诚意就没有艺术，角色们如果不扎根于他们的环境中，就不可能栩栩如生。他们必须在与土壤及环境的密切关系中显示出来，要呼吸他们那个时代的空气。自写了他的第一本独特的、有个性的小说以后，作为现实主义者的巴尔扎克便粉墨登场了。

有两三个月之久，巴尔扎克研究、阅读，找遍一切可用的材料，仔细披览地图，尽量精确地去确立队伍的行动和战役地点。然而，即使对于最敏锐的想象力来说，印出来的文字还是不能代替由直接观察所得到的明确印象。巴尔扎克不久就发现要把德·维尔纳尔小姐的旅途写得十分生动，只有自己坐上马车照着女主角的路线走上一遭。要想制造出气氛和风景的生动色调，只有把想象中的景象付诸实地去考验。

运气总算不错，一位曾经参加过反对朱安党人的老共和国军人正好已经退休，住在福杰尔，那儿就是当时的战地。而且，这位德·彭迈惹尔男爵还是巴

尔扎克家族的一位老友。这种有利的巧合当然应该利用，即使它意味着要为这次旅行去借点债或者再写一点骗钱的作品（就连那些巴尔扎克专家也查不出他在写作正经作品的间隙中还插进来写过多少糊口之作）。他以轻妄的坦率向德·彭迈惹尔男爵致歉，说他由于经济状况危窘，不得不自我请求到后者家中小住。而德·彭迈惹尔，在僻远的村居中大概十分烦闷吧，也象每位老战士一样，高兴能遇到愿意洗耳恭听他往日战役故事的人，便回信说，巴尔扎克将受到欢迎。

他的行李是寒俭的。彼时他尚未被虚荣心所驱迫，象后来那些年里那样，到一百三十件背心中去挑选出最考究和最昂贵的那一件。他也还不能乘坐自用马车出门，由穿制服的跟班陪伴。一位服饰俭朴的年轻人，姑且不必说是褴褛吧，爬上了公共马车的一个廉价的位子，即使这样也已是一个奢侈了，因为他连全程都坐不起。为了节约，旅程的最后一段是必须步行的，而靠两条短腿在公路上跋涉，当然无法改善那身本已狼藉的装束。当他满身尘垢、汗流浹背地在敲德·彭迈惹尔住宅的大门时，竟被人第一眼认作流浪汉，不过这个可怜的印象不久便消除了。几乎初见面的寒暄尚未了结，他的年轻的欢悦情绪就已经

显现出来，他完全沉醉于欣忭之中了，因为他终于找到良好处所，今后几个星期的食宿都不成问题了。德·彭迈惹尔夫人留下了一篇这第一次会面的记录，这记录绘出了从他身上放射出来的活生生的力量的一幅栩栩如生的图画：

他是位矮小的年轻人，身躯肥厚，这一点由于衣着剪裁拙劣而格外显著。那顶帽子尤其不堪，不过他一把它摘下，在你看到他面部丰富的表情之后，其它的你都就忘记了。此后我看到的就只是脸了。没有见过他的人真不能想象他有的是个什么样的前额，还有一双什么样的眼睛！舒展的眉毛光泽动人，棕黄色眼睛象他的言语一样充满了表情。他的鼻子肥厚而四四方方，一张永远咧着笑的大嘴，全不在乎他那参差不齐的牙齿。他留着浓髭和长可披肩的垂发。那时候，尤其是他刚到的那几天，他总体看起来显得枯瘦，就好象他没有吃饱似的。……从他整个的仪表、行动、姿态、说话的方式来看，有着极多的善良天性，纯朴而坦白，使人一见到他就不能不喜欢他。而他最显著的特征，乃是他那经常的好脾气。好脾气太富裕了，到处在感染别人。

他被德·彭迈惹尔夫妇款待得很好，直到返回巴黎后好几个星期，才失去他“新获得的丰腴和好气色”。

本来他只打算住两个星期，结果竟停留了两个月。他倾听德·彭迈惹尔的怀旧之谈，写下笔记，进行写作。他忘掉了巴黎，忘掉了朋友，甚至也忘掉了德·柏尔尼夫人，对夫人他曾在严保证，将送上一份记录着每天印象的日记。他生活于全神贯注的状态下，这种状态就他来说，总是顺利成就的先声，他一心专注于工作，过了几个星期，就把他新小说的几章交给在巴黎的拉杜摄了。

拉杜摄，他在发现天才方面具有一个堪舆家的良能，马上就预见到一位伟大作家即将出现。他的信心，尽管诚笃、恳挚，却不幸地出以财物形式。他决定在他认准了是个未来的宠儿的身上“押上赌本”，而且，知道巴尔扎克舍不得拒绝，他拿出一千法郎收买一本尚未写完的小说的版权。巴尔扎克没有抉择的余地。虽然从前他曾从毫不费力乱写一气的书上收入一千五到两千法郎，而在目前的情况下，他却不能拒绝一千法郎的现款。买卖算是谈妥了，不过在这种情形下经常总是如此的，这意味着他们的交情也拉倒了。拉杜摄却尝到一次不愉快的意外。他一向惯

于把巴尔扎克认作快手，能够准时到一天不误地交出约定数量的凶杀、毒药以及伤感情话之类，这回，他却很恼火，因为必须得常常给巴尔扎克送去催货单。巴尔扎克总不肯把稿子交出，直到他自己认为非常满意为止。随后又多了一个耽搁的原因。在稿子终于从推三阻四的作者那儿索取出来，送去付排后，清样送回时却带着无数处的修改和更动，以致必得重新排版。拉杜摄大肆咆哮，说由于这些无尽无休的删改，他时间金钱两蒙损失，然而巴尔扎克还是从容不迫。艺术家的责任感已经确立。这还是第一次，他感到了，他对奥璘利·巴尔扎克这个名字应负何等责任，他决心要使它不朽。他一生中，对于商业及其它财物方面的责任都不大关心，相形之下，对这件义务，他却是从不大意的。

一八二九年三月中旬，康耐尔出版公司发行了《最后的朱安党人或一八〇〇年的布列颠》，凡四卷，著者奥璘利·巴尔扎克——还不是“德”·巴尔扎克。没有达到预期的成功，这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全书的布局和连贯性，第一次显示出伟大小说家的大手笔；场面的展开，技巧极为成熟；军事的细节充满了活灵活现的描写，雨洛将军和间谍高兰丹这两个角色是由活人直接摹下来的；他在政治背景上的洞

察力（这一点在后来的小说中，曾无与伦比地刻画了时代的特征），使他从阴影中勾勒出富歇^①的形象，这位拿破仑有力的敌手，一位使巴尔扎克终身憧憬的人，总是永远故意地潜匿在阴影之中的。只有这本书的情节本身才泄露出作者从前是写流行小说的。德·维尔纳尔小姐这个角色，这是从两三年前出版的用假名撰写的小说《La guitariero》里移植过来的，写得很不真实。

巴黎的批评家们对拉杜摄和巴尔扎克的大吹大擂并不理睬，态度颇为冷淡，他们所指出的是“风格上的越轨”。而巴尔扎克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那些年的胡诌乱写使他造成了潦草马虎的毛病。甚至于五年以后，在他用最大的细心去洗伐他的风格，然后把这一部“旧作修订本”送给热拉尔男爵时，他还写道：“不管我怎么努力，恐怕我这初出茅庐的手笔总会有人看出来。”公众对于这位自命的法国沃尔特·司各特爵士也不那么热情。尽了巨大的努力，头一年只卖出四百四十四部。对巴尔扎克天才过早的信任，又一次非得用现金补偿不可了。

纯粹靠机会，巴尔扎克又补偿了这次半截子的

^① 富歇（Joseph Fouché，1759—1820），法国政治家。一七九二年被选入国民公会，投票赞成处死国王。后致力于波旁王朝的复辟。

成功。在他还在写《最后的朱安党人》的时候，出版商勒瓦瑟尔到底发现了他住的地方，便去拜访了他，毫不客气地提醒他一笔二百法郎的款子，那是一年前为了一本巴尔扎克答应要写的《商人手册》预付的。巴尔扎克早已忘记这笔交易，但勒瓦瑟尔却坚持合同一定要得到履行。由于不愿打断正经工作而去改写一本通俗小册子，巴尔扎克便向他的债权人提出一个变通办法。在旧稿中他有一本《婚姻准则》，这本书他曾以《结婚生理学》的名称在自己的印刷所里排印过。如果勒瓦瑟尔同意，他准备修订一下这本旧书来偿债。勒瓦瑟尔大概也知道从这位不名一钱的作者身上并没有机会索回二百法郎，便答应了这个提议。

巴尔扎克于是开始工作，但他在完成时，原作已所余无几。近年来，他读了许多拉伯雷的作品，于是，他采用了另一种风格，充满了热情与风趣，以代替他从前的榜样劳伦斯·斯泰恩^①的冷隽机智。德·柏尔尼夫人和一位新相识德·阿伯朗台公爵夫人，为他提供许多有兴味的掌故，因而这本为清偿忘掉了的债务而纂辑的书，却写成了一本光芒四射、谐趣横生、圆润流利的作品，由于其中的大胆的奇谈、侮弄

^① 劳伦斯·斯泰恩(Laurence Sterne, 1713—1768), 英国小说家。

性的魅力以及幽默的怀疑，从而引起了热烈讨论。讨论有的是善意的，有的是恶意的，越来越多了。这就保证了这本书的马到功成。尤其是妇女们，她们日后都成为巴尔扎克的最坚定的持纛人，被这本书惹得又生气又高兴。她们写了信来，有的褒扬，有的贬抑，有的口气恭维，有的口气苛刻，不过不管怎样，这本书却是后来的几个星期内一切沙龙中的唯一谈话资料。

巴尔扎克还不算已经打开道路，他还不算成名，但有一件事总算有了成就。巴黎人的好奇心已被这位青年作者打动了。人们送来请帖，他也得找裁缝定制合体的服装和漂亮的背心，德·阿伯朗台公爵夫人还把他介绍给瑞卡米耶夫人，她的沙龙当时就是首都文学作品的主要票据交换所。当他拜访苏菲亚·盖夫人和戴尔凡·盖夫人的竞争公司时，他结识了他的业已成名的同行们，雨果，拉马丁，和儒尔·雅南^①。再做一次最后的努力，他一生中第二个要求就可以得到满足。他将不仅受到爱戴，同时也将成名。

* * * * *

道路虽然尚未打开，堤上一个裂缝却已形成，巴

^① 儒尔·雅南 (Jules Janin, 1804—1874)，法国作家。

尔扎克的巨大的创造性的能量以其如被禁锢的洪水般的威势象瀑布一样倾泻下来。一旦巴黎认出了这位青年作家的多才多艺，这种本领能在一个烤箱里同时烤出一部历史小说这种正经菜和一盘象《结婚生理学》那样的辣味饼，他就被这个成功以及扑面而来的种种任务给弄得头晕眼花了。可是，那些委托他写东西的人们却对这位魔术师的节目数量之大和变换花样之多，以及回答他们的这第一次尝试性呼叫所将轰鸣出怎样的远震四方的回响来，却是一无所知的。

在一八三〇和一八三一这两年中，这时他的姓名已经有了一点价值了，巴尔扎克的产品在文学编年史上几乎是无与伦比的。他作了许多短篇小说，长篇故事，报纸文字，谈话录，小品文和政治评论。如果你把一八三〇年印出的出自巴尔扎克笔下的七十种真实作品（姑且不论用其他名字出版的作品）和一八三一年印出的七十五种作品加到一起，那么他每天应该写出相当于一个印张的十六页书，而在清样上所作的更改尚不计算在内。没有一种期刊或报纸不曾突然出现过巴尔扎克的名字的。他写出内容驳杂的文章投给《猎鹰》、《剪影》、《漫画》、《时尚》、《巴黎杂志》和几十种其它出版物。他用流利的文风

谈论《打扮哲学》或《烹调生理学》，今天写拿破仑，明天又写《从手套研究道德》，他摆出哲学家的姿态去讨论《圣西门的门徒与圣西门主义者》，再不然就发表《食品店老板的意见》，研究《捧角家》或《银行家》，嘲笑一下《引起骚乱的方法》，以及讨论《一瓶香槟酒的道德》或《雪茄烟生理学》。

如此多才多艺与如此机智，这些本身在巴黎新闻界并不算怎么了不起。可惊的乃是，在这种五光十色喧嚣的陈列之中，竟然也能找到完美的杰作。它们，虽然只局限于一个小范围，并且跟那些过眼烟云的作品一样，也是一夜之间写成了的，却能流传达一个世纪之久。《沙漠里的爱情》（“Une passion dans le désert”）、《恐怖下的插曲》（“Une épisode sous la terreur”）、《刽子手侯爵》（“El Verdugo”）、《撒拉逊女人》（“Sarrasine”）——这些作品一下子就把这位从不知名的作家给显示出来，使人看到一位以短篇小说技巧擅场的空前大师。他顺着所选择的道路愈向前进，就愈加明确他能做些什么。Vires acquirit eundo^①。他的力量在前进的过程中日益增长。他以巴黎社会的世态画卷，如《女人之研究》（“Etude de femme”）、《三十岁的女人》（“La femme de trente

① 拉丁文，意为“向前走就能获得力量”。

ans”)和《夫妇间的和平》(“La paix du ménage”), 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类型, 即“被误解的妻子”类型**。这种妻子, 在结婚上的幻想破灭之后, 由于丈夫的冷淡与不关心, 就象患了什么神秘疾病似的日益憔悴。这些故事感伤气味太重, 又受损于现实主义及客观真实性的缺乏, 使它们在现代眼光看来实属病态的甜蜜, 而在当时却遇到了一群热情洋溢的读者。在法国以及其它地方, 深感受到误解的数不清的女人, 认为她们在巴尔扎克身上发现了一位能够诊断她们的哀愁的医生。只有他, 这个人认为应该饶恕由于爱情而生的一切过失, 并且敢于主张, 不仅“三十岁的女人”, 即使是四十岁的女人, 尤其是四十岁的女人, 由于具有更成熟一些的知识和辨别力, 就更有最强烈的口实去恋爱——只有他, 才是了解她们的。她们把他看做辩护人, 能为她们辩护在国家法律与资产阶级道德观上的过错, 不知有多少戴格曼夫人(Madame d’Aiglemont)^① 在巴尔扎克的理想化了的人物中看到她自己的影子。他那部于一八三〇年四月问世的《私人生活之场景》, 不仅在法国, 而且在意大利、波兰、俄罗斯, 都被人以同等热情广泛阅读着。以他首创出来的口号“三十岁的女人”, 他宣称,

① 巴尔扎克小说里的人物。

过了第一个青春的女人是**有权恋爱的**。

不过，即使是比那些女性读者稳健得多的法庭，不象她们顾影自怜把自己当成小说中的心爱角色，耽溺于自伤薄命，而在看到这位一步即跃入文坛的青年作家的多才多艺与力量之集中，也不能不大感惊奇。在同时代的成名人物中几乎没有一位曾写过任何作品能比得上《红色旅馆》（“L’auberge rouge”）那种简洁的描写本领，而在《无名的杰作》（“Le chef-d’oeuvre inconnu”）中，以其才气浩瀚使批评家们大吃一惊之后，巴尔扎克又显示了他天赋才能的深度。他的同行们尤其觉得，一切达于至善至美的冲动，这就是一切艺术深处的秘密，还从来没有以如此狂热的程度被逼到如此悲剧高度的。他的天才的十多个宝石反射面，每一个都从有限的表面反射出内蕴的光芒，而他天才的真正高度则表现在他的广大渊博、丰富多采和变化多端中。完整的程度只有从成就的总和才能判断出来。

巴尔扎克第一次表现出他真正的气质是在《驴皮记》里。正是在这个故事里他揭示出他的宗旨指向何处——小说是社会的一个横断面，上层与下层阶级，贫穷与富有，匮乏与奢侈，天才人物与小市民，孤寂顶楼的巴黎和热闹沙龙的巴黎，金钱的威力和

它的无能，都杂糅在一起。锐敏的观察家与尖刻的批评家已经开始把真实感加到了那个勉强的、感伤的浪漫主义者身上。《驴皮记》的一个浪漫性特点，乃是把《天方夜谭》的一个东方童话移植到一八三〇年的巴黎来的这个主意。更多的浪漫性可以从两个人物身上看到：冷酷的福多尔伯爵夫人，她宁舍恋爱而取奢华；和她的对立面保琳，一个追求舍己为人的无边爱情的女孩子。可是巴加纳里亚身上的现实性曾震撼了同时代的人们，还有描写他自己求学时代的自传性场面，这些都是从个人经验中直接冒出来的。那些医生们的议论、高利贷者们的哲学，并不只是在沙龙中窃听而来的谈话的再现，而是真正角色们升华了的气质。

经过了十年的徒劳摸索之后，巴尔扎克已经发现，他真正的事业乃是当一位自己这个时代的历史家，当心理学家和生理学家，当画家和医生，当法官和文学创作者，对象是那个自称巴黎、法兰西或者世界的庞大生物。如果说他的第一个发现是他自己工作的巨大能力，那么第二个也并不次要的发现，乃是这个力量应当如何运用的目的。当巴尔扎克找到了他的目的，他就找到了他自己。在此以前，这些爆发的力量壅塞在心里，他只觉得这些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只觉得它们最终总会把他带到彗星生涯中去，高

翔于他同时代的扰扰众生之上：

“有好些使命是一个人应该服从的，同时存在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它将驱策我去获得权力与光荣。”

正象歌德一样，甚至于在《维特》和《柏尔里卿根骑士》成功以后，他仍旧不敢相信自己的才能是在文学方面，而且仅仅是在文学方面；巴尔扎克也同样，甚至于在《驴皮记》问世后，仍然未曾自信文学就是他的真正事业与命运。事实上，他乃是那种天才中的一个，其天才是在他们所采取的任何方式之下都能显示出来的。完全可能想象，他会成为米拉保^①第二，成为一位达利兰^②，成为另一位拿破仑，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画商，或者投机大王。这就是为什么他在早年并不相信他生来该是一位作家的缘故。而戈蒂耶^③，他是深知巴尔扎克的，说这句话时大概是不

① 米拉保（Mirabeau，1749—1791），法国政治家，口才卓越的演说家。

② 达利兰（Talleyrand，1754—1838），法国政治家，一八一四年任临时政府首脑。

③ 戈蒂耶（Gautier，1811—1872），法国巴拿诗派前驱诗人，提倡纯艺术美，认为一切有用的都是丑陋的。

会太错：

“他并不据有文学才能。在他这情形，思想与形式之间是有一条鸿沟的，这条鸿沟，尤其是在最初阶段，他简直毫无希望能够跨过。

写作一事对他并非必要，他也从未觉得这是他的天职。他认为写作只是在多种可能选择中的一种，他将以此获得财富与名誉，从而使他能控制世界：

他要成为伟人，为此他发射出力量的恒流，那是比电力还要强大的。

他的真实天才乃在他的意志力，而这种意志力之从文学找到它的出路，可以说是机遇，也可以说是命运。他的书，在世界上每个国家里都有人读，甚至年迈的歌德也曾向爱克尔曼^①表示过他对这种杰出才能的慈祥的惊异。评论刊物和别种期刊的编辑都打算用最高的代价去引诱他——而巴尔扎克却仍然没有信心。一年以前他曾写道：

^① 爱克尔曼 (Eckermann, 1792—1854)，德国作家，歌德的秘书。

“一封信的邮资，一趟公共马车的车费，对我都是可怕的花费。我常留在家里，为的是不要磨损衣服。”

现在，虽然接到多得眼花缭乱的委托，他仍旧认为文学不过是他多种可能性中之一。迟至一八三二年，他还写信给他母亲：

“早晚我总会发一笔财，也许是当作家，或者从政，或者入了新闻界，也许是由于娶了阔老婆，或者做一笔大生意发了横财。”

有一阵子，他被从事政治的念头迷住了。一八三〇年的七月革命把中等阶级又置于当权地位，有力的青年人有了很多施展本领的机会。法兰西议院中一位下议员能够提升得象拿破仑时代的二十五岁或三十岁的上校一样快。巴尔扎克几乎已决心要为政治而放弃文学了。他投身于“sphère tempétueuse des passions politiques”^①，还打算获得康伯瑞和福瑞尔两个选区的席位。他希望当权掌舵——“Vivre la vie

① “暴风雨般的政治狂热”。

du siècle même”^①——假如选民们曾对他更有好感，这或者就是他的雄心所已采取的途径了。成为法兰西政治领袖的说不定是他而不是梯山尔^②，也许他已成为拿破仑第二了。

有幸的是，两个选区的投票人都作了别样决定，不过另一个危险仍旧存在。他还可以去找“Une femme et une fortune”^③，得到终身所渴望的“richissime veuve”^④。这样就会发展出一位享乐主义者而抹杀了一位苦干家。因为——虽然他自己还不知道——他那巨大的成就只有在同样巨大的环境压力下才能够被榨出来。如果遇到一位年入三四万法郎的寡妇，那么巴尔扎克不论在什么时候，即使已在成名的顶峰，他也会委身于安逸生活的。“我是会退入安乐之窝的。”他曾在他朋友珠尔玛·卡罗面前承认过，并且还向她描写他的乡村生活梦想，在乡下，他可以“faire de la littérature amateur”^⑤，高兴的时候

① “真正生活在本世纪的命脉里”。

② 梯也尔（Thiers，1797—1877），法国反动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曾血腥镇压巴黎公社。后任第三共和国总统（1871—1873）。

③ “一个女人和一笔财产”。

④ “孀居的财富”。

⑤ “从事业余文学”。

候，偶尔写上一本书。

上天之命却比巴尔扎克内心的欲念聪明，决不使他得到过早的满足，因为天命在他身上希望得到比这个更多的东西。它阻塞了通向政府席位的道路，使他不致糟蹋天才；它拒绝了他想在交易所里凭一次运气就可以赢得巨资的美梦；它使富孀可望而不可即，尽管他在无休止地追逐着。上天把他早年在新闻工作上的热情，变成对一切报纸写作的嫌恶，把他拴在书桌旁边，从那儿，他的天才能征服的不仅是议院、交易所或者奢侈的室家之乐，而是整个世界。以一个狱卒的无情管束，上天一次又一次地将他驱回囚室工作，破坏他冲向外界的各种努力，因为到了外面，他就能享受自由、爱情和权力的无拘无束的快乐了。针对他每一次的逃跑意图，上天便给他加上双倍分量的锁链。在他早期的盛名之下，他一定已曾暗中预感到他将要承担的沉重负荷了。他抵抗，他设法规避，他从来未曾停止渴望着奇迹，那奇迹能一蹴而从束缚中把他攫走。他总在继续梦想着一次大赌博，一位阔老婆，一次命运的急转。

然而逃避命运乃上天所不许；他应该创作，此乃天命注定，所以幽闭在他心中的力量必须为自己开辟一个前所未有的文学天地。它的幅员不可测，它的

视野不知垠。他刚开始工作，他就发觉，从内心汹涌而出的丰饶和超度丰饶必须秩序井然，如果他和读者想在这广袤的领域中窥其全豹。如果文学将是他的活动园地，他就不能只是掉以轻心地将一本作品堆在另一本上面，而是要把它们联结起来成为一个阶梯，包罗一切世间情态，采用生活所会采取的一切形式。当他把这些小说中的第一部送给一位朋友时，他写道：“我的工作的底层平面图开始成形了。”他曾设想一个多结果实的圆满办法，就是使各个角色重现于多本书中，这样就可以代替一串并无关联的小说，而创造出这个时代的一部完整的文学史，它可以包括各种阶层、职业、观念、情绪和社会状况。在他那本《哲学小说》（“Romans et contes philosophiques”）的序言中，他让菲拉瑞特·查斯勒，此人的手是由他指导的，准备舆论去接受他的文学革新。一部当代的、包罗万象的历史被计划停当，而这第一卷只是

一组众多壁画中的第一幅。作者从事的任务是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与文化，这个时代，由于热度过头的想象和利己主义的泛滥，在他看来是非常堕落的。我们将看到，作者怎样能

够不断地在调色板上调合新的油彩……如何挨次摹写社会等级的每一阶段。他向我们介绍一个一个人物——农民，乞丐，牧人，市民，内阁大臣。即使是刻画一个教士的图像，甚至是国王本身，他也决不畏缩。

在三十岁上，巴尔扎克并未意识到他所承担的任务范围是如此广阔。他也没有意识到在撰写《人间喜剧》这件事上他已成为记录一组史诗的工具，而这是时代本身颁授给他的。当艺术家的因素已在他心中占优势的时刻，这个伟大的景象已呈现于他的心灵。然而，二十年的无法测度的、无与伦比的艰辛劳动却还不足以使此景象完全形成具体。

第 二 卷

巴尔扎克在写作中

第 七 章

三十岁的男人

从一八三一年起，在巴尔扎克已届三十之年、并以其第一部有分量的作品问世之后，他就从此一劳永逸变成奥瑙利·德·巴尔扎克了。疲冗努力、迂曲发展的那一阶段算是完结了。以成人论，以艺术家论，以人格论，他都已濒临于成长的结束阶段。无论在身体的外型上，在作为艺术家的发展上，在道德观念上，后来再没有发生过明确的改变。生命力已经找到方向，这个有创造性的作家已经确定了自己的任务，雄心勃勃的建筑师已经草就他未来建筑物的初步蓝图；而且，巴尔扎克也已经以狮子般的勇猛投身于当前的工作之中了。只要脉搏还在跳动，他的日常工作节奏就继续向前发展，既无中断也不减弱。从他

投身于事实上是规模无限的工作的那一瞬间，便只有死亡才能够对他的普罗米修斯意志加以限制。写作中的巴尔扎克，大概是近代文学里所能找到的创作持久性的最壮丽的例证了。象大树一样从大地的无穷来源里取得养分，他在被斧斤伐倒之前以庞大的力量屹立着，枝枝叶叶伸向天空，同时，一动不动地扎着根，坚忍不拔地履行他的富有生机的命运——孳长，开花，结出愈来愈好的果实。

尽管创作上日新月异，巴尔扎克自己却并无改变。把他五十岁的肖像同三十岁的比较一下，只找得出微不足道的差异——头发中多一两根银丝，眼眶下多一些阴影，鲜润的气色上多了一丝苍白，但总体外貌却是完全一样的。在三十岁上最基本的个人特征已经最后定型了。这位“矮小、羸瘠、苍白的年轻人”，在他的不矫饰的外表上，唯一积极的特征是跟未露头角前的波拿巴^①的隐约相似，说来也真够奇怪的，竟恢复成那个“圆脸蛋儿的胖孩子”了。他一把自己锚定在写字台畔，内心的高度紧张、犹疑不定、迫不及待、随遇而安等等因素，就让位给恢宏壮阔而从容自若的气概了，那是充满了力量和自信之感的。

^① 即波拿巴·拿破仑。

当他在达尔太这个角色上描绘自己的肖像时，他写道：

达尔太眼睛里的神情，那眼睛是一度闪烁着高贵雄心之火的，现在功到垂成时，却变得疲惫无情了。曾以宏大精深赋予眉宇间的思想，现在消褪了，一度苗条的身材已经肥胖起来。过舒心日子的、冒金光的色泽已浮现在面孔上，这张面孔在年轻时却是由穷困染上苍白之色的——那色调现出一种气度，正竭尽全力不断斗争，直至达到成功为止。

相貌造成的第一个，同时也是，跟多数艺术家的情形一样，不可靠的印象，乃是一个健康、爱享受和欢乐的好脾气。尽管那光滑整饬的前额上堆着经常不大整洁的鬃毛，他脸上的嫩肉，带着油润的皮肤，稀疏的髭须，以及宽阔无定的面容，却给人以一种印象，好象它们都属于一位喜欢过舒服日子、有充足时间睡大觉、多吃而少做的人。只有当人们看到他的双肩，宽得象举重者的、他自己笔下的伏特冷（Vautrin）的双肩；只有当人们看到他那肌肉结实、牡牛一般的脖子，它能一次俯首十二、十四小时而不知

疲倦；只有当人们看到他那运动员的胸膛；只有这时，人们才能有点概念，此人身上究竟藏有多么巨大的力量。他身上这股力量就肇端于那软软的、松弛的下巴。他的身体简直是青铜铸的。这身体的主要的质，就象在他作品中的一样，蕴蓄于雄厚、蕴蓄于广袤、蕴蓄于那难以形容的生命力之中。要从巴尔扎克的颜面去觉察其天才之存在，都必将是徒劳而且会导致错误的。雕刻家大卫·德·翁热^①曾试图赋予以天才的印记，他把上额加高，并塑出隆起部分，仿佛作家的思想要排开头盖骨的四壁，奔腾而出似的。画家布朗热^②则打算用白色僧袍来遮掩那放肆的肚皮，整饬一下全身的风度。罗丹^③也有同样打算，他的办法是给他一副从悲惨幻觉中醒来的失神落魄的样子。三位艺术家同样感到，这副尊容缺乏显著的特征，一定要有所加强，为的是使内在的天才能够被人认出，为的是要羸进魔鬼的或英雄的因素。而巴尔扎克本人，当他在马卡（Z. Marcas）这个角色中再度描绘自己的小影时，也做了同样的企图：

① 大卫·德·翁热 (David d'Angers, 1788—1856)，法国雕塑家。

② 布朗热 (Boulanger, 1806—1867)，法国画家，长于石版画。

③ 罗丹 (Auguste Rodin, 1840—1917)，法国现代写实派雕刻家。

其发如鬣；其鼻既短且扁，尖端有皱襞，鼻孔大如狮子。前额亦颇有狮子意，以一道巨大裂罅隔成两块有力的隆起。

忠实的观察者必须无情地承认，巴尔扎克——也象所有真正有代表性的民族天才们如托尔斯泰或路德^①一样——看去只象人民的一员，他的面孔，应该说，也就是乡土中不可胜数的平凡百姓的面孔的缩影而已。巴尔扎克的面孔至为平凡，甚至流于鄙俗。特别是在法兰西，智慧上的最高成就存在于两种类型之中，其一是贵族风味的精致提炼，如黎塞留^②、伏尔泰与华莱理^③；另一则表现了人民的力量与生命，如米拉保、丹东。巴尔扎克则全然属于低等类型，他不属于贵族也非式微之士。假如腰间系上一条蓝布围裙，他又站在法兰西南部一家小酒馆柜台后面，他那高兴的神气，跟一位一面斟酒、一面同主顾们闲谈的目不识丁的掌柜的是没有区别的。把他当作一

① 路德，即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德国神学家，宗教改革的领袖。

② 黎塞留（Richelieu，1585—1642），法国红衣主教和政治家。

③ 华莱理，旧译梵乐希（Valéry，1871—1945），法国诗人与哲学家。

个扶犁的庄稼人，当作街头的挑水夫，当作收税员，或者当作马赛妓院里的水手，巴尔扎克将均无不宜。穿着衬衫，或者随便什么衣服，他看上去总是真诚、自然。当他打算风雅一点，装出贵族的神气，头发上抹着头油，眼前举着眼镜，去模仿圣日耳曼镇上的纨绔子弟们的时候，他看上去就象是化了妆似的。正如在他的艺术中，当他探入哲学的或伤感的领域而对自己不忠实时，他的力量不在人为技巧，而在于天然无饰。同样地，他的主导的身体特质，就在于他的生命力，他的活泼生机，他的体力。

从视觉方面来体认这些品质，这不是肖像画的功能。那应该象从电影胶片中抽出的一个画面，一刹那的停顿，一个动作的片断。而我们并不能从他的种种肖像去推断他身心两方面的丰饶，正如我们也不能从他作品中的一个单页去推断他天资的无与伦比、多才多艺的生产能力一样。在巴尔扎克脸上，仅仅仓促的、浮光掠影的一瞥是什么也不会告诉你的。所有同时代人的报道在这一点上都同声一致。当他那矮胖的身躯，由于爬楼的费力还在喘息不止地走进了房间，身上一件扣错钮扣的棕色外衣，鞋上一半没有鞋带，一身投进在他体重之下咯吱作响的圈椅的时候，第一个印象是一塌糊涂的。这个粗野的、脑

满肠肥、蓬头垢面、一身香水气味的平民，竟能是我们的巴尔扎克，我们秘密情感的吟唱者，我们权利的发言人？这就是那些惊讶不已的贵妇人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而另外那些在场的作家们就心满意足地睨视镜子，求得证实，他们可远没有那么多的小市民气，比他文明多了。几多微笑隐藏在（贵妇们的）扇子后面，而男士们则一律朝着这位虽然平凡却很危险的文坛劲敌交换恶意的眼神。

可是，只要巴尔扎克刚一开口，最初的可怜印象立即消失，因为光芒四射的隽语激流立即使气氛受到电波冲击。所有的眼睛都被引到他身上，当他谈论一百种事情时，无论宣讲哲学或是简述政见，他引用大量轶闻、掌故，半是真实半属虚构，愈说愈趋玄妙，愈说愈不可信。在他一面吹牛、嘲弄、哂笑，既陶醉自己也陶醉听众的时候，富有戏谑性的好脾气的金色火花便从他深黑的眼睛里迸射出来。当他有本事博施慷慨时，那是无人堪与匹敌的。

他的肉体活力播扬魅力，跟他大肆迷惑读者的作品的魅力同样，都是举世无双的。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好象有十倍于人的力量。当他大笑时，墙上的图画都要发抖；当他说话时，妙语如瀑布奔涌而前，使人们完全忘掉他的坏牙齿。当他旅行时，他每

半点钟掷给车夫一笔小费，催他鞭马疾驰。当他算账时，成千上万元钱乱七八糟地叮当作响。当他工作时，不分白天夜晚，坐在那儿二十四小时连轴儿转，能用钝一打笔尖。当他吃饭时——下面请看碎嘴作家戈兹兰所描写的场面：

“……他的嘴唇颤动，眼睛闪烁着欢悦，由于看到一堆美丽的梨或桃，双手便因快活的期待而搔搦……他那兴高采烈、庞大固埃^①方式很是神气；他早已解开领带，衬衫竖领也敞开了；手里拿着水果刀，他笑着，喝着，一面把刀切入多汁的大梨。……”

在巴尔扎克的天性中，小器是同他最不相干的了。他具有孩子般的善良性情，这种性情，我们大体上总是把它归于巨人的，什么东西也不能动摇它。虽然他明知他的同行们对他这过于笨重的丰采发窘，还在他背后互相窃议，说他缺乏风度以及上百种其它的恶意诽谤，他却为他们每一个人都讲好话，把作品呈献给他们，并在他的《人间喜剧》里不是东处就

^① 庞大固埃 (Pantagruel)，拉伯雷小说中的主角，一个快乐的酒徒。

是西处提起他们大家。他豁达大度，不与人为仇，在他的作品中，没有一处可以找到对于某个人的非难。当他折磨出版家们迫使他们就范时，其目的并非要从他们那里勒索几许额外法郎，而是出于一种愿望，要逗弄他们，要表示他才是他们的主人。他也说谎，但目的并不在于骗人，而是发泄丰富的想象力和幽默感。他知道人们嘲笑那些他们认为幼稚的举动，但这更引得他夸大那些举动。他常向朋友们讲点言过其实的故事，他以敏捷锐利的眼光观察到，他们连他所说的一个字都不相信；可是第二天一早就把它传遍巴黎；这种事就使他变本加厉，更爱大肆渲染了。他最乐于看到人们认他为怪物，看到他并不入他们的俗套，而在他等待那些将以他为笑柄的讽刺出现时，他就先以拉伯雷式的兴致讽刺自己。那些人又能对他有什么损害呢？他为这种意识所弥漫：就他皮下的肌肉、脑子里的灰色细胞而论，他都强过他们大家，于是他就随他们去了。

巴尔扎克的自信，那是立足于由身体和智慧双方所给予他的一种力量之感的，而不是立足于光临其身的名誉和成功，因为以文学成就而论，即使在他已经出版了《驴皮记》、《高老头》和十几种其它不朽杰作之后，他仍感自己并无把握。他对自己的生命力

的充沛自信，并非来自轩臧轻否的衡量，来自自我反省，来自他人的判断。那是一种天生的东西。他自得于内心的丰富之感，无求于苦恼的自我批评或自省的分析。他给德·阿伯朗台公爵夫人的信上说：

“在我的五尺之躯中，紧塞着每一种能想象出来的对比和矛盾。如果有人高兴说我是虚有其表，夸张，顽固，轻浮，思想上无定见，奢侈，粗心，懒惰，缺乏适当的反映和不够辛勤，不能坚忍，饶舌，欠圆通，无教养，粗卤，喜怒无常，那么他也不见得不如另外一个人正确；而那个人是说我节俭，谦逊，而且勇敢，不屈不挠，精力充沛，坦然自若，勤苦，有定见，沉默寡言，充满文雅与礼仪，并永远愉快的。说我是懦夫或英雄，说我是聪明人或白丁，才华盖世或很愚蠢，这些都同样真实。说什么都不会使我惊诧。我自己已终于断然相信，我只不过是一件工具，是环境的玩物而已。”

无论他给别人什么精神食粮，什么赞美或者嘲弄，他总是昂首阔步，勇敢，愉快，无所牵挂，承受命运带给他的一切打击。他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所以

他能够不多计较。他的虚荣心虽然幼稚，但决不卑下。他倒象一位微醺醉汉，坦然自得。

如此基础深厚的慷慨天性，必然是大手大脚的。巴尔扎克在各方面都挥霍无度，只除了一件事，他必然吝啬于与人相处的时间。他曾说过，他“每天只有一个小时可以交给这个世界”，他的生活中是没有社交的余隙的。因而同他密切交往的人也就屈指可数了。和他真正亲昵的还不足十人，而且即使这几个人，除了最重要的一员^①之外，在他三十岁时都已光临他的生活了。在往后的岁月中，他的友谊圈子扩展很小，正象他在处世经验方面和艺术发展方面也没有增加多少一样。他必须吸收的都已经吸收了。他没有时间增添新的友谊，他只有用于写作的时间，只有他自己创造出来的男男女女对他才是真实的，重要的。

在他那狭窄然而持久的朋友圈子里，女人占首要地位。信件中有十分之九，甚至更多些，都是写给女人的。对于她们，他完全屈从于他的“*besoin d'épancher le coeur trop plein*”（倾吐出一颗过于充满的心这一需要），他的不时坦白的倾吐心情这个难

^① 这里指德·韩斯迦夫人，最后同巴尔扎克结婚，但巴尔扎克不久就病逝了。

以抗拒的渴望。对于女人，他能“*se mettre à nu*”（赤裸裸地呈现自己），他能在几个月的缄默之后，突然爆发出暴风雨般的冲动，要交出思想、感情，常常是向一位从未见过或仅属泛泛之交的女人。他从来没有给男人写过一封亲昵的信，从来也不曾有兴致把内心的冲突、艺术创作中的问题向他同时代最伟大、最驰誉的作家们倾诉过，即使如雨果或司汤达。象他那样习惯于垄断谈话的人，很少在迫不及待地继续神聊和吹牛时有心思容人置喙，他毫无兴趣于跟作家同事们通信，或者同他们谈话。他并不需要友情的鼓舞，而且恰恰相反。他需要内心的紧张得到松弛。因而，如果说他主要地只给女人写信，那不仅是，象他玩笑地向台奥菲尔·戈蒂耶所说，因为“*cela forme le style*”（那能形成风格），而是出于深沉的、也许部分潜意识的欲望，要找到一位了解他的女人。倦怠于写作，牵掣于事务，生活于债台重压下，一再坎坷于“*vie torrentielle*”（激流的生活）中，他无已地切慕一位妇女，她将是母亲、妹妹、情妇、内助，就象德·柏尔尼夫人曾在他成长的年月中所做过的那样。促使他不断去物色的并非由于猎艳的癖好而是对安宁的迫切需要。人们却不可受了他的《笑林》的骗，那里面尽是喧闹、肉欲之乐。巴尔扎克决

不是一位唐璜^①，一位卡扎诺瓦^②。他所需要的，是一位能给他布尔乔亚满足的女人，“une femme et une fortune”（一位妇女兼一笔财产），如他所坦白承认的。一位有着他那种想象力与活跃智力的人并不需要来自廉价冒险的思想、情绪上的亢奋。一半下意识地，虽然有时也神志清楚，他寻求的是能够满足他为人两极端的女人：一面把他的工作从不得不当成赚钱的手段的灾难中赎回，却不以她对他做出的若干要求而损害工作；一面满足他肉体的欲望，同时还从金钱与物质的困难中把他拯救出来。如果可能，她还应该是贵族后裔，以满足他那天真的势利之心。

这就是他一生的美梦，虽然它从未得到满足。他找到的追求对象，都是单方面的，有时是这一方面，有时是那一方面，而从来不曾是——或者说太晚了才得到——兼而有之的。即使是他与德·柏尔尼夫人的第一次私通，也被判定为甚不完美，因为，他曾说过，魔鬼非常残酷，把年龄钟表给安排错了。在二十三岁的年龄，他在她身上找到了带路人与安慰者，

① 唐璜（DonJean），西方历史上和著作中有名的色鬼。

② 卡扎诺瓦（Casanova，1725—1798），意大利冒险家，回忆录作者。他是与唐璜齐名的好色之徒。他的《回忆录——我生活的历史》既是一部抨击时政的史料，也是一个诱奸者私生活的自白。

她在危险时刻拯救了他，还热烈地爱上了他。然而年龄的悬殊，这一点在他最需要她的时候并未显得不自然，经过一个相当时期之后，便显得甚不相称了。在三十岁上，即使巴尔扎克，他是能把任何女人都看作他梦中的海伦的，也为给一位五十三岁的妇人当情夫而甚感窘迫了。虽然要罗尔·德·柏尔尼退到那种不可避免的事情以前去是非常之难的——其实，即使对于最聪明的女人来说，只要她正在恋爱中也是同样地难——他们关系中的色欲因素毕竟还是渐渐衰退了。

可是，在这个变化还未完成以前，巴尔扎克已经在旁处寻找而且找到了他天性中色欲方面的满足，而那位年事日增的德·柏尔尼夫人的嫉妒大概由于这一事实而更加强烈了：原来他这新朋友也和她一样是半老徐娘，肉体的妩媚也因之颇为衰退了。这位德·阿伯朗台公爵夫人乃是雨诺将军的遗孀，而当巴尔扎克一八二九年前后在凡尔赛第一次遇到她时，她已成为过去荣耀的一座颓坏了的纪念碑。她遭到波旁王室的摈斥，在社会上无人注意，又陷于不可自拔的债务，以致不得不靠回忆录来赚钱，于是她专事挖掘陈旧的丑闻，有的当真，有的编造，把这些东西一年复一年、一卷及一卷拿去卖给出版商。即使如此，她毫无困难地就把巴尔扎克从德·柏尔尼夫人

的母性裙带上解了下来，因为她打动了她天性中两桩最强的因素——艺术家一心想从生活的源泉中去研究历史的无餍的渴望，和无餍的势利心，那是他根深蒂固的弱点了。头衔与高贵姓氏永远是操纵他的符咒，而他能做公爵夫人的朋友，甚至是情夫，她床第间的后继人，即使不是皇帝本人的，至少也是皇帝手下一位将军的、穆拉的、拿破里国王的、梅特涅亲王的后继人，这种胜利之感当然能把他，至少暂时地，从德·柏尔尼夫人的怀抱中给掣转过来，要知道德·柏尔尼夫人的母亲毕竟只不过是玛利·安东涅特跟前的一个侍从女官罢了。

巴尔扎克心中这种永久鄙俗的虚荣与情热已将他投入一场历险之中，这场历险从一开始就没有表现什么了不起的困难。对于未来的“historien de son temps”（这个时代的历史家）来说，其想象力只消一星之火便能照彻整个天宇，能同一位知道所有的历史秘密的女人同床共寝，这该是多大的优越性！德·阿伯朗台公爵夫人曾在母亲派尔蒙夫人家里见过拿破仑，那时候他还是孱弱的青年波拿巴上尉。她不仅曾在杜伊勒利王宫里站在新封的王子公主群的前列，并且还曾窥见了幕后进行着的一切。如果巴尔扎克的带有拿破仑背景的小说，如《一桩可怕的故事》（“Une ténébreuse affaire”）或《夏倍上校》（“Le

coionel Chabert”），都浸透了文献的细节，那正是由于他与德·阿伯朗台公爵夫人的结识。在他们的结识中，真正的爱情比起彼此的肉欲和智力方面的好奇，不过只扮演了小小的角色。

当作一场恋爱事件来说，此事并未持延很久，然而某种友谊的依恋却保持下来了。双方都负有重债，都急于品尝一下生命所能给予之物，不久便又转向其他的钟爱。然而在短暂的热情冷却以后，他们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以志同道合的精神彼此相助。她把他介绍给瑞卡米耶夫人以及其他贵族相识者，同时他帮助她把回忆录分派给出版商们，或许还在写作方面暗中助过她一臂之力。渐渐地她从他的生命中消退出去了，而在若干年以后，人们发现她已死在巴黎一处破烂的顶楼中时，他以一种吃惊的口吻描写她的结局，从中泄露出一个事实，即她早已完全从他心中消逝，而他和她的交往，不过是他一生中转瞬即逝的，尽管是热情洋溢的，一个插曲而已。

* * * * *

当他同德·阿伯朗台公爵夫人的私通尚在初期阶段，另一位女人珠儿玛·卡罗又进入巴尔扎克的生命。他俩之间形成了最好、最高贵、最纯洁、最有价值、而且——尽管在空间与时间两方面都有过几次分离——最持久的友谊。跟他所钟爱的妹妹罗尔

年纪相埒，珠儿玛·杜昂然一八一六年同一位姓卡罗的炮兵上尉结婚了。卡罗是一个 *austère probité*（端庄严正）之士，一位勇敢的军官，他的纯正的功绩却未获得应有的承认。在拿破仑战争中，当同伴们在战场上杀出了璀璨的前程，或者在内阁里升到了眩目的高位时，他竟有此不幸而作为战俘在英国的舰狱上消磨岁月。到最后他被交换回国，已经太迟了。没有什么适当的位置可以安排这位没有势力的军官，他当俘虏时未曾有机会拉上关系，也没有赢得军事勋章。一度他被安排在小小的外省卫戍部队里，后来又被派去管理国家火药工厂，于是他和他的妻子就在遥远的外省小镇的狭小范围里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珠儿玛·卡罗，她并不算特别美丽，而且还为轻微的跛疾所苦，对于丈夫的忠实禀性怀有巨大的敬意，又为他恶星所照的命运深感怜悯，命运是那样过早地打断了他的雄心，销毁了他的生命，可是，却并不能说，她很爱他。她为他和儿子料理家务，并且由于她赋有头脑，而且颇知谋略，近乎一位天才，所以就在她力所能及的有限的社交范围内，她也荟萃了一个诚挚的、虽说是比较寒微的朋友圈子围绕在她身边。这里面包括一位派瑞阿拉上尉，后来巴尔扎克对他特别亲近。就是这位派瑞阿拉上尉，他供给（巴尔扎克）许多的细节来写关于军队生活的小

说。

珠儿玛在巴尔扎克妹妹家里同他见面这件事，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桩好运气。对珠儿玛来说，她的观点极富人性，她的智慧胜过朋友圈中任何一人，或者甚至远胜过巴尔扎克的许多知名的同伴作家和批评家，如今在她的小天地中忽然遇到这样一个人，他的文学天才和他的灿烂辉煌而四处洋溢的人性立即被她看中了，这在珠儿玛乃是一次强烈的震撼心灵的体验；而在巴尔扎克呢，乃是一桩好运，当他疲于工作与迫于债主们的时候，他有珠儿玛的家可去，到了那儿，他能不受到过火的赞美而找到慰藉，还能加倍显示才华。那里给他预备好了一间屋子，可以不受打扰地安心写作，到了晚上，就能找到心田温煦的朋友在等待着他，跟他们谈话可以毫无拘束，享受着十分亲昵的气氛。他可以只穿衬衫休生养息，可以说，无须担心成为人家的累赘。他知道在劳作的辛苦之后，总有一个随他使用的避难所，所以他总是提前几个月就在梦想到那些屯军的城镇的旅行，也许是圣·锡尔，也许是安古莲，或者佛拉柏斯罗，只要赶上是卡罗夫妇驻扎的地方。

没有多久，巴尔扎克便已察知这位隐蔽着的妇人的心灵特点，以及她的献身与诚恳的天性，于是一种深沉的、柏拉图式的友谊在他们中间滋长起来。没

有疑问，珠儿玛·卡罗不会漠然于巴尔扎克这种人品发出的肉体吸引力，但是她克制自己。她知道，再没有另外的女人能为巴尔扎克的无休止的性格做出这么多的事，因为只有她才会那样完全不顾自己，又同时不露痕迹地减轻他的困难，铺平他的道路。有一次她给他写道：“我是命运注定了为你而生的女人。”他回信道：“我需要象你这样的女人，一个毫不自私的女人。”他向她坦白：“傍晚同你一起消磨的一刻钟，对我的意义比在那些美女们怀抱中的竟夕欢娱更大。……”

可是，珠儿玛非常明智，不会看不出她缺乏性感，不能满足一个她看得比旁人都重的男人。不管怎样，象她这种天性，也决不可能欺骗或放弃一个丈夫，这个丈夫是把快乐如此彻底地寄托在她身上的。于是她给予巴尔扎克友谊，如他所说的，是“une bonne et sainte amitié”（一种和善而圣洁的友谊）。远离一切自私的虚荣和奢望，也不为色欲的潜流所纷扰：“我不愿即使是一芥之私进入我们的关系。”

因为她不会既给他指导又给他爱情，象德·柏尔尼夫人做过的那样，她就喜欢把这两个方面分开，以使自己成为他困难中的更完美一些的内助，“un oeil de plus pour vous’（你的第三只眼睛），她还喊道：

“天啊！命运之神为什么不把我的生命投在你所住的城市？那我就能以爱情的方式把你想慕的一切给你。我就会把我的住处迁到你所住的房屋。……那该是两倍数量的幸福了！”

可是，把一个人的生命分为肉体的和精神的两个方面，这个机会并未降临在他们身上，于是她就另找出路：“我将认你做儿子。”她打算把想念他、照料他、忠告他作为终身事业。正象所有的女人一样，她疼爱这个不知如何处理自己生活的、具有孩子般天真的天才人物，她感到，她有必要给他以母爱。

而巴尔扎克，事实上，不论作为男人或作为艺术家，也都不会有比这位不知名的女人更真诚、更能干的顾问了。埋没在外省，束缚于平庸的婚姻，乃是这位妇女的命运。在一八三三年，当时巴尔扎克的作品已成为轰动一时的时髦品，但还没有找到真正的知音，她写信给他，用的是她那决不畏缩的恳挚语调，这种语调把她所说的一切都赋予特性：

“你是这个时代的首席作家，而在我看来，你还是所有时代中最重要的作家。你能比的只有你自己，在你以外，一切都显得那么肤浅。”

一点不假，她立刻又接着说：

“然而我很怀疑，有没有必要把我的声音加入，来增强那成千累万人的合唱，他们都在对你大唱其赞美诗。”

无讹的本能指引着她，她为巴尔扎克的成功中的风行一时、轰动视听的因素担心。正因为她深知他的伟大心地，因为她爱那“心地善良”，而“隐藏在薄纱窗帘、羊毛披肩、青铜雕像后面”的巴尔扎克，所以她担心他天才上和个性上的危险，这种危险是会由他沙龙中的社交成功和出版商那里的物质成功产生出来的。她很心焦，他的最高潜在能力应该充分表现出来：“我已被要看到你尽善尽美的愿望迷住了。”这种尽善尽美并不就是

“时髦的，或沙龙式的成功（这种成功我很惋惜，因为它把你的前途毁了）。尽善尽美——你真正的名望务必憩息于此。我所想慕的你那未来的名望，对于我也同样重要，就象我也顶了你的姓氏，或者我是站得离你这样近，以致它的光芒也会射到我身上一样。”

她把作为他的艺术良心这个责任加诸己身，因为，虽然她认识到他的伟大与美好，可是她对他的危险倾向并不盲目，他会在幼稚的虚荣驱使下屈服于社会的谄媚。她冒着失掉友谊的危险，这友谊是她生命里最珍贵的东西，以极度的恳切向他陈述，优惧毫不亚于嘉许，虽然她颇意识到，她同公主们与社会贵妇们抛向这位时髦作家的谀词大相违异。

现在，哪里也找不到比她那些判断、批评更有见识的了，甚至于一世纪以后，这位炮兵上尉的妻子发出的每句赞美或每句非难，都比圣伯夫^①和其他专业批评家的全部批评更为苛刻。她赞许《路易·蓝柏尔》、《夏倍上校》、《恺撒·毕骆都》和《欧也妮·葛朗台》（“Eugenie Grandet”），而对过分渲染了的沙龙故事则十分嫌恶，如《三十岁的女人》。她很公道地称《乡下医生》（“Le médecin de campagne”）“过于黏滞，观念太多”，她也对《西拉飞达》（“Seraphita”）的夸张的假神秘性深感憎厌。她以惊人的清醒神志察觉可能威胁他持久成功的每一危险。当他打算进入政治时，她焦急地警告：“《笑林》要比部长皮包重要得多。”当他转向保皇党时，她劝诫道：“保护这种利益的事还是留给在朝的人们

^① 圣伯夫（Sainte-Beuve，1804—1869），法国文学批评家及作家。

吧，不要同他们共命运，否则你只会玷污你勤勤恳恳获得的名声。”她蔑视一切地宣称，她将永远忠实于她对穷人的爱，“他们如此屈辱地被富人的贪婪所毁谤、剥削，因为我自己也属于人民。诚然，在社会上我们被包括在贵族中间，但我们从来就保存着对于人民的同情，他们在压迫下深受苦难。”

当她看到他在狂暴的仓促中写作而给作品带来破坏性的影响时，她警告道：

“你真认为那是文学吗，当你一边写作一边好象有把刀子对准你的嗓子？如果连把作品写到纸上的时间几乎都舍不得付出，你怎么会创作出真正完美的作品呢？为什么这样忙呢，只为了给自己提供只适于暴发户的面包匠而不适于一位天才的奢侈品？能够描写一位路易·蓝柏尔的人，实在不必以为非要获得英国御马不可。……奥瑙利，我很忧虑，看到你对自己的伟大并不忠实。噉！就我这方面呢，你当然可以去买马，买车，还有波斯壁毯——可是你决不要让那些狡猾的人有机会来说：‘你随便什么时候都能用钱买动他！’”

她珍爱他的天才，担心他的弱点。当他疯狂地写

作时，当他放任自己被一些沙龙强加利用时，还有当他，为了打动她一向轻视的“上流社会”而用不必要的、驱他陷入债务的奢侈来包围自己时，她总是忧心忡忡地注视着。她以一种非常正确的先见之明恳求他说：“不要把自己过早的耗尽！”有着强烈的法兰西的自由感，她亟愿看到本世纪中最伟大的作家能在一切方面无所倚傍，超乎毁誉、舆论、金钱之需；而在她看到他连续坠入新的奴役中时，她被掷入了失望的深渊：“一个船奴——你一辈子都是船奴。你把十个人的生命集中一身，然后在贪婪中耗尽自己。你终身的命运将是坦塔罗斯^①的命运。”这真是大有预见的评论！

在公主们、公爵夫人们把他团团包围在谄媚的香火中的那个时期，他不但接受了这些强硬的、甚至往往是粗暴的谴责，还再三感谢她的诚恳，这一层很能说明巴尔扎克的品德，他远比那少许虚荣便使人误信的情况要精明多了。“你就是我的公众，”他写信给她，“我以认识你为荣，你给了我增进自己的勇气。”他感谢她曾经助他“拔去田中的莠草。我每次见到你后，都从你那儿带走使我终身受益的收获”。

^① 坦塔罗斯 (Tantalus)，希腊神话中的多财之王，为宙斯之子。被罚投于湖水，渴思饮水则水退，饥欲摘果则树升高，备受痛苦。今以喻巴尔扎克。

他知道，她的警告决不包含卑劣动机，不含嫉妒，也没有智力上的骄矜，却是来自对他的艺术的不朽心灵最恳挚的关怀，而他也在自己的生命中派给她一个特殊地位：“我对你的感情不能与任何别人相比；没有什么比得上，连相似也做不到。”即使在后来，当他将灵魂倾注于另外一个女人德·韩斯迦夫人身上时——他把她从乌克兰携来，当做他私人的忏悔席——这事也不曾动摇过“我心中的这个特许优先权，那是永世不会改变的”。

只是他对旧友逐渐沉默起来，可能是由于某种不安与一些秘密的羞愧吧。当他向德·韩斯迦和其他女人们倾诉衷情时，他把自己的债务、他的劳作都戏剧化了，但他知道，他决不能对珠儿玛·卡罗说一句假话而能不被她发觉，因而下意识地，在他向她自白时，便愈来愈感禁忌了。若干年过去了，他没有再到她家那间她为他设置的安静书斋去，当她唯一的那次来到巴黎时——天晓得付出多大代价——他却那样专心不二地写作，以致并未拆开她的信，而使她等待着一个永不到来的答复。然而，在他死前不久，就是他终于过了十六年之后，已成为濒临末日之人，在把德·韩斯迦夫人娶过来的那一年，他曾停顿了一刹那来检讨过去的生活，并向自己承认，珠儿玛乃是他所有认识的女人中最重要、最诚挚与最美好的

一个。他拿起笔来给她写道：“我从未停止过怀念你，爱你，甚至在此也未停止过同你谈话。”

* * * * *

巴尔扎克，这位永恒的虚构家、浮夸家，当他把他跟珠儿玛的关系置于所有他人之上，并且截然不同地视做友谊中最纯洁的一个的时候，他却一点没有浮夸。所有其他的关系——除了与德·韩斯迦夫人的订交，这事控制了他的晚年——多多少少都有插曲味道。在他认识的所有驰名女人中，当他特别钟情于高贵的玛色琳·戴丝波尔得—瓦勒摩儿时，他表现出确切无疑的心理睿智，向这位妇女献上他自己的伟大作品之一，他还到王宫里她的顶楼上去拜访，并不害怕那使他喘息不休的百级楼梯——从他的体重看，这要算是不小的成就了。跟乔治·桑，她被称为他的“frère George”（乔治兄弟），他们的交往纯属诚笃的同志情谊，那是一点色欲的亲昵也没有的——在那年月，这是罕见的例外。他的自尊心保护了他，使他免于以第十四或第十五名列入她的情夫的名单，那名单上是包括阿尔佛莱德·德·缪塞、桑多^①、肖邦和圣伯夫在内的。他也免于沾溉到半个巴黎文坛在她床第间的光荣。在私下，还有几个隐隐

^① 桑多（Sandeau，1811—1883），法国作家。

约约的为时短暂的人物，比如一位不知为何许人的“玛利”，他跟她有过一度私通，她大概还给他生了一个孩子；还有某一位“路易丝”，她的姓氏也同样不为人知。凡是论到同女人的亲密关系所在，巴尔扎克就在无拘无束坦然饶舌的外表背后保持了高明的慎言。

至于同男人的友谊那就更稀少了。他与之亲密交往的几乎全部都是不知名的、不重要的人物。如果说他需要女人是为了跟她们一同休憩，那么他也需要男性朋友好有所倚靠。也象歌德、贝多芬以及多数决定献身于博大作品的具有创造性头脑的人一样，巴尔扎克并不选择一些有卓异智慧的朋友，而这种人是能够在艺术上刺激创作和督促竞争的。他却满足于那些人，他劳作的间歇中能去寻找，他们也随时可以帮他的忙。他所寻求的乃是某种家庭关系。关于德·马尔岗先生我们知道得很少，在他的萨水（Saché）别墅中，一间能够用来写作的舒服的屋子在巴尔扎克多次想要离开巴黎的时候就供他随意使用。他的真正朋友决非象雨果、拉马丁、海涅或肖邦这类品格的人，虽然这些人他都有交往，而是一位铁器商、一位医生、一位无名画家、一位成衣匠。矮子达伯兰老爹自从莱斯底居耶尔街的年月就已经是他不可或缺的朋友。跟奥古斯督·波尔志，他曾一度在

卡西尼街一所房子里同住。拿克加尔大夫照应他的健康，一直到他死去的那天，而且还不时给他以帮助，不仅是对小说提出专家性质的忠告，还在他紧急之时用几百法郎来缝补他口袋上从来也不会补缀好的漏洞。布伊松，里涉留街的那个成衣匠，在巴黎的批评家发现巴尔扎克的天才以前，就已经知道尊敬他了，不但允许他拖欠付款爱多久就多久，而且还借钱给他用；而在他没有另外的躲避眼光厉害的债主们的隐身之所时，布伊松还在自己家里给他准备下一个避难处。把钱借给巴尔扎克那样有心感恩的人，倒不是笔坏生意，可敬的成衣匠到底从《人间喜剧》中的两行文字中为欠他的债得到充分的偿还，不论这笔欠债有多大数目：“布伊松所制做的一身衣服，足能使你在随便哪个沙龙里扮演王家角色。”这个小小的宣传立刻就使布伊松成为所有那些要在社会上崭露头角的人的成衣匠了。除了普通被认为是法定货币的东西之外，大人物们是另有付账的办法的，他们能把不朽赐予债主。

当巴尔扎克开始写作那些使他赢得名誉的作品时，这个朋友小圈子基本已经完成，在三十岁上，他的接受时期已告结束。他已不再需要刺激、讨论、博览、新鲜知识和新朋友。他已准备好了，而他所有的，

可以用天才和智慧、热情与奋勉呈献出来的，则要属于将来了。他曾说过，“大树吸干周围的土壤”——“Un grand arbre ressèche le terrain autour de lui”。为了它开花结果，它要把够得着的一切力量吸取过来。虽然拥有几百位相识，巴尔扎克并未将其他任何一个人置入这亲密的圈子以内——只有德·韩斯迦夫人是例外，她后来成了他生命的中心人物与真正焦点。

第 八 章

黑 咖 啡

突然的成功对艺术家来说总是危险的。在一八二八年，巴尔扎克是一个被人雇佣的文丐，破了产，债台高筑到眼皮底下，一位承认蹲在家里乃是为了节省衣服的穷鬼。两三年后，他已是欧洲最有名望的作家之一，报章杂志争索他笔下的文稿，他受出版家谄媚，他被倾心的读者们的来信给埋起来。一夜之间，他青年时代的野心之一竟尔实现，la gloire（光荣），辉煌的名声，用灿烂的翅膀带着他的名姓周游世界。即使比巴尔扎克头脑清醒的人尚不禁为这种成功所陶醉，而巴尔扎克却远远不是头脑清醒的人。他已在晦暗、穷困、饥饿中生活了过多岁月，充满了难以忍耐的失望，在妒羡的瞬间他观察到的总是别

人，从来不是他自己；总是别人在获得财富、女人、成功、奢侈品与大批横财。以他那种耽于感官快乐的天性，他肯定是急于利用他所造成的动荡，品尝一下人世间所能提供的快乐，是可想而知的。他要尽情吸入已临于其身的名誉，在舌头上品尝，在手指上触摸，用所有的感官来体会，他要感受喝彩的群众的安逸的温暖，感受到谄媚的芬芳气息。既然全世界都知道他的才能，他就更要把自己呈现于全世界。他早已疲于屈辱与挫折，疲于长年的奴役与钱财的窘困，他准备屈服于名誉带来的甘媚引诱，屈服于奢侈与豪华的欢欣愉快。他知道了，现在世界成了他的舞台，他决定要出现于观众之前，在社会上扮演角色。

与巴尔扎克作为作家的天才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他在作为社会名流这样角色上才能的缺乏。人类的脑子有个特征，即使最高度的智力才能与极广泛的经验累积，也不能克服一个人先天的无能的所在。他不论对自身气质上的缺点洞察得多么清楚，也没有力量除去它们。诊断并不跟治疗是一件事，我们一再看到，绝顶聪明的人在统驭那些成为旁人开心笑柄的小小愚蠢时是怎样地无能为力。尽管清楚意识到自己的势利眼是十分幼稚的，他却不能克制这一最坏的弱点。写出此一世纪最伟大的创作的、能以一

位贝多芬的漠不关心态度在国王与亲王面前走路的人，却患了一心想做贵族的荒唐毛病。一封来自圣日耳曼镇公爵夫人的信要比来自歌德的赞美更有意义。他毋宁做一位罗斯柴尔德^①，可以住进宫殿，有着仆夫、马车和罗列着杰出艺术品的长廊，而不必获得不朽的荣誉；为了一份由路易·菲力普国王签名的真正贵族特许证，他是会出卖灵魂的。既然父亲有本事从农民阶级步入富庶的资产阶级，为什么他自己不应该再进一步跻入贵族阶级呢？耀眼的璀璨前程的时代只不过刚刚过去，然而难道就有理由认为它已经彻底结束了？如果一位穆拉，一位雨诺和一位纳伊，这些手艺人、马车夫的儿子、小旅店主人的孙子们，由于能够指挥骑士们进击和拼刺刀而当上公爵；如果银行家、股票行的暴发户和工业巨头们都已晋封贵族了，为什么他，就不应该同样有本领升入社会的“高等”阶层呢？

那种同样的精力，六十年前曾推动巴尔扎克的父亲用拉·奴该瑞的草屋去换得巴黎的更广阔的机会，现在大概也在无意识地激励着儿子更向上升。然而，如果把高目标只等同于进入前此拒他擅入的圈

^① 罗斯柴尔德 (Rothchild)，详见本书第 80 页注^②。

子，而不是以自己的创造性成就作为高目标的话，那将是荒唐的。那真是一种不能合理地分析的心理状态。我们面对着难以理解的矛盾。为了爬进“高级”社会层，他终身忍受屈辱。为了生活奢华，他命令自己强制劳作。为了显得风雅，他使自己表现荒唐。不知不觉地他本人就成了他在小说中描述过一百次的定律的活证明——在某一领域里的大师，当他冒险进入另一个对他不相宜的领域后，他可以变成笨货。

巴尔扎克装扮自己，去承担他将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首先，他不能仅以巴尔扎克先生的称号出现。这在圣日耳曼镇听起来太资产阶级味儿了。于是他自己做主，在他名字上加上贵族的称谓，由《驴皮记》开始，他的作品都用奥璠利·德·巴尔扎克这个名字出版。谁敢否认他有权使用这个头衔，谁就该死。有怀疑者将被告知，完全是出于谦虚，他才只称自己“德·巴尔扎克”，因为他乃是德·昂特拉格侯爵的后裔。为了使这个说法更加可信，他把德·昂特拉格家族的纹章刻在他餐具上，绘在马车上。第二步则是彻底改变生活方式。他论证：要人们相信奥璠利·德·巴尔扎克是伟大作家，他的生活非跟他的名声相称不可。你越有，人家才越肯给。在一个唯有外表才算数的人世间，如果你想得到很多，你一定得表

示出有很多。如果德·夏多布里昂先生^①拥有一所别墅，吉拉尔丹^②养着两匹乘马，儒尔·雅南或者欧仁·苏^③享有马车，那么奥瑙利·德·巴尔扎克就有更多理由应该驾出双轮马车，后面站着一个身穿号衣的跟班，以使人们不致把他视做二流作家。他租了卡西尼街那所房子的二楼，买了众多家具，而且没有哪一个纨绔子弟能说他的衣着比奥瑙利·德·巴尔扎克的那些更加阔绰，更加贵重。他还特地为他那蓝色礼服定做了镂花的金扣子，同时可敬的布伊松赊账提供丝绸、锦锻的背心。这样，把厚密的发鬃涂上厚厚的油，手把一只小单照而搔首弄姿。这位羽毛新成的作家就迈入巴黎的沙龙，pour se faire une réputation（目的在于建立名声）——好象他的名声在他那一代人和未来的世世代代都还未曾确立似的。

巴尔扎克本人给予巴黎社交界的印象，其结果令人失望，而且这事对他的作家名望反响不佳。他打算把自己变成花花公子的企图彻底失败。在他生涯

① 德·夏多布里昂（De Chateaubriand, 1768—1848），法国作家及政治家。

② 吉拉尔丹（Girardin, 1806—1881），法国政治家，政论作家。

③ 欧仁·苏（Eugene Sue, 1804—1857），法国小说家。

的这一阶段中他得以出入的沙龙虽并不是圣·日耳曼镇的那些，但他并未被请到大的大使馆去。他所进入的社会只限于盖·戴尔梵夫人母女的和瑞卡米耶夫人的文艺客厅，这些夫人打算培养文学界的贵族来跟高高在上的官场贵族竞争。可是，即使在这些并不高级的圈子里，巴尔扎克这种矫饰的故作风雅，其效果乃是灾难性的。单是他身体的外形，就足以毁灭他一心向往的扮成贵族的希望。不论布伊松的裁剪手艺，不论是金扣子还是金丝领带，都不能遮掩这个矮胖粗肥、红脸蛋儿的平民，他说话的嗓门儿如此之大，不容别人插上一句，他闯进屋子就象一发炮弹。他的气质过分充裕，决不能用礼仪上的谨慎姿态来约束，这种克制使他很不自然。二十年后，德·韩斯迦夫人颇有理由提出抱怨，他吃东西时竟把刀子塞进嘴里，还有他那聒噪的矜夸，使诚恳地急于赞美他的人们神经紧张。她感叹他那带回响的阵阵轰笑，和“滔滔不绝的风雨洪流”，任何人的言谈都要被淹没其中的。

只有那有闲的人，一心只注意外表的，才有时间，有耐性，永远打扮得文质彬彬——这事本身确也是一种艺术——但是巴尔扎克，他只能从工作中把自己拖出来一个钟头，马上就暴露出他出门打扮总

是匆忙的。他的上衣跟裤子的色彩设计甚不协调，使德拉古瓦大失所望，再说，如果举着它的手指的指甲非常垢秽，那金单照又有什么用呢？他的鞋带散着，在丝袜子上拖着，在他太热的时候，油垢便从涂油的头发滴到领子花边上。巴尔扎克之修饰丰采，一如小厮之穿戴号衣。他的嗜趣愈来愈趋向奢华而不趋向于审慎；他使贵重的物品都显得低贱，并给奢侈以炫耀的外观；两者结合的效果——无数以他为题材的讽刺画都能证实——往往迫使那些女性崇拜者也在扇子后面隐匿起一个微笑。

巴尔扎克愈是感到他的附庸风雅企图的不成功，便愈做得过分。如果他真不能崭露头角，那至少也能轰动一时。如果他不能以不刺目的卓越产生出令人愉快、引人注意的效果，那么至少他的放荡不羁应该变得跟他用以获得令誉的作品同样驰名。如果他将成为让人嘲弄的笑柄，他至少会给他们可以嘲笑的充分理由。头一次失败之后，他发明出来一个怪诞的策略，他戏谑地说，那将比小说更使他知名。他弄来一根手杖，粗得象条大棒，镶着绿松石，在手杖上他散布了荒诞的谣言，比如说，他在杖柄上镶着一位神秘的情妇穿着夏娃装束的小照，这位妇人是属于贵族最高圈子里的。当他进入意大利剧院的“老

虎”包厢时，海格克斯巨棒在手（这东西破费了他一直没有偿付的七百法郎），观众象被催眠了似地凝视着它，而且德·吉拉尔丹夫人受了这件可惊异的家伙的启示，还写了一本小说叫《德·巴尔扎克先生的手杖》。不过贵妇们的幻想破灭却一直没有治好，因而没有一个女人选取这位曾经歌唱她们的赞美诗的抒情人为她的被保护人。巴黎沙龙的名流们，就是深深赞许的那些拉斯迪额和马尔赛的原型，也觉得他们无须害怕这位社会荣誉的新候补人那些笨重巨象式的竞争。

巴尔扎克在文坛上同他的同行们相处，也没有获得多大的成功，这些人以某种不安的心情看着这条突然出现在他们鲤鱼池塘里的肥胖梭子鱼。他们之中许多人仍把他突然成名以前的暧昧过去记得清清楚楚，但是，为他的才能所惊，为他的多产所扰，他们本已有所准备，想把他接纳为自己人之一员。巴尔扎克拒不理睬他们的接近。尽管他天性善良，且对别人成就慷慨赞许，他却故意采取傲慢态度，特别是对文坛的同行们。他并不接受他们愿以友谊相待的欣然态度，却反而粗暴无礼地对待他们。他进屋时仍然戴着帽子，他拒绝在文坛上摆在与他们相同的地位。他不肯以外交方式容忍同行作家们的小小虚

荣，却大声疾呼坚决反对把他跟什么阿历山大·仲马^①、保罗·德·柯克^②、欧仁·苏、桑多或雅南放到一堆。他吹嘘所能博得的巨酬，把那些人都得罪了；此外还把新闻记者们也触怒了。极少有这样的作家曾经如此漠视有利评论的作用以及记者们所能左右的宣传。而他却让他们感到他并不需要他们的恩惠，并且，正象他想用他那颇为粗俗的浮夸装束使自己成为“离群之人”来引起社会印象一样，现在他以天真与卤莽的诚意不断强调，说他是不能用跟旁人同样的标准来衡量的。即或他是带着由衷的嬉笑，怀着游戏三昧的兴致，以可能想象得出的漫不经心的态度这样做的，可是巴黎人把他的态度看成了挑衅。

巴尔扎克的弱点太明显了，不会不把一百个攻击点授给那些具有敏捷心智和恶毒心肠的、早想利用它们的人。同时报上全以他为题材，用嘲讽的幽默大肆喧嚣。这位当时最伟大的作家，竟成了讥讪评论和无礼的讽刺画所喜爱的靶子了。“社会”对于这位既轻视社会而又不能没有它的人进行了旁人所没有

① 阿历山大·仲马 (Alexandre Dumas, 1802—1870)，即大仲马，法国小说家、剧作家。

② 保罗·德·柯克 (Paul de Kock, 1794—1871)，法国小说家、戏剧家。

经受过的严酷报复。巴尔扎克本身并未感到，失败有多大影响。他元气过于旺盛，精力过于充沛，充满了自我优越感，根本不注意这些微不足道的小小讥制，对于油头粉面的讨厌人物或势利眼的女学究们的冷嘲热骂，他报以拉伯雷式的哈哈微笑。即使在盛怒之下他也仍然宽宏大量而创造性斐然可观。他对那些力竭声嘶的新闻记者和文学界小人物们的怨嫌，并不用卑微小器的争论来还击，而用的是《幻灭》中那幅描绘文坛恶德的宏伟壁画。

在另一方面，他真正的朋友们却感到十分痛心，看到巴尔扎克这样的天才，竟由于他的小小势利心的弱点而被置于屈辱的境地，这暂时地证明了以他为目的的侮弄是有理的。珠儿玛·卡罗在遥远的外省小城比他自己就了解得早的多，知道他所希望在巴黎社交场合中采摘的天堂果实很快就会在他嘴里变成灰烬。于是她恳求他，不要“到一个有求于你的会比偿还给你的多一百倍的世界里”去做演员。她以友谊的劝诫口吻写信给他：

“奥瑙利，你现在已是驰名的作家了，然而你是命里注定还要有更高的成就的。区区微名对一个象你这样的人实在无所谓。你应该树立

更高的目标！假如我有勇气，我本会向你说：‘为什么你，纯出于虚荣，要用如此愚蠢的方式去糟踏你那极不寻常的智慧呢？放弃这种附庸风雅的生活吧！……’”

可是，巴尔扎克却得先尝到痛苦经验的教训，然后早期成名的陶醉才会让步去承认他自己的定律的清醒道理，即：一个人不能同时在两个领域里都是大师，而命运并不希望他在一个很快就会忘掉他的男女们的短暂世界里高视阔步，而是希望他用笔锋的创造力使这个世界在高度与深度上都长垂不朽。

我们可以看一看无数关于彼时的巴尔扎克的描述。有些只是寻开心，另一些则是诙谐的；有些是藐视的，另一些则是恶意的甚至是狠毒的；但它们都以巴黎社会与新闻界的引人误入歧途的观点来观察他。他们给我们看到的是：巴尔扎克穿着镂花金扣子蓝外衣，拿着他粗笨的嵌宝石的大棒；巴尔扎克穿着拖鞋；巴尔扎克坐在双轮马车里带着马夫和跟班；巴尔扎克徘徊在马路上，流览店铺招牌，给书中人物寻找姓名；巴尔扎克，古玩家，怀着用七法郎拣到一张伦勃朗的画或者花十二苏买一只切里尼碗的希望在涉猎古玩店；巴尔扎克，出版商的阎王爷，排字工的

心上病；巴尔扎克，吹牛匠与骗人精，逢人说教，认为纯洁乃创作之前提；巴尔扎克，多情郎，换个女人比换件衬衫还来得勤，巴尔扎克，饕餮家，一顿吞下三十六个牡蛎，还要再吃肉排再吃鸡；巴尔扎克，梦想家，天天谈论从矿里、暖房里、生意里赚出几百万，却又经常因付不出一千法郎的期票，每次都要用假名字隐匿几个星期。

有个情况决非偶然：传留下来的巴尔扎克的写生，四分之三不是肖像而是漫画；还有，他同时代人记载了他的无数轶闻掌故，却连一部精确而重要的传记也不曾传下。从这些情况看来很清楚，巴尔扎克的人格在巴黎人身上的反应乃是使他们不把他看作天才，而看成一个怪物，而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大抵判断得是很正确的。他当然会在群众中表现古怪，就“古怪”这个字的真意而言，因为他一离开屋子、书桌和工作，他就立刻越出轨道了。那个真正的巴尔扎克，对于戈兹兰们、魏尔特们、雅南们，对于马路上游手好闲的人和漫游者，是隐而不见的，因为他们认识他只限于他能给予世界的“每天一小时”，而不是他那创作性的孤独中的二十三个小时。当他走到同伴之中时，那就象囚犯在狱中天井里散步吸点新鲜空气时的放风一样。正如听到午夜最后一声钟响

必须回到它所从来的黑暗区域的那个鬼魂一样，巴尔扎克在他那不受拘束的精力充沛的短暂间歇之后，必得回到工作上去，而没有一个热中于以巴尔扎克为材料而进行冷嘲热讽的人知道他伟大工作的一星半点，知道他所赖以完成工作的严苛要求。本质的巴尔扎克乃是这样一个人，他，在二十年间，除了大量的剧本、短篇小说和杂文之外，写了七十四部小说，们自己的一个天地，和一切殖居其间不同风景、街市、房屋、人物。

这是能够用以衡量巴尔扎克的唯一标准。只有在作品里真实的巴尔扎克才能被认清。这位被他同时代人认作愚蠢的怪人，具有这个时代最严格的艺术智慧。他们揶揄他的奢侈放佚，他却是一位辛勤的苦修人，有着遁世者的坚忍不拔的耐心。那些选择了中庸之道，意识到自己正常而心安理得的人们，都因他的夸张倾向而嘲笑他，然而他从他那富于创造性的头脑中创造出的作品却比他同行们加在一起的还要多。真正算得上工作到死而后已的，恐怕他是唯一的人。他的日历跟同时代人的不同。他们的白天是他的夜晚，他们的夜晚是他的白天。他的真正生活是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自己造成的世界；而真实的巴尔扎克，只有他写作于其中的那间屋子的四壁才

能看到、听到。没有一位同时代人能写他的传记，他的传记都包含在他的作品本身之中。

* * * * *

让我们拿出巴尔扎克写作生活中的一天来，这是几千天中典型的一天。

黄昏八点钟。巴黎市民早已做完一天的工作，离开了办公室、商店、工厂。跟家人或者朋友，或者独自一人，吃完晚饭之后，他们涌上大街寻求欢乐。有人在林荫道上闲荡，或者坐咖啡馆，另一些人还对着镜子在打扮上做最后的修饰，然后到戏院和沙龙去。而巴尔扎克还独自睡在昏暗的屋里，在书桌上消磨了十六七个小时之后，已对人世一无所觉。

九点钟。戏院幕布已经升起，跳舞厅里挤满了回旋的舞侣，赌场里回荡着金币的叮咣声，偏僻街道上偷偷摸摸的情人们深深挤到阴影里——而巴尔扎克仍然大睡。

十点钟，这里那里屋里的灯光在熄灭，老人们想着上床了，听不到几辆马车从石子路上辚辚驶过了，城市的闹声渐渐低沉了——而巴尔扎克还在睡觉。

十一点钟。戏院里最后的幕已经落下，最后的客人已从舞会和沙龙里出来，正在回家。饭店已在打烊，最后的行人已从街头消失，喧嚣的醉汉们最后一

阵声浪消失于边远的街道而缓缓远逝，然后林荫道上空寂了——而巴尔扎克还继续睡觉。

子夜。巴黎阒然。百万双眼都合上了。灯光多数已经熄灭。现在别人休息了，那就该是巴尔扎克工作的时候了。现在别人在做梦了，那就该他醒来了。现在巴黎其余的人的白天既已完结了，他的白天就该开始了。没有人会来打扰他了，没有访客会来麻烦他了，没有信件会使他不得安宁了。没有债主子会来敲门了，也没有印刷商会派人来非要再交一份稿件或校样不可了。浩瀚无际的时间摆在面前，八至十个小时的完全孤独，可以用来从事浩瀚的工作。正象能把冷的脆矿沙熔成好钢的熔炉不得冷却一样，他知道他构思的紧张是不容松弛的：“我的思想务必出自眉宇，犹水之出自泉源。那过程完全是不知不觉的。”

他只承认自己的工作所定下的规律：“必得中断与外出，我就不能工作。我从来都不是一气只工作一两个小时的。”只有在夜里，时间才是无际而不分割的，这种持续才有可能，就是为了获得这种工作的持续性，他颠倒了正常的时间划分，把夜晚变成白天。

被仆人轻轻的剥啄声唤醒后，巴尔扎克起身，穿上袍子。这件袍子，他由多年的经验发现它于工作最为方便。在冬天，它是温暖的开司米羊毛的，夏天则

是薄夏布的，既长而白，行动自由，领部敞开，它供给适当的温暖而不令人闷气。而他所以如此选择的另一理由，很可能是因为它跟一件僧衣相似，这就下意识地提醒他，他是为更高的法律服务的。只要穿着它，他一定会屏弃尘世和尘世的引诱。一条编织的带子（后来由金链子来替代了）松松地系在这件僧衣上，并且在挂十字架和披着肩衣的地方挂了一柄裁纸刀和一把剪子。在屋里走上几遭，使睡眠最后的残余从脑子里摇晃出去，使血液在脉管里循环得更快一点，然后巴尔扎克算是准备好了。

仆人已将桌上的银烛台上点燃六支蜡烛，还把窗帘紧紧拉上，仿佛这是一个显著的信号：外间世界现在已经完全隔绝了，因为巴尔扎克从来不用日光星辰来度量工作的钟点。他不想看到天亮，也不想知道巴黎又苏醒到新的一天。周围有形的物体都已隐没到阴影里面——沿墙排着的书籍，墙壁本身，门呀，窗呀，以及门窗以外的东西。只有自己头脑里的活物在谈话、行动、生活。他正在创造自己的世界，一个能长久保持下去的世界。

巴尔扎克坐到桌子旁边，在这地方，他说过：“我把我的生命投入坩埚，就象炼丹的人投入他的金子。”这是一张不大的、无可夸耀的长方桌，但他爱

它胜过他所有财产中最贵重的东西。对于巴尔扎克，它意义极大，超过那根嵌宝石的手杖，超过一只一只买来的银盘子，超过那些装璜华丽的书籍，超过他已赢得的美誉，因为巴尔扎克总带着它从一个住处到另一个住处，破了产、遇了灾也定要营救它，就象一个战士从战乱中拖出他束手无策的伙伴。它是他的至乐和他的沉忧的唯一知心人，是他的真实生活的唯一缄默的见证人：“它见过我所有的窘困，知道我所有的计划，窃听过我所有的思想。我的笔疾驰纸上时，我的胳膊几乎是在粗暴地撞击着它。”没有一个有生命的人比它更了解巴尔扎克，也从没有一个女人比它分享到更多热情的友谊的夜晚。就在这张桌子旁边，巴尔扎克天天生活着，并且一直勤奋工作到死。

最后再环顾一遭，确知每件东西都已适居其位。象所有的工作迷恋者一样，巴尔扎克的工作方式也很拘执。他爱工具就象士兵爱他的武器，在投身战斗之先，定要知道它们都已在手边准备齐全。左边叠着整齐的白纸，纸张是精心挑选过的，尺寸形状与众不同，呈浅蓝色，为的不使眼睛眩晕和疲倦；纸面特别光滑，鹅毛笔能毫无阻力地从上面掠过。笔也是小心准备的，除了大鸦的翎管别的一律不用。在墨水池旁

边——不是赞美他的人送给他的那个孔雀石做的贵重礼物，而是从做学生时就伴着他的那个不值钱的——放着一两瓶储备着的墨水。他决不忽略任何应注意的所在，以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右手放着一个记事册，那上面，他不时记上一些观念和想法，也许后面哪一章书里可以用得上。别的装备就没有了。书籍、论文、研究资料等等，概不需要。开始动笔以前，巴尔扎克已把一切都融会在脑子里了。

他坐上椅子向后一靠，卷起大袍袖子以使右手活动自如。然后他自我鼓励，向自己说些半开玩笑的话，就象马车夫吆喝马儿拉车。或者应该用游泳家来比拟，他从跳板上在陡然入水以前，总要伸伸胳膊，活动一下关节。

巴尔扎克写了又写，从不停顿，也不犹疑。想象的火焰一旦燃着，就会长久熠熠。就象森林失火，火舌从一棵大树跳到另一棵大树，在进程之中愈烧愈炽，愈来愈猛。纵然笔触飞驰，文字总赶不上思路。他写得愈多就愈写简字，为了不必推慢思想。他决不能让内心的景象中断，他的笔再也不从纸上提起，一直要到痉挛强迫他松开手指，或者字迹已在眼前飘动，疲劳得已经头晕眼花的时候。

街上静悄悄的，屋里唯一的声音就是翮笔滑过

纸面的咝咝声或者一张稿纸加到写好的一叠上的沙沙声。外面快天亮了，巴尔扎克却看不见。他的白天就是烛光所投出的小小光圈。他全不知道什么空间时间，除了他自己造成的世界以外。

不过时而机器也有停车不转之虞。即使最不可限量的毅力也不能无限延长人体的自然限度。在不间断地写作五六小时之后，巴尔扎克也感到必须招呼暂停了。手指已经麻木，眼睛开始流泪，脊背酸痛，太阳穴悸动；神经也已不能再受紧张了。换个别人，可能就会满足于已经做成的工作，停下来等到夜里再说；然而巴尔扎克却不肯退却。骏马必得跑足规定的路程，即使它已在兴奋之中跌倒。如果这匹懒骨头不肯保持原来的快速步伐，那就得借重鞭子。巴尔扎克从椅子上站起，走近放着咖啡壶的桌子。

咖啡就是再开动机器使用的黑油；巴尔扎克看它比吃饭睡觉都重。他恨烟草，烟草不能刺激他达到工作所需的强度。“烟草有损身体，伤害脑筋，使得整个民族迟钝。”对于咖啡，他却大唱赞歌：

“咖啡滑下去到了胃里，它就把一切推入运转。思潮犹如大军中各路纵队勇往直前。回忆汹涌而来，大旗高擎，将队伍带进战场。轻骑兵奔

驰在前。思维的逻辑如炮兵拖着辎重和炮弹隆隆而来。昭晰的观念作为狙击手加入决斗。角色们各着衣冠，稿纸上铺满墨迹。战争在黑色液体的流注中开始，然后完结，就象真实的战场包围在火药的黑烟中。”

没有咖啡他就不能工作，至少不能按照这种方式来工作。纸笔之外，他所到之处都要带上“咖啡机器”，这件不可缺少的装备，其重要不减于他的桌子和白色袍子。他很少让劳人准备咖啡，因为旁人不会把这兴奋剂的毒药做得如此浓黑有劲。并且，正象一个人迷信某种拜物教一样，他只用某一种特别的纸张和某种形式的笔，由于同样原因，他也要按照一种专门配方去配制咖啡。一位朋友记载过：“他这咖啡包括三个品种——波蓬、马提尼克和摩沙。他买波蓬到蒙特布朗街，买马提尼克到老奥得莱特街，而买摩沙则要到圣日耳曼镇的大学街上一家商店，名字我忘记了，虽然我曾多次在采购的远征中陪伴着巴尔扎克。每次都要半天的旅程，横穿巴黎。不过对巴尔扎克来说，好咖啡是值得这么麻烦的。”

咖啡就是他的鸦片。因为同一切毒品一样，咖啡也得愈喝愈浓，如果要它保持效力，他就不得不愈来

愈增多地吞食这杀人的精灵，才能跟得上神经上日益增加的负担。谈到他的一本书时，他说那书得以完成全靠“咖啡河”的帮助。一八四五年，在将近二十年的耽溺之后，他承认整个机体都由于不停地求助于这种刺激品而中毒，还抱怨刺激品的效力愈来愈差了，并且说它还使他胃痛得厉害。如果说他那五万杯咖啡（这数字是某一位统计家估计他所饮下的杯数）加速了《人间喜剧》庞大体系的写作，它们也要对心脏过早的衰弱负责，那心脏本来强得象一口大钟。拿克加尔大夫，他的终身的朋友与医生，在他的真正死因问题上提出：“是多年心脏病发作，由于长夜工作和服用——毋宁说是滥用——咖啡而日益严重，他为了与人的正常睡眠需要来斗争，不得不求助于咖啡。”

终于钟鸣八下，门上于是有一声剥啄。仆人奥古斯督端着简单的早餐盘子走进来。巴尔扎克于是从桌旁站起，他是从子夜一直伏在桌上写到现在的。短暂的休息来到了。奥古斯督拉开窗帘，巴尔扎克就走到窗前，临眺他早已准备征服的城市。他这才记起还有另一个天地，另一个巴黎，既然这时他自己的劳作已经暂时结束，这个巴黎现在要开始工作了。店铺纷纷开门，孩子们忙着上学，街上马车辚辚，在办公室

和商号里，人们都在桌旁落坐。

为了歇歇精疲力竭的身体，以便重整旗鼓去做那些等着他的更多工作，巴尔扎克洗一个热水澡。他经常在澡盆里消磨一个小时，就象拿破仑所喜欢的，因为那里才是唯一不受干扰得以冥想的场所——只管冥想而不必立即写下思想的内容，只管纵情于创造性梦境的欢乐中而无同时的体力操劳的必要。可是衣裳还没有穿上，门外脚步声便可听见了。信差已从他的各处印刷所来到，就象拿破仑的骑使们在战争时送发他的命令，联系于司令部和执行命令的部队之间。第一个来人是索要写作中的小说的新章节的，就是昨夜写的墨迹未干的稿子。巴尔扎克所写的一切都得立即付印，不仅因为报馆或出版商正在等待偿付到期的债务——每部小说在写成以前就已卖出——而且还因为巴尔扎克在他那昏昏沉沉的工作状态中并不知道他在写什么，也不知道他已写成了什么。即使自己的敏锐眼神也看不清稿子上的浓密丛林。只有在它们被排印后、他能逐段校阅它们时，好象连队士兵在检阅中走过，巴尔扎克身上这位将军才能辨清是否已经打了胜仗，或者还得重新进攻。

从印刷所、报馆、出版商那儿来的另外的信差带来了书页校样，那是他两夜以前所写、前一天送去付

印的，还有更早交出的章节的二校三校清样。整叠整叠的新印大样，常常有五打六打，都是刚从校样机上拿下来的湿纸，铺满了小桌，等待他的关注。

九点钟，他的短暂休憩告一结束。他的休息方式，他曾说过，就是任务的变更。但是就巴尔扎克而言，校改大样并非轻而易举。它包括的不仅是消除错排的字与风格或内容上的轻微修改，而且是原稿的完全重写。其实他总把第一次校样当做初稿，而他最热衷的事无过于在一连串的清样上去逐步形成他那可塑性的文字。那清样，他一次一次审查、修改，艺术责任心至为强烈。工作上的每一件事，他都是既苛刻又固执的，他还坚持非按照他所制定的规则去排印大样不可。纸张要特别地长、特别地宽，因此印出来的本文看上去就象扑克牌里的一张“A”。上边下边，左边右边，都有着宽大的空白，以便修改和重写。还有，他不接受印在普通贱价黄纸上的清样，而一定要求白色质地，上面每个字母都显得清清楚楚。

巴尔扎克又在小桌面前坐下。首先是迅疾的一瞥——他也具有他那路易·蓝柏尔一目六七行的禀赋——跟着就是狠狠的一戳。他很不满意。头一天所写的一切，还有再前一天写的，都要不得。意思晦涩，文句紊乱，风格多瑕，结尾粗笨。全部都要改动，要

清楚一些，简单一些，少臃肿一些。他用来进攻那一方块印就的文字的狂暴劲头，就象一个骑兵冲向敌人的坚固方阵，能够从墨水四溅的凶猛笔触中看出，它们横扫全部纸面。以翮笔作佩刀的一挥，某个句子便从上下文里扯了出去，抛向右方；某个单字被刺中了，猛掷左方；某几个整段文字全被揪了出来，插进去另外几段。通常作为排字工人的指导符号已不够用，巴尔扎克不得不用自己发明的符号。不一会儿，纸边便没有地方来写更多的修改，现在修改已比印成的文字都多了。四边的修改文字上也加了许多记号，以便引起排字工人对这些后加的东西的注意，一直到那块原来只是中间有一堆文字绿洲的白色沙漠，已被蛛网般的交叉线条盖满，于是他又翻转纸张到背面去继续修改。即使这样还是不够。当纸上没有地方来放那些使得不快活的排字工人找不到出路的符号和横七竖八的交叉线时，巴尔扎克就要借助于剪子了。不要了的章节被整块剪掉，空隙处补上新纸。一个片断的开头也会被插入中间，再写出一个新的开头，也许本文整篇都被掘起全部翻新，然后这混成一团的印刷文字，连同插进去的校正和改动，以及符号、线条、墨点等等，就送给了印刷所，比起原稿更加无比难读、无比难解。

在报馆和印刷所，嬉笑的人群都围拢来细察这种惊人的字迹。最有经验的排字工人都宣称无能索解，虽然得到双倍工资，还是不肯每天排印多于一个小时的巴尔扎克（的作品）。要学会阐释他那天书的学问，必须得好几个月的工夫。即使如此，专家校对人还常要校正排字工人的往往是极度悬揣的臆测。

可是，他们的工作还不过是在初级阶段。当巴尔扎克收到第二套大样时，他又是怒气大发，猛扑向前，跟上次一样。他会再度拆掉辛苦筑成的大厦，在每一页上从顶到底又布满进一步的修改和涂抹，一直到它杂乱难读不减于它的前身。这件事情要重复六七次光景，只不过在后来的清样上他不大再毁掉整段文字，而只修改句子，到了最后就只限于调换单字而已。在他的某几本作品上，巴尔扎克重改清样多达十五六次，只此一事就具体而微地告诉我们他的非凡的生产能力。二十年中，他不仅写出了他那七十四部小说、许多短篇和许多小品，而且在那些作品最后印成以前，他还一次又一次地重写。

无论是钱财紧迫，还是出版家们的恳求，这些人轮番使用友好的责难与法律行动来对付他，都不能劝阻巴尔扎克放弃这种昂贵的方式。有多少次，他丧失稿酬的一半，有时竟是全部丧失，因为他得自掏腰

包偿付改正与重排的费用。但这是有关艺术完整无疵的事，在这一点上他是绝不动摇的。一位报纸主笔有一次印出了他一本小说的一回，没有等待最后的清样和巴尔扎克的“付印认可”，结果巴尔扎克永远跟他断绝了关系。对于外界，他显得轻浮、拖沓而贪婪，然而作为艺术家，他却是在近代文坛所有作家中进行了最本乎良心、最不迁就的斗争的一个。因为惟有他一个人知道在那间隔绝尘世的实验室中，他用了几许精力和献出几许牺牲，才达到他作品的精美。在那里，他的专心一志的辛勤，是那些仅见其完成了的作品的人所未曾见到的。所以他才把他的清样当作唯一的忠实见证人来钟爱。它们都是他的骄傲，而这种骄傲，更多的是属于一个劳动者的骄傲，一个不知疲倦的手艺人的骄傲，而不完全属于艺术家。他于是将每本作品另外编成一册，由各个阶段的修正清样组成，再加上原稿，装订成一巨册，比起一本印出后二百页的小说来，这个巨册有时竟包括两千页之多。有些时候，原稿并不和清样装订在一起，仅仅附在后面。正如拿破仑向元帅们和他的忠实追随者们颁发王公头衔与纹章一样，巴尔扎克把浩瀚的《人间喜剧》中这些巨册作为他的珍贵礼品赠送给朋友：

“这些册子我只送给爱我的那些人。它们是我的冗长劳作与耐心，我曾向你们说过的，见证人。正是在这些可怕的篇幅上我曾消磨掉多少个长夜。”

其中大多数赠给了德·韩斯迦夫人，但是德·葛兰特利夫人、桂都邦尼—维斯岗地伯爵夫人和巴尔扎克的妹妹，也属于接受者之列。被选出来受此殊荣的有限的几个人是深知这些独特文献的价值的，这事可以从收到《幽谷百合》（“Le Lys dans la vallée”）的清样册作为多年友谊与医药照料的酬报的拿克加尔大夫的回信来判明：

“这真是一座惊人的纪念碑，应该让所有倾心于艺术完美性的人都看到它。这对于读者们也大有教益，他们都以为思维产品的孕育与创造，就同它们被人阅读时一样地毫不费力！我真希望我的图书室就设在旺多姆广场中心，以便欣赏你的天才的人可以知道你工作时的谨严与坚忍的真正价值。”

除了贝多芬的手册是个例外，现今存在的任何

文献，没有哪一本比这些册子把艺术家为了工作而奋斗的情况表现得更确切的了。在这里，巴尔扎克所禀赋的元气，他用以完成作品的巨大精力，较之任何肖像或当时写成的故事，都能更生动地供人研究。只有知道了这些，我们才算知道真正的巴尔扎克。

他把用来修改清样的三四个钟头戏称为“文艺烹调”，花去了整个上午。然后他推开纸堆，吃一顿简单的午餐来恢复精神，一个鸡蛋，一两块三明治，或者一点肉饼。他喜欢过舒服日子，喜欢老家杜尔式的厚味油腻菜肴，美味的腌肉，香脆的鲱鱼，多汁的红肉，而他熟悉本省的红酒白酒，就象钢琴家熟悉键盘一样；可是在他进行工作时他屏弃一切奢侈。他很懂得多吃使人怠惰，而他却是没有时间可以怠惰的。他甚至连片刻休息的时间都没有，马上他又把圈椅挪到小桌跟前，或者继续校正清样，写下备忘材料，写一两篇文章或者写信。

最后，快到五点钟的时候，他总算搁下白天的笔了。他一个人也不曾见到，连报纸也没有看上一眼，不过现在他能松弛一下了。奥古斯督送上晚饭，有时他也许接见一位出版商或者一位朋友，但一般地他总是独自冥想的，所想的也许是围绕着他当晚要做的工作。他从来都不，或者极少，到街上去，因为他

总是太疲乏了。八点钟，别人出去寻欢作乐，他去上床，而且立刻入睡。睡眠沉熟无梦。跟他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一样，睡眠也以高强度著称。他睡觉就为了去忘记。他已经做成的工作，并不能解脱他在明天、后天以至生命最末一点钟要做的工作。子夜时刻，仆人走进来点燃蜡烛，也就点燃了醒来的巴尔扎克的工作火焰。

* * * * *

这就是巴尔扎克一连气工作若干星期、若干个月的方式。他不能容忍任何中断，一直到他手边的工作做完，而且在两次专心致志工作时期中间的休止，也总是短暂的。一本书紧跟另一本，就象一行行针脚在一块大布上，这是工作，也是他的寿衣。他在悲哀中忧叹：“一切永远一样。一夜跟着一夜，一本跟着一本！我营造的建筑实在太高太大了！……”

往往他又被丧失生趣的恐惧心所袭击。他摇晃着自己锻成的锁链：“一个月里我做的事，别人一整年或一年再多一点也完成不了。”不过工作对于他已经成为强制性的必要，他是欲罢不能的了：“我工作时就忘记了一切痛苦，工作就是我的慈航。”

尽管花样繁多，而对其持续不断却毫无影响：“不写作的时候我盘算计划，既不写作也不盘算的时

候，我还有清样要改。我的生活就由这些组成。”

他的生活是脚踝上绕着一条链子的，即使要逃走，链子也会作响。他去旅行时也仍旧非写不可。当他在恋爱中跑去会见热情所钟的女郎时，热情仍从属于更高义务。当他宣称即将拜访德·韩斯迦夫人或德·葛丝特丽夫人时，他也许确是迫不及待、欲火中烧，可是，他在信里还要提醒情妇，她决不可能在下午五点以前就见到他。只有当他做完了当天应做的毫不留情的十二到十五小时的工作之后，他才能献身于中选的妇女。工作先于爱情。《人间喜剧》重于现实之世界。

当我们想到巴尔扎克在这二十年中的作品，如果还算上他的私人事情和商业交易，我们将格外惊叹。歌德或者伏尔泰总有两三位呼之即来的秘书，即使那位圣伯夫，也还专用一个人给他扒罗剔抉；而巴尔扎克却总是单枪匹马，通信自理，商业自办。只有在病榻上那封动人的最后一信是例外，那时他的手指已不能握管，只能在妻子所写的信后面加上一个附白——“我已不能再读书写字了”——此外他的书籍的每一页，他的函札的每一行，都是他亲手写成的。他安排合同，参与所有他被卷入其中的诉讼程序，都不用一個书记，不用商业代理人或者专家顾

问。他为家庭采购物品，他亲自向商贩订货，后来他还照管德·韩斯迦夫人的财务，并给家庭建议一切。他殚精竭力已接近病态，但也有这样的时刻，他认识到这种不正常的精力消耗必有灾难的后果：“有的时候我仿佛感到脑子着了大火，似乎我命定必将死在我的心灵的废墟上。”

当他允许自己在过分工作与极度紧张的几段期间之后略事休息的时候，这个休息总是危险得象一场崩溃：“我一天睡十八个小时，而另外六个小时我什么也不做。”他在过分工作之后所采取的休息方法，其本身也是一种形式的过分，而当他能够提起精神去寻求消遣的时候，也与此相类似。当他离开斗室，去找寻同伴们的时候，他的脑筋仍旧处于兴奋状态。在几乎连自己的声音都听不到的若干星期的孤独之后，他总是垄断谈话，仿佛禁锢已久，急于冷嘲热讽，而隽语和高谈自是接踵而来。当他走进商店时，他仍未忘怀幻想中的百万金钱，那是从他头脑中倾注出的故事中变出来的，所以他花钱如流水。过了多少个星期的俭朴生活之后，他胃口甚佳，大吃大喝。而当他出门时，马匹总嫌奔驰不疾。他的行动都保留着在他的小说里可以找到的丰饶狂想，带着欢愉的生气。他很象一位昔日的粗豪而热诚的水手，他

们一连几个月没见过陆地，没睡过床铺，没同女人谈过话，然后，在轮船克服了多少海上困难抵达港口之后，就会把一个鼓囊囊的钱袋扔到桌上，老酒喝足，大喊大叫，感到生活欢愉的爆炸。也可以把他比作长久关在厩里的赛马。一旦它呼吸到吹人欲醉的自由空气，能自由地伸缩筋肉，它就会象火箭一样冲向前去，而绝不是缓步逍遥。这就是巴尔扎克在他从自己规定的苦修中暂时轻松下来的休息期间怎样行动的。

而那些戈兹兰，那些魏尔特，新闻界那一大帮是非精，却大施其廉价的小聪明，象小人国的侏儒们那样嘲笑巨人，这位巨人刚被释放，正在侏儒中间高视阔步。他们记下一些小故事，这些小故事四处传播他的可笑的正襟作风和幼稚的虚荣心理，还把这些东西热心地刊入报纸，于是每一位蠢才都感到自己比伟大的巴尔扎克聪明。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了解，对于象巴尔扎克这样工作的人，假如他行动正常；假如他经心算计每一个法郎，还为了四厘息金去投资；假如在他所控制的幻化梦境中大施威权之后，而在出现于实际的人世间时，他还能遵照沙龙里的流行习俗；假如他能把自己的创造性天才拘束在冷静的外交策略的老谋深算的圈子内，那才是真的不正常呢！这些

自作聪明的小人只能在巨人走过之际嘲弄一下他投射在墙上的奇异怪影而已。他的同代人都不知道他的真实天性，因为，巴尔扎克就象一个幽灵只被允许在那不属于它的世界遨游一样，一听到严峻的钟声就要被召回阴间，他只有短短几个小时来享受自由呼吸。然后他就被召回孤寂的隐穴，回到他自己所创造的世界，那个对于他才是唯一真实的世界。

第九章

德·葛斯特利公爵夫人

巴尔扎克的生存方式就是工作，他也暗中自我欣赏有这种超凡毅力和创造性意志，这两点使他能从魁梧的身躯和弹性的头脑里取出极大值来，甚至于超过极大值。他日日夜夜投身于炽热的熔炉，并骄傲地宣称：“Mes débauches sont mes travaux”（我的纵恣就是工作）。从生命中极度汲取，这就是他工作方式中最基本的原则。

但是最残暴的意志也不能完全抑制人的天性要求，天性总会去反抗非天性的生活方式，这种反常的生活方式仅只在幻想里寻求满足，还努力在某种专门事业里去磨蚀情欲的锋芒。有的时候——随着年龄增长也越来越经常了——巴尔扎克被一种阴暗的

先兆所袭击，感到优美岁月已然消逝，最高超的艺术创造也只能够算是生命的代表，而不是生命本身。“我努力要把生命集中在脑筋里，”他对珠儿玛·卡罗承认，但这却是他不能完全办到的事情。这位艺术家，也是一位享乐主义者，常为他日常生活的苦行单调性而呻吟。这个人需要更热烈的表达方式，而不是只向一无反应的纸张倾吐言辞。这位角色创造家，他描写跟男人们谈情说爱的女人们，自己也需要一位女人，他能够去爱，也能够被她爱。

这样的女人怎么去找呢？在这件事上，他的工作又十分嫉妒地拦住了道路。他没有时间去寻找妻子或者情妇。他不能在清闲时间四处物色；看到他屡次委托妹妹和珠儿玛·卡罗为他找一位合适的妻子，使他从感情的痛苦和受折磨的期待中解放出来，也是很令人感动的。

突然的成名带来了新奇的转机，因为当他已经走到失望的边缘，似乎永远也找不到他要的女人时，女人们寻找他来了。女人总是喜欢关心女人问题的作家，而巴尔扎克对于他的女性角色的偏爱——他把她们描写成男人所不了解的苦闷的受难者——对她们失败的体贴，对被弃、被逐、衰老女人的同情，都触动了不仅是巴黎女人的心灵。从法兰西各省最

偏僻的角落，从德意志、俄罗斯和波兰，都有信寄给这位作家，说他对女人真是作了“彻底的探索”。

一般说来，巴尔扎克是个粗疏的通信人。他很少回复来信，而那些希望跟当代杰出的人才们讨论知识问题的人也总是徒劳的。但是妇女读者们的书信总能给他快乐，同时还能促成精神的兴奋。对他那想象力丰富的头脑来说，这一类通信意味着一本可以在实际生活中体验的小说。而在热烈期待精神交往时他会向素昧平生的女人们倾吐情愫与忏悔，那是他连知心朋友们也不给的。

有一天，一八三一年十月五日，一封信转到沙谢，他正在那儿的朋友马尔岗家作客，这封信引起了他的特殊的兴趣。我们从他的小说里知道，他的想象是可以由极琐碎的小事点燃起来的。在这一次，信笺的质地，笔迹和表达的口气都使他有此感觉，写信人，她没有署名而用了一个英文假名，必定是一位高级贵妇，说不定是最高级的。于是他立刻让缥缈的梦幻尽情飞驰。她一定年轻、美丽而不幸，一位经历过悲剧经验的女人，而且无疑是一位伯爵夫人、侯爵夫人或者是公爵夫人。

他的好奇——也许还有点势利眼——使他坐立不安。他马上给这位不知名的写信人回了六页长信。

他说，她的年龄，她的环境，他一无所知，他最初只想为自己辩护，去驳回她读了《结婚生理学》之后加给他的指责，她认为他轻浮。但巴尔扎克是决不能把热情抑制在界限以内的，当他要表露仰慕之情时，它就必得以狂喜的辞藻表达。他一旦敞开心怀，那就是一阵疯狂的忏悔。他倾心地对她说，他的意愿就是只跟一位寡妇结婚，他用一半伤感一半痴心的色彩描写他的理想对象，还告诉了她他的“最秘密的远景计划”。他告诉她，《驴皮记》将是他的巨型大厦《人间喜剧》的拱心石，他为“有此企图而充满自豪，即使计划可能失败”。

这一信件的不知名的收信人，当她读了这封亲密的自我坦白而不是礼貌的复函，一定大为惊讶；她原先所期待的不过是至多一两页关于文学的讨论而已。她好象也是毫不迟延地就复了信，于是两人之间建立了通信关系，可惜信件如今已留存无几。通信自然要导致彼此识面的渴望。不知名的女人早已知道一些巴尔扎克的事，除了社会上所传布的闲话之外，他的相片也已在许多报纸上刊登过，而他却对她一无所知。他的好奇心定然已被刺激到最高峰，耐心已不能控制，急于要发现她是否真的年轻貌美，究竟是不是渴望安慰的一个悲剧灵魂，她是否仅是一位蓝

袜子^①，一位受教育过多的富家女儿，或者果真是（大胆的希望！），果真是一位地道的伯爵夫人、侯爵夫人或者公爵夫人。

事实证明，这是巴尔扎克的心理本能的一大胜利。不知名的通信人确是一位侯爵夫人，将来还会由于继承关系而获得公爵夫人的头衔。不象他从前那位情人，德·阿伯朗台公爵夫人，她是由于依靠科西嘉窃国者^②而新得到贵族特权的。而这位夫人，是圣日耳曼镇里所能找到的最好、最纯的贵族血统。侯爵夫人，后来的公爵夫人，亨利爱特·玛利·德·葛斯特利的父亲是德·马叶公爵，前任法兰西元帅，他的家徽可远溯至十七世纪，她的母亲曾是德·费慈—詹姆斯公爵夫人，换言之，就是斯图亚特王室的一员。她的丈夫，德·葛斯特利侯爵，是同名的著名元帅的孙子，一位德·基尼斯公爵夫人的儿子。巴尔扎克对贵族的病态狂热实在不能更加满足了，有了象这样的一个家庭谱系，夫家和娘家都如此显贵不凡；在年龄上，她也符合理想到了极点。她三十五岁，因此可以认为是一位“三十岁的女人”。在其它方面，她

① 蓝袜子，指有才气的妇女，本无贬义；但后来用法也含有女学究的意思。

② 即拿破仑。

也是一切女人中最巴尔扎克式的，因为她是一位伤感的、不幸的、失望的女人，过去有个爱情故事，在巴黎社会并不比《驴皮记》少受称赞，这个故事还曾被司汤达在他的处女作《阿尔曼斯》（“Armence”）里利用过。

巴尔扎克毫不为难就了解到她的浪漫史的细节。二十二岁上，当时她是法兰西贵族界最美丽的年轻女郎之一，她遇见大权在握的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的公子。她狂热地爱上了这位青年，公子继承了父亲的外表和社交的魅力，虽然缺乏父亲的健壮。因为法兰西的高等贵族还保持十八世纪的开明哲学传统，她的丈夫本当默许这一场爱情事件，不管如何炽热，只要它保持在秘密界限之内就可以。但是，他们有着真诚的目的，它不仅激起司汤达的热情，而且激起了整个巴黎的同情，这一对情侣竟藐视任何妥协。德·葛斯特利夫人离开了丈夫的家，维克多·梅特涅亲王也舍弃了光辉的前程。断然不顾全世界的意见，他们决定只为彼此双方，只为相互的爱情而生活。这一对浪漫情侣遍游欧洲最美丽的国土，在瑞士和意大利度着自由的、迁徙的生活。一个儿子不久就降生了，正是他们的幸福的理想证明。后来奥地利皇帝把冯·阿尔登堡男爵的头衔赐给了这个孩子。

然而，这样的幸福实在过于美满，必难持久。晴天里落下霹雳。出外打猎时，侯爵夫人不幸坠下马来伤了脊骨。从此之后，她就不得不花费大部分白昼斜靠在沙发上或是卧床不起，而没有多久她又被夺去了情人的温柔照料。一八二九年十一月，维克多·梅特涅死于痨病。这打击比猎场的祸事更加凶猛。她不能再继续居住在那些风景中了，它们的美丽她只能在他们的爱情的反射光辉中才看得到，她只好回到巴黎。不过，她没有重新获取她在丈夫家里的地位，也没有恢复她在社会上的地位，这个社会的风俗她曾大加侮慢过。她在她父亲的府第卡斯特兰宫里过日子，过着完全隐居的生活。她拒与旧友交游，只在书本中寻求伴侣。

继续跟这样一位女人通信，由她以亲切的言辞来叙谈，这当然要拨动巴尔扎克的心。因为在各方面她都是他的大胆梦想的实现。一位贵族妇人，一位“三十岁的女人”，一个“弃妇”^①，竟选择了他，巴尔扎克，这个农民的孙子，从前的一位小布尔乔亚的儿子，多么光荣啊！多大的胜利啊！超过一切雨果，一切仲马，一切缪塞，他们都只娶了布尔乔亚女人为妻，找到坤伶、女作家、轻佻女郎当情妇！如果他获

^① 见本书第 77 页注①。

得权利去宣称，在她身上已超过友谊的关系；如果继象德·柏尔尼夫人这样的小贵族和象德·阿伯朗台夫人这样的暴发公爵夫人之后，他居然能成为一名正牌的老法兰西贵族公爵夫人的情人甚至于丈夫，成为梅特涅亲王的后继人的话，胜利将更是多么充分啊！何况在德·阿伯朗台公爵夫人身上，巴尔扎克已经承继过亲王的父亲了。他坐立不安，期待着人家邀请，只要是那样，他就有机会亲自拜访这位著名的、尚未谋面的妇人。最后，二月二十六日，一封包含着“信任标志”的信终于到来，他马上回信说他立刻接受她的“慷慨赐予”，而不顾要冒“在个人交往上遭受损失”的风险。

他回信如此匆忙，如此幸福与快乐，以致疏忽了另外一封信，放在桌上竟没有拆开。这封信是同一天从俄罗斯寄来的，是另一位妇人写的，她署名为“外国女人”。

* * * * *

不消说，在巴尔扎克没有见到德·葛斯特利夫人之前，就已无可奈何地爱上她了。如果她竟然丑陋或者愚笨，吵吵闹闹或是悻悻嫌怨，那也对他的感情不起作用，因为他的全部感情，包括爱情在内，都受意志支配。在他还没有梳洗完毕、穿上新衣、坐稳马

车向卡斯特兰宫进发之前，他已下定决心要爱这个女人，同时也要被这个女人所爱。正象后来跟另一位妇女的事情一样，这位妇女的信放在桌上还没有拆开，他已把德·葛斯特利侯爵夫人塑成理想的偶像了。在她身上，他分派了充当他自己生活故事中的女主角。

故事的头几章的确符合于他那想象丰富的观念。躺在趣味优异、与众不同的客厅里一张沙发上，一位少妇在等待他，虽然已不太年轻，看上去有点苍白，有点疲倦，她是一位曾经爱过、知道爱情所意味的一切、在孤单中需要安慰的妇女。说来也怪，这位一向跟公爵、亲王们来往的贵妇，她的情人曾是奥地利首相的翩翩公子，见到这位肩宽体胖，任何裁剪手艺都无从赋予他丰采与华美的平民，却并不失望。眼睛充满了活跃的兴趣，她感激地倾听他的生动谈吐，因为他是她第一次认识的作家，是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尽管她矜持，她却确实感到了他用来接近她的领悟的同情心和兴奋的急躁感。谈着谈着两三个钟点就象魔术一样过去了；尽管她忠实于故去的情人，她还是不能抵抗对于命运给她送来的这位奇人的敬仰。对她来说，这是友谊的开端；对巴尔扎克来说，这是错乱的开始。他给她写信说：“您这样亲切地接

待我，我跟您一道度过的时间是这样愉快，我已确信，只有在您身边我才能找到幸福。”

他们的关系日益亲挚。随后的几个星期、几个月里，巴尔扎克的马车每天晚上都驶到卡斯特兰宫，两人一直谈到午夜以后。他陪她到戏院去，给她朗读最近的作品，征求她的指教，把手稿《三十岁的女人》、《夏倍上校》和《噩耗》作为礼物相赠。这孤单的女人，她因失去情人已悲哀许久，开始在这理智的友谊里体验到某种幸福，但是就巴尔扎克而言，友谊是不够的。

巴尔扎克的需要多于理智的交往，他的求爱风狂雨暴。他坦白地告诉她，她是他的欲望的对象，他愈来愈紧迫地要求她的服从的最初和最后的保证。德·葛斯特利夫人不由得感觉到，也许是下意识地吧，被一位自己所崇拜的天才爱慕是颇为得意的，所以她也并不用冷淡的轻蔑来抵挡他的小小亲热。她甚至于会有意向他挑逗，虽然我们不能够完全相信巴尔扎克在他后来一本带报复性的小说《兰瑞公爵夫人》（“La duchesse de Langeais”）中的描写：

这位妇人不仅亲切地接待我，还为我施展了她相当可观的妖媚本领的各种技巧。她定要

使我欢心，尽一切努力使我保持酩酊状态，怂恿我得寸进尺。她用尽一切办法迫使安静怯懦的情人表明态度。

不过，一到情况到达危险地步时，她就坚决挡住他，不许越雷池一步。也许她要继续忠实于孩子的父亲吧，为了他，她曾放弃了社会地位；也许她感觉受到身体残废的限制吧；也可能到了最后，她终于被巴尔扎克的平凡外貌所排斥吧；也许她是害怕他的虚荣心会驱使他在公开场合吹嘘他的贵族关系，——这也并非无理——所以她就只许他做些他在《兰瑞公爵夫人》里所说的“怯懦情人应当满足的迟缓的小小征服”，而顽强地拒绝“以肉体的屈服去证实心灵的屈服”。有生以来第一次，他不得不承认他的意志并不是全能的。在几个月的坚持求情、逐日拜访、为保皇党所作的笔墨活动之后，无论他的自尊如何委曲求全，他还仍然只享有德·葛斯特利夫人的理智友谊，而并不是她的情人。

即使最聪明的人也总要到最后才醒悟他是在干着不值得的事。由于不明事实真相，巴尔扎克的朋友们看到他在公共场所出现时的仪表大变，甚为惊讶。他们看到他日益时髦而心神不安，看到他经常用小

望远镜从意大利剧院的劣等包厢向某个包厢窥盼，看到他成了德·费慈—詹姆士公爵（Ducs de Fitz—James）和德·罗桑公爵（Ducs de Rauzan）的保皇党客厅的熟客，在那种地方，中产阶级出身者即使是伟大的作家、画家、音乐家或政治家，都被视为小厮。朋友们大都倾向于认为这种走向奢华的谄媚行径有损于他的声望，但是到他们的奥瑙利·德·巴尔扎克忽然在极端反动派的报纸《革新者》（“Le Rénovateur”）上作为政论的作家而大出风头的时候，他们就极感震惊了，在报上他热烈吹捧封建特权，在德·柏利公爵夫人（Duchesse de Berry）面前公开屈膝。朋友们相当了解他的性格，知道他并不是那种为了金钱出卖自己的卑贱之辈，他们的本能告诉自己他必是由某只隐蔽的手给牵进了黑暗的政治歧路。德·柏尔尼夫人——巴尔扎克一直特别小心不让她知道他跟德·葛斯特利侯爵夫人的通信和对她的拜访——是第一个出来警告他的人。虽然她自己，既由于家庭传统，也由于她是路易十六和玛利·安他涅特皇后的教子，也倾向于赞成保皇运动；她却以厌恶的心情看到巴尔扎克突然变成他们的宣传家，而力劝他不可沦为“那些人的奴隶”。从她的旁观者清的有利地位，带着有关贵族社会的经验，她知

道这些人对于巴尔扎克这位作家并不真正敬重，不过要利用他向上爬的心情罢了：“他们本质上是不知感恩的一伙，他们决不会为了你的缘故而改变作风，我的朋友。”

更坦率一些的是珠儿玛·卡罗给他的忠告，当她读了巴尔扎克写给德·柏利公爵夫人的颂歌以后，她深感惭愧和失望了。这位公爵夫人当时正竭力活动，要让儿子，查理十世的孙子，获得法兰西王位的继承权。珠儿玛劝告他，把保护这些权益的事留给宫廷左右的人，自己不要跟这些人鬼混而玷污了名誉。冒着失去友谊的危险，这友谊乃是她所有的最宝贵的东西，她毫不怜惜地告诉他，由于对天才的爱慕使她憎恨这种奴颜婢膝，竟把贵族特权看得比心灵的纯正还重：“你居然归附于顽固的特权贵族了！你就永远不会从迷梦中清醒了吗？”

两位诚恳的朋友都不知道到底是金钱的锁链还是玫瑰的锁链，竟把他束缚在那已然摇摇欲坠的波旁的仆从群里；但是她们都认为他已被迫抛弃了独立，已对他自己不忠。约五个月之久，从二月到六月，他都在侍奉德·葛斯特利夫人。突然间，到了六月初，他离开了巴黎，跑到沙谢，住到马尔岗家去了。是热情冷却了吗？是自信心大大减低到这种程度，他

只好撤了不可攻克的堡垒外面的重围？是他厌倦了这种关系，不管多么努力，仍然不超过柏拉图式的友谊吗？都不是。他仍然处于来自勃勃雄心的感情蛊惑之下，虽然他倒有自知之明，知道事已无望。他带着坦率的失望心情，最后向珠儿玛·卡罗供认了他的处境：

“我现在要到爱克斯，然后爬上沙芜瓦，跟在某一个大概要取笑我的人屁股后面——某位贵族妇人，在你眼里无疑是个可憎之物，她有着天使般的美貌，在美丽的容颜后面，想必有一个美丽的灵魂。她是一位正牌的公爵夫人，你一打算跟她亲热她就退缩，她说爱我，可是如果她能得逞，就会把我禁闭在威尼斯的深宫……这个女人，（你知道我对你总是坦白一切的！）她要我只为她一个人写作。她是那种女人之一，你不得不毫无保留地崇拜，如果她们要求的话，你就得跪在地下；而去征服她们又是多大的乐事啊——这种女人你只能在梦里遇到！……她们什么都嫉妒！噢！我还不如跟你一块儿住在安古莲，靠近你的磨粉厂，既可以理智清醒，又可以心灵平静，倾听风车转动，饱尝香菇美味，同你

和你的朋友一块儿欢笑、谈天——而不是到这儿来浪费时间和生命！”

不过，他这次暂时离开巴黎和德·葛斯特利夫人倒并不是由于已经感觉到他对她的爱情注定要遭挫折。原因决没有那样罗曼蒂克。头顶上象夏天风雨一样规则的经济风暴又一次向他袭来。巴尔扎克和米达斯^①恰恰相反。他所触到的东西都不变为黄金而变成债务。他每逢谈情说爱，着手投机，甚至出去旅行，结果总造成经济上的灾难。因为他的预算总是平衡在剃刀刃上，工作中每抽去一分钟时间都会表示贷方项下的一笔欠款。他消耗在德·葛斯特利夫人客厅和戏院里的夜晚相当于两部未写的小说，而收入上的损失又因为支出数目增加得可观就更显得严重。要用适合于一位贵族情人的方式来求爱这一不幸的念头使他债台高筑到不可想象的程度。单是为了驱车到卡斯特兰宫去所用的两匹马，就已经花了九百多法郎的草料费，而三个仆人管理家务的开销，裁缝的账单和阔绰的生活方式，都使他债台越筑越高。现在，围攻卡西尼街上房子的不再是债主，而是

^① 米达斯 (Midas)，神话中的人物，他得到了点金术，只要他的手接触到的东西，都会变成金的。

法警了。眼下只有一条路可以拯救他，那就是回到写作上来，然而要写作就得有心灵上的安静；剩下的可能性只有一个——逃走。逃出巴黎，逃出爱情，逃避债主，到一个什么地方，让人家找不到、碰不到。

当然，他所能写的随便什么，都已事先卖掉了。动身之前那天，他签订了两个合同，预支了一千五百法郎，这笔钱将作为下几个月的零花费用。但是当他快要离开巴黎的时候，一千四百法郎必须付出；等他登上送他去沙谢的驿车，他所有的全部总数是一百二十法郎。幸好，在马尔岗家一切需要都有供应，所以他没有什么花销。他一个整天半个黑夜坐在屋里写作，只在进餐时露面一两个钟头。可是静坐沙谢并不能减低巴黎家务的日常开销。他必得找到一位什么人，能够整饬秩序，减轻费用，拼搏债主，绥靖商人。而他所知道的唯一能够担此重任者就是他的母亲。在挣扎多年逃脱她的保护之后，现在却被迫要到她的节俭理家的才能中去寻求谦卑的庇护了。

傲慢、顽固的儿子的屈服是老太太的一大胜利，于是她就勇往直前地去保卫原已失去了的地位。她减低他的家庭开支，辞退多余的仆人，同商人和产业查封人进行战斗，卖掉了马车和鬃鬃的马匹。一个苏一个苏，一个法郎一个法郎，她力图恢复他那已经崩

溃了的财政，但是，就连她，不久也在债主的加速冲击面前束手无策了。房租付不出，房东就要扣押家具。仅面包店一家就拿出高达七百法郎的账单。很难想象一个单身汉怎么会消费这么多的面包。每天都有更多在巴黎金融市场上流转的汇票期票到了收回日期，在无可奈何之中她一封连着一封给儿子写信，而儿子却早已卖掉他在将来才能写出的书稿，毫无希望在这些书写成之前能从出版家或编辑手里再弄出一个法郎。就算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时，也不能够付清过去几个月所欠下的债务。

拯救不能来自文学，这十分明白。他于是又把希望寄托在老药方上，就是娶个阔老婆。尽管这在一位好象已在热恋中的人身上似乎是古怪的。在心与脑的奇异配合下，他在那一年年初，那时他对德·葛斯特利夫人的欲望还浪漫得很，就已竭力追求一位名叫德·杜鲁米莉小姐的女郎，这位爱情的新对象刚因父亲弃世而成巨富，大概不仅是一个偶合吧。由于历史没有记录下来的某些原因，追求遭到拒绝。在富有的孤女把他嘲笑一通之后，他决定重寻富孀，希望以此将宁谧带给不安的心灵，并能保证安心工作所需的物质条件。在万分失望中，他不仅拜托母亲，甚至还请求了老友德·柏尔尼夫人，以尽快的速度去

探索途径，为他找到一位拥有巨资的寡妇，好把他从破产的丢脸中拯救出来。

一个符合必要条件的候选人还真找到了，有一位德尔布鲁克男爵夫人，她，而且还是奥瑙利·德·巴尔扎克作品的热情赞赏者。一个小小的计策被炮制出来。在夏季，黄金的商船该进港了，因为男爵在离沙谢不远的地方有一处产业，于是巴尔扎克就把他的辞令库里各项武器擦亮，以便擒获这项贵重物品。为着在最后的突击之前先削弱她的防守，他把自己的作品献上了几本，都题有热烈的献词。当时，她住在查尔西（Jarzé）另外一座别墅里，这些礼物或许会增加她亲自结识这位有趣的青年作家的焦急情绪。每个星期他三次离开写字台，从沙谢走到附近的麦里（Méré），那儿是她的产业所在地，去询问她是否已经到来。

不幸得很，男爵夫人并无离开查尔西别墅的迹象。而且，如果她有一点察觉巴尔扎克急于要爱上她的收入，她说不定更要不慌不忙。她让他等待，于是威胁信每天从巴黎滚滚而来，而他的羞涩钱囊也日益消瘦。那一百二十法郎已缩小到了几个银币，如果不滥用朋友的好意，那么他在沙谢的停留将不能拖过两个星期。如果他不见到男爵夫人就离开沙谢，那

么他与她的一场不觉唐突的邂逅的最后机缘也就从此消逝。他的机智已经到了终点：“一个人在文学工作方面已有这许多忧愁，另外又有这么多事务上的困难，他就会认为结束自己生命是最好不过的了。”

当我们读到巴尔扎克在这悲惨的日子里所写的信件，我们就会被导致一个结论：没有一位艺术家在遇到精神上受到如此刺激并且走投无路的情况时，他还能产生任何有价值的作品。然而巴尔扎克处在这种情形之下，逻辑却等于零，不大可能的事件往往可以期待（其成功）。他所居住的两个世界，一个真实的和一个想象的，是两相隔绝的。一位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家，他能够非常有效地自禁于本人的精神世界之中，外在世界肆虐的风涛都被关闭在外。坐在小桌旁边，在摇曳的烛光下揭开众多角色命运的幻想家，与另一位奥璁利·德·巴尔扎克——他是被控诉欠债不还，被法警没收家具的——丝毫没有相同的地方。他丝毫不受那位居住于使其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的奥璁利·德·巴尔扎克的失望情绪的影响。

当事情到了最糟糕的时候，他倒最能表现出他是一位最卓越的艺术家的。忧虑和担心以某种神秘的方式转化为内心的高度集中。没有什么比他自己的

解释更真切的了：“我的最佳的灵感闪光都是在忧愁最深、最悲惨的时刻来临的。”

只有在四面楚歌、毫无出路的时候，他才最能投身工作，象一只被追捕的麋鹿投身河水。只有当生命的道路被断绝的时候，他才找到了“真正的自我”，而他本人这个内心秘密也从来没有比在这个狂风暴雨的夏季表现得更清楚了。一方面，他老给并无回音的德·葛斯特利夫人续写情书，每星期三次去恭询富孀是否已到，天天算计着日趋枯竭的现钱，设法延付到期的期票，绥靖已付款购买，而自己还没有去写的书籍的出版商，用各种手段推延看来是无法避免的破产。另一方面，他在撰写《路易·蓝柏尔》，这是他全部著作中最深刻、最富有思想的一部。这是一部雄心勃勃的小说，他希望以这一本胜过他过去所写的一切著作，并将以此证明他所以超过一切同时代作家的高明之处。这本书将表示他对已往作风的放弃，同过去那位为女性读者视为亲爱者的时髦浪漫派小说家的告别。它也将是作者品德的证明，证明他已从事一件（有意义的）工作，这一工作决无任何受到广泛欢迎的前景，而那个时代的读者们所要求的有刺激性的言情故事和社会小说，正可提供容易的机会使他获得如此紧迫需要的物质成功。正当出版

商和书商等待着他下一部司各特式或库柏式的书时，

他却致力于一部只有纯粹理性兴趣的悲剧故事，这种兴趣将使他的理性英雄的概念同拜伦的孟福勒特和歌德的浮士德并列。

这本雄心勃勃的著作的真正价值很少有人领会过。从较高的意义上讲，他并没有写完。巴尔扎克借着路易·蓝柏尔这个形象来反映他本人的少年时期以及他当时的思想和憧憬，他企图表现一个重要问题。他想指明，一位在完全的遁世中加深集中能力的天才，就会因此不能适应世俗的生存，因为紧张过度以致发烧的头脑最终还是不能承受这种负担的。由于受某一个观念的蛊惑而产生的这种悲剧，巴尔扎克对此已在他的小说中改头换面一百次了。在这本小说里，他把它搬进了理性的范围，让它成为接近于病理学的一个问题。天才与疯狂之间的神秘关联，这个主题为巴尔扎克所关注，要远比他这一代人早得多。

在以路易·蓝柏尔的形象来描写自己天才萌芽的最初几章里，他成功地刻画了一个可信的人物，而把自己的顶峰思想“意志论”的著作权归于这个人物。这个理论发挥了人性的心理方面和生理方面两

者之间的模糊关系。如果把路易·蓝柏尔这位也在“追求不可能”，并因过分求知而毁了自己的概念，拿来同歌德的浮士德概念相提并论，我们不夸张地说，巴尔扎克总在有意无意地同浮士德竞赛。不过有一个重大的区别，那就是歌德在《浮士德》上费了六十年工夫，而巴尔扎克，却必得在六星期内把定稿交给出版商高士林。为了给这本书提供一个他能引出结局的某种布局，他在主角的大理石雕像周围穿插了一篇无聊的爱情故事。哲学理论是以匆忙的即兴方式凑成的，因而读者的钦佩就因作品的不足而羸入了抱憾的色调。然而这本书比其它任何一本都更能告诉我们作者才能的宽广博大。作为一件艺术品，这部书一直并不完备，虽然后来他曾有所修改。但是从理性的观点说，它代表了他要处理严肃问题这个雄心的最高峰。

七月下旬，手稿送交巴黎出版商，在沙谢的六个星期已完成

了任务，但是他的经济地位却毫无改善。德·德尔布鲁克夫人还没有到来，他再逗留下去，那就是滥用朋友们的款待了。他显然不好意思向这些慷慨之士借一笔小钱而暴露自己的窘况。幸而他还有一处永远为他敞着门的躲避的地方。他知道卡罗一家定

会高兴地接待他，而且由于他们自己也穷得象教堂里的老鼠，他也就无须隐瞒自己的穷困，可以坦白地实说，他，著名的奥璠和·德·巴尔扎克，口袋里连补鞋子的钱都没有。他甚至于连坐邮车从沙谢到安古莲的车钱都出不起，于是，这位一度备过一辆马车、畜养过两匹良马的人，如今却在烈日下步行，一直到了杜尔，才在那里坐上邮车，驶向目的地。到了那里，囊中已一无所有，立刻向珠儿玛的丈夫借了三十法郎。

卡罗夫妇，他们本曾屡经浮沉，当巴尔扎克告诉他们他的荒唐困境时，便深表同情地哈哈大笑，并尽其所能给他一切。他有了一间清静的屋子可以工作，每当晚上去跟他们谈天时，他感到了愉快的气氛和亲切的关怀。以往也是这样，同这些襟怀坦率的朋友一块儿待上两个钟头，要比他的全部贵族相识都更能使他快乐。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在修改《路易·蓝柏尔》的大样之外，只用很短的时间他就写成了《弃妇》和《笑林》中好多篇故事。假如他每天早晨不为巴黎的母亲寄来的信件而苦恼，一切都是很美满的。这些信是要求寄钱来偿还债主的，这些人已无法再推开了。但是，要弄到几千几万紧急需要的法郎似乎已无法可想，因为就是向人家借区区三十法郎，

他还要跟自己的傲气作一番斗争呢。

黑暗的时刻到来了。在两三个胜利的年头中他曾吹嘘过偿还母亲借给他的一切。沉醉于成功，对才能的过分自信，他过着仿佛金钱无关重要的生活。他倚仗显贵的交游，又相信最后可以在富贵婚姻中找到安全港。现在他却又象个败家子，被迫爬回家来，卑躬屈膝地要求家庭出面帮助。他，圣日耳曼镇的可心人，著名的作家，一位高级贵妇的扈从转士，却不得不象一个无助的孩子，奔向母亲，请求由她担保去借款一万法郎，从破产中把他拯救出来。

奇迹出现了。巴尔扎克夫人成功地说服了一位老朋友，德兰诺瓦夫人，借给这个悔改了的败家子一万法郎。当然，这块可口的小面包是在撒上食盐和胡椒之后才放在这个饿鬼面前的。他必须低低俯首于肩轭之下。赦免了的罪人答应立即改变奢侈的生活方式，放弃毁人的挥霍生活，培养谦逊节俭这种中产阶级的品德，还要以复利偿还一切债务。

* * * * *

巴尔扎克被奇迹挽救了，但是每当一旦有希望能在正常的基础上来调节生活时，他内心潜藏得很深的某种本能，就会以新的反常反应出来，而这种本能倒是需要混乱和外在环境来压迫它的。他只能够

呼吸充满火焰的空气。他的血性气质往往趋向于使他忘记曾经折磨他的烦恼，而并不要求立刻履行的义务对他来说就等于不存在。假如他能冷静思索，他定会承认，他的经济状况在哪一方面也没有改善。唯一的不同无非是把二三十笔小量的急债归结成一笔大债款罢了。不过，就巴尔扎克而言，拴在颈项上的圈套已经松开，于是他刚一能够再次呼吸，他就要把肺叶涨满空气。

当他忙于撰写《路易·蓝柏尔》，又处于经济危机的紧扼之下，他已停止思念德·葛斯特利夫人了，他心里已私下认输，放弃了这场赌博。而在债务的重压暂时卸离肩膀后，他又亟想再一次孤注一掷。德·葛斯特利夫人在夏天好几次邀请他到沙芙瓦的爱克斯去看她，然后同她和她的舅父德·费慈—詹姆士公爵秋天一块儿到意大利去旅行。财源缺乏一直妨害他去考虑如此诱人的计划，但是眼下又有几个金路易在钱包里铿锵作响，这个引诱使他抵挡不住了。他觉得，她这样的邀请，去安西湖（The Lake of Annecy）畔，去卢梭的风景区，一定不仅仅是礼节上的姿态，这种微妙的暗示是不应忽视的。也许这位缄口不答的侯爵夫人，据他所知，不过是“跟一千只猫一样动情”的人，她所以在巴黎拒绝了他乃是怕旁人的

闲话罢了。是不是这位圣日耳曼镇的贵妇人要在自然的神圣美景里用自然的方式去满足自然的欲望呢？如果拜伦爵士，《孟福勒特》（“Manfred”）的作者，曾经在瑞士的湖畔寻找欢乐，为什么欢乐就不会在同样的环境里落在《路易·蓝柏尔》作者的身上呢？

在艺术家的美梦里经常有个警觉的本能在提防着。有三种虚荣形式在巴尔扎克的灵魂里斗争——一是飞黄腾达的念头，二是征服一位持续引诱他、却又不让他擒获的女人的雄心，以及第三，鄙弃一个拿他这样有价值的男子汉寻开心的交际花的欲望。一连几天，他同珠儿玛，他可以坦白直言的唯一对象，讨论他是否该去爱克斯。在珠儿玛身上也有着每一位妇女都具备的本能，无疑是厌恶巴尔扎克爱情所钟的这位女人的，她的本能当然会督促她去劝告巴尔扎克不去寻访她的这位贵族情敌。她一分钟也不会相信德·葛斯特利夫人会准许自己妥协于同一个平民讲恋爱这样的事情，尽管这位夫人崇拜他的文学天才。不过，当珠儿玛看出他在以怎样炽烈的焦躁心情期待她来加强他应当前去的信念时，她心里的某种东西就给了她力量来向他提供他所需要的鼓励。她不愿招致猜疑，以为她所以劝告他不要去捕捉

辉煌的机会只是出于嫉妒。让他从经验得到教训吧！终于她说了他所希望听到的话，事情就此决定了。八月二十二日，他动身到爱克斯去。

巴尔扎克一生都跟最原始的迷信有瓜葛。他相信护符，总戴上一只刻着神秘的东方符号的招福戒指，在做出重要决定之前，他总要爬过五级楼梯去请教算命先生，象巴黎的女裁缝们一样。他相信精神感应、秘密启示和本能的警告能力。假如这一次他也听从了内心的劝谏，他定会一上来就打消行意。因为旅行一开始就出了意外事故。在更换马匹，他走下邮车的时候，马拉动了车辕，他那不算不肥胖的身躯就跌在铁镫上，伤腿至骨。换了别人一定会取消旅行，把自己交给医生，因为伤势相当严重。但是阻挠却只有增强决心的效果。急急忙忙扎上绷带之后，他继续旅行，一直到达里昂，直挺挺躺在车厢地板上。从里昂他继续向爱克斯进发，到达时只好痛楚地扶杖而行，以不能再坏的形象来重弹热烈爱情的老调。

德·葛斯特利夫人以感人的关心为他预定了一间面临雄伟湖山的美丽小屋。它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非常便宜，每天只要两个法郎。他从来还没有在这样的舒适和宁静中工作过。但德·葛斯特利夫人所表现的预见也有一定程度的谨慎。巴尔扎克所占的

房间跟她自己住的房间并不在同一家旅馆里，而是隔着几条街的另一家。因此，他的晚间访问就只能是社交性质，而不允许有更亲密的接触。

只有晚上他才能见到她。这是他自己的规定，因为白天他要献身于工作。在她的要求下他所作的唯一的让步就是他一连十二小时的工作时间从早晨六点开始，而不是从他所习惯的午夜。黎明之后，不一会儿他就坐下来写作，直到晚上六点，都不离开书桌。鸡蛋和牛奶是他仅有的食品，只用十五个苏的代价，并由人家给他端到房间里。十二个小时工作完毕之后，他的时间就属于德·葛斯特利夫人了。然而不幸的是，她还是拒绝顺从他的奉承。她要多体贴有多体贴，他腿伤还未痊愈时用她的马车带他到布尔志湖和查尔特勒斯去玩，当他浪漫热狂时则尽情地姑息他，长夜谈天时按照他的配方准备咖啡，在娱乐场把他介绍给漂亮的朋友，甚至于让他称她为玛利，而不是亨利爱特，这是她只许给知心朋友的特权。可是，这就是她许给他的一切了。他给她送去路易·蓝柏尔的热烈情书，那方式当然使她了解，每个字都是写给她本人的。然而无济于事。他从巴黎定购半打黄色手套，一瓶香膏，一瓶葡萄牙香水，用快邮寄来。然而仍无济于事。有的时候，她容忍地接受、甚至撩

拨起某些亲密举动，从中似可看出顺从的迹象：

爱情的一切欢乐都由她那勇敢的、富于表情的目光，带有抚爱腔调的声音，言辞的迷人魅力预示出来。然后她让他察觉在她身上有点高级妓女的味道。……

在湖畔一次闲游时，她允许他攫获一次甘心情愿的、也许是偶然被偷去的亲吻，但是每当他要求爱情的最后确证时，当“三十岁的女人”和“弃妇”的保护人希望得到她用《笑林》方式来酬报他时，她就又变成远不可及的贵妇了。夏天即将过去，安西湖畔的树叶渐渐变黄而凋落，而新的圣—布勒^①比起六个月之前在卡斯特兰宫的凉爽、高敞的客厅里的时候，在他的爱绿绮思身上并无进一步的发展。

供人散步的湖滨路上游客逐渐稀少，显贵的旅游者已在准备离开。德·葛斯特利也在整理行装，虽然她并不回巴黎。她打算先同舅父到意大利旅行，巴尔扎克被邀请同行。他很犹豫。由于长期的、无结果的追逐，给他塑造了一副狼狈相，他不想再哄骗自己

^① 圣—布勒（Saint—Preux），和下文的爱绿绮思（Héloïse），都是卢梭所著的《新爱绿绮思》一书里的人物。

了。这一点可以从他给珠儿玛·卡罗写信时所用的悲哀声调里看得出来：“你为什么让我到爱克斯来？”并且，到意大利旅行花费不貲，而在他，更是双倍的开销，因为路途中所耗费的时日就是他工作上时日的损失。但另一方面，这又是对艺术家的极大诱惑，艺术家的思想能因施行而丰富，他就曾经这样说过。他将看到罗马和那不勒斯，他将同一位他爱上了的聪明、漂亮女人在一起，他将乘坐公爵的马车。巴尔扎克又一次抵制了内心的预兆，屈服于诱惑。十月初旬，三个人动身去意大利了。

日内瓦是南行的第一个停留站，对巴尔扎克来说，也是最后一站。到达这个城市之后，在他与德·葛斯特利之间发生了一场戏，详情则无人知道。好象是他给她送去了某种最后通牒，而这一次她似乎用了一种使他深感侮辱的方式拒绝了他。毫无疑问，她在他最敏感的地方残酷地伤害了他。或者是由于男子的自尊心，或者是由于人性的自尊心，因为他立即冲出门去，满面怒容，赧火中烧，决定对这位几个月来一直把他拘在愚人的天堂里的女人进行报复。他脑子里也许想好了报复这场屈辱的办法，就是在一部小说里给她描绘一幅无情的肖像。就在《兰瑞公爵夫人》，最初题为《别触动斧头》（“Ne touchez pas

à la bache”)的这本书里，他终于让全巴黎都知道了这件事。为了顾全面子，两人表面上还保持着友谊关系，巴尔扎克甚至还拿出骑士姿态，在小说出版之前读给她听过。遗憾的是，这部小说趣味不高。他向全世界描绘她的肖像，而她则用更高贵的姿态来回答，批准了这幅不大招人喜欢的肖像。她后来就在圣伯夫身上找到另外一位文学上的父亲兼忏悔师，而巴尔扎克也就毅然地宣称：

“我对自己说，象我这样的生活不能总是依附于妇道人家；我应该勇敢地跟随命运，把眼光抬到比女人裙带更高一些的水平上。”

* * * * *

就象不顾一切劝阻而疯狂奔跑的孩子碰到石块以后，立刻飞回母亲的怀抱来求得抚爱，并使伤势得到照料，巴尔扎克也从日内瓦直奔那穆尔去看德·柏尔尼夫人。回到她身边来，既是为了忏悔，也是对最近生涯的清算。他从一位女人那里逃到另一位女人那里，前一个，由于出自虚荣，他才去追求她，而她却出于漠不关心，或出于冷静的计算，如果答应了他将有多少损失，因而拒绝献身给他；而后者，则为

他牺牲一切，给他一切。他从来都没有象现在这样深切地感受到她一向是怎样待他的，而直到今天她仍然是这样待他，这是他所爱的第一个女人。现在，她只是一位伸出母爱之手的朋友，他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领会到，他欠她的情有多少，于是他就拿他一生中最喜欢的一部书《路易·蓝柏尔》献给她，来表示他的深切的感恩。这部书第一页上所题的献辞是：Et nunc et semper dilectae——“献给我所选择的女人，从现在直到永远。”

第 十 章

巴尔扎克发现了秘密

假如我们竟然相信巴尔扎克自己说的话，我们就会被迫得出结论，说他和德·葛斯特利夫人的爱情是个悲剧，给他留下了磨灭不掉的伤痕。“我讨厌德·葛斯特利夫人，”他用大动感情的腔调写道。“她毁掉了我的生活，却没有赔我一个新的。”在另一封给一位不知为何许人的信上他竟然宣称：“我们之间的关系，由于遵照德·葛斯特利夫人的愿望而完全停留在无可诟病的范围之内，乃是我所经受过的恶运的打击中最严厉的一次。”

我们应当习惯于他书信中的这种过分戏剧性的叙述。无疑地他的自尊和虚荣深深被这次挫折给刺伤了，然而他的坚定信心在他身上是根深蒂固的，他是一个极度以自我为中心的人，随便一位女人的

“可”或“否”是不足以“毁掉”他的生活的。跟德·葛斯特利夫人的这段经历并不是什么灾难，而只是一段插曲，因为本质上的巴尔扎克决不会那样失望，那样悲痛，象他给不知名的女通信人的罗曼蒂克的流露中所表现的那样。他从来没有过那种念头，象他在《兰瑞公爵夫人》里所描写的蒙特利物将军似的，用一块红热铁去给卖弄风骚的贵族妇人打上烙印。他并不曾在第一次遭受打击之后便口吐白沫，必图报仇而后快；而是继续友好地同她书信往还，几次登门拜访。在书本里出现为风暴式的悲剧，而在现实中却逐渐地在“彬彬有礼的关系缓和的气氛之下”闪烁地消逝。巴尔扎克，我们不妨以足够的尊敬来说，在描绘自己的肖像时从来就不说真话。他的小说的特殊标志就是它们的丰富多采。他力图从每次与外界的实际接触中汲取到最大限度的经验。因此我们也确乎不应当从他的创造性的想象力里面竟希望他会忽略了他本人的经验而排除他那添油加醋的习惯。

给巴尔扎克写传记的人必须同巴尔扎克本人所提供的引人误入歧途的证据做斗争，一定不允许自己被巴尔扎克的感情爆发所眩惑，而竟然相信由于一位高级社会的贵妇人拒绝给予他法兰西人所谓的

“小便宜”便会成为后来将他送进坟墓的心脏病的基本原因。这桩公案并没有毁掉他的生活，恐怕可以这样说，他还从来没有比自此以后的几年里更健壮、更有精力、更勤奋、更充满活力呢。他的作品要比他的信札提供了更可靠的证据。仅在此后的三年中，他的文学产品已足足抵得上一一般人毕生的工作，足以使他成为当时最伟大的作家。然而就是这样，他也只把它看作一个起点，只是他真正事业的开端，他的真正事业是，他要成为“记录十九世纪社会风俗的历史家”。

*

*

*

*

*

早期的成功给他带来了信心，他感到自己掌握着一种力量。他知道自己实力，他觉得可以用笔锋去征服世界，犹如拿破仑曾经企图用剑锋去征服世界。不过，假如他注意的只是物质上的成功，象人们因阅读他的信札可能设想的那样；假如他希望的只是大规模地赚钱，那么他所需要从事的只是向读者提供他们吵嚷着要得到的读物就足够了。女人们尤其会对他保持忠诚。他可以成为沙龙中受人尊崇的英雄，所有失望的巴黎妇女的偶像，孤独女性的心上人，雄心稍弱于他的同行如大仲马、欧仁·苏之类的成功的劲敌。但是，他既意识到自己的实力，他的灵

魂就被一个更高目标的火焰所点燃，于是他冒着失去读者的风险，相当勇敢地、愈来愈甚地偏离这些人的趣味。他想要找到究竟什么地方才是他才能的止境，而它的范围之广袤，就连他本人在振笔疾书的时候也无法停止对自己的惊愕。

他在一八三二至一八三六年之间的作品是以花样繁多著称的。第一次接触这些作品的人们一定会感到这是难以置信的，《路易·蓝柏尔》和《西拉飞达》（“Séraphita”）的作者居然会写出了《笑林》，而且，他是在同一时间内撰写这些作品的。就在他写下一篇“笑林的故事”的当天，他正在校改哲学小说的清样。这种现象只能解释为他有意考察自己的天才，看看究竟能达到多高和到达多低。正如一个建筑师在完成未来的建筑物设计之前，要计算、验正一下尺寸与应力；巴尔扎克也对自己的力量做出估计，奠定基础，在这基础上他的神圣的《人间喜剧》即将矗起。

《笑林》这本集子，是以拉伯雷的风格和他自己创造的古式法文写成的，纯系故事叙述，它能使自己的高兴情绪任意驰骋。这些故事写来毫不费力，也无须什么深刻思想或细致观察，他只是把一种想法尽情发挥。显然，巴尔扎克十分欣赏以这种轻佻的情调来写作。他心中的高卢精神和粗犷的男性气概都以

毫无顾忌的色情表露出来。他很得意地拿葛龙地夫人^①寻开心，在他所有的作品中，这些故事最配得上他这个脸颊红润、嘴唇粗厚的胖汉的外表了。沙龙里显得过于粗野的喧嚣狂笑，在这里都蒸馏成沸腾的欢笑。在这里我们看到巴尔扎克在悠闲安逸地写作。假如生活对待他不那么粗暴，假如生活允许他呼吸得更自由一些，那么我们本该有一百篇滑稽故事，那是他在对读者宣布的计划书里曾许诺过的，而不只是现存的三十篇了。

* * * * *

这是他天才的下限，他献给自己先天气质的贡品。不过，同时，他还在寻求他所能达到的最高峰，在他称为“哲学的”那些著作里。勃勃雄心鞭策他去证明，“手帕的成功”，即让眼泪涌入读者眼眶中的才能——这一点他已在作品的多情女角色身上表现出来了——并不使他满足。现在他既已对自己有所了解，他就不愿再让别人误解了。他已经达到了成熟阶段，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他要宣称，象他这样地位的小说家，已负有重任，要把小说水平提高到崇高

^① 葛龙地夫人 (Mrs. Grundy)，是英国剧作家摩尔顿 (Morton, 1764—1838) 一本喜剧《催犁》(“Speed the Plough”) 中未出场的角色，她是代表传统的拥护旧礼教的人物。

的艺术形式上去，其方法是处理有关人类的决定性
问题，无论是社会的，哲学的，还是宗教的。他要对
比两种人，一种服从社会律条，适应社会常规；而另
一种人则超越常人遵守的界限。其目的就在于描绘
真正的领袖和所有那些人的悲剧，他们或者高抬自
己超越常人而敢于特立独行，或者把自己禁闭在本人
所创造的幻觉之中。给巴尔扎克带来个人失败的那一
生活时期也正是他表现得最大胆的那一段时期。

在这些小说里巴尔扎克试图摹写那种人物，他们
使自己承担重大的事业，在现实中无从解决的事业。
他献出最艰巨的努力去描写那些人，他们因过分
努力而结局悲哀，那是一些最后与现实失去联系的天
才。路易·蓝柏尔是他在这一领域的第一个尝试。这
是一个哲学家形象，他打算解决人生的最高问题，而
最后沦于疯狂。这是一个主题，在它上面他用种种方
法把一切想象得到的花样加以翻新。在《无名的杰
作》（“Le chef-d’oeuvre inconnu”）里，他指出
一位画家的命运，他，在追求完美的幻想冲动中，竟
超出于完美之外。可以说，他的过分努力破坏了他正
在其中进行工作的素材，正象路易·蓝柏尔的想法最
终变成了不可理解的。音乐家钢巴拉步出了艺术界

限之外，直到只有他一个人听得懂他自己所创造的和声，正象只有路易·蓝柏尔才

懂得自己的想法或只有佛兰荷夫才懂得自己的幻梦一样。在《绝对之追求》（“La recherche de l'absolu”）里，化学家克拉埃在基本元素的寻求中毁灭了自己。他们都在追求什么是“绝对”。他们都是精神活动方面的伊卡路斯^①。

与这些艺术和科学中的天才并列，他又在《乡下医生》和《西拉飞达》里安排了道德上和宗教上的天才。前一本小说的灵感间接归功于对德·葛斯特利夫人的拜访。在一次外出同去访问德·阿古尔伯爵夫人时，他听到邻近有一位医生，一位罗梅尔大夫，他曾以慈善活动垦殖了一块弃地，复苏了一片破产的农民。这个故事，加上景色的宏伟，给了巴尔扎克深刻印象；而与卢梭有联系的风景区，可以说，也在他身上唤起了卢梭的改革热情。在别的作品里他是一位社会批评家，而在这本书里他却要承担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并勾勒出一份计划以求得社会问题的解决。他要表明，一个创造性的天才能够创造出不朽的杰作，不但用声音、颜色、思想来创造，也可

^① 伊卡路斯（Icarus），希腊神话中人物，世人用以比喻雄心过大而自毁的人。

以用人类社会这个脆弱的材料。

也许更大胆的要算把“西拉飞杜斯—西拉飞达”(SeraphitusSéraphita)性格化这个企图了。柏那西斯博士退出了世界,为了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而巴尔扎克要用这个形象去描写一个人成功地摆脱了一切人世的罗网,将爱情完全升华到理性爱情上去,使得一切色情气味荡然无存。体现在柏那西斯博士身上的这位实践思想家,本想以其渊博的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的,在这里却转入了斯威登堡^①观念的神秘领域。《乡下医生》和《西拉飞达》,如以最高标准来衡量,都不算成功。虽然巴尔扎克对它们的失败深感痛心,却也并非毫无道理。它们的笔调都过于轻描淡写,而把一个对现实有强烈感受的人作为宗教反对家呈现在书中,这也太不合乎人物性格了。尤有甚者,一部旨在为永恒问题提供最终解决之道的著作,决不应该作为报纸上的长篇连载断断续续地撰写,并且还预支了稿酬。他的哲学小说作为艺术作品并未达到最高水平,只不过是他的最高抱负的归宿罢了。他只是尽一个天才之所能去理解和描写了天才的品质,而他的成功之作却是他作为艺术家去描写

^① 斯威登堡 (Swedenborg, 1688—1772), 瑞典科学家兼神秘主义者, 他自称能将上帝的意旨显示给人类。

艺术家的那些作品。《无名的杰作》是一篇高超的不朽杰作，然而哲学家是不能跟急躁结合的，宗教感也不能跟无耐心结合。他的哲学小说只不过显示出他的头脑的惊人发达，难以相信的渊博知识，他的多才多艺和他思维的无所不包的广阔领域。他的头脑，对任何问题都能应付，只是除了宗教这个最高问题。

* * * * *

在讲故事人和思想家之间，站着五光十色的生活的观察家。他的真正专长是现实主义，他在小说里才能找到思想平衡，通过小说，他被看成那个时代的历史家。他的第一个大成功是《夏倍上校》，就在这几年当中，第二个成功是《欧也妮·葛朗台》（“Eugénie Grandet”）。他已发现写作的规律——即描写现实，但是要用更强的活力，因为典型只限于很少的几个人物。在这以前，他曾试图到浪漫主义范围里去寻找小说的本质，一方面写时代的故事，一方面采取玄幻的或神秘的内容。然而，现在，他已发现，如果从正当的角度观察，当代的景象也会充满同样生动、同样丰富的生活，还有，重要的不是题材或布局，而是内在的活力。如果作者能使人物足够紧张并赋予他们以适当的行动，同样的效果会以更真切、更自然的方式取得。活力并不存在于气氛或情节里，而

是存在于人物本身。世人本无特殊的原材料，因为一切都是原材料。在种葡萄人葛朗台的简陋屋顶下，空气也可以跟《三十岁的女人》的海盗船舱里有同样浓的火药味。当平凡而头脑有点单纯的少女欧也妮·葛朗台，在贪婪的父亲威胁的眼光下，给她爱上了的堂弟查理的咖啡杯里多放进一块糖时，她表现的勇气并不亚于拿破仑挥舞军旗冲过洛蒂桥的时候。老吝啬鬼挣扎着去战胜他兄弟的债主时，表现出同样的狡猾、机智、坚毅和天才，就象达力兰^①在维也纳的会议上。重要的并不是环境。《高老头》里的芜桂学舍(The Pension Vauquer)和那十二个年轻学生，所包含的戏剧成分的可能性，同拉瓦西埃^②的实验室或居维埃^③的书房一样多。所以，创作需要的是正确的观察，是集中，是加强，是汲取最大量的生活内容，揭示感情，暴露最强者身上的弱点，把内在潜伏着的力量发掘到表面上来。欧也妮·葛朗台就是他走上这个方向的第一步。这位朴素、虔敬女子的献身被抬高到几乎是宗教性的，而同时老葛朗台的贪婪和丑

① 达力兰 (Talleyrand—Périgord, 1754—1838)，法国政治家。

② 拉瓦西埃 (Lavoisier, 1743—1794)，法国化学家，近代化学之始祖。

③ 居维埃 (Cuvier, 1769—1832)，法国著名生物学家。

陋的老女仆的忠实被赋予魔鬼式的强烈。高老头对孩子们的疼爱变得着了迷，逼着他去行动。每个人物都被观察得很正确，他或她的秘密都为作者所深知。作者只须使他们一一对立，把不同的世界给混杂起来，只消按事实取其善或取其恶，接受怯懦、狡猾、卑鄙，都作为自然力量而无须道德考虑。

巴尔扎克已发现了极大秘密。一切东西都是原材料。现实就是个取之不尽的矿源。你只须从正确的角度去观察，每个人就会变成了人间喜剧的一个角色。高低之间并无区别。你能选择一切，你也必须选择一切，这就是巴尔扎克的决胜之点。一个作家想要描绘世界，那么他对世界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容忽略。社会阶梯的每一等级都应该被表现，无论是艺术家还是律师和医生，以及葡萄种植人、看门人的老婆、将军与士兵、公爵夫人与街头卖淫妇、挑水人与银行家，都无例外。所有这些范围都互相交织着。他们彼此都有联系。与此类似，各种类型的人物都应登上舞台，无论野心家或悭吝鬼，高洁之士或鬼蜮之徒，勤俭者或败家子——凡属于“人”这个品种的各色行为的各种方式，都要让他们表演。并不需要接连不断地创造新角色，因为只要用适当的组合，同一形象可以重复出现，一个或两个医生就代表一切医生，

一位银行家就是所有银行家的样板，这样，就可以在一部小说的范围里压缩大量材料。巴尔扎克越来越清楚，如果要把如此丰富的素材加以控制，他就该定下一个工作计划以占有他后半生的整个时间。他不应只把他的小说一部一部单独地安排，而应该使它们嵌合为一个整体，他要成为一位“司各特兼建筑师”。单创造出一幅幅“独个生活的图画”，那是不够的；因为最重要的是作品之间的互相关联。

巴尔扎克这时还没有很好地认识到他的《人间喜剧》所包容的整个范围。又过了十年时间，他才使他这个计划在脑子里清楚地固定下来。不过，有一桩事情他是确信的。他的全集不应是一本本孤立的作品的拼合，而应该以系列性的步骤把它建造起来。就在一八三四年十月二十六日那天，当时他还不知道他的工作将具何种规模，他就给他希望所寄的规划勾出了一个轮廓：

到一八三八年，巨大工作中的三个部分将完成到这种程度，使人至少认识到这结构的计划，而对概念的全貌有所判断。……在“风俗的研究”中，社会情况的一切反响都要描述。我打算描绘生活中每一情景，每一姿容，每一种男女

性格，每一种生活方式，每一种职业，社会的每一阶层，法兰西的每一省份，生活的童年、盛年和暮景，政治、法律和战争——不得疏漏一项。这一点做到了，人类心灵的故事一丝一缕地被揭出，社会历史的各个分枝也展开了，这之后，基础才算奠定。我并不希望描写那些渊源于想象的插曲，我的题材都是各处实际发生的事迹。

然后，就进行第二阶段——“哲学的研究”。效果的描写之后应继之以原因的描写。在“风俗的研究”里，我将说明感情、生活和生活的结果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哲学的研究”里，我将谈论感情的来源和生活动力的成因。我将提出一个问题——只要缺了它们，社会 and 个人的生命就不能延续下去的那些作用力量，那些条件，究竟都是什么？用这个方式讨论了社会之后，我将用批判的眼光去考察它。在“风俗的研究”里，个人将作为类型来描写；而在“哲学的研究”里，这些类型又将作为个人来描写。不过，我所描绘的永远是生活。……

最后，继原因与效果的描述之后，要进行的的就是“分析的研究”了，其中一部分就是《结婚生理学》，因为在效果和原因之后，我们就应追

求原则。风俗提供戏剧，原因表现了幕后和舞台机构，最后就是原则，换句话说，就是戏剧的作者。不过，在比例方面，当整个工作象是以一系列螺旋形向上升高时，它就变得狭窄，变得集中了。如果“风俗的研究”需写二十四册的话，那么“哲学的研究”我将写十五册，而“分析的研究”只需再有九册就行了。用这种方式我可以描写、批判和分析人的本身，社会，人类，而不必在作品中多所重复，这部作品将成为西方的《天方夜谭》。当这一切都完成了的时候，……当我写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这时，人们可以认为我或者做对了，或者做错了。但是，在获得这个文学成果之后，在完成整个体系的这一描述之后，我将转向科学方面去写一篇《人所赖以推动的力量》的论文。并且在这座巨厦的基础上，作为孩提和幽默的装饰，我还要画出那部《笑林百篇》的巨幅蔓藤。

带着对自己从事的事业的惊人热情，他喊道：“这是我的工作，一个深渊，一个火山口，它在我面前张开了。这就是我要加工的原材料。”

他面前摆着毕生的工作，这个认识决定了巴尔

扎克的未来的道路。一八三三年九月，他以高度的自信写道：

“我将统治欧罗巴的文化生活而一无对手！再有两年的工作和耐心——那时我将踏过那些人的头顶，他们是曾想捆绑我的双手，阻止我前进的！在迫害和不义之下，我的勇气已经坚硬如青铜。”

意识到前有工作，后有读者，他下定决心不与任何人谈判。他再也不去迁就出版商和报纸编辑的愿望了。琐碎的烦扰和刺激对他已不起作用。他对出版商口授条件，如果这些人不能完全答应他的要求，他就毫不犹豫地另找他人。即使经济状况极为困难，如果他们自由处置他送去的稿件，他也放弃同最有影响的杂志合作。他还盛气凌人地不理睬新闻记者，这些人相信他们是控制舆论的。让他们去指摘这一部或那一部小说吧！要阻止他那包罗万象的巨厦的完成，他们可没有力量！巨厦比各个构成部分重要得多。让他们攻击他吧，让他们在卖弄小聪明的短栏里取笑他吧，让他们用恶意的传闻和漫画来讥笑他吧！他将在小说里进行报复，揭破这一派系的势力与无

能。在《幻灭》里，他用抹不掉的线条在世纪的墙壁上作画，画出他们系统地败坏舆论，嘲弄名誉和精神的價值。虽然债主们可以用赎回期票和法律诉讼来苦恼他，虽然他们可以没收他的家具作为抵押，他们却决不能从他所建设的世界取走一块石头或一粒砂土。计划既已定妥，任何东西都无力再使他动摇，因为他确实感到有一种内在的力量足以完成这一项工作，这项工作唯有他才敢于计划，唯有他才具有这种天才能够使之完成。

第 三 卷

巴尔扎克的生活稗史

第十一章

不知来历的女郎

巴尔扎克并无幻想，他知道，如果他想“在欧罗巴的文坛上领先，取得拜伦、司各特、歌德和霍夫曼曾经占有的地位”，摆在他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他本来算计他至少能活到六十岁。在剩下的三十年左右光景，恐怕他每一天都得花费在书桌旁边，不会有多少空闲用来寻求欢乐和个人享受。就是到了后来债务终于偿清，金钱滚滚而来，还是没有多余时间用来享乐。他也知道，在这种克制上他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但他并不畏惧，因为他在工作中得到了欢愉。

为了达到目的，他还需要一件东西——脚底下一小块结实的土地。他已投身于需要他付出全部精力的事业了，对生活上最低需要的追求也就越来越

感到强烈，越感到躁急。他需要妻子和家庭，需要解除肉欲的苦楚、债务的烦恼，同出版商的斗争，以及不得不预支未脱稿的书籍的稿费。他希望能把一切力量集中在他的巨著丰碑上，“它之所以能传之久远，更多的是由于面积庞大和材料积累，而不是因为结构美丽”。为了获得心灵上的平静，使他将一切努力献给事业，他应该找到已是他长久以来所追求的目标——妻子和财富。

他非常清醒，不至于不了解他的平民外表和姿态跟沙龙里的文雅常客们对比是十分不利的。德·杜鲁米利小姐已经拒绝了他。他同德·葛斯特利夫人的来往已经教训了他，即使他那最痴心的进攻也不会具有诱惑性。他一来太骄傲，二来太害臊，更舍不得把时间花费在烦人的求爱上。德·柏尔尼夫人，尽管已是五十四岁的年纪，却不大愿意为他选择一位接替她的人，这当然是容易理解的。而珠儿玛·卡罗，也难得在她的外省圈子里有机会为他找到具备他的必要条件的阔绰的贵妇人。他的希望只能靠奇迹来实现了。因为他既没有时间，又没有勇气，也没有机会，去物色他所需要的。那么他梦寐以求的女人就必得自己走来了。

按照逻辑，本不该这样期待的；但在巴尔扎克的

一生中，那种不大可能的事情却经常发生。女人们并没有当面认识他，也许正因为并不认识他而对自己心爱的作家抱有浪漫观念，她们还真地来到巴尔扎克的身边。一次又一次他收到女性读者的来信，其中很多信还保留至今。这些读者怀着好奇心，有时还怕冒风险。德·葛斯特利夫人并不是唯一靠邮递员来搭上交情的女人。有许多位钟情的女性朋友，关于她们我们多半只知道教名，都在通信之后亲身来拜访过巴尔扎克，而其中的一位，我们已经指出过，还给他生了一个孩子。在这些函件中，是不是有一天终于有一封信会导致永远的爱情而不是短暂的私通生活呢？这正是为什么巴尔扎克阅读女性崇拜者的这些来信非常细心的缘故。这些书信加强了他的感觉，知道自己在女人身上是举足轻重的。每当一封信的语调或某一个特殊语句唤起了他的好奇心，他就回答得相当详尽。当这一类通信到来时，就好象有一种甜蜜销魂的清香突然浸透他那间与世隔绝的重帘密障的斗室了。这要比任何批评或者其他公众的鉴赏都更生动地使他深知，有一种震颤从他身上发射出来，对此女人们是特别敏感的。

有一天，他桌上放着一封女人笔迹的厚厚的信，寄了好几个星期才到达他这里。信是从俄罗斯寄来

的，封口处有印章，标着 *Diis ignotis*^① 字样，还有“*L'Etrangère*”（不知名的女子）的签名。不过，这封信是在一个不祥的日子来到的，那就是一八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这一天巴尔扎克收到德·葛斯特利夫人的第一次邀请信，请他到卡斯特兰宫去拜会她。所以他把信留在桌上没有拆开。可是这封信对他今后的生涯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这封命数攸关的信件背后有一篇奇异的故事，连巴尔扎克自己也不能给一篇浪漫爱情故事发明出比这更有戏剧性的、更带异国情调的序幕了。场景置于沃尔希尼亚（*Valhynia*）的一所乡村别墅里，这是贵族的迂回曲折的宫邸之一，由于完全与外界隔绝而给人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邻近没有城镇，甚至连个象样的村子也没有，只有农奴低矮的茅屋。四周，目力所及之处，伸展着广阔的沃土和乌克兰的无尽森林，都是属于阔绰的俄属波兰男爵温西斯拉夫·韩斯迦的。

这座俯控农奴陋室的贵族宫邸以欧洲所能提供的一切奢侈品给装备齐全了。它有名贵的绘画，丰富的藏书，东方的地毯，产自英格兰的银盘，来自法兰西的家具，出自中国的瓷器。马厩里充满了马车、雪

① “不知名的神”。

橇和马匹。只是，整群的农奴，屋内屋外的仆从，还有侍童们、厨师们和女管家们，都不能保护韩斯迦男爵和他的妻子，耶威林娜·韩斯迦，去抵抗最残暴的敌人，抵抗那隔绝尘世的孤寂的烦闷。德·韩斯迦男爵刚刚五十岁，不很健壮，同邻居们的生活不大一样，因为他既不是热中的猎手，也不是坚定的赌徒，或粗暴的酒鬼。对产业的经管不能鼓舞起他的兴致，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拿他所继承来的几百万怎么办。甚至他作为几千个“灵魂”的主人（“灵魂”是俄国沙皇时代对农奴的称呼），也不能使他平凡的灵魂得到快乐。他的妻子，由于得不到任何刺激和文化交往方面的一无所有，所感到的烦闷就比他尤甚。作为一位卢赤芜斯迦女伯爵，她曾有著名美人之称。在她那属于波兰高级贵族的父母家中，她已学会了把文雅的社交看成必要的事。她操法语、英语和德语，对文学拥有高深修养，许多嗜趣都属于西欧世界的，可惜的是，这个世界现在却远得可望而不可即。

在维埃曹尼亚就找不到一个人可以满足她在文化的刺激和友好的谈话上的需要。邻近地产的业主们都缺乏文化教养，对心灵上的事物不感兴趣，而被德·韩斯迦夫人请到家里来作伴的两位穷亲戚瑟维玲和登尼斯·维尔辛斯迦也贡献不出什么来。房子

本已过于宽敞，而包围着房子的岑寂自然就更显得宽阔无边了。一年里有六个月，房子都被白雪所封蔽，俨然是一件脱不下来的白色棺罩，而从来没有一个客人上门。到了春天，他们就旅行到基辅去参加一次舞会，每三四年他们或许去一趟莫斯科或圣彼得堡。除此之外，日子都过得荒凉而空虚。结婚后十一年，耶娃·德·韩斯迦夫人奉献给大约比她大二十五岁的丈夫七个孩子，——或者，按另外一种算法，属于男爵的只能说是五个——其中，除了一个以外，全都死掉了。男爵已未老先衰，而她自己却只有三十岁，她在这个年纪得说是一位体态匀称、颇有魅力的妇女，虽然稍嫌胖了一点。然而过不了多久，她也会容颜渐老，生命也会渐渐消逝的。

与冬天的冰封雪盖和夏日的无垠田野所构成的单调景色相映衬，同样的无边烦恼也笼罩着这所房子。在一个星期当中，居停主人所能热情期待的唯一事情就是邮件的到来。那时候俄罗斯还没有铁路，每七天一次有雪橇或马车把珍贵的物品从远远的几乎是传奇式的“西方”送来。这是一桩多么重大的事啊！韩斯迦夫妇订阅了检察机关所允许的一切外国报纸，尤其是巴黎保守派的《每日新闻》（“Quotidienne”）和法兰西现行的所有文学杂志。他们的书商还按期寄来

一切重要的新出版物。由于距离遥远，每天发生的平常事件竟赋有重要意义，于是，巴黎人用无精打采的眼光去流览的报纸，在这里竟被人们聚精会神地从头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书籍也是一样。没有哪家杂志象这个处在欧洲文化边缘的远离尘世的家庭，这么详尽地批评或讨论最新的出版物。每到晚上，韩斯迦夫人跟她的两个外甥女和女儿的瑞士女教师亨利爱特·保埃尔小姐，总一起坐下来交换对于日间阅读的意见。有的时候，虽然不很经常，她的丈夫，或者她的兄弟，如果他碰巧来探视他们，也参加聚会。他们为赞成什么或反对什么而争吵，直到巴黎报纸提到的各色细小消息都已用热情的关注分析完毕。他们都屏住呼吸去讨论演员们、作家们和政客们，仿佛这些人都是神物，非世俗常人所能接触的。

在一八三一年冬日长夜里的某一晚，讨论特别炽烈。他们为一位新近在法兰西成名的作家，一个叫做什么奥瑙利·德·巴尔扎克的在争论。他的姓名挂在每个人的嘴边，女人们尤其被鼓动得热情大发或者大为嗔怒。他刚写成一部宏伟著作《私人生活之场景》，以往还没有哪位小说家曾经如此深刻地看透女性的灵魂，也没有对寂寞、失望的女人表示过这样的同情。他对女人的过错和弱点表示了什么样的感

人的宽容啊！不过，又有一件难以置信的怪事，象他这样有细腻感觉的人，竟同时又出版了一部叫做《结婚生理学》的书，充满了可憎的讽刺和玩世不恭！一位如此洞察女性气质的作家怎么会把身分降低到如此地步，去把整体女性用作嘲笑和戏谑的对象呢？然后还有他的新小说《驴皮记》，这无疑是一部杰作，但是巴尔扎克怎么能够让可爱的青年主角，他被象保琳这样的高贵姑娘所爱，只因为福多尔伯爵夫人这么一个冷酷的社会妖精的缘故，竟放弃了保琳呢？不！象德·巴尔扎克先生这样的天才应当对女人有较好的意见。他应当只描写象《私人生活之场景》里的那种高贵灵魂，而不该把才能浪费在象福多尔伯爵夫人这样的女人身上，更不必提那种轻浮的狂欢痛饮的筵席了。多可惜啊，他竟不能忠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优点！该有个人来指导他，把他领上正路！

“好吧！”一位在场的女士提议。“为什么不该咱们自己来呢？我们就给德·巴尔扎克先生写信好了！”其他的女士们有的大笑，有的愤怒抗议。不，一定不可能这样做！如果他的妻子竟与巴黎的一位古怪绅士写信，那么德·韩斯迦先生会说些什么呢？人们不应当危害自己的名声，因为据说德·巴尔扎克先生是位年轻人，而且他既然轻浮到写出一本《结婚

生理学》的程度，谁还能信得过他？总而言之，谁能知道那样一位法兰西人，当他收到这么一封信时，会干出什么样的事来！可是，所有这些猜测和顾虑，都只能使这个冒险念头越来越引起兴奋，于是最后他们决定给他送去一封联名信。如果这位既崇拜女性而又在同一的口气里去开女人玩笑的神秘作家，自己这一次也换换口味，居然也会不知所措，那倒真是一个好玩的主意。所以她们就合谋编造一封信，很浪漫又很伤感，采用浮夸的语言，还到处插进甜蜜的钦佩字眼，简直是一封字谜，足以使他大费力气去猜解。当然，这封信不应当由德·韩斯迦夫人来签名，也不应由她执笔。或者由她的兄弟，或者由女教师保埃尔小姐抄写。为了增加德·巴尔扎克先生的迷惑和进一步逗起他的好奇心，便在信上封口处印上 *Diis igno tis* 的标志。他一定会想象自己是受到“无名的神”的敬重，这些神明要领导他去实现“真我”，而不要让他觉察出：真正的崇拜者是尘世上的某一位德·韩斯迦夫人，她已经有了一位凡间的丈夫。

不幸这封信并没有流传下来，我们只能揣测它的内容。不过，有另外一封信还可以看到，也是那个时期写的，那一段时间里凡署名“不知名女郎”的信件都是由德·韩斯迦夫人和她在维埃曹尼亚那个欢

乐的小团体共同写作的。后来，当通信进入更严肃的阶段，她当然就克制自己不做这一类的倾诉了——

“自从我读了您的作品那一刹那，我就把自己跟您及您的天才等同起来。您的心灵站在我面前，光华璀璨。我一步一步追随着您前进。”

或者是——

“在我眼中，您的天才显得多么高超——但它应当是神圣的。”

或者是——

“在作品中，您只消几句话就写出了我整个人的基本存在。我崇拜您的才能，我尊敬您的心灵。我愿意给您当妹妹。”

不过，这肯定是与第一封匿名信相同的基调。因为你从每一个字上都会觉察出这些策划人是如何由衷地称赞她们所写的每一个夸张的语句有多么成功。而当这信到达收信人手中时，它的神秘风味大概

会收到更高的效果。这种由衷心的赞许、恶作剧以及带着稚气的幽默炮制成的大杂烩，不能再好地完成了它的使命。因为巴尔扎克果然受到嘲弄，大感迷惘。女人寄来的过分热情的书信，就他本人来说，倒算不上什么异常现象；但是，这些信件一向都发自巴黎，或者，即使最远也不过来自法兰西的外省。在那个时候，一封来自乌克兰崇拜者的信，要比今天一封来自南洋群岛的信更使人惊愕。巴尔扎克想到他的名字已经在声望的翅膀上被送到如此遥远的地方，不禁满腹骄矜。直到此时为止，他虽然影影绰绰知道他的作品已在国外唤起人们的兴趣，但他却一点也不知道，就连伟大的歌德也正在魏玛城同艾克曼^①讨论《驴皮记》。正象他第一次收到德·葛斯特利夫人来信的情形，他又呼吸到贵族的醉人馨香了。只有俄罗斯的贵族才能写出这样完美的法文，只有阔绰人家才出得起从巴黎按期把最新出版物寄到遥远的乌克兰旷野里所需的昂贵邮资。巴尔扎克的想象力又开动了。他的不知名的通信人一定是年轻、美貌、出身高贵的。没有多久，他就毫不含糊地相信她至少是一位公主。在第一阵受到吹捧的兴奋的陶醉中，他告诉知心朋友们关于一封“俄罗斯或者波兰公主写来

^① 艾克曼（Eckermann，1792—1854），德国作家。

的神圣的信”，这封信他拿给珠儿玛·卡罗——也许还有旁人——看了。

巴尔扎克从不会让一位公主等待回信的，可是这位匿名的崇拜者既不具姓名也不写地址。即使在很久以后，她还明确地说，“我是您的‘不知名女郎’，我将终身如此。您永远也不会知道我是谁。……”

所以，他怎么能写信去感谢她呢？似乎没有任何办法去接触她了。最后，他想出一个巧妙的主意。《私人生活之场景》的增订新版正在排印，他所增加的故事之一，《赎罪》（“L'expiation”），还没有说献给谁。他给印刷厂家送去一个条子，指示他在扉页上把那个纹章和题字摹印上去，“Diis ignotis”，并在下面标上日期，“一八三一年二月二十八日”。这书她一定会从书商处及时收到，等她看完新书后，她就会发现他以多么精巧的慎重态度选择了这个方式去感谢她。他要以王子的方式去回报王子方式的敬意。

不幸得很，德·柏尔尼夫人仍在好心地为他做阅读清样的工作。她显然不欢迎什么“不知名的神”，或者毋宁说是女神，去侵入她的被保护人的生涯。由于她的急切愿望，“我内心感情的无声象征”在最后付印前给删去了，于是维埃曹尼亚那个恶作剧的妇

女小组就长久不得知道她们的神秘书信早已搅动了巴尔扎克的丰富想象，大大超过了她们所期待的程度。

她们并未曾期待回信。她们向天空射出一支箭，并不等待是否有射中鹄的的消息。有两三个星期，她们就靠揣测这封信对德·巴尔扎克先生可能产生的效果来排除厌倦。她们既用以自娱，又借此发明更多的办法去刺激他的好奇心，去鼓励他对自己真正使命的感受。她们又写了第二、可能还有第三封信。其中一个目的至少达到了，她们发现了一个可以代替恩布尔牌，或惠司脱牌，或巴西恩斯牌的游戏，那就是——给德·巴尔扎克先生写信。

这个游戏饶有趣味，但是跟所有的游戏一样，它最后总要使人厌烦，除非把赌注加大。逐渐地，她们怀疑她们以那么多的技巧、聪明和有趣的幽默写成的信，是不是真的到达了目的地。也许有可能用个什么方法去查明，德·巴尔扎克先生究竟是感到生气呢，还是以为别人在捧他。凑巧，德·韩斯迦夫人跟她丈夫计划春天到西欧去旅行。也许从瑞士继续通信会更容易些，甚至还可以从这位著名作家那里收到一封回信。

好奇，同需要一样，也是发明之母。十一月里，

德·韩斯迦夫人跟她的知心人们共同决定，再寄出一封匿名信。这是传世的第一封。在通常的热情洋溢和精神交流的一番确有自信的言语之后，一次挑战置于命运之前。德·巴尔扎克是否愿意从不知名的通信人那里收到更多的书札，是否“有心接触永恒真理的神圣火花”？在感情冲动的辞藻洪流之后，她就向他提议，他无论如何应该表明这封信是否到达。由于她仍然不愿让他知道姓名或地址，她就提出一个当时甚不寻常的方法，就是在报纸上登一段个人启事：

“在《每日新闻》上登出的您的一句话就可以使我确知您已经收到了此信，并使我能够安心再给您写信。请在启事上这样签署：致‘不知名……’……奥·巴。”

德·韩斯迦夫人一定感到心中的奇异颤抖，当她一八三三年一月八日翻开十二月九日的《每日新闻》并在广告栏内读到：

“德·巴先生收到了给他的信。直到今天，他才能借此报纸之助，宣告此事。他极感遗憾，

不知应将答复送至何处。致‘不知名……’……
奥·德·巴。”

在第一阵感情澎湃的汹涌下，她无疑因为伟大的巴尔扎克表示了给她写信的愿望而深感愉快。可是第二个感觉必是羞愧，巴尔扎克竟然被引诱，认真对待维埃曹尼亚那个家庭圈子有意夸大其辞的情绪。情况已经越过幽默阶段，颇有危险了。她的丈夫，一位思想刻板的乡绅，名誉感甚为强烈，却一直蒙在鼓里，完全不知道他妻子、妻子的两个外甥女和瑞士女教师所耍弄的把戏。只要“不知名女郎”仍是代替四个联合起来耍把戏的女人的假名，这场把戏还不致有什么害处。如果她现在打算进入严肃的通信，这事就得瞒过丈夫，也不能让一直充当同谋者的人们知道。

德·韩斯迦夫人忧心忡忡，她有一种恶兆，感到她即将从事一场冒险，跟她的地位和个人节操甚不吻合。然而偷尝禁果又有爽心的满足，而且期待作家的亲笔回信，这个诱惑也很难抵制。何况她又不是麻木不仁，对于在想象中看到自己充当了巴尔扎克小说的女主角，还是感到兴奋的。

因此在短时间内她拿不定主意，一般女人总会

这样的，她也只好推迟那不可避免的决定。这事是不假的，她还当真立即给巴尔扎克寄去回信，但这封信的口气却跟前面的很不相同。她回避了迸发性崇拜的更多吐露，只通知他她的打算是在不久的将来出门旅行，这将使她接近法兰西国境。虽然她有继续通信的愿望，但只能在她确信并无危险，不致因任何疏忽行为而使她个人受到危害时，通信才可实行：

“我很希望收到您的回信，但我必得非常谨慎。很有必要选择许多迂曲方法，所以我还不能冒险向您作出有约束性的许诺。另一方面，我也不愿意在我的通信问题上老处于无把握状态。所以我请求您尽快地让我知道，有什么样的可能性使你我之间能进行不受阻挠的通信。我完全相信您的保证，说您决不企图发现您的信件的接受人的姓名，因为如果我给您写信这事被人家知道了，我将会垮台的。”

这是用完全不同的腔调写的。这才是德·韩斯迦夫人自己，我们由此第一次推断出她的某些真实性格。她是那种女人，即使要投身于冒险，也会保持清醒头脑。如果她走上错路，她也是骄傲地昂着头，

完全能够指挥自己的机智。

事态的新转机，特别是，包括着同她的自傲的斗争。自从巴尔扎克在《每日新闻》给她回了话，她的好奇、虚荣与好赌博的本能三者的结合，就促使她以更亲密的方式跟他通信。但是一封从巴黎寄来的信却会成为维埃曹尼亚的非常稀罕的事情，决不会不引起注意就到达她的手中。每当邮差到来，全家上下都兴奋不已。收到随便什么信件或邮包的人都是旁人的嫉妒对象。所以根本没有希望能够把什么东西走私进来而不让丈夫和亲戚知道。她必须让一个第三者参与秘密，要找一个没有问题的适合她的愿望而又绝对可靠的人。

有幸的是，手边就有一位这样的十全十美的人，这就是她女儿的女教师，亨利爱特·保埃尔，爱称莉勒黛。这人出身于新沙特尔一个虔诚的中产阶级家庭，已经为德·韩斯迦夫人服务了好几年。她生活在远离亲戚朋友的地方，没有机会遇见男人，所以十分忠实于她的主人和他们的女儿。在她所隶属的那个小圈子里，作为游戏而写成的开头几封信，就是由她执笔的，我们这么说大约是比较可靠的。当德·韩斯迦夫人决定要使通信多带一点私人接触的色彩，而又不让两个外甥女知道的时候，由莉勒黛来当一个

中间人，是再合适不过的了。谁也不会想到，来自巴黎寄给亨利爱特·保埃尔的信居然会出于巴尔扎克之手。也无须怀疑，这位虔敬、单纯的年轻女人一定会同意这一花招，因为她决不会透露任何迹象，表明她为女主人所做的事情已然超出天真的好意。由于她对德·韩斯迦夫人的忠诚，从而导致她做了一件至少是对男爵甚不忠诚的事情。属于职责上的这一矛盾，当时她虽不曾觉察，而到后来，在德·韩斯迦夫人和巴尔扎克的关系带上了“有罪的”性质后，好象就扰乱了她的良心。在后半生，她因为曾充当过一桩以通奸为结束的欺骗事件的媒介，而一直受到罪愆感觉的压抑。感情上的冲突似乎在相当早的阶段里即已形成，所以她后来从未克服她对巴尔扎克的私下的嫌怨，而巴尔扎克方面，却在《贝姨》（“La Cousine Bette”）中使她流芳百世。德·韩斯迦先生逝世时，她那抑制着的犯罪感就从禁锢中爆发出来，葬礼刚一完毕，她立即宣布不能再留在这个家庭。为了忏悔她曾经帮助过别人去犯了一次重大罪过，她便托身于一家修道院中了。

正是亨利爱特的默许，使得定期的通信成为可能。对方吩咐巴尔扎克回信时用信封上的地址；而德·韩斯迦夫人，着迷于她所玩弄的危险游戏，越来越

心焦地等待着，看他到底会不会回信。

当回信不是一封，而是两封连续到来时，她的惊奇是可想而知的。其中一封（从这封信开始了以后的书信往还，因为它已流传到我们手中）存在着这样的预期：使维埃曹尼亚的主妇既能被激动，又会被触恼。对于来自对方的那些迸发出来的文句，巴尔扎克先是非常严肃地对待它们，并且据他说，“尽管朋友们常常提醒我，要在通信中加以提防，不能轻易信任，而那种通信跟我有幸从您那里收到的却十分类似”；可是他已允许自己“委身于信任感”，并且描写了他被她的来信所挑起的热情：“您是我最甜蜜的美梦的题材。”

在后面另一段里，他采用了，甚至超过了她本人所采用的那种过分的口气，他宣称：

“假如您曾见到您的信在我身上引起的效果，您就已经看到一个钟情男子的感恩，他的铭心的信任，一个儿子依恋母亲的纯真爱情……一个年轻男人对于女人感到的诚挚尊敬，和对持久的热烈友谊的期待。”

这一类情感，是用巴尔扎克的最坏风格表达的，

颇带有他青年时代写的浪漫稗史气味，当然会深入一位寂寞妇女的头脑，而她的命运是被投掷在乌克兰的黑暗深渊里的。而他，可算是仁慈豁达惊人，要把一篇故事献给还没有见过面的她！她的第一个冲动是，以同样的坦率给他回信。可是，不幸得很，令人不快的事件给她的快乐遮上了阴云。几乎同时（究竟稍晚或稍早，我们也说不清，因为这封信没有保留下来），第二封信又从巴尔扎克那里写来，这信也是回答她上一封信的，然而笔迹却全然不同。那么，到底哪一封信是巴尔扎克所写，谁又写了另一封呢？也许，全不是巴尔扎克所写？可能不可能他打算拿她开心，送来了也由第二人或第三者写出的信，就象早些时候她那些信也是由某个起草委员会编造出来的那样？他是跟她同样在耍把戏，就象当初她耍弄他一样呢，还是诚恳的呢？她在坐立不安中把两封信比了又比。最后，她决定给他写信请他解释笔迹和语气的矛盾。

这一次轮到巴尔扎克为难了。当他给德·韩斯迦夫人写信时，工作正在忙迫之中，他忘记了已有一封，或即将有一封回信，要以他的名义寄出。当来自女性崇拜者的书信变得过多，他已无法应付时，他曾想出一条计策，既保证让这些女人心情愉悦，又不致

侵占他的宝贵时间。这些信都简单地交给珠儿玛·卡罗，由她以他的名义回答。珠儿玛，她的天性中是没有嫉妒的，住在单调的外省小城里，颇有空闲时间。她觉得，披读这些情感流泻的来信，再以巴尔扎克的特殊风格作答，是挺有趣的事。而这一事件则大约是这样，这封“俄罗斯或波兰的公主的神圣信件”不知怎么竟跟珠儿玛·卡罗手头上的工作混到了一起，于是她以通常方式，当作例行公事处理了它。

巴尔扎克知道他干了蠢事。换了旁人，不是不知所措，就是老老实实说出真话。然而巴尔扎克从来不会不知所措，也从来未曾，或几乎未曾，告诉过这位“不知名女郎”关于他的实情。一直到最后时刻，他们的通信仍然跟刚开始的时候一样，并不诚恳。对于象巴尔扎克这样的小说家来说，不可能办到的事从来不是一个严重的障碍。他以一个厚脸皮的斤斗巧妙地翻越了逻辑的关卡，请她把疑团抛入风中随其飘逝：

“你以某种怀疑让我解释我的两种不同笔迹。而事实是我的笔迹多得就象一年之中有那么多的日子。……这种多变性来源于想象力，想象力能够孕育任何观念，却又仍然无瑕如镜，使

任何反射都无从玷污。”

他坚请她对他抱着信心，绝不要有任何疑虑，以为他在进行戏弄。这位当时正在写作那本淫荡的《笑林》的巴尔扎克，竟然请求她相信，他是“一个可怜的孩子，直至将来，也永远是个牺牲品，因为他对女人的感情太纤弱了”。配合着他的自我描述，他开始羞答答地讲起知心话，谈到他的一颗“心，这颗心自始至终在全世界上只识得一个女人”。在十多张信笺上他泼出了同样的空泛的忏悔，谈论到他的文学风格，议论他的工作，这工作逼着他“放弃女人们的爱情，虽然她们是我信仰的唯一宗教”。

他提到了生活的孤单，你不得不钦佩他那细心的微妙处，他就以这种不可捉摸的微妙奏出了薄薄的爱情音符：

“你啊，我在你身边鼓翼，就象在心爱的幻想周围；你啊，你是我一切美梦里充溢着的希望，……你不会知道，当他能凭借这样一个甜姐儿来活跃他的孤寂时，这对于一个作家意味着什么。特别是这个妙人儿的形象，由于她的人品的闪烁飘忽而具有更加动人的魅力。”

甚至于在他还不知道她的姓名，也没有见过她的肖像之前，他已在第三封信里向她保证了：

“我爱您，我的‘不知名女郎’！这件古怪的事情不过是一种荒凉苦闷生活的自然结局。……如果曾经有过一个人，象这样的冒险一定要落到他头上的话，那我就是这个人。”

对这些不成熟的吐露的第一个反应，是一种不舒适的感觉。这里面带有一种紧张的矫揉造作，留下了恶劣的味道。这使你无法摆脱怀疑，巴尔扎克简直是在有意地把自己装扮成浪漫的伤感状态，距离他的真实感情实在太远了。由于巴尔扎克弃世以后，德·韩斯迦夫人曾谨慎地烧毁了她所写给他的大部分信件，因此，只从流传下来的所能体现她的书信风格的唯一例证来判断，巴尔扎克的这些信除了疯狂的奉承和令人作呕的哀怨之外，也不会还包含其它什么。在她写给她兄弟的信里，也找不到一行足以提供她杰出人格的任何暗示。而巴尔扎克本人也无意之中透露出一点端倪，否则那些事情至今是无从解释的：“我不得不为自己创造出热情来！”

他本打算从自己的生活中创造出一篇故事来。

当他最初的念头被德·葛斯特利夫人的高傲给毁灭掉以后，他就企图向他的新的崇拜者身上胡乱射击。他本能地按照时代风尚去行事，因为在那几十年的浪漫主义的年代里，巴黎和欧洲的读者一般都希望作家不仅写出带刺激性的小说，而且还要过着那些小说所描写的刺激性的生活。为了赢得读者的欢心，作家自己就得充当一篇爱情故事的主角。拜伦的冒险生活和他跟桂西奥里伯爵夫人的私通，李斯特^①和德·阿古尔夫人的私奔，德·缪塞和肖邦同乔治·桑的关系，阿尔菲耶里^②跟阿尔班尼伯爵夫人的交往——这些事件撩拨起群众的兴趣并不在他们的写作和音乐之下。巴尔扎克，他企图在社会上成功的雄心甚至于超过了创造出文学杰作的壮志，他十分渴望着不要落在同行们的后面。所以，当他把心扉敞开在他那不知名的“公主”面前并用遮遮掩掩的爱情誓言把她淹没，而不是普通人所期待的平常谢函的时候，那并不是出自天真无邪的精神，象他自己宣称的那样；而是带着建立浪漫关系的坚决意图的。他打算的是“创造”出热情来。

他给德·韩斯迦夫人的最初几封信，只有当我们将它们看成是一本小说的最初几章，那才能够理

① 李斯特 (Liszt, 1811—1886)，匈牙利作曲家及钢琴家。

② 阿尔菲耶里 (Alfieri, 1749—1803)，意大利戏剧作家。

解；因为这本小说要继续写下去的话，并非依赖他的灵感，而是依赖事态的进程。他的不知名的女主角，她模糊的轮廓在后面的几章即将描写清楚，暂时只由于一定的距离和高贵的社会地位所产生的魔术效果才被赋以魅力。男主角就是巴尔扎克自己，不过已被写成另一种腔调，变成一位徒然追求“纯洁”爱情的浪漫青年了。一直由于残酷命运才拒绝使爱情到来，这种命运在他的凄凉道路上播下的全是荆棘。

如果我们一行一行地追踪巴尔扎克向德·韩斯迦夫人所描绘的自画像，那就会呈现出如下的画面：他孤单地住在大城市。在广袤的整个世界上，哪怕连一颗可以一倾积愆的心都找不到。任凭他的心归向于什么事物，其结果终必是一场虚幻。他的梦想从未实现过。他总被人误解，没有一个人欣赏他的多情天性：“我是恶意诽谤的受害人。你简直想象不出四外播扬的关于我的恶毒传说，那些诽谤，那些疯狂的攻击。”在巴黎，在外面世界，人们都是穿过歪曲形象的透镜来看他的：“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我的孤单，我的越来越重的工作，我的悲哀。”在绝望中，他就埋头工作，好象“恩培多克勒跳进火山口^①，在那

^① 恩培多克勒 (Empedocles)，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哲学家，他投身火山口自杀。

里他希望找到安宁”。

他是一位“可怜的艺术家的”，瞧不起金钱，蔑视名誉，追求的只是爱情，犹如巴尔西发^①寻求的乃是圣杯：

“我唯一的激情是女人，而她们带给我的只是失望。……我观察过女人，研究过她们，知道怎样去理解她们，去深深地爱她们。然而落到我身上的唯一报答，就是被遥远的伟大而高贵的心灵所误解。我只得把欲望和梦想寄托在写作上。”

没有人希罕“那个憋在我心中的爱，那种为我渴望的爱，而它又总被人误解”。为什么总被人误解呢？“无疑，因为我的爱太强了。”

在另外一个场合他写道：

“我有准备遭受重大的牺牲。我准备得很充分，只梦想在一年之中仅跟一位少妇享受一天

^① 巴尔西发（Parsifal），圆桌骑士之一。按照马勒瑞的《亚述之死》和丁尼生的《国王的牧歌》所说，最后终于看到圣杯一眼。

欢乐，只要她在我眼里是来自仙境的尤物。有了这个我就满足，对这个女人我将永远保持忠诚。可是你看我，已经渐渐衰老了，已经三十五岁了，我在越来越需要更多精力的工作上消耗自己，最美好的岁月已经耗尽，而在现实中却一无建树。”

为了加速他这部小说的步伐，巴尔扎克便把自己的弹性感情加以调节，以适应，他以为应该是，德·韩斯迦夫人的品德和智慧。德·韩斯迦夫人大概对一位卡桑诺伐的进攻是不会理睬的。她所期望于一位艺术家的无疑是心灵的纯洁和虔诚感。因此他在追求一个女子的爱情时必须染上悲怆的色调。他必须加上一点拜伦式的装扮，带有某种浪漫风味的失望。可是，在这周密布置的初步遭遇战之后——在战斗进行中，他表现为一幅具有诚恳、心灵纯洁、可靠、孤单、天真等特征的画像——他就迅速地愈来愈接近高潮地走向进攻。由于技术高超，他懂得如果一本小说要提供作家所期望的那种兴奋，那它就应该尽早迈开大步。在他开宗明义的那头一封信里，女主角只是“我最甜蜜的美梦的题目”；在第二封信里，他“抚摸”她“好象一张梦境中的图画”；在第三封信里，

他就已经说了“我爱你，我的‘不知名女郎’！”在第四封信里，他爱她已经“更加深情，即使还没有见到你”，他还深信他最后终于遇到了梦中的理想女人：“真希望你能知道我用什么样的热情向着你，我久已向往的人，真希望你我知道我觉得我能够做出的献身！”

再写上两封信之后，她就成了那样一颗心，“我在那心上第一次找到了安慰”——这其实只能够说是对德·柏尔尼夫人和珠儿玛·卡罗的忘恩负义。他称她为“珍贵而纯洁的爱”，他的“宝贝”和“心爱的天使”。她是他一生中唯一的女主人，虽然他还不知道她是什么样子，甚至于也不知道她多大年纪：

“如果你要我这样做的话，我明天就把笔折成两段。将来没有旁的女人会听到我的声音。我要求你的宽容只为了我的 *dilecta*（爱人），她就象是我的母亲。她已经五十八岁了，而你还这么年轻，你是不会嫉妒她的！噢！请接受我给你献上的全部感情，请把我的感情当作宝贝收藏！关心我的美梦吧，使我的憧憬成为现实吧！”

只有她才使他认识到爱情神迹，只有她才是“第一个人，填补了一颗本已绝望于爱情的心灵的空虚”。等他知道了她的教名时，他就把自己，连同身体和灵魂，都奉献给她了，直到永远：

“只有你才能使我快乐，伊娃，我在你面前下跪，我的生命、我的心都属于你。你可以一刀杀死我，但不要让我苦痛！我以全部心灵的力量来爱你。不要让我的美丽希望成为泡影！”

如果你问，巴尔扎克怎么可能在纸上写出这样狂热的词句，这些不仅对我们显得毫不诚恳，而且连任何正常的敏悟的女人也一定会被驱走的词句？那么，唯一可用来解释的就是他正在编造一篇浪漫爱情故事，而且，正象他每次打算表示伤感时就会发生的那样，他陷入了错误感觉的精神恍惚中。他把女主角给理想化了，然后为了使图像谐和，他被迫着给自己，这个充当男主人公的角色，也绘出一幅同样理想化的肖像。仔细研究他的书信之后，你就不致被这样的事实所惊讶，即当男女双方彼此接触的前景愈来愈迫近时，他对爱情的温存欲念就越来越以更多的浓艳的和火热的腔调使之加强。他的推断是正确的。

他那貌似坦率的自我表白和热情的保证都搔着了德·韩斯迦夫人欲望的痒处，使她越发想对这个能用如此钟情口吻给她写信的人有更多的了解。在庄严宣称她要保持不知名和不可接近这个无可挽回的决定之后，她就让严格匿名的帷幕在好奇心的微风中荡开一点缝隙。德·韩斯迦先生突然发现自己正被妻子催促着要带她到西欧去旅行一次；而巴尔扎克，也在一种对他来说颇不寻常的失慎中用戏谑口吻给他妹妹写了一封信：

“你是否想到这是一件美差？把一个丈夫从乌克兰强拉出来，硬叫他远行一千五百英里，来讨好一位情郎，这个怪物；而他现在只须跋涉四百英里路程。”

就在一八三三年初，一个车队从维埃曹尼亚出发了。德·韩斯迦一家以俄罗斯贵族的方式出行，带着自己的随行车马，众多的仆役，还拖着成堆的行李。那位少不了的莉勒黛也陪着他们，好象是为了照应女儿安娜，其实乃是要继续充当通信的秘密中间人这个差事。

第一个较长停留的所在被安排在维也纳，这显

然是德·韩斯迦先生的愿望，他曾在奥地利首都度过他的少年时代，有许多朋友在那里。但是，以新沙特尔作为夏季的住处，这个选择无疑是他妻子的主意，因为此地离法兰西国境很近，非常容易到达，如果巴尔扎克真的愿意见她的话。据说德·韩斯迦先生被她说服了，理由是莉勒黛的父母住在新沙特尔，而她流落在乌克兰如此长久之后，也该得到机会陪她父母住上一阵子。无论怎样，他反正没有提出反对。七月里，他们到达了新沙特尔，在那里，他们租赁了安得利别墅，打算住上几个月。

巴尔扎克秘密地得到通知，要他住在郊镇旅舍，那儿离安得利别墅很近，在那里等待进一步的指示。他很快乐，计算着还有多少分钟，生活本身就要写下重要的一章，而这一章是应该紧接着他自己已经创造成功的浪漫楔子的——即两个灵魂的躯体上的初次相逢，他们互相各属于对方，那是上帝早已安排好的。时间还来得及送出一封匆忙的信：

“噢，心爱的不知名女郎，不要不信任我，不要相信我有什么坏意；我是比你所能想象的还要荒唐的孩子，但是我也象孩子一样纯洁，我的爱也是只有孩子才能有的爱！”

他宣称他已决心用假名旅行，以避免一切怀疑。已经安排好，他首先只在新沙特尔停留几天，然后到十月里回来住一整月。在动身之前还有一件事应该做好。一定不能让珠儿玛·卡罗和妒心尚炽的德·柏尔尼夫人知道他突然到瑞士去的真正原因。得让她们产生错觉；反正巴尔扎克从来也不会找不出借口来作解释的。他告诉她们他要到柏桑松去弄到一种特别纸张来印刷他的下一部小说。然后他钻进马车，经过了四夜摇散骨架的旅行，于九月二十五日到达新沙特尔。他筋疲力尽，甚至于没有按原来的安排去寄寓郊镇旅舍，而是马马虎虎租了福冈旅舍的一个房间。等着他的有一封信，指示他在第二天，九月二十六日，在散步场上出现，时间是一点至四点之间。他也用仅有的精力写就一纸匆忙的便条，宣布他的到来，并请求她，“为了老天爷的缘故，让我知道你的真实姓名吧！”他早已发誓永远爱她，为她去死，但是他并不知道她是什么样子，只知道她的教名是伊娃。

*

*

*

*

*

帷幕就要升起，让你看到巴尔扎克恋爱故事中最令人兴奋的场景了——两个纯洁心灵的接触。梦中的公主就要揭去面纱，呈现为尘世的凡人了。在新

沙特尔散步场上，那是以优美闻名世界的，他们的眼光将互相寻觅，终于相逢。然后又会怎么样呢？当他发现梦中的贵妇人在现实中只是一位外表平凡的妇女时，他的希望会不会粉碎呢？当她所描绘的那位虚无缥缈的作家，她本来把他想象为白皙瘦长，有那么一双忽显哀怨忽表热情的眼睛，而现在竟出现为一位红脸蛋儿的肥胖绅士，更象杜尔的酒商而不象代表世上被误解的女人走进比武场的一位文学武士，她的感觉又当如何呢？他们会不会各人都躲避对方的眼光，还是双方都深感亲切？他们的第一遭彼此相认的表示是什么，从嘴唇上掠过的第一句话又会是什么呢？

太不幸了！后世在这桩重要事件上并无记载，只是有几种传说。其中之一宣称，他事先已在她的安得利别墅瞥见她一眼，看到她跟他预先所设想的完全相象而大喜过望。另一个说法则认定，她根据他的肖像图片立即认出了他，毫不迟疑地立即迎上前去。依照第三个说法，当她看到他那平庸的外表时，简直不能掩饰她第一下失望的打击。不过，这些都是后来编造的，不足为凭。我们确实对任何事都不清楚，除了一点，那就是在他们第一次秘密约会时肯定已经策划好了一个聪明的方案，通过这个方式他们可以正

式会晤，让她把他当做一位社交场上的朋友介绍给并无狐疑的丈夫。不管怎么说，反正巴尔扎克当天晚上就以应有的庄严态度被介绍给德·韩斯迦一家。但他并没有立即进行他期待已久的向“心爱的天使”去表示奔放的激情，他发现自己光是在跟德·韩斯迦先生和他的外甥女周旋了。

德·韩斯迦先生是一位寡言而有点古怪的人，但他却很有教养，对于文学成就和社会成就都极为尊敬。得到机会同这么著名的作家会晤使他极为快乐，他也就倾倒于巴尔扎克绚烂的谈吐了。他一点也没有想到可以有什么嫉妒的理由，因为他丝毫也不怀疑，他的妻子，这位卢赤芜斯迦伯爵小姐，竟会是接受这样一个其貌不扬又肥又胖的中产阶级作家的狂热情书的对象。他非常恳切，邀请巴尔扎克下次再来，他们一块儿散步。不过，这种款待热情对于一个急不可耐的情人却是极为不便的，他忍受了四大四夜嘎吱嘎吱的马车并不是就只为了得到给德·韩斯迦一家大讲文学轶事的快乐的。他一直如坐针毡，非要从九天之上摘下他的“北极星”，把她抱在怀里不可。

只有两三次德·韩斯迦夫人设法规避家里人的眼目，陪了巴尔扎克短短一个小时。他怒气冲冲地写

信给他妹妹：“她可恨的丈夫五天以来就没有让我们单独留下过一秒钟，他总是在妻子的裙子和我的坎肩中间摇来晃去。”

无疑地，虔诚的亨利爱特·保埃尔，在分隔他们这件事上也有她一份。他们所能成功地做到的只是在湖畔某个幽静地方，在散步场的阴影下短暂地密谈。然而出乎他的意料，——他后来坦白地告诉她：“我本来还怕你也许觉得我没有吸引力！”——他在前哨战里已获得小小胜利。在她那遥远的乌克兰城堡，她还从来没有碰到过人类中竟有这样火热的英物。她倒能使自己的良心平静，说服了自己，认为这样一个敏感的灵魂决不应当因她这方面的残忍表现而搞得他心烦意乱，所以她允许他来向她求爱，甚至还让他在橡树的阴影下偷去一吻。爱情的这个初步保证，足以鼓励即使比巴尔扎克还不乐观的求爱者也会希望更大的好事还会再来。

在欣喜若狂中他驰返巴黎。又一次不能入睡的四天四夜，作为露天乘客，跟一群同样肥胖的旅伴挤在很不舒适的马车顶上，也没有挫伤他的锐气。比起他的瑞士之行所获得的无比欣悦的成功来，这不过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小小不适。一切期望都已超过预想。如果他自己曾经发明拿她来充当他本人的一篇

小说的女主角的话，那么他的至今不知名的通信人对于他的这个计划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她不象他从前的恋爱对象，因为她还没有到达中年。作为对他欺骗她的报复，她已试过让他相信她只有二十七岁，虽然这当然不是真的，但她也决超不过三十二岁。加之她有一个值得追求的美丽的的女性身材，意大利人所谓的“un bel pezzo di carne”（美丽的一块丰腴佳肴），而且是大开胃口的一块。如果巴尔扎克以其夸张的艺术本领把她描写成“美貌的杰作”，那也不会使我们惊异。维也纳的微型肖像画家达芬格尔^①画的一张肖像证实了在巴尔扎克眼里大受赞赏的特征：

“世界上最美丽的黑头发，细腻浅棕色皮肤，迷人的小手，眼色郁闷，睁圆了却发出妖娆的光辉。”

另一方面，达芬格尔这幅颇带奉承的肖像却显示出吓人的丰满倾向，双重下颌，丰厚的臂膀，肥胖得可观的身材，很小的暗色眼睛，目光蒙眬，这是在高度近视者的脸上你会经常看到的。面孔上毫不表

^① 达芬格尔（Daffinger，生卒年不详），维也纳专画微型肖像的画家。

现明确的性格，虽然显得胸有城府，而且掩藏得很秘密。不过，倒不光是肉体上的美丽光艳捕获了巴尔扎克。他发现的是一位真正的 Grande dame（伟大的妇人），有教养，读书多，懂多种语言，有聪明才智，风度焕然，给巴尔扎克这个平民以强烈印象。她出自波兰贵族最显赫的家族之一，她的一位曾姨母玛利·勒辛斯迦曾做过法兰西的皇后，所以他曾被允许偷吻过的那副嘴唇，应该给他一种特权——至少他自己相信——去称呼法兰西国王为“我的表哥”。

然而即使是这样，也并非最后的神迹。他就要拿来戴在额头上的王冕乃是纯金制成、外嵌宝石的。不错，德·韩斯迦夫人的丈夫并不是亲王，甚至连伯爵也不是，如他私心所想象的那样；然而她丈夫却另有一个重大优点——这是巴尔扎克估价中最高的。他家藏万贯。他确实拥有巴尔扎克只能在小说的纸面上虚加传播的几百万家财。他的财产形式是可靠的，俄罗斯的债券，田地和森林，房产和农奴。他的妻子——或者说，他的遗孀——到了一定时候就能顺当地继承。于是，巴尔扎克发现，就是德·韩斯迦先生也天生有许多值得尊敬令人嘉许的品质。第一，他比他的妻子大上差不多二十五岁。第二，她并不十分钟情于他。第三，他的健康状态也多有不足之处。

自从他在莱斯底居耶尔街过着清贫日子以来，巴尔扎克从也没有停止过梦想终有一天能由于鸿运降临而万事亨通。这鸿运足能将那疲劳、忧愁、屈辱的生活如魔术般地变成富裕、奢华、有空闲去写作的生活。现在，这个远景已被送入可能实现的范围之内了，全靠跟一个女人的新奇的冒险遭遇，而且，这个女人在肉体上很吸引他，而她本人对他也并不失望。从这一刻起，他就贡献出全部的忍耐、坚毅和精力于赢她到手这一任务。时机已到，那位德·柏尔尼夫人，她曾是他“从现在直到永远选中”了的，却该退休了。他的“北极星”即将以无比的光辉照耀天空——“这位心爱的，这个世界为我保留的唯一女人。”

第十二章

日内瓦

新沙特尔之行属于策略上的勘探性质。他已视察了地势，确认情况有利于最后进攻，但是为了使对方削弱防卫和被迫投降，他有必要返回巴黎来筹办军火。如果他打算再次扮出情郎角色，充当娇惯女人的求婚者和她的阔绰的丈夫的尊贵朋友，他就得以足够的派头生活，住上高雅的旅馆，崭露出峥嵘头角。他知道他下的赌注是什么。这桩艳遇，开始就极有希望，大有物质利益和社会利益上的远景，于是他加倍努力，以求达到目的。他写道：“这里一些朋友，看到我表示出的猛烈决心，至感不解。”这并非夸大其辞。

他仍然受到无从摆脱的重债的压榨。但他又一次靠发现了一位出版商而得以稍苏喘息。这是一位

名叫柏谢的寡妇，她计划付他两万七千法郎，为了刊印他那十二卷《十九世纪风俗的研究》（“Etudes de mœurs au 19ième siècle”），这书的一部分就是《私人生活之场景》加上《外省生活之场景》（“Scène de la vie de Province”）和《巴黎生活之场景》（“Scène de la vie Parisienne”）的新版。他再次接受还没有动笔的作品的预支稿酬。但无论如何，在那些日子里，这总算是最优厚的合同了。他高兴地喊道：

“这事会在这个恶意嫉妒的和愚蠢的世界上得到回响。这事定会激起所有那些人的怒气，他们会肆无忌惮地相信，他们定能探得我的隐私。”

他现在的情况至少已可以去满足那些追索得最急的债主，虽然他还是欠着母亲和德·柏尔尼夫人的债。虽然他的欢呼还是有点过早，——两星期后，他又宣告：“星期四我应付还五千法郎，而我的确已莫名一文了。——可这事并不使他发愁。正如他自己说的，他已习惯于“这些小枪法”，他也知道用两三个月的艰苦工作，就能赚到很多的钱。他即将进行的日内瓦访问也许会决定他未来一段时期的、说不

定就是他后半生的命运：

“所以目前就是要坐下来工作，白天黑夜都干。我定要赢得在日内瓦的两星期欢乐——这句话不断出现在我的眼前，好象已镌刻在我前额里面了。这句话给了我勇气，那是我平生还不曾体验过的。”

这一次，巴尔扎克并没有夸大。这一次由于在预期的欢乐的醉人鼓舞下，他比以往工作得更勤奋、更有效果，这在以往是很少见的。他受到一种思想的鞭策，即他的工作并不仅仅是为了出版商的报酬，那是可以使他得到暂时休憩的；而是为了最终摆脱掉折磨他的一切钱财上的苦恼。他在这几个月中所写的书，充分证实他所表达的有能力完成最佳作品的信心：

“我相信，一想到这个念头，血液就流入心脏，主意就拥入头脑。我整个身心都感到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这种希望的鼓舞下，我定可创作出我力所能及的最优美的作品。”

巴尔扎克在努力超越他以往的成就，不仅在数量上，还要在艺术上和精神上都不同凡响。从他跟德·韩斯迦夫人的谈话和从她的信里看，他已揣测到，她有点厌烦《结婚生理学》这一类作品的“轻浮”。他很怕自己装扮成心地纯洁的浪漫情郎的这个打算，可能会被《笑林》最近出版一事给破坏。他要证明他是有本领的，他具有更伟大更高尚的感情，他的心充满着人道，甚至是宗教的观念。他的《乡下医生》，这书对普通读者来说，是过于严肃了；但它却可以证明一件事，即他那些比较轻浮的故事都是在不大负责的情绪下写出的，而他的最好的精力则献给纯真的理想。他在这同一时期也完成了《欧也妮·葛朗台》，这是他的不会磨灭的杰作之一。这样一来，他就多了两个无可指摘的“人证”，给他作为艺术家的天才和作为人的品德提供了见证。

当他如此勇敢与勤奋地为自己的生活稗史的决定性场景安排道路时，他也并未忽视趁热打铁。他无意让它冷却，每星期都给他的“爱情之侣”写热烈的信，信中所用的昵称“你”（tu），早已代替那个比较正式一些的“您”（vous）了。他向她保证，说在他身上“新的快乐生活”已经开始，而她则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他所能爱的女人。他崇拜她的一切，“你的口

音和你那惯说好话并为我祝福的朱唇”。他深感震惊，他的生命已然完全隶属于她——“在整个世上再也没有旁的女人，只有你一个。”从一开头他就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可怜的奴隶”，完全屈从于她的意志，一个敢于窥视崇高主妇的农奴。他向她屈膝投降，甘愿自缚手脚，任她怎样处置。假如你真相信他的宣言，那么自开天辟地以来，还没有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感到过如此无穷无尽的热爱。每个星期他都朝着远处的堡垒发射燃烧弹：

“每天我都发现你更加诱人。每天你都在我心上占了更多的地位。你切不可辜负我对你感到的伟大爱情。”

为了驱散她关于他的不道德倾向的猜疑，——他极为恐慌，知道她买了一部《笑林》——他向她保证：“你还不知道我的爱情的处女般的纯洁。”他又坦白：“三年之久，我的生活都跟少女一样的贞洁。”

然而鉴于他不久前才骄傲地向他妹妹吐露，他刚刚当了一个私生子的父亲，这可真够令人大为震惊的了。

就在他如此举起重型武器去击破他的心爱者的

外线防御的司时，他也十分机巧地用地下坑道的渗透战术去博得她丈夫的欢心。在那些专为供她过目的亲密书信之外，他还用比较疏远的腔调给她写了别种信件，信中用礼貌的“您”和“夫人”这些字眼，显然是为了取悦于德·韩斯迦先生而写的。它们的目的是要将德·巴尔扎克先生对这家人的特殊感情告诉他，包括女儿、外甥女、女教师和德·韩斯迦先生本人在内，还要强调他这位著名作家到日内瓦来的唯一目的，就是为给自己取得跟这样一个招人喜爱的家庭一起度过几个星期的快乐。作为友情的特别标志，他给专爱搜集手迹的德·韩斯迦先生送去一部罗西尼^①的手稿，又以动人的谦虚请求允许，给他的妻子呈上《欧也妮·葛朗台》的手稿。只是他把打算在扉页背面用铅笔写下他抵达日内瓦的日期这件事给省略了，没有告诉德·韩斯迦先生。心无疑惑的丈夫并未料到自己的妻子和虔敬的瑞士女教师背着他正合谋参与巴尔扎克正在急忙地巧妙从事的一本自传性的小说。

到了十二月，一切准备已经完成。《欧也妮·葛朗台》，这本书的刊行是他一直在期待着的，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连最仇恨他的批评家都惊动了。这本书

^① 罗西尼 (Rossini, 1732—1868)，意大利歌剧作曲家。

补充了巴尔扎克旅费的来源，其程度大大超过了原来的期待。他以非常愉快的心情于一八三三年圣诞节那天在日内瓦的阿尔克旅馆登了记。在那里，他得到了第一个欢迎，其形式乃是一只贵重的戒指，在其隐藏的小孔里藏着一绺他最珍爱的黑发。这是一个信物，它许诺了更多的未来。在他后半生中，他总是戴着它，作为他的护身符。

*

*

*

*

*

巴尔扎克在日内瓦的逗留持续了四十四天，每天的十二小时都花在工作上。当他宣布他的紧急到达时，他所用的那种狂热的辞藻包含着他将在心爱的天使身边度过的幸福时刻的快乐信心。然而他也并未忘记告诉她，他的时间表将保持他每天从午夜十二点到中午十二点必须束缚在书桌上。就是在天堂，他也不允许自己有一点休憩。只有下午和晚上，可以分别用来表示他对德·韩斯迦夫人和她的家庭感到的爱情。余下的时间则要保留给另一种非常不同的感情——报复的欲望。他带了《兰瑞公爵夫人》的手稿到日内瓦来，这部书描写了他跟德·葛斯特利夫人的中断了的艳遇，为的是他要在他经受最后挫折的这个城市里来完成这部书；他之选择这个机会来做这件事也不是没有经过仔细思考的。他无疑

要依靠可以借此加给德·韩斯迦夫人的心理压力。如果他每晚每晚都向她诵读这篇书稿，她就会明白一位作家怎样向女人报复的本领，假如这女人玩弄了他的爱情，并拒绝给他爱情的最后保证。她一定会，或者有意，或者无意，感到恐慌，否则自己也要同样残酷地受到舆论的涤荡。你越研究巴尔扎克的书信，你就越明白他用来玩牌的技巧。他一方面让她看看在他对待德·葛斯特利夫人的狡狴手段中的威胁，因此她会明白他将怎么样不可和解地对付一个自己也是不可和解的女人；而另一方面，他又让她从他谈到德·柏尔尼夫人时的那种天真热情上看到他会怎样对一位妇女感恩戴德，如果她把身体心灵都呈献给他。狡狴和热情两者都是为了对德·韩斯迦夫人的开导所做的改进，然而她对这个却并没有注意到。尽管在他们幽会时发生了什么，我们知道得很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巴尔扎克的心神全贯注在一个夺人心志的目的上，他劝说他的天使“从天上降下凡尘”，并交给他德·葛斯特利夫人在这同一座日内瓦城里曾经顽固交出的东西。

从巴尔扎克的书信和恳求中，很明显地可以看出德·韩斯迦夫人是摆出了坚决的防卫。可以推测得出来，她对他的貌似审慎而实际却打算随心所欲

的行径的最后怀疑尚未消除。传记作家和心理学学者都相当愚蠢地在争辩她到底是否真的爱上了巴尔扎克，仿佛恋爱这种感情是可以明晰地、毫不暧昧地给它下定义的一种东西，而不受制于波动或禁抑似的。即使，象她的后期生活所证明了的，她天性中色欲强烈，但她的欲望也决不是不受理性控制的。这种色欲经常受到名声和社会地位的约束。从她那双黑色的近视眼睛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她所践履着的道路，而她那个被巴尔扎克大加赞颂的大理石额头却能保持思想冷静。从一开头她就注意要避免受到这场冒险的危害，而在这场冒险中，她已陷溺得比原先设想的深多了。在这件事上她是同巴尔扎克大相径庭的。巴尔扎克毫无耐性地催促她下定最后决心。而她却总不能克服对他的二元感情，因为在不同的场合他对他的感情和判断都是不同的。在并不忽视他的弱点的同时，她佩服他是作家，认出他的天才是独一无二的，而彼时巴黎的批评家却都把他跟亚历山大·仲马以及同时代的其他小说家们相提并论。但是她又以同样清晰的眼光看穿他的求爱方式的荒诞夸张。她的耳朵对他那虚情假意的谈吐和看风使舵的诡辩日益有所警觉。虽然作为一个女人，她无法抗拒他的色欲冲动，而她的贵族本能却对他那不文雅

的举止、高尚趣味的缺乏和平民阶层的自以为是，感到受了触犯。他用来浸渍书信的谄媚糖浆并不能完全迷醉她的知觉。她兴奋地饮下了他阿谀奉承的奇异而猛烈的芳香，这种芳香也确实扇动了她的虚荣和好奇，但她却并不允许它过多地侵入她的头脑。她在新沙特尔的那些日子，写给她兄弟的一封信说明，她是能够多么清楚地观察到她同巴尔扎克的关系：

“我终于结识了巴尔扎克。你一定会问，我对他盲目的偏袒（这是按照你的用语），是否仍存于我们相逢之后，或者我这毛病已被治好了。你一定还记得，你常常预言他会用刀子吃东西，拿餐布去揩鼻涕。嗯，他倒的确没有犯第二种罪过，但确是犯了第一种。当然，瞧他这样做会令人发窘，好几次他犯下由于我们称之为‘蹩脚教养’的结果而造成的错误时，我都设法纠正了他，正如我在同样情况下会教导安娜该怎样做一样。但是这一切只是表面的。这个人本身所拥有的东西，那要比好的，或者坏的礼仪重要得多。他禀赋的天才似乎使你着电，把你举到精神的最高境界去。他把你尘世的自我带走，他使你理解生活中一向缺乏的东西。我设想，你一定又

要说我发了疯，但是我向你保证，并非如此。我对他的崇拜并未使我盲目而看不到他的过错——过错，他确有不少。但是他爱我，而我也觉得这个爱情是我所有过的最宝贵的东西。假如我们今天就得分手，它在我生命上所产生的影响就象火炬似的，它的光亮永不会在我昏眩的跟前停止照耀。——我可怜的眼睛，当我一想到世界上的卑贱、渺小和那些围绕在我身边的人们的时候，它们有时就十分厌倦。”

这几行家书颇有恳挚之音，那从巴尔扎克的信上是找不到的。她抵制不住由于被他这样的天才所爱而产生的自豪感。她也是有雄心的，认识到同他书信来往会使她成为一些文件的保管人，这些文件将被后世感到兴趣，因而也赋予她，一位乌克兰地主的妻子，以历史的重要性。从根本上看，她的精神和感情状态跟德·葛斯特利夫人的颇有相似之处，这位夫人也在被名作家追逐和崇拜的情况下找到幸福和骄傲，但同时又能保持冷静头脑，不被恋情所左右。只是当他纠缠不休，对她说“让我们热恋吧，不要拒绝那意味着一切的东西！”的时候，她就退缩了。

她一定觉得，到旅馆去秘密访问巴尔扎克，是甚

不体面的行为。他那方面的吹嘘和饶舌大概也增加了她对他的审慎的怀疑，因为他发誓，她的服从只会增长他的爱情和感激：

“你会看到你的默许只会使我的爱情更深刻、更强烈。……我怎么才能说得好呢？我陶醉于从你身上飘过来的轻微的幽香，假如我占有你一千回，你也会看到我只是变得更加陶醉于爱恋。”

几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从午夜到中午，他坐在桌旁给兰瑞公爵夫人描绘报复性的肖像，这位夫人拒绝把最后的恩情交给情人。然后他放下笔，下午又继续企图去攻破这另一个女人的顽抗，她总是不愿屈从他的意志。

最后，幸运终于招手了。在四个星期的顽强拒绝之后，他的天使从天上降下凡尘了。阿尔克旅馆的那个房间就是他们发生奸情的见证：

“昨天整个晚上我都对自己说，‘她是我的了！’ 啾！天堂里的天使也不会象我昨天那样快乐。”

巴尔扎克本来打算在实际生活中去体验一部浪漫小说的，他毕竟成功了。以他高超的技巧，他已把小说带到高潮，他已表明不可能的事情实际上是可能的，已把幻想转化为现实。一位他从未谋面的女性已具体化为自己梦寐以求的年轻貌美的阔绰贵妇。在还未晤面之前就自荐为她的情夫，然后终于实现了他的欲求。他的生活充满了意外的兴奋和异域的景象，跟《人间喜剧》里的任何一篇故事一样。

这只是第一个高潮点。一对情侣已经拥抱，已经信誓旦旦，不过下一步该是什么呢？德·韩斯迦夫人是不是跟着他去巴黎，而摈弃她所不爱的年老丈夫？她会不会请求离婚，从而体面地在奥璫利·德·巴尔扎克身边度过余生，以她在乌克兰的地产和不知其数的财富来交换取得巴尔扎克姓氏的权利？巴尔扎克会不会异想天开地去继续他这桩已经如此不可思议地开了头的艳遇呢？

对这件事，跟对所有其它的事情一样，巴尔扎克把狂想与现实结合在一起。他从一开始就接受一句格言的指导：“一个女子和一笔财产。”而他的炽情的主要刺激物也就是，德·韩斯迦夫人既有贵族的特许，又有一笔财产。而她一刻也没有打过这种主意，要在巴黎一座普通住宅安顿下来，在那里她的主要

职务就是给巴尔扎克的债主开门。不同于私奔、离异和决斗这一类浪漫的收场，在他们投身于罪恶之后紧接而来的乃是一个条约，其冷静的考虑几乎是带商业性的。一对情人答应彼此每日向对方通报感情和生活上所发生的情况，并且交换了盒子，以使他们所写的信件得以保藏，一直到——唉，一直到德·韩斯迦先生变得非常可爱，撒手不再充当他们结合的障碍为止。同时他们还将考虑不时隐蔽地晤面的方式方法，都要无损于德·韩斯迦夫人的名誉，也不能引起流言蜚语，造成丑闻——那是上帝所不容的。一旦她丈夫的弃世使她成为维埃曹尼亚无可争执的业主，和他的百万家产的继承人，他们的爱情就将以婚姻的永久结合而正当化。

在痴情的人看来，这些誓约未免有点冷血的性质，特别是紧接在他们不久前刚显示过的奔放热情之后。但巴尔扎克却看不出其中有何不妥之处。他想，这位乖戾的老病人最多也只能再拖一两年了，他那毫不动摇的乐观主义告诉他，已发生过一个神迹的地方，出现两个神迹也不是不可能的。他跟戴绿头巾的丈夫热烈握手，感谢他的款待和许多值钱的礼物。德·韩斯迦一家带着扈从和行李动身到意大利去旅行，与此同时，巴尔扎克则回到巴黎去继续他的工作。

第十三章

维也纳一别

用他天才的策略，巴尔扎克善于在以似乎天真的快乐谈论自己时，成功地隐瞒他真要保守秘密的事情。他吹嘘巨额的版税收入，多半是为了使人不去怀疑他已债台高筑到何种程度。当他用金扣子装饰衣服而且还自备马车时，乃是为了帮助他去隐瞒付不出面包账这个事实。当他企图说服戈蒂耶和乔治·桑，一位作家应当过寺院式的贞洁生活时，他的目的就是压下那些窥探的好奇心，因为有人要打听那个秘密拜访过他的女人。在那个时代，其他文人都公开私事，尽量在他们驰骛情场的每一阶段都让读者知情；巴尔扎克却坚决保持最大的审慎。从他会见德·韩斯迦夫人那一瞬起，即使对最亲近的朋友都保持绝对的缄默，这些朋友在整整十年中都丝毫不知

道有这位妇女的存在。除了在期待访问新沙特尔的第一阵陶醉中写给他妹妹的一封信之外，他从没有向任何人提过她的姓名。她的来信都收藏在她给他的盒子里，钥匙从不离身，而《西拉飞达》的献辞也是用普通奔放的抒情辞藻写成的，那可以献给为数众多的任何一位公爵、伯爵或外国贵族，或男或女，只要是他把故事献给他们。

尤其是德·柏尔尼夫人，必须让她蒙在鼓里，不许她知道这个女人从今以后就是他忏悔的听取人，手稿的守护者，逃出奴役的最后救星。从日内瓦回来不久，他就去探望他的前 *dilecta*（爱人），他打算不让她知道他已选中了（用他自己的词汇）一位 *Predilecta*（超级爱人），好让她纵恣她的幻想，直到最后一刻，也总以为她自己才是他的秘密的唯一心腹。因为她的健康已经迅速恶化，医生们已使巴尔扎克思想中再无怀疑余地，她没有多久可活了。这位脆弱的老妇人直到最近还曾是他的情妇，这事对他几乎是不可理解的：

“即使她竟能够恢复健康——我真希望她能够——而要我看守着她凄凉地走进老年，那会永远令我十分痛苦。由于这位女人的长期抵

制生命和时间的法则，真象是大自然突然以一击之威施以报复似的。”

月亮因太阳从地平线升起而趋于暗淡，仿佛是一个象征。在巴尔扎克决定另外一个女人该成为他的一切时，这一位曾经给过他一切的女人，就开始退潮了。

从日内瓦归来就立刻到德·柏尔尼夫人家中去探望，其中也许有潜在的罪过之感吧。他就要离开她了，但是他却瞒着她，她在他心中早已如此了。经过几个星期紧张的兴奋生活，继之以一个短期的休憩。坐在她的身边，他再一次回想过去，那条他曾引导他走过的荆棘丛生的崎岖小路。然而道路拐入了新弯，那么巴尔扎克也就以更新了的坚毅投身工作，一心要达到双重目标；财富与不朽。

* * * *

也许是他日内瓦新近的胜利，也许是他要向德·韩斯迦夫人证明她所献身的人是值得她信任的，也许只是他有需要在未来几个月中赚到足够的钱支付开销，以便再次追随他的爱侣，在她遁迹于乌克兰的阴黑地区之前横贯欧洲，巴尔扎克回到巴黎之后，在文学创作方面几乎超过了以往的努力。他的

几部第一流的作品都创作于这一时期，但医生们都在摇头，警告他爱惜精力。他自己有时也有恐怖之感，恐怕有一天健康崩溃：

“我已开始战栗。我很害怕在我的事业完成之前被疲倦与枯竭压倒。”

然而他继续一部书一部书地写下去。都是些什么样的书啊！“我的想象力还从来没有在这样多的领域里驰骋过！”他完成了《兰瑞公爵夫人》，于六月到九月的“一百个黑夜”里写成了《绝对的追求》，十月开始了他的《西拉飞达》，十一月着手于《高老头》，并在四十天之内结束了它。他又写下了《海滨的悲剧》（“Un drame au bord de la mer”）、《金眼女孩》（“La fille au yeux d’or”）、《和解了的梅尔摩特》（“Melmoth réconcilié”）以及《三十岁的女人》的几个新的段落，这是在十二月和后来的几个月里的事；又在脑子里草拟了《恺撒·毕骆都》和《幽谷百合》的大纲。尽管这已很难令人置信，但这还不是这几个月的出品总数。他同时还修改了几部早期的小说，跟于尔·桑多合写了一个剧本，写成了他的《给十九世纪的法兰西著作家的几封信》，再加上跟

出版家争吵，以及如期忠实地寄给他爱侣大约五百页的书信和日记。

* * * * *

正当法兰西文坛的西普孚斯这样地滚石上山之际，德·韩斯迦夫人却在意大利享受着 *dolce far niente*^① 的生活。她跟那人数众多的扈从，从一所豪华旅馆游荡到另一所，每天都去散步，请人来画肖像，搜遍各个商店，陶醉在艺术的喜悦之中，这些东西是从威尼斯、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拿来，提供给一位一向没有越出俄罗斯门槛的有教养的女人的。她拥有巴尔扎克所缺乏的一切——金钱，空闲，和这两者能够使她耽溺其中的娱乐——在他们的通信里，没有一点痕迹足以指明她有一丝一毫打断假期、奔向情人怀抱的微小愿望。我们很难抵制一个怀疑，即德·韩斯迦夫人在巴尔扎克身上的兴趣要比对他的信件少得多。这些书信都是贡品，好象她坚持要按期收到，作为她的应得之物。尽管她手头有的是时间，她自己的回信——巴尔扎克常常抱怨——却写得很少，而且间隔很远。整个一年多的旅行，她在每一个歇站的地方都希望收到他一封信，而她这位农奴也总是忠实、顺从地如期写好寄出，不折不扣地执行这

① 意大利语，意为“愉快的无所事事”。

位专横主妇的命令。

不过，他的书信的形式和口气都不得不经常改变以求适合环境。眼下已经不再能够象在维尔曹尼亚、新沙特尔和日内瓦那样秘密通信了。意大利的信件检查对留局待取的邮件是严密注意的，而从巴黎写来的给瑞士女教师过多的信件也会引起最不怀疑的丈夫的注意。所以，巴尔扎克被迫使用可以让丈夫阅读的风格给德·韩斯迦夫人写公开信件了。亲密的称呼“你”由客气的“您”来代替，“爱侣”变成了“夫人”，而夫人总被彬彬有礼地请求转达他对“乌克兰的大元帅、女儿安娜、保埃尔小姐，和家庭的其他成员”的真挚问候。没有永恒爱情的旦旦誓言，也没有把自己指为——你看到这一点大可以松一口气——她的忠实“奴才”。他把信写得好象他在日内瓦时，只是在她身上发现一位喜欢文学、有敏锐批评眼光的贵妇，她赢得他的尊敬，因而他觉得一定要向她报告一切生活细节。在他跟他们一同度过的几个星期里，他已经变得如此眷恋他们全家，以致他不能抵制这个诱惑，必须借用这种方式通过邮政来继续跟他们闲谈。

然而，他的书信含有一个密码，只有德·韩斯迦夫人懂得。当他表白对瑞士风光的热烈爱慕时，她就

清楚地知道他的怀旧的真正目标何在了。诱人而危险的游戏继续进行。巴尔扎克所关心的不但是骗得德·韩斯迦先生深信，这种跟他妻子的友谊纯粹属于文学上的和智力上的性质；他还急切地向德·韩斯迦夫人保证，她仍然是他唯一的爱人，即使在她这样远离他的时候，他也不可动摇地对她永远忠实。事情好象是这样的，当他们商定在她的丈夫尚在人世这一段时间里彼此应怎样保持关系时，在日内瓦事件之后，他必须回到从前所谓的贞洁状态。这或者是她这样要求过，或者是他，以他向有的胆量，这样答应下来的。不管怎么说，反正每一封接踵而来的信都要胜似前一封，诉说他的寂寞与孤独，不但白天如此，连夜里也是一样。一而再地提到他所过的“寺院生活”，而且还说，“再没有谁的孤寂比我更完全彻底的了”，或者说，“我孤单得就象在大洋中间的一块石头。我的无止境的工作不适合任何‘人’的口味。”又有一次，他写道：“我坐在这里，完全孤单，达到了任何一位渴望爱情的女性所能希望我该有的程度。”

不幸的是，德·韩斯迦夫人似乎对他的保证并不怎么相信。她是够精明的，在日内瓦时已察觉他是多么不象他在早期通信里自己所描绘的浪漫肖像。无疑已有十几次发现过他的不忠之后，她对他已没

有幻觉，因为她知道他能让他的想象力把现实美化到什么程度。在阿尔克旅馆他的房间里的那些幽会，大概已向她证明，他并不是个害羞的、没有经验的苦行人，在爱情艺术上完全外行，如他自称的那样。而且不管怎样，她好象已经在他背后组织了一个相当有效的情报机构。

也许背后不是没有动机的吧，在他离开日内瓦的时候，她曾交给他若干封介绍信，给那些居留在巴黎的俄国和波兰的贵族。波多基一家和基塞留一家一定送来了情报，引起她心中怀疑，他是否真的日日夜夜坚忍地献身于工作，和为他的病友德·柏尔尼夫人而感到忧伤。巴尔扎克在巴黎是如此的有名，不会不被人注意，当他每星期两次出入戏院，总是有著名的交际界美人在陪伴他，这是从来不变的。

还有一件事也不会瞒得过她，她的“可怜的囚犯”除了在卡西尼街的住房之外，又在战争街租了一处寓所。她一定曾经向他暗示过——由于她烧毁了她的书信，我们不能十分肯定——她并不会这样头脑简单，随地哄骗；为此巴尔扎克觉得压力很大，非得解释不可。他向她保证——喋喋不休地，什么由于她丈夫的启发，在讨论友谊的主题，但是她能够读出他字里行间的真意——无恒与不忠皆非他的天性。

当犯罪的证据传到了她耳中，他就巧妙地预先准备说词，转入优势：

“颇有那么一些女人，她们浓妆艳抹，自夸对我的生活颇具影响，还吹牛说常到我家里来。”

这一切都是撒谎、诽谤和言过其实。那倒是确实的，他在音乐里寻求隐蔽，但这也只是由于过分孤单：“我为缺乏诗歌而叹息，而诗歌却为您所深知。”（她一定会想到《费加罗》^①的咏叹调而懂得他的意思！）不，这跟世间欢乐无关，也与要在社会上发迹的欲念无干：

“听音乐！这意味着对你的爱情对象眷恋更深。这意味着痴心揣想一个人内心的秘密憧憬，凝视着那双燃起你的爱情火焰的眼睛，直窥到目光深处，并听出了心爱的声音。”

她仍旧不能相信他，尽管——也许正是由于——他有层出不穷的办法把一切事物都用花言巧语

^① 指歌剧《费加罗的婚礼》。

安排得头头是道。她跟巴尔扎克的关系依赖于她对他的暗中深信，因为她最怕的就是他的轻浮失检，而她已开始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保留，这使他颇为不安。意大利之行于夏天结束，这时德·韩斯迦夫妇去到维也纳，计划在那里过冬。来年春天，德·韩斯迦先生就要携同妻室回到他那位于文明边缘的倒楣庄园去了，而巴尔扎克的北极星，他的一线希望的光芒，将永远鞭长莫及了。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他得再见到她，如果两人之间的联系要加强的话。她当初献身给他，是在她没有防备的一刹那间进行的，除非她的爱情能由再度亲自接触加以促进，否则就存在他会失掉她的危险。所以他必须到维也纳去。借口是很容易找到的。所有朋友，包括德·韩斯迦先生，都得到通知，为了能给他的一部小说《战争》（“La Bataille”）的结局加添笔墨，他实有必要到阿斯本（Aspern）和瓦格兰姆（Wagram）两个战场去凭吊一番。他为此已经计划了好几年了。但是秋天溜了过去，冬天也拖到尽头，春天即将接踵而至，巴尔扎克却还留在巴黎，有着种种阻挠他的障碍。这些障碍总在挡路，而且永远是同样的障碍，无论它出以什么形式：要么他得写完一本小说，取得一笔他所急需的款项；要么就得付清一笔小债，

以便借到一笔大钱。同时，意在捅旺那即将燃尽的炉火，他寄出一封接一封的信，其中都包含着早日团聚的保证。他的希望就是，他只要到达了维也纳，这阵清风不久就可扇旺炉火，再现先前的光辉。

* * * * *

一个不幸的事故几乎断送了团圆的希望。德·韩斯迦一家七月下旬到达维也纳。因为前次在这城市逗留时，他们秘密通信的安排是运转无恙的。这次巴尔扎克寻思，在这么多个月的抑制之后，无妨冒险给德·韩斯迦夫人写一封留局待取的信，信中措词十分热烈，原不打算让丈夫寓目的。这次信里没有正规使用“您”和“夫人”的字样，也没有向“大元帅”、西维琳小姐、亨利爱特·保埃尔致以问候，只有向德·韩斯迦夫人一个人表达的爱情的滚滚洪流：

“啊，我的天使，我的爱，我的生命，我的欢乐，我的宝贝，我的心肝——这些勉强压抑在心头的保留是多么可怕啊！能够给你写封心心相印的信，这又是多大的快乐啊！”

这个狂暴的开端之后接着宣布，他计划不久即

离开巴黎到维也纳附近的温泉去访问德·韩斯迦夫妇：

“我即将风驰电掣到达你处，虽然不能够预先说定准确日期，因为这次旅行需要巨人的奋斗。但是，我是以超人之力在爱你的。”

经过“六个月的渴想，在爱情受到禁锢”之后，他终于要“去亲吻神圣的额头，摸触心爱的头发，其中一缕我一直细心地带在心边”。跟她厮守在一起的三天可以给他“一千年的生命和力量”。

不幸的是，这封写给“亲爱的白猫咪”的信，也许还有另外一封属于同样亲密性质的，落到了德·韩斯迦先生手中，好象发生了一场暴烈风波。虽然我们现已不知道这事立时的后果是什么，反正巴尔扎克被迫提起笔来向暴怒的丈夫解释，什么事引诱他写了这么一封毫不含糊地向德·韩斯迦夫人表白心迹的情书——这时他已因经济困难不得不延期动身了。鉴于事态十分清楚，要作解释实非容易。不过，以巴尔扎克的发明天才，并不会被这类性质的问题难倒。以他上次说服德·韩斯迦夫人他以不同的笔迹去应付不同情绪的那张厚脸皮，他又快快活活地

送上一篇同样流畅的故事去平息她的戴绿头巾的丈夫。他说，德·韩斯迦夫人，“我所认识的最纯洁的生命，十足的孩子，最严肃、幽默、聪明、神圣、睿智的人”，一天晚上，曾经笑着谈起“她要看看真正的情书到底是什么样子”。他当时也用同样的语调回答，“那就象德·孟多兰给玛利·德·维尔纳尔写的信”，意思是指他的小说《朱安党人》里两个主角的文风。那时他们只是毫无猜忌地开开玩笑，而后来德·韩斯迦夫人曾在底里雅斯德给他来信提到这桩事，“您忘记了维尔纳尔小姐吗？”她问。这使他想起他曾经答应过给她一封典型情书的钞本，于是他就给维也纳寄去两封这样的信件——当它们落到德·韩斯迦先生手里的时候，这两封信都惹起了他的惊异，这种惊异丝毫不减于他震怒的程度。

期待一个有头脑的人去相信这种解释，等于用这许多话去告诉他，他认为他是傻子。不过，巴尔扎克的下一个行动更为机敏。他断定，接到第一封信之后的立时——就是说，在德·韩斯迦先生发现和解的证据之前——德·韩斯迦夫人已经寄给他一封愤怒的回信。“您想象不到，”他写道，“我的傻瓜玩笑的成功竟使我怎样目瞪口呆。她回答这滑稽信的第一封用了冰冷的轻侮——而我却已寄出了第二封！”

不去向受骗的丈夫坦白承认在他背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去恳求他宽恕一个不幸的误会，他却象一位绅士对另一位绅士那样要求——这的确是聪明绝顶的举动——他也参加，帮助他去消除贞洁无邪的德·韩斯迦夫人的愠怒。她已忘记他们关于给玛利·德·维尔纳尔的情书的笑话，这事实就证明了——依据巴尔扎克的特殊逻辑——她认为阅读一封情书，即使是一封拿给她看的样品，也是非常不该的：“德·韩斯迦夫人的宽恕正好提供一个高贵的证明，显现出我行为的愚蠢。这正表明她是怎样的一位圣者，这也正是我的安慰。”

他又进一步恳求德·韩斯迦先生（“如果我没有滥用您的友谊”）的好心，去把第三册《风俗的研究》连同原稿转交给他妻子。不过，如果他们任何一方面认为不宜再从卑鄙的玩笑者那里接受友情的信物的话，“那么，请烧掉这部书和手稿。”

即使德·韩斯迦夫人打算给以完全的宽赦，他也永远不会宽恕自己，竟然刺伤或冒犯，即使只在短短的一瞬间，这样一个高贵的灵魂：

“无疑我的命运就是不该再次见您，但我还要告诉您我是多么地深以为歉。我并没有多少

感情融洽的朋友，致使我能够失去一个而不流泪。”

这就是给德·韩斯迦先生一个明白的暗示，他所能做的正确与正当的事，就是请求巴尔扎克继续同他的妻子通信，并坚持他们的友情必须继续无恙。

德·韩斯迦是不是天真到如此，相信这一篇狂想的故事呢？还是他冷静地对待了这个局面，因为他知道几个月之后他的妻子和她的情人就要相隔千里？也许是德·韩斯迦夫人并不想放弃担任巴尔扎克的“不朽的情人”的任务，因而已说服他让步。我们所清楚知道的只是，他们两人采取的行动仿佛是吃透了这场玩笑的精神，德·韩斯迦先生给巴尔扎克写了一封和解的信，而德·韩斯迦夫人则大大方方地赦免了罪人，因为一个月后我们就知道他回信说：

“恢复我们的通信，谨向尊贵的丽人致敬。（我用大写字母写丽人，就象写殿下、大人、老爷、神父、阁下、陛下这些称呼一样——‘尊贵的丽人’包括这一切尊称。）”

从负荆请罪直到获得赦免，他又重邀恩宠，被批准继续用他那无足轻重的生活琐事来娱悦他高贵的朋友。高贵的女主人和她的丈夫甚至颁给仁慈的许可，他可以在他们回乌克兰之前到维也纳来表示敬意。

* * * * *

“误会”已经正式消除，可以期待巴尔扎克不再拖延，启程前往维也纳了。可是冬天过去了，四月来了，他的行程又因新的种种障碍而推迟，或者该说，只由于一个大障碍。巴尔扎克又已囊空如洗。他已完成《高老头》及其它三部小说，还有一批短篇故事，以此获得比任何时候都大的文学成就和相当可观的金钱报酬，但是他辛勤的右手积累的一切，都被挥霍的左手漫不经心地花费掉了。新的房屋和装修费，只付清了一部分。根据他给德·韩斯迦夫人的信，这些并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了于尔·桑多。来自《高老头》和其它新著的收入，都已先期被珠宝商、裁缝和家具商吞噬掉。他准备以五个月辛勤去换取一个月自由的打算又一次失败，他不得不承认：

“我深感屈辱，酷受债务的束缚犹之农奴受土地的束缚。我并不是自己行动的主人，而是被

钉死在我立足的地方。”

现在轮到德·韩斯迦夫人来纠缠不休了。她丈夫坚持现在已经到了该回家的时候，然后，显然经过了极大的困难，她才在一大堆借口下游说成功，要他在春天以前留在维也纳。四月是他肯同意的最后日期。可是凭借着巴尔扎克那个一旦写完《西拉飞达》立刻就来的许诺，她要强求延期离开。如果他到五月还不来的话，那就不再考虑等待，无论他再提出什么样的理由来要求迟延，这就是最后的期限了。

巴尔扎克体会到这是关键时刻。既然在丈夫死后他跟德·韩斯迦夫人的结合看来才象是他得以增进财富的最后一个机会，那无论多么大的孤注一掷都值得一试。《西拉飞达》虽然报酬已付而书仍未完稿，不过最后几章也可以到维也纳去写。他没有钱，但是现在这已不使他发愁了，他在卡西尼街的全套银器都被送进当铺，又从出版商和编辑手里弄到更多的预支，他的名字又被签署在另外一两张借据的后面。五月九日那天他离开巴黎，十六日到达维也纳。

这次旅行大大增加了我们的知识，懂得构成一个天才人物的气质的若干品德。因为很难再找到更

完善的例子来告诉你，即使一个最富理性的头脑也会堕落到这么愚蠢的地步。强烈的光线投下的乃是黝黑的阴影。带有稚气的弱点，在常人身上可以不被人注意或者会引起同情的微笑；而对于一位可以同莎士比亚相比的具有世界性知识的人，则显得古怪可笑了。现在就是最恨他的批评家也承认他的天才，即将出版的小说的广告足够吸引大批的订购人。来自世界的每一角落都向他的名声致敬。然而，尽管他完全知道他已取得的不朽地位，他却仍被一颗幼稚的野心所引诱，要拿他所没有、而且也绝不会有的东西去使群众铭刻于心。他本是农民的裔孙，但他却希望被看成贵族。他背了一身的债，却要人们把他看成阔佬。他从德·韩斯迦夫人处得知维也纳的社会急切等待他的到来。他竟被一个不快活的热望攫住，希望自己也成为贵族和财阀的一员去同维也纳的权贵会晤，虽然从这些人对待贝多芬的态度已经表明，再没有别的能比自主天才的独立精神更能使他们铭记于心。而他却以为，绝不该让埃斯特哈慈家、施瓦生柏尔格家、卢保米尔斯基家和李希登斯坦家这些人想到，象德·巴尔扎克先生这样的人物竟然属于文坛上贫穷、疲敝的清苦文人一类。于是他按照想象中的高雅绝顶的装束来打扮自己，而所收到的效果却

是把自己打上了暴发户的印记，看他的

“那支手杖，已成为巴黎的话柄；一副夹鼻眼镜，那是炼金术士为我从观象台光学家那里特别定制的，还有蓝色外衣上的金扣子，那是仙女的手雕刻的。”

他不象旁人那样乘坐普通邮车，而是定下专用马车，上面漆有德·昂特拉格家族的纹章，雇了穿号衣的车夫，甚至在路上装出侯爵气派。光这笔开销他就付出五千法郎，虽然使他烦恼的是，在他居留维也纳期间，并无一人对此有所评论。这五个星期的旅行，其中两星期消耗在华贵的马车里，剩下的时间有一半消磨在旅馆的书桌上，花了他一万五千法郎。

因为德·韩斯迦一家住在维也纳漂亮的外交官官邸，他们为巴尔扎克在附近的金梨旅馆订下一个房间。这是一个奇怪的选择，因为这房间里，查理·提利安，他是拉苏莫斯基伯爵的秘书，兼伯爵夫人的妯娌卢卢·杜尔海姆伯爵夫人的秘密丈夫，刚刚在此自杀，他右手持枪，而同时左手却拿着一本巴尔扎克的小说。几乎还没有跨过门槛，他已明白了他是被维也纳人非常崇拜的，即使没有带来穿号衣的车夫，

也没有什么人的家族的纹章涂饰在车门上，人们对他也不会有什么不同。他在圣日耳曼镇所受的冷遇和在巴黎的包藏祸心的同行们手上的诋毁，现在已得到了补偿。奥地利贵族中最显赫的人物都争先恐后邀请他到他们的宫邸去。梅特涅亲王，欧洲最有权力的政治家，也请他到家里，而且在长谈中还告诉他一桩轶事，巴尔扎克后来就拿它作为剧本《巴梅拉·基罗》（“Paméla Giraud”）的基础。

不幸的是，他无法接受如雪片飞来的请柬，尽管这些都是他贵族名位欲望上的甘露，因为德·韩斯迦夫人把他召进自己的社交圈里，虽然她也偶尔让他接触波兰贵族中的亲密朋友，如卢保米尔斯基家或兰斯可伦斯基家。他没有遇到什么作家和学者，只见到了东方学家汉穆尔—蒲尔格斯托尔男爵，男爵送给他一个东方的护身符，后来他迷信地保留了一生；还有一位低级戏剧家齐迪里斯男爵，当他发现著名的巴尔扎克将谈话只限于稿酬和金钱这个引人的题目上，他竟惊异得连骨子里面都震颤了。

巴尔扎克登上了第七重天。他在这个外国城市里享受文坛名宿的果实已登峰造极，那些来向他致敬的人的姓名，他们本身就是由于受到尊敬才为人们经常提到的。他本来一直是用整个上午的时光坐

在桌旁来完成那本象宗教一样神秘的《西拉飞达》的，这原是一部闻名世界的作品；可是在这些促使他懈怠下来的诱惑中，连他这样的人都很难于不离开书桌了。除了校对一些清样，并参观了阿斯本和埃斯林根两个战场为小说《战争》搜集点儿资料，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以德·韩斯迦夫人献媚上了，虽然维也纳好象不如新沙特尔和日内瓦给他那样多进行调情说爱的机会。在那桩信件被截获的插曲发生之后，她必须十分谨慎；而巴尔扎克本身的鼎鼎大名也要经得起考验，以表明他必须是一位卫道者，甚至其正经程度比一个受监督的少女更为显著。在即将离开维也纳以前，他心情阴郁地写信给她：

“几乎没有一个小时，没有一分钟，可以算作我们自己的。这些障碍使我发烧，为此，我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提前离去。”

事实上，他的被迫离去，是由于一个更物质的原因而提前的。他的发烧，倒不是由于未能满足的拥抱德·韩斯迦夫人的渴望所致，而是由于无力付账。虽然他已用了出版商魏尔特一笔钱，并未办理预先得到的该商人允许的手续，可资源还是一天一天地在枯

竭。当他六月四日向德·韩斯迦夫人告辞的时候，他甚至不得不向她借一枚金杜卡来赏给旅馆里伺候他的仆人。

他奔回巴黎，其疯狂速度同来时的旅程一样，一个星期就抵达了。此后又过了七年之久，他才重见德·韩斯迦夫人。他的爱情故事的第一卷，虽不乏兴奋激动的场面，至此已然结束。就象在他的其它故事里常常发生的一样，他把故事的赓续延缓了很久，为了使自己在在此期间从事更急切、更诱人的事业。

第 四 卷

小说家巴尔扎克的 光荣和苦难

第十四章

祸不单行之年

大自然有时候表现出一个特殊现象：两三阵不同的狂风从罗盘上相对的几个位置吹将出来，聚结在某一地点，然后在那里又以联合、集中了的威力爆裂开来。这正是巴尔扎克从维也纳回来之后，灾祸追击他的方式。他的那些闲散轻松的日子是要以分量有增无减的焦灼去补偿的。

第一个困扰他的苦闷就是他同家庭的老纠纷的重演。他妹妹德·苏维尔夫人病了，她的丈夫又赶上经济困难。他的弟弟亨利，本来就一无所长，为了免得碍手碍脚，才被送到海外去的，这时却从印度回来，不仅一文莫名，还带了一位年纪大上十五岁的妻子。巴尔扎克的母亲对待他的办法就是大发神经。奥

璫利，伟大而权威的奥璫利，必须给他弟弟找个职业。而且，现在是到了他应当偿还短欠他母亲的债务的时候了！这都发生在同一个时候，报纸恶意地告诉读者们，巴尔扎克已从巴黎消失，因为他应付不了他的债务。

每当母亲提出要求或者对他横加指责，他的习惯总是飞奔到慈母般的朋友德·柏尔尼夫人那里去寻求安慰。但是现在却要轮到他去安慰她了。她已病重，她那久已虚弱的心脏又因受打击而更加衰弱，因为一个儿子死去，一个女儿精神错乱。于是她已不能以忠告来帮助他了。即使校读清样这样的好心服务也得放弃，因为这已经超出她的能力。巴尔扎克也不知如何是好，只得自己承担了安慰者的角色。

这时候，他的景况窘迫得不比寻常。不光是到处欠债，这已是他的正常状况了；而是他在工作上远远落后。他已养成习惯，坚持得到预付稿酬；至于那书稿，则由他同意在将来的某个规定日期交出。朋友们都曾徒劳地劝告过他，不可采取这种很不妥当的做法，尤其是珠儿玛·卡罗，曾多次劝他宁可取消一些表面的奢华玩艺儿，而不可以急就的作品去贬低自己的天才。可是他仍持旧习。文学信誉原是他所具有的唯一信誉，而他也爱享受这种信誉所能给予他的

权力感，当他强逼着出版商来买他袋中猪仔^①的时候。他卖给他们的小说一字未写，只有书名。也许他需要那种强制吧，一定要在规定的日期完成著作，然后才能鞭策自己达到那种勤奋程度，才能从自己的手和脑汲取出大量的能源。

动身去维也纳之前，他已尽其所能地搜刮到他能以预支方式取得的每一便士。他不但已经卖出从前用圣·沃般笔名所写的言情小说的重刊权利，还把一部新书，《一个新婚少妇的回忆》（“Les Mémoires d'une Jeune mariée”），卖给了《两世界杂志》（“Revue des Deux Mondes”）。这部书迄今还没有动笔，而出版商布洛斯却在等待《西拉飞达》的最后几章，因为这后一本几个月前已经分期登载了。巴尔扎克倒并不为《西拉飞达》发愁，这书他期望在八天之内，应该说是八个夜晚，就能在维也纳金梨旅馆内完成。就连《一个新婚少妇的回忆》，照他的计算，也花不了两星期以上的时间。回到巴黎之后，道路就可以扫清，他还可以把其它书稿拿去抵押。

然而，这却是他第一次未能遵守他的时间表。他的日历上是不允许他有假期的，而在维也纳，他却屈服于种种诱惑，它们打乱了他的计划。他的时间都花

① 袋中猪仔，比喻买主不许挑选所买的货色。

费在奥地利和波兰贵族的客厅里，或者跟德·韩斯迦夫人驾车愉快闲游，而本应看到他在书桌旁忙于工作的夜晚时间，也都奉献给清谈的快乐了。布洛斯被迫中止刊出尚未终结的《西拉飞达》，虽然订户们倒不十分见怪，因为他们并不觉得它的瑞登堡式神秘主义和那种高级风格怎么诱人。严重得多的问题乃是，《一个新婚少妇的回忆》巴尔扎克连一行还没有写出来。他对此书已不感兴趣，因为他在维也纳的旅途中已经构思出另外一本小说——《幽谷百合》。旅行经常刺激灵感。他答应供给布洛斯这部新书去代替曾经许诺过的那一部，当他还留在维也纳时就寄出了第一份连载稿。

布洛斯同意了，《幽谷百合》的第一部分也印了出来，但他自认有权就巴尔扎克在《西拉飞达》问题上的过失要求赔偿。那时候圣彼得堡发行了一份《外国杂志》（“Revue étrangère”），其方针是，当巴黎出版了最新法文文学作品，同时，有时甚至提前，也向俄罗斯读者提供。布洛斯已经做了安排，这家杂志有权刊印作家们送到《两世界杂志》和《巴黎杂志》（“Revue de Paris”）的稿件。为了这个目的，他可以把稿件的清样卖给它。巴尔扎克是当时在俄罗斯最受欢迎的法国作家，布洛斯毫无顾忌地就把《幽谷百合》的清样卖给这家俄国杂志。反正巴尔扎克欠他

钱，大概不会跟他争吵。

巴尔扎克回到巴黎后，刚一听到这桩交易，立刻就象受伤的狮子似的扑向布洛斯的脖颈。为了他的名誉，应当说，惹起暴怒的并不是金钱方面，而是他感到他的艺术家的正直受到了凌辱。布洛斯已将第一次清样送到圣彼得堡，而《外国杂志》并未请示巴尔扎克，就将这一版逐字印出，虽然巴尔扎克向来都把第一次排版只看做草稿。他经常向《两世界杂志》要求，要经过六次以上的修改然后才能付印。所以，当他收到一册《外国杂志》，看到他的新小说的第一章竟以原始的粗糙形式出现，并带有许多技巧上的缺点和笨拙的文句，这都是他绝对不允许进入读者眼帘的，他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了。他理直气壮地察觉，布洛斯正是利用他的外出来欺压他，于是他立即决定，跟这个破坏他的艺术良心的罪犯脱离关系，并向法院控告《两世界杂志》。

朋友们听到他的意图大感惊惶。布洛斯控制着法国的两家最有势力的杂志，他的影响很大。他可以促成，也可以伤害一位作家的名声，巴黎作家和新闻记者中五分之四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他的。此外，他还能在大报纸的编辑身上施加压力。因而，如果到了公开冲突的程度，巴尔扎克就会找不到一家报纸甚至于一位同行肯为他作证，或以其它方式来帮助他。

除了他在作家同伙中没有人缘这一情况之外，他们也没有勇气敢于站出来反对布洛斯。这个人，朋友们警告巴尔扎克说，能够用一百种办法去伤害他的名声，在公开出版物上署他于被嘲弄的地位，还能威胁出版商，甚至于左右售书商。所以，打官司是要不得的。即使胜诉，事实上他也是从一开始就已失败。任何人都没有可能去打击这个不出面的潜势力。它的触角在地下伸向各个方面。如果巴尔扎克当真孤军作战的话，则事实尤其如此。

然而，当他的艺术家的正直感处于危机的时刻，巴尔扎克再不踌躇了。维也纳的逗留增强了他的自信心，有助于他了解到怨恨和嫉妒在本国内已经掩盖了他的地位到了什么程度。他意识到他的力量，挫折与屈辱只能使他更加坚决，定要获得胜利。他一向不屑于回答个人的攻击，这些他并不放在心上；但是他一想到他将向那腐化堕落而心怀鬼胎的整个巴黎新闻界进行挑战，将面对狂吠的一群而负隅拒抗，他却深感快乐。所有的调停他一律拒绝，而对布洛斯提出控诉。布洛斯也就反诉他不曾履行合同义务。这争辩，理所当然地从法院上闹到报纸上，以及整个文学界。布洛斯连一块石头都不让它太平。在《巴黎杂志》上他刊载了人们关于巴尔扎克的最野蛮的诽谤，也饶不过他的私人生活，嘲笑他窃取贵族头衔，揭露

他在少年时代写过或与人合写过粗制滥造的作品，幸灾乐祸地取笑他的欠债已达到何种程度，还讥讽他的人品。布洛斯的全队文学将士都拿起了武器。一个一个作家都被劝诱得站将出来宣称：出版商把作家的稿件卖给外国杂志而不再付酬，这原是惯例。因为《巴黎杂志》和《两世界杂志》向他们提供面包和黄油。布洛斯鞭子一挥，他们就一律点头赞同，并不以友爱精神站在同行一边。亚历山大·仲马、欧仁·苏、戈兹兰、于勒·雅南和其他十几个人都为反对巴尔扎克而出来作证。只有雨果，仍旧跟以往一样高贵，和乔治·桑，拒绝舔布洛斯的靴子。

到案件宣判的时候，巴尔扎克赢得了道义上的胜利。法院的判决认为，如果一个作家未能交出他所许诺的作品，而其原因是缺乏意愿和能力的话，那么他不应该被人强制去赔偿出版商或编辑。这对文学界真是一桩要事。巴尔扎克只被命令交还他从布洛斯那里预支的报酬。这是一个胜利，然而却是惨胜。巴尔扎克损失了几个星期的宝贵光阴跟律师们打交道、出庭、应付辩论。巴黎的全体新闻界狂徒都在他脚跟后头追击他，即使最坚强的人，也会在这样一场跟一伙劲敌的长期作战中给拖垮的。

* * * * *

从这次诉讼经验里巴尔扎克得到了一个教训。

他看出来他以往是非常正确的，他让他小说里的英雄人物芜特冷、德·马尔赛、拉斯迪额和吕崩柏礼等都按照一条无情格言去行动：“攫取到权力，然后人们就会注意你！”获取权力，不论何种权力，是来自财富的权力，来自政治影响的权力，来自军事胜利的权力，来自暴行的权力，来自社会关系的权力，还是来自女人的权力，但不管你干什么，你都要获取权力！时刻把武器擦亮，否则你就失败！仅仅不依赖别人是不够的，你要学会让别人依赖你。只有当人家感到他们的弱点所在、虚荣所在或怯懦所在将会受到攻击的时候，只有当他们怕你的时候，你才能表现出，你是他们的主人！

巴尔扎克一向相信，他本身的力量存在于读者们对他的忠诚。但是读者散处世界各地，未曾组织起来，也没有受过训练；他们不能引起反对派的恐惧，却只能引起他们的嫉妒。当他去同那一派塑造、左右巴黎舆论的无耻文人和寄生虫斗争时，那些读者是帮不了他的忙的。不过，他是所有法兰西作家中读者最多的一个，他觉得时刻已到，可以不再依靠评论了。如果他自己能够控制一个舆论机构，他就可以把那些人脚下的基地削减一些，而那些人已把他逐出他们的批评阵地，并且倚仗自己的财富，对他大肆嘲

笑。

一八三四年以来，在巴黎就存在一张小型报纸，叫做《巴黎时报》（“Chronique de Paris”），它每周出刊两次，并不大受读者注目。这张报纸倾向于极端教会派和正统派；但这事却没有使巴尔扎克感到烦心。他也并不因这家报纸的岌岌可危的财务状况和狭窄的销路而有所迟疑。他非常相信，有奥瑙利·德·巴尔扎克充任定期投稿人并且还刊登他的小说的报纸，必能不费周章即可站稳脚跟。除此之外，这张报纸还可以成为走上政治舞台的踏板。不顾他已往在政界的失败，巴尔扎克仍在梦想进入议院，受封为法兰西贵胄，取得个什么大臣的职位。他仍旧迷恋于政治权力，一切看得见、摸得着、富有刺激和风涛险恶的权力。

《巴黎时报》的股本先天就不值钱。巴尔扎克筹划着组成一个公司，由他掌握过半数的股本。他以一贯的乐观来办理复杂的交接手续，也包括由他负责筹款继续出版的这件事。契约一签订，他就尽其所能地投身于这一新事业。由有才能的青年人组成的编辑部迅速建立起来，其中唯一成为他长期朋友的是泰奥菲勒·戈蒂耶。他请来充当秘书的是两位贵族青年，德·柏罗瓦侯爵和德·葛拉曼伯爵。在这种事

情上，比起他的真知灼见来，他更相信他的势利眼的本能。不过，秘书和编辑都无关宏旨，只要事情掌管在巴尔扎克一个人手中，他一个人写的足抵得上十二个人。

起先，当巴尔扎克还对他的新事业感兴趣的时候，他几乎一人包办了报纸的全部内容。从他笔下流出来的是可以想象得出的任何一种稿件，政治性的、文艺性的、议论性的杂烩，配上一连串最好的短篇小说。为了在他的主编下于一八三六年正月出版的第一期，他一夜工夫写成了《无神论者做弥撒》（“La Messe de l’athée”）。紧跟着《禁治产》（“L’interdiction”）、《古物陈列室》（“Le cabinet des antiques”）、《发西诺·卡因》（“Facino Cane”）、《人在这儿》（“Ecce homo”）和《被遗忘的殉道者》（“Le Martyr ignoré”）也接踵写成。白天里的每个小时，他都会突袭编辑室，去看看人们都在干什么事，去督促职工，提出建议。在权力欲望的刺激下，也许还为了报复其它的杂志吧，这些杂志他希望其声望会随着他自己报纸声望的增高而降低，他发动了一场挥霍浪费的宣传运动。在一月十日、十四日、十七日、二十二日、二十四日、二十七日，他在卡西尼街举办了一连串的宴会，饭菜丰奢，酒流如川。他

所请来的都是最有影响的文学同行。而他最后两季的房租却还没有付清，房东不得不请求法警来帮他征收巴尔扎克所欠下的四百七十三法郎七十生丁。

这种豪华宴会是一种投资，他希望由此而得到一百倍的偿还。巴黎对他的报纸颇感新鲜，第一期出版之后四个星期，他就在一封写给德·韩斯迦夫人的喜形于色的信上，过早地鼓噪起他的胜利：

“《巴黎时报》令我剩不下时间去做旁的事情。我每天只睡五个小时，但是如果您和德·韩斯迦先生的事务还算顺利的话，那我也可以说我的事业也正在繁荣起来。订户之多出人意料，仅仅一个月，我在报纸的股份上就取得九万法郎资本。”

把他在《巴黎时报》的资产估计为九万法郎，这只不过是他在股票市场上的行情所表示的个人希望，事实上这家报刊机构颇有信任不得的恶名。在美梦里，巴尔扎克看到巴黎屈服在他脚下，他完全相信布洛斯不久就会以谦卑恳求的姿态爬到他跟前，带来十万法郎放在桌上，来换取他的允诺，把《巴黎时报》放弃，回过头来再给那些老杂志投稿。过不了多

久，那群刚刚把他当做他们恶意嘲弄的对象的作家，就会跑来向法兰西最有影响的期刊编辑摇尾乞怜。还有大臣们和议员们，也会发现他们不得不采取德·巴尔扎克先生的政见作为他们自己的政策。

不幸得很，大批读者争先恐后前来交纳订费这件事，只是巴尔扎克的丰富想象力的一个虚构罢了。帐面上的数目规模不大。其他的股东们，他们的天才不如巴尔扎克，但经商的本能却还比他高明，于是静悄悄地都把股份脱手，而让巴尔扎克去处理他自己的股票，其价格只等于他当初所付的几分之一。当他意识到他的新事业正在失败，他就失去兴趣了。编辑工作使他厌倦，他在编辑室里越来越少露面，投稿越来越少，一年还没有过去，这个事业就遭到巴尔扎克所有的物质事业的共同命运——彻底的破产和高筑的债台。六至八个月的狂热劳作只是在他的负担上再增加一笔四万法郎的欠债。倒不如来一次休假去做环球旅行的好！正如地神之子安泰（Antaeus）^①，只要他与自己的大地母亲接触，他就获得了新力量；但是如果越出了自己的范围，他的天才和清醒的智力就离他远去，于是连侏儒也都敢对他那巨人的奋力

^① 安泰，巨人名，是希腊神话中的地神之子。只要他身体不离土地，就能百战百胜。后来被识破，敌人将他举到半空中，乃被击毙。

成就加以戏弄。在他的勇敢宣言“我将在一八三六年致富！”的后面，紧接着的却是他的供认：“一八三六年我并没有比一八二九年前进多少。”

* * * *

反布洛斯的诉讼和《巴黎时报》的失败，只是这一年的惨剧集中的两件展品。几乎每天都送来恼人的插曲。巴尔扎克跟出版商的争吵并不限于同布洛斯。“优美的柏赤夫人”突然变成了“可憎的柏赤夫人”，当夫人的老雇员魏尔德自行经商获利后，他将巴尔扎克从她那里诱走了。因而她毫不留情地要求他交出尚在短欠的两卷书稿。魏尔德，在他这方面，并没有充足的资本去支援巴尔扎克。为着获得喘息的间歇，巴尔扎克预备自费去刊印《笑林》的新版。此刻却忘记了古老的格言：烧伤的孩子怕见火。以前的印书冒险曾经陷他于破产。而他却不怕那一套，还是靠赊欠买了纸张，找到了一家印刷所，赊帐印刷新版《笑林》。印张已妥，正要装订，贮藏印张的仓库突然起火，三千五百个法郎彻彻底底地化作青烟飞去了。

巴尔扎克力竭智穷，再无办法挡住债主。他关上卡西尼街上的大门，连夜把最值钱的家具和书籍搬进在战争街的一幢新公寓，这几间屋子是在他去维

也纳之前用“杜兰寡妇”的名义租下的。跟在卡西尼街一样，他在这里也享受一种方便，就是有一个秘密楼梯用来躲避法警或其他不速之客从前门的侵入。不过到达“杜兰寡妇”的前门也决不是一桩简单事情。他将日常生活包藏在浪漫的神秘性中，他以一种天真的乐趣发明了一套不断更改的口令。谁也不能希望穿越巴尔扎克的三重屏障，除非他已被教给了“开门吧，芝麻！”^①，这才能使大门飞也似地打开。那位看门人，据戈蒂耶告诉我们，比方说，在某一天，必须听到“李子熟了”，然后，赛布露斯^②才让客人跨进门槛。不过，这只是第一步。巴尔扎克的忠仆守在楼梯脚下，他必须听人告诉他说“我带来了比利时花边”，然后才允许客人走到公寓门前，在那里，他的保证“柏尔特兰夫人身体非常健康”才是进入神秘寡妇密室的最后的钥匙。

他的小说里的英雄们所玩弄的每一招诡计，巴尔扎克自己都曾拿来试用过。期票被转到第三者、第四者手里，合法的诡计被用来获取庭讯的延期，传票

① 这是《天方夜谭》里的故事。这句话是喊开强盗收藏宝物的石洞大门的暗号。

② 赛布露斯(Cerberus)，希腊神话中守护冥府的长着三个脑袋的獠犬。

则利用邮件无从递达而避免到手。就象他笔下的那位巴尔费林一样，他就是这种伎俩的大师。巴尔扎克使用一百种迂回手法去对付债主，他的法律知识，发明技巧，以及他的厚颜无耻对他都大有帮助。他的期票流转于出版商与放债人之间。巴黎没有一位法警手中没有送交巴尔扎克先生的扣押证，可是没有一个人有办法当面见到他。

出于自豪感，也许还有点恶作剧的意思，巴尔扎克还存心以公开嘲弄国家法律的办法让更多的人来追踪他。依据当时最新法令，每一个公民都该在国防军服役一段时间，但是这个义务巴尔扎克却拒绝承担。作为正统派，他认为资产阶级国王，路易·菲利浦，是一位篡权者，是没有权利来向他发布命令的。无论如何，他的时间非常宝贵，他认为肩荷步枪站在那里冒充兵士实在有辱尊严，而同时，印刷机正在渴望着他的文稿。

如果使用友好的磋商，没有问题，是总会找出办法来让象巴尔扎克那样的健康状况，又具有那样的文学水平的公民免去服役义务的；但巴尔扎克决不容忍任何妥协。他甚至根本不理睬他收到的召他入伍的命令。三次召他去解释何以不会报到，每次他都置若罔闻。最后，国防军训育处罚他八天监禁，这使

他捧腹大笑。命令他这欧罗巴文坛大元帅因不愿荷枪入伍而入狱监禁，实属胆大妄为！好吧，让他们试试吧！他很高兴跟那些受命逮捕顽抗的逃兵的警察大捉迷藏。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逮捕，但首先得找到他！这些黄发笨货的脑袋里得需要多一点灰色脑髓，然后才有希望胜过他这样的才智之士。

其后几个星期，巴尔扎克销声匿迹了。白天每个时刻，警察们强入卡西尼街住宅，然而一无所获。巴尔扎克总是旅行去了，没有留下地址——虽然当天晚上他可能出现于意大利剧院包厢，甚至于上午就出现在出版商的办公室里，去领他的稿费。从仆人那里打听到胡子警察们多少次来此追查，他至为快活，更有趣的是站在隐蔽的门后倾听着这群蠢货挠头失措，无力发现他的踪迹。这倒是些材料，他可以用来在下一部小说中注入一些趣味。这些给他提供了优美的灵感，用来描写芜特冷和巴克瓜所发动的斗争，以抵抗高兰丁、拜埃拉和法律的其它猎狗。

然而一天早上，四月二十七日，路易·菲利浦国王居然可以庆祝胜利了。一位警官和两名侦探，在等待了好几个钟头之后，当巴尔扎克走进卡西尼街公寓时，就跟在他背后冲了进去。三十分钟之后，臭名的绿色篷车就把他带到巴辛古拘留所，即大家称之

为扁豆拘留所的。从他不得不坐满牢期这件事表明，巴尔扎克在本国同胞中的地位是渺小的，他并没有得到人们的普遍尊重。国外的贵族朋友们，曾经请他赴过宴的大使们，曾经给以殊荣亲自接见他的梅特涅亲王——这些人在巴黎都帮不了他的忙，从四月二十七日直到五月四日，当地的法律严守其责，毫不留情。他不得不坐在一间大敞厅里，处于一群最下层社会的叫嚣罪犯之中，这一伙人各以不同的方式在自寻其乐。他们多数都是工人，他们拒绝牺牲被要求到国防军去服役的两天时间，因为损失了这期间的工资，他们的妻子儿女就要挨饿。巴尔扎克设法取得的官方的唯一让步就是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这也就是他所需要的一切了。在周围的喧哗吵闹声中，他居然能够集中精神校改清样，不受干扰，好象还是坐在书房的岑寂宁静之中。他的良好心情丝毫不曾减低，这从他给德·韩斯迦夫人一封信里的快乐描写中看得出来。他远远不以监禁为屈辱，监禁反而触动了他的高卢民族的幽默感。甚至可以说，他竟然在欣赏一种乐趣，即在得到国家的庇护下避免遭受出版商和法警的纠缠。他已习惯于比在扁豆拘留所的监禁更难忍受的限制自由的生活。在巴尔扎克看来，自由就意味着为生存而斗争，一天接着一天，一夜接着

一夜。

他象个男子汉，抵御命运的打击达六个月之久。虽然他偶然也叹气：“我的确是在自杀”；或者“我垂头丧气不啻一匹疲惫的马”。就在这段时期，他那钢铁般的身躯受到第一次警告，他已经工作过度。他被眩晕给击倒了。医生叮嘱他应该考虑健康问题。巴尔扎克听从医生的劝告，答应到乡间住两三个月好好休息，虽然他把处方的后半一半给抹掉了。他到他的故乡杜尔的老朋友马尔贡家去住，但他并没有休息，象拿克加尔大夫所命令的那样。相反，他工作得跟从前一样疯狂。他重复地得到了教训，从困苦境地求得解脱，绝不会来自投机事业，来自贸易企业，或者来自阔绰的婚姻；而只能来自献身于他的真正事业，为了这种事业，他在娘胎中就已命里注定了。艺术家具有一种疗法，那是医生不能开给其他病人的。只有他能够给烦恼以艺术的表达方法去驱掷烦恼。他能够将生活中的痛苦化为人类性格的生动描写，又将外界环境的限制形成创造性的自由。

当巴尔扎克到沙谢去逗留时，他显然受到外界环境的压力。寡妇柏赤已经再嫁，新丈夫是个做生意的内行人，他在有关钱袋的事情上是决不手软的。在他的影响下，她赢得法院开出的传票，命令巴尔扎克

二十四天之内定要交出两册出色的《风俗的研究》，否则迟误一天就须付五十法郎的罚款。于是巴尔扎克决定“让这女人在二十天后得到书稿”，以此了结自己对她的义务。他看到有两件事情是他应该做的：“我应该完成从前的这份合同，而除此之外，我还得写出一本第一流的作品。”

两个目标他都实现了。八天之后他拟好了《幻灭》的腹稿，并且写完了第一部：

“我竭尽全力每天写作十五小时。太阳甫升，我已起床；一直工作到午饭时刻。这中间除了黑咖啡我什么也不吃。”

这本书虽是为了逃避罚款在赛跑中写出的，却是巴尔扎克的主要著作之一。这好象是巴尔扎克挥鞭抽打着自己，把灵魂深处的东西挖掘出来，在自己面前检阅了最秘密的私欲和正在威胁着自己的重大危险。虽然从表面上看，《幻灭》是一幅现代生活的图画，其广度与现实性在法兰西文学里至今无匹，但它却是巴尔扎克打算同自身搏斗的一次决定性的尝试。在不同的两章里，他一方面指明，如果作家坚决忠实于自己和自己的艺术，他能获得何种成功；另一

方面说明，如果作家屈服于诱惑，想要获取一个走捷径的没有价值的虚名，那将会发生什么事。鲁先·德·吕崩柏礼象征着巴尔扎克立足其间的精神上的毁灭，而但尼埃尔·德·阿尔太斯则表现了他内心的理想。

巴尔扎克知道他自己的天性中有二重性。他知道，他据有不受触犯的艺术良知，这种良知敦促他发出内心中最最美好的东西，足以拒绝任何妥协，足以抗世而独立。但是他也知道自己性格的另一方面，他耽于寻欢作乐，他爱挥霍，他的势利眼以及他的无力抵制小小虚荣和豪华生活的引诱。为了锻炼自己，为了把一位艺术家宁可辜负自己的艺术而去寻求短暂的成功的危险性摆在眼前，他描写了一位作家，作为对自己的警戒。这位作家没有能够站稳脚步，在他一度屈服于诱惑之后，就再也站不起来了。鲁先·德·吕崩柏礼，他的真名是查尔登，也象巴尔扎克一样窃取了本来无份的贵族头衔，以年轻的理想家的身分，口袋里装着一本诗集来到了巴黎——这本诗集就相当于巴尔扎克的《克伦威尔》——一心希望只靠自己才气的力量打通出路。机会将他带进了一个文艺社，这是一群居住在拉丁区顶楼里的穷学生，他们，由于忠实献身给预定的使命，代表了法兰西的未来的精

英。他们都是路易·蓝柏尔的朋友。德·阿尔太斯是其中的作家，毕安仓是医生，米歇尔·克拉斯提恩是哲学家。他们为了所要献身的事业能够在未来取得成就的缘故，都蔑视眼前短暂的成功。通过但尼埃尔·德·阿尔太斯——在这个人物的坚强性格和足以自豪的忍耐上，巴尔扎克描写了他本人的美好的一半——，鲁先·德·吕崩柏礼被介绍加入了这些诚恳的理想主义年轻人的圈子，然而他却不忠于他们所宣誓效忠的高贵智慧品德，反而受到了诱惑，一心要讨好圣日耳曼镇的世袭贵族。他要的是飞速的成功，金钱，受人称赞，女人的宠爱，政治权力。由于诗歌不能立即铸成这种值钱的金币，他就把笔杆出卖给新闻界。他出卖了才能，正如巴尔扎克曾经做过的，拿出粗制滥造的作品，跟文学制造匠合作，左右社会舆论，变成了给新闻界拉皮条的人。他固然成功地成为当时文学泥塘里无数泡沫之一，从而为自己造出了名声，可事实上他却一天天地沉沦下去了。

由于脑子里活生生地装着长年在新闻界受奴役的体验，以及从一个狠毒集团手中得到的深刻痛苦的经验，巴尔扎克揭穿了组织舆论的整个系统，即整个文学界和戏剧界以及存在于其中的腐败现象，在这里，人们目前虽然互相鸠集在一起，可是一有机会

就会在谁的背上捅上一刀。尽管他只不过想表现当时巴黎社会的一个片段，然而这部书却发展为那个时代的一幅完整的图画，而且这张画在一切时代里都会有效。这部书把自豪与愤怒的感觉融为一体，是一个号召，劝人远离急躁和贪婪，要保持坚强，从不断的反抗中汲取愈来愈多的力量。每当阴云密布，巴尔扎克总会找到真正的勇气。当生活的混乱达到高峰时，他就写出最优美最有个人特色的作品。

第十五章

桂都邦尼—维斯冈地伯爵夫人

这个充满灾难的一年，诉讼，扣押，无力偿付，坐牢，还有其它困厄，在巴尔扎克给德·韩斯迦夫人的书信中，带着近乎虐待狂的愉快，有时还使用热情的修辞，记录得颇为详尽。你不得不怀疑，当他一星期一星期谈论他的忧越与挫折、孤单和哀怨时，他用来填满这些汇报的细节，其实就是一种屏障，用来遮瞒其它他不愿意让遥远的乌克兰收信人知道的事情。没有什么东西比巴尔扎克的自我描述更误人听闻的了。他把自己说成一位苦行者，其生活只是为了工作，他的一点闲暇时间只是花在极度精疲力竭的垮台状况中。

只有等到我们明白，他那深不可测的自信已经使他全然漠视人们通常所谓的命途多舛，他的性格

才变得为人们所理解。他身上有一种东西，也许竟是他最主要的部分吧，这种东西能使他对向他袭击来的外在生活的惨剧持毫不关心的态度，而只是以浓厚的好奇心去观察各种现象，宛如站在干燥土上的人注视海中的汹涌风涛。法警在早晨还会敲打过房门，但这件事却从来不会妨碍他下午仍去拜访珠宝店，去赊购对他毫无任何可能用处的某种小摆设。就在这个一八三六年，债台高筑已达十四万法郎，他的的确确不得不向裁缝或医生借一顿午饭钱的时候，他却又买了一根手杖，与那支著名的“德·巴尔扎克先生的手杖”相配，这次是犀牛角的，价值六百法郎，此外还有一百九十法郎的金制小刀，一百一十法郎的皮夹，四百二十法郎的项链。所有这些东西，店家本来都是只希望卖给一位哄骗财主松开钱包为她付款的轻佻女人的，而不是想要卖给一位本已决心坚守苦行生活方式的“囚犯”。

某种内心的秘密对抗力量力图使他保持平衡。他陷入债务愈深，就愈要设法维持奢华的幻觉，而大买特买昂贵的女式琐物。他愈受外界环境压迫，就变得愈加轻浮。他愈是严厉地被迫去踩囚犯的踏车，他就愈加热衷于享受生命所能提供的一切。除非我们理解他这种性格上的矛盾，否则会觉得他的行为简

直象是愚蠢。事实上这正是一种方式，有了它，他那火山似的气质才能宣泄出积存的力量来，而这种力量是必须找到爆炸的出路的。

因为一八三六年是他经历了最严重危机的一年，也是忽而烈日当空忽而凉雨骤至的一年，所以也是巴尔扎克在奢华与感官满足上的丰收年。他把那些不愿公开的事件都用变魔术的方式转移到视线之外去。而从他实际过着的生活与他写给德·韩斯迦夫人信中所叙述的自传式的详细记录两相比较，我们就清楚地看到他的厚颜无耻已达到惊人的程度。比方说他告诉她，为了有躲避债主的安全避难所，他租了一间顶楼，在那里可以象一位悲愁的白发隐士那样度过孤单的日日夜夜，而不会被知心朋友甚至于家里人所发现。其实他所租的并非顶楼，而是一所极为奢华的房子，为了装修他毫不吝惜。虽然他在卡西尼街有四间屋子的大批家具，他每一样东西仍都从卡布新大马路的莫罗家具店重新购买。就连奥古斯督，他的仆人，也用新制服给打扮起来了。除了背心是红色的，浑身上下一色蓝衣，只这一套制服就得花他三百六十八法郎，如果他付了现钱的话。他所谓的隐士之庐，其装修中的最高成就要算那间“闺”房了。那是连茶花女也决不会小看的。看到这些值钱的

家具和完好的堆积，在色调上都是根据感官要求的对比而谨慎选择过的，他至感喜悦，在《金眼女》（“La fille aux yeux d’or”）里曾详加描述：

“闺”房的半间形成了色调柔和的幽雅弧形，与另外的半间形成对比，那半间四四方方，中间有个大理石壁炉台，白色而闪着金光。人们从旁门走进，它隐藏在阔绰的门帘背后，面向窗户。这个马蹄形的屋子备有一张真正的土耳其卧榻，换言之，一块铺在地板上的厚褥，它跟眠床一样宽大，周围有五十英尺，由白色喀什米尔毛料制成，上面饰有黑色和火红色缎子制成的玫瑰花结，排成钻石图样。大床的床背比床上堆积的许多靠垫高出好几英寸，这些垫子以其优美的雅趣使床更加富丽。“闺”房壁悬红色的料子，其上饰有印度薄纱，做成了哥林多式柱形，凸凹相间，上下两端连结在一条火红色的带子上，其上又有黑色蔓藤花纹。薄纱后面的火红色显得呈粉红色，这种多情之色又在窗帘上重现。窗帘也是印度薄纱制成的，以粉红绸料镶边，饰以火红色杂黑色的流苏。六只镀银的托架，每一托架插上两根蜡烛，以相等的距离排在壁衣上，

用来照耀着卧榻。天花板的中心处挂着一只暗色镀银灯，白得炫目。壁带则是镀金的。地毯象是一块东方披肩，其花纹令人想到波斯诗歌，盖出自奴隶之手。家具使用白色喀什米尔毛料，突出黑色和火红色的装饰。时钟，炮台，都由白色金色大理石制成。屋子里唯一的桌子上面铺着一块喀什米尔毛料台布。雅致的花架上布满各式各样的玫瑰，都是白色或红色的花朵。

不象理查·瓦格纳，此公对用艳丽绸缎和喀什米尔毛料来装修房间虽也有同样的爱好，但巴尔扎克却不需要以它们为手段，来提供艺术灵感的正确气氛，因为灵感他到处都找得到。他眼中的目的是要更摸得着、更实际一些。当他指给朋友方登耐看这座“著名的白色卧榻”时，他一度忘记了平时的谨慎而笑着承认：

“我制做这张床是因为那时我马上就要得到一位高等社会贵妇。你知道，她需要一件漂亮家具，因为她习惯如此。当她看到自己坐在这张卧榻上，她决不会不高兴的。”

即使方登耐未曾在日记里细心写下这几句话，我们也可以从公寓布置的方式推测出来，他将为了什么目的使用它。每当巴尔扎克重新装备自己的时候，这就是他又堕入情网的一个标帜。每当他装修新的公寓，那就是因为他在准备接待一位情妇。他的感情跟他的忧虑一样，可以根据他的贴目的大小来衡量。当他追逐德·葛斯特利夫人的时候，他取得一辆马车和车夫，也是为了她，他买了第一张沙发。玛勒街的卧室曾经为了德·柏尔尼夫人装饰过。为了到维也纳去访问德·韩斯迦夫人，他雇到了一套专门的车马。在顺逆境兼备的这一年，当他还继续向维埃曹尼亚的“爱的伴侣”发誓永远效忠于她，还在一封又一封信中向她描写贞洁生活的痛苦时，他堕入了情网却比任何时候更为强烈。他写给德·韩斯迦夫人的情书，它们以动人心弦、热情洋溢的辞令深深打动了整个一代人的心，却是在他跟另外一个女人调情的间歇中写成的。

* * * *

巴尔扎克的新情妇，她在他力图隐瞒的生活中起着重大作用，当初正是间接地通过德·韩斯迦夫人本人才结识了他的。在巴尔扎克离开日内瓦之前，德·韩斯迦夫人给他写了致奥地利驻巴黎大使阿朋

尼伊伯爵夫人的介绍信，他不失时机地立即拜访大使馆。在一八三五年某晚的盛大招待会上，他的兴趣被吸引到一位女人身上，她颀长身材，金色头发，三十左右，美丽动人。当她在群众中以诱人的风度走进走出并接受男客们的崇拜和奉承问候时，表现雍容自若。巴尔扎克的感情固然为她的美貌和身材所摇荡，但比起连结在她身上的贵族姓氏，其向往之情却更加炽烈了。当他知道她是桂都邦尼——维斯冈地伯爵夫人后，这一点就足够燃起欲火。维斯冈地一家是米兰的公爵，而桂都邦尼这家人也是意大利头等贵族家庭之一。受到无法抑制的天性冲动，忘记了他对此时旅居维也纳的维埃曹尼亚宫的女主人的永远忠实的誓言，巴尔扎克便采取步骤，被引见到美丽的伯爵夫人面前。

这位可爱的异国妇人并非生来就是伯爵夫人，而且事实上她也并不是意大利人。她的姓名曾是沙拉·洛威尔，出生在伦敦附近的埃奥尔公园，是一个古怪的英吉利家庭的后代。在这个人家，自杀和感情爆发是他们的流行病。她的母亲，同样地以美貌闻名，在觉得自己开始年老色衰时就将生命结束。她的一位弟兄也做了同样的事。另外一位弟兄因嗜酒而陷于潦倒，妹妹则因成为宗教狂而受苦。作为这个高

度兴奋型家庭中唯一正常的成员，伯爵夫人将感情集中于色情范围。她以典型的英吉利式的镇静来对待任何一个引诱她的冒险行为，表现得仿佛只有委屈顺从而毫无禁忌，然而也从无特殊的兴奋表示。她占有一个丈夫，叫做爱米里奥·桂都邦尼—维斯冈地，但这并不足以扰乱她在这些风流韵事上的心灵的安宁，她也并未受到丈夫方面嫉妒表现的干扰。他是一位文静谦逊的人，大约是她某一次游历欧洲时拣到了他之后跟他结婚的。

爱米里奥·桂都邦尼—维斯冈地本人也不是没有自己的生活热情，虽然这些兴趣和他妻子的那些毫无关系。他的真正爱好是音乐，他是一位值得霍夫曼^①在小说里使其流芳永久的人物。虽然他是雇佣军大队长的后代，他的最大快乐却是坐在一座戏院的乐队里，在许多职业音乐家当中去演奏小提琴。除了在巴黎和维也纳的宫邸之外，他在凡尔赛的纳伊利路还有一所房子，在那里，他每天晚上都偷偷溜出门去到戏院的音乐池里落座，而且无论到什么地方，他都谦恭有礼地请求人家让他在本地戏院里演奏。在白天，他就以当化学家自娱。他把各色成分混合到一

^① 霍夫曼 (E. T. A. Hoffmann, 1776—1822)，德国作曲家，作家，画家

起，把结果倾入瓶中，贴上整整齐齐的标签。社会使他厌烦。他喜欢躲在幕后，因此对于妻子的情夫们他决不是可厌之物。他对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很和蔼，因为他们使他能够更加不间断地将精力献给他所心爱的音乐。

巴尔扎克真有福气。在德·柏尔尼先生和德·韩斯迦先生之后，他又找到了第三位丈夫。这位做丈夫的一半由于骑士精神，一半由于漠不关心，并不提出反对妻子去接受一位著名作家的谄谀式的关心。巴尔扎克又以常有的急躁去获取目的物了，为此他花费所有的空闲时间陪同桂都邦尼—维斯冈地夫妇，驾车到凡尔赛去，分享他们在意大利剧院的包厢。一直到四月，我们发现，他有过汇报，当然不是给德·韩斯迦夫人，而是给珠儿玛·卡罗的：

“好几天了，我一直受到一位非常有侵蚀能力的人物的迷惑，我不知道怎样躲避，因为我无能为力，抵挡不住任何使我快乐的东西。”

而伯爵夫人，在她那方面，却犹豫不决，是否接受巴尔扎克的“进犯”。她刚刚斥退了最后一位情人，高斯罗斯基亲王，通过亲王的作用，她曾经得以奉献

给爱好音乐的丈夫一个儿子。但是她打不定主意，到底是由李昂纳尔·德·崩瓦尔伯爵，巴黎的大雄狮之一，还是由巴尔扎克直接来当亲王的接替人呢。就巴尔扎克而言，他还有另外一块铁要保持热度。在维也纳的德·韩斯迦夫人通过她在法兰西首都的同乡那里得知巴尔扎克对于音乐的突然偏嗜，她也知道，在歌剧院里，他曾经从奥林比·派里西埃，即罗西尼的情妇的无关紧要的包厢里调换到维斯冈地夫妇的包厢里去。由于她已经承担了扮演巴尔扎克生活中的主要女角的任务，她就责备他的无信和不诚。好象是，在他们所订立的盟约里，她已经规定，他所需要的任何消遣都只能够到“les filles”^①中去寻求，在那些地方没有什么精神联系的问题，她也就不会有嫉妒的理由了。她非常理解他，准知道这位桂都邦尼——维斯冈地伯爵夫人一定也会是他给她写的同样情书的收信人，而她则是要确保她的独占的。最后，巴尔扎克没有其他选择，因为他不愿意放走手中的鸟，只好动身到维也纳去，走上昂贵和狂想的旅程，为的是再一次向她保证，唯独她一人在他心中占有神龛。回来之后，他又到沙谢去完成他所欠下的书债。一八三五年八月，他又进入那个名单，去同李昂埃尔·德·

^① “les filles”，法语，那些姑娘，意指娼妓们。

崩瓦尔争夺美丽的伯爵夫人的宠爱。胜利终于落在他的手中，他成了她的情夫。如果那本匿名作者写的不无可疑的消息灵通的书，《巴尔扎克的真相》（“Balzac mis à nu”）还是可以相信的话，那么巴尔扎克有极大可能是一八三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出生的、李昂埃尔·理查·桂都邦尼——维斯冈地的父亲，——他的三名私生子之一，这些孩子既未继承父亲的姓氏，也没有禀受父亲的天才。

*

*

*

*

*

虽然她作为他的情妇、对他从无厌弃之心的朋友和他的周济人达五年之久，可是桂都邦尼——维斯冈地伯爵夫人却没有从巴尔扎克的任何一位传记作者那里取得应有的一份注意。这疏忽她应当自己负责。因为获得名声，其决定性因素往往不是由于个人的成就和影响，而是他或她自我吹嘘的能力。她并不追求在文学上的身后名。她的形象完全被那位无法与之比拟的更虚荣、更野心勃勃、更兢兢业业的德·韩斯迦夫人所掩盖，这位夫人似乎从一开始就在她要占据的位置上下定决心了。假如巴尔扎克不曾给伯爵夫人也写过同样热情的信，那他就不是巴尔扎克。然而她既不把它们编号，也没有把它们藏在专门的小箱子里以备将来的公开发表。也许是纯属疏忽，

也许是出于自傲，这自傲使她看待这样一种前景感到厌恶，即在他们死后还被人们议论着她姓甚名谁。她并不打算帮助未来的文学史家把她本人供奉在书页之中。可是在巴尔扎克活着的时候她却更加全心全意地献身于他的福利。她与他之间的关系是自由自在的，毫无痛苦的紧张之感。而这一点在德·韩斯迦夫人那里，只要一仔细考查便发现很突出。即使是在那所谓巨大热情期间，德·韩斯迦夫人也时刻在关心她的社会地位和文学史上将要派给她的位置。二十年的光景，她总是不断地苦恼，害怕她将因与巴尔扎克的关系而遭受损害。她所要的是，在巴尔扎克的事业里保留她的光荣地位，而自己又无须付出真正的热忱。她的打算，既不放弃丈夫和他的几百万家财，又不使她那无瑕的名声受到一丝一毫妨害。即使最后到了她已自由的时候，她也还愿意贸然下嫁一位社会地位低于她的男人。她的精细的计算和态度上的谨小慎微决不会弄错，她在日内瓦的一次投降给人的印象是，那是在好奇心面前犹豫不定的屈从，并不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对所爱男人的无私献身。

跟这种心地不真诚、因嫉妒而唠叨、冷峻的工于心计的表现相比较，那位不太道德的伯爵夫人倒显

得是慷慨大方的顶峰和具有真纯独立性格的女人。她一旦决心献身给巴尔扎克，就毫无保留地做去，正如我们在《幽谷百合》里所看到的她的肖像那样。至于全巴黎知道还是不知道她的事情，那对她全都无关重要。她陪同他出现在歌剧院她的包厢里；当他要躲避债主时，她就带他到她家里去。当他在乡间建造房子的时候，她就住进隔壁的小小庐舍。她在丈夫眼前并不装做忠实的妻子，而且正象她不能容忍她丈夫方面的嫉妒那样，在她这方面也不用狭隘心肠的嫉妒和无聊的侦察来苦恼巴尔扎克。她让他有充分自由，笑看他跟别的女人鬼混。因为她自己从不对他撒谎，她也不强求他撒谎，象他给维埃曹尼亚写信时所不得不做的那样。虽然她的富有还不及德·韩斯迦夫妇的十分之一，而她却用这样那样的方式接济他十二次经济上的困难。她在同他的关系上总以真诚朋友的态度展示出勇敢的坦率和自由。这些行为，只有一个拒绝顺从社会或道德规范的严格规定而只听从自己意志的命令的女人才办得到。

这种不顾公众舆论的态度，当然使巴尔扎克没有可能向德·韩斯迦夫人隐瞒他和伯爵夫人的关系。就算他能够成功地否认《幽谷百合》里杜德利贵人的热烈爱情场面是在他头几次与伯爵夫人神魂颠

倒的会见的直接灵感感召下写成的，他也无从阻止她在巴黎的俄罗斯和波兰朋友向她报告事实真相，还要加上他们头脑中产生的丰富的想象力突出想出来的缤纷彩饰。“充满怀疑和责难的信件”宛如从遥远的乌克兰吹来一阵暴雨，可是巴尔扎克却紧握手中枪，坚持说这只是柏拉图式的友谊。为了加强德·韩斯迦夫人对他的忠诚的信心，他就为这一“安慰了我众多哀愁的友情”大唱赞歌，并向她保证：

“你所谈到的维斯冈地夫人，她是一位非常温顺的女人，具有万分高贵的仁慈。她有着纤细而高雅的美丽，她帮助我维持生计。她极温柔，但又坚定。她所主张的和她所厌恶的，是不可动摇和决不通融的。她具有自信的风度。她并不阔绰，无宁说她和伯爵的财产是不足与他们光荣的姓氏相称的。……”

然后，他以忧郁的叹息结束了这首颂歌：“不幸的是，我很难得见到她。”

也许在他内心深处并不十分在乎她是否信不过他，因为他的“北极星”的光辉已经开始暗淡，因为它毕竟离得太远了。还有，德·韩斯迦先生的健康状

态越来越增进了，其健壮的程度大大超过了他的期待。而伯爵夫人则唾手可得，既年轻貌美，又富有性感，只要他什么时候想见她，他就能见到。她也从来不曾干扰过他心灵的平静。在随后的几年里，他都和她共同生活在一起，而同时却仍提供给德·韩斯迦夫人以若干虚构的传记细节，以便保存在她的小盒中，为了供后世人最久远的娱悦。

* * * * *

德·韩斯迦夫人的野心是要担任巴尔扎克的导师和顾问，作为一位比任何人都更深刻了解他的女性，而她的文学判断力也确实远比伯爵夫人高明。但是伯爵夫人在他的作为一个人的需要上却有着更清楚的了解。她认识到他是多么疲劳，多么受折磨，而得到某种形式的娱乐，在他是极为重要的。在她的温暖同情下，她安排了唯一可以使他重新恢复创造力的行动，就是让他去访问意大利。自从他跟德·葛斯特利夫人共同开始的旅行突然中断之后，这是他一直都在渴望的事情。伯爵夫人筹划一切，使他不用花费一文钱。

桂都邦尼——维斯冈地伯爵曾经继承他母亲的一笔钱，但这笔钱他却难以收集到手。因为他在商业事务上缺乏才具，他已基本上放弃了收回欠款的希望。

伯爵夫人提议，巴尔扎克，他们共同的朋友，有毅力和经商的本能，他是清楚的，可以受权担任他的代理人到意大利去走一趟。天性纯厚的伯爵表示同意，便由法律公证人拟就一份委托书。七月里，巴尔扎克坐上邮车，口袋里无疑装着旅行的费用，动身到他梦想已久的“爱情国度”旅行去了。

这还不是伯爵夫人表露慈悲心肠的唯一方式。她之不陪同巴尔扎克南行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生下一个儿子刚刚满月，这孩子非常可能就是他们爱情的结晶。可是奇怪的是她并不反对他由一个矮个子黑头发的漂亮小伙子陪同，这人名叫马西尔，他的来历是巴尔扎克的其他朋友全然不知道的。唯一能知道这个年轻小伙子来历的人也许就是裁缝师傅布伊松。几天之前，巴尔扎克曾带了一位黑黑的年轻女人来看布伊松，请他给她做一套男人的衣服，一件灰色礼服。新衣美妙地适合这位年轻的女郎的身材，虽然还有点美中不足，使得尖锐的眼光不能发现女性的身体曲线。巴尔扎克不是到“爱情国度”去寻找风流人物，而是带着风流人物一同上路。

跟他的几乎全部女朋友的情况一样，巴尔扎克跟这位新情妇的第一次见面，也是从欠了读者来信之情开始的。这也跟他的大部分女朋友一样，她也是

已经结了婚的而且有个自鸣得意的丈夫。卡洛琳·马尔布提夫人觉得在利摩日城充当一位法院高级官员的妻子实在厌烦，于是跟法兰西所有其他的失望的妻子一样，她也写信给巴尔扎克。这是一八三三年的事了，那时，我们这位被误解女子的权利的辩护人实在太忙碌了，竟没有回信。所以她就想寻找一位替身。她顺着按字母排列的作家名单找去，在名单上，Ba（巴）字下面接着是 Be（伯），于是她就选中了圣伯夫。说也奇怪，这也同德·葛斯特利夫人所做的一样。圣伯夫好说话，他请她到巴黎来，她接受了邀请。不过，枯燥乏味而又倨傲无礼的圣伯夫并不能吸引这位火热的年轻女郎，尽管他为她的魅力写过一首动人的十四行诗。她宁愿再到巴尔扎克那里碰碰运气。自从在德·韩斯迦夫人身上得到了成功，巴尔扎克已开始欣赏比自己年轻的女人了。他并不象约瑟那样拒绝这个强求的波提发尔的妻子的进攻^①。初次会见是在战争街的“闺”房里，一连延续了三夜。她非常符合他的口味和胃口，以致向她提议联袂到杜尔兰去旅行。马尔布提夫人不能同意这个提议，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可是自他从沙谢回来之后又重申

^① 这是《圣经》上的故事。约瑟是圣者，而波提发尔（Potiphar）的妻子是荡妇。

邀请，这一次是靠另外一位女友开销旅费到意大利去旅行。她热诚地同意伪装一个男小厮陪他同去，因为到罗曼斯国度里去旅行，其本身就必须用一件罗曼蒂克的趣事来装点一番。

由于偶然的机会，巴尔扎克的一位朋友看到了这出女扮男装的喜剧。于勒·桑多，他到卡西尼街来送行，突然看见一个剪短头发的年轻女郎驱车前来，急急忙忙登上了通向巴尔扎克卧室的楼梯，显然对这里地形十分熟悉。他这时正在暗笑朋友的新收获，而几分钟之后，一位漂亮的年轻男子从卧室走了出来，穿着灰色礼服，拿着一条马鞭和一只旅行箱——这只箱子，装了足够一个星期的换洗衣物和以备急需的妇女衣服——从原来的楼梯带了下来，塞进了正在等待着的邮车。巴尔扎克跟在这年轻人后面走过来，他坐到年轻人身边，脸上颇以把戏变得成功而带有自得之色。一分钟后，邮车就朝着意大利的方向滚滚驰去了。

开头是愉快的，而且很符合巴尔扎克的期待，旅途之中屡有趣事。大沙特勒斯修道院的僧侣并没有被年轻马西尔的丰满礼服和肥硕裤子所骗，拒绝他们进入修道院。这位仙女就以在附近溪水中沐浴来报复。《笑林》的作者于是有了充足的快活机会。在

一次迅疾而危险的驱车穿过先尼斯山之后，他们平安抵达都灵。

你们一定认为，到了这里，无需伪装的时候已经到来。或者，至少你会以为他们一定住进一家小旅馆，远离通衢，一个不致引人注目的地方。可是巴尔扎克什么事都喜欢走极端。他驱车直达城里最大的旅馆，欧罗巴旅馆，面临王宫，为他和他的旅伴租下两个彼此相通连的房间。当然，《毕埃芒新闻》第二天就宣布了著名作家的到来，都灵社会全体都迫切希望见到巴尔扎克和他那根著名的手杖，手杖早已和小说同样闻名于欧洲了。最尊显的家庭都派出仆人送去请帖，人人都盼着见见他，几位好意的贵族还安排让他得以使用王宫的马匹。

巴尔扎克接受毕埃芒贵族社会的邀请，不胜喜悦之至。但是恶作剧的魔鬼竟说服了他带着女伴同去，仍旧女扮男装。这就导致新的复杂问题，因为不久外面就在盛传，说这位年轻的马西尔，就象梅耶贝尔^①的歌剧《法国清教徒》里的同名女人一样，其实是个女子。因为没有人想象得到，巴尔扎克居然胆敢如此粗鲁无礼，公然带上不知名的床头女伴来到毕埃

^① 梅耶贝尔 (Meyerbeer, 1791—1864)，德国作曲家，《法国清教徒》为其代表作之一。

芒贵族的客厅里。不久之后，到处就在传播一个离奇的谣言。人家本来知道，他的著名的同行女作家乔治·桑，就是爱剪短发，爱吸雪茄，喜欢用长裤代替裙子的，而且情人常换，比换块手绢还勤。她最近曾和阿尔弗勒德·德·缪塞一同来到意大利，所以很可能，她又跟巴尔扎克重登旅程。可怜的马尔布提夫人忽然发现自己已被男男女女团团围住，他们非常殷切期望，要跟她谈论文学，要听她的机智言谈，如果可能的话，还想得到乔治·桑的签名。

情况如此窘急，就连巴尔扎克这样有本领恶作剧的人，也吃不消了。他需要全部精神贯注，以求自拔于已陷入的漩涡。他向菲力士·德·圣托马斯侯爵坦白了女扮男装的真相，但又有所用心地杜撰了一个道德动机来文饰他的这一行动：

“她委身于我，因为她知道，我的全身心都已被一个炽烈的爱情攫去，早已不知道世上还有其他妇女存在了。”

无论如何，他懂得时间已到，这场小小的恶作剧必须结束，不要发展成一大丑闻才好。在相当成功地了结维斯冈地所委托的事务之后，他匆忙地离开都

灵，动身回转巴黎。

最后一站是日内瓦，但他们停留在那儿却不止一夜。这个城市是他生活史中发生过两次决定性插曲的场地。就是在这里，他遭到德·葛斯特利夫人的最后拒绝，又征服了德·韩斯迦夫人最后的、犹疑不决的勉强。现在，他又以马尔布提夫人为伴回到此地。如果我们相信他写给德·韩斯迦夫人的信，那么除了追思甜蜜往事，含泪想念远隔天涯的她之外，他在日内瓦是无所事事的。事实并不如此浪漫，不过要有趣得多。以往他总是很不耐烦，焦急地催促车夫挥鞭策马，以求越早到达目的地越好。此刻恰恰相反，从日内瓦到巴黎的旅途上，竟花费了十天工夫，每夜都在不同的城镇里留宿。没有理由认定，这些夜晚都是用在由于距离而伤感忧郁地沉思，因为距离使他无法接近他那远在天边的北极星。

* * * * *

八月二十一日那天他回到了巴黎。销魂生活的几个星期过去了。寓所的门上贴着法警留下的通知书，桌上高高堆起未付的账单。在家里还没有过上一个钟头，他就知道他的出版商魏尔特已濒于破产。这一切事他觉得都没有理由要使他惊讶或者仓皇。他从严峻的经验里认识到，他所允许自己的每口自由

呼吸，都不过是更加勒紧他命运的绞索而已。可是，在信件堆里，却有一封带黑框的讣告。亚历山大·德·柏尔尼写道，他的母亲已于七月二十七日去世。我们现在从巴尔扎克所写的信件里知道，他受此消息的打击是如何严重。好几个月以来，他已早有准备听取这一噩耗，到意大利去之前不久，他还最后一次去看望了她。那一次，他向她深表感谢，说她在《幽谷百合》里扮演了德·莫尔梭夫夫人的形象。可是她已经没有气力对此感到快乐了。他总应当感到惭愧和悲哀吧，当他跟那无聊的夏洛琳·马尔布提在意大利尽情游冶的时刻，她却正垂死在病床之上。她第一个将爱情奉献给他，而这个爱情比他的生命中任何其他女人的都更真诚。而当这位妇女正被送下墓穴时，也许他正在都灵的沙龙里谈笑风生吧。过了一两天他离开巴黎去上坟。内心的本能已告诉他，他的生活的一个段落已告结束。在罗尔·德·柏尔尼的坟墓里也葬埋着他本人的青年时代。

第十六章

第二次意大利之行

德·柏尔尼夫人之死，是巴尔扎克一生的转折点。她不再在那里保护他，鼓励他了。尽管还有乌克兰的情妇，巴黎的情妇，他仍感到万分孤单。一种新感觉攫住了他，这在他的自信与乐观的天性中是一向没有的，那就是，前途如何，茫茫不知所向的恐惧。他恐惧，自己的力量只怕不能够支撑到底，去完成他已进行了的巨大工作；他恐惧，不久就要跌倒；他恐惧，他会让现实的人生悄然逝去。他自问，他已从生命中做出了什么，他还能从生命里做些什么。他揽镜自顾，看到白发，在日趋稀薄的长发里已有一缕白色，都是他补写短欠书稿的艰苦奋斗和困扰不堪的日常忧患的结果。虚胖的双颊，蜡黄的面容，双重的下巴，虚弱的身躯，都是帝后窗下无尽夜晚的写作，

累周积月的缺乏新鲜空气和运动所造成的。

这就是他十七年来的生活方式，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写下了几十万张稿纸，修改了几十万张清样，一本一本印将出来。可是成就如何呢？微乎其微。至少对他来说是微乎其微。《人间喜剧》计划得规模大似一座法兰西教堂，现在只刚刚立起了几根柱子。至于应该耸入云霄的穹顶和尖塔，甚至还没有开始呢。他将来能够完成它吗？过去他滥用精力、枯竭身心的年月会不会向他索取惩罚呢？已经有了警告性的征兆，指明机器开始不行了：突然的头晕，阵阵的疲劳，跟着是死一般的昏睡，以及浓烈黑咖啡所造成的胃痉挛。难道还不是时候吗，应当停止下来，休养身体，享受人生，而不是服从严酷的命令——“创作，创作，再创作”？除了当前已长眠地下的这位女人之外，谁曾感谢过这狂热的自我牺牲和盲目的自我克制呢？工作给他带来了什么呢？名声，事实上还是相当大的名声。但是也有仇恨、嫉妒和悲痛的经验。工作没有带给他的一样东西，是一切东西中最重要的——自由。七年以前，他肩负了高达十万法郎的重债重新开始，后来就以一当十地那样工作。但是三十部小说还不足以结清他的账单。他的债务几乎增高了一倍，虽然他写成了三十部小说，都被译成欧洲的一切语言，

打动了几十万读者的心。他仍然被拴在出版商和报纸编辑的意志上，还要被迫爬上六层楼去拜访卑鄙的放债人的窟穴，依旧被逼得象小偷一样，一想到前来执行法律判决的法警就要发抖。如果这样做并不能使他获得独立，那么奋力工作到死又有什么意义？在三十七岁上，他看到自己是在按照一个错误的计划安排生活，因为他将生活奉献给一桩事业，而这事业却使他大失所望，骗取了他最诚挚的希望。

内心的呼声劝告他要用另一种方式去生活。呼声催促他不要仅仅满足于接受远方女人的多情仰慕，而要寻求享受她们柔软肉感的身体；要离开书桌去游山玩水，以新鲜景色来清醒耳目，以刺激性的欢乐来陶醉已经疲惫的精神；要砸开锁链，把它抛在身后，在狂热地向预定目标奋进了这样长久之后，需要呼吸一些清闲的轻松空气。他已经未老先衰。每天都给他带来更多数量的烦恼，他要求解脱。所以在三十七岁上，巴尔扎克比起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更热衷于粗狂放肆的生活。在德·韩斯迦夫人身上的成功，好象唤起了他的淫欲，因为风流韵事接踵而来，他在一年之中所获得的女人的宠爱比从前十年之中得到的还多。除了伯爵夫人和卡洛琳·马尔布提之外，还有一位年轻的布列塔尼贵妇，名叫赫莲娜·德

· 瓦拉特，和一个不知名的“路易丝”，这女人也是他以惯用的通信方法勾引到的。他还成为某些奢华晚餐会上的熟客，在会上，巴黎最出众的轻佻女郎，即他的多尔皮尔和阿桂玲娜的原型，都表演她们的技艺，自在地贡献姿色。现在既然一只冷手的第一个警告的暗影已经微微触动他的心灵，吸引他身心的已经不再是工作和名望了。对自由的渴望，对享乐的追求，享受安逸生活的冲动，都精力充沛地爆发出来了。

* * * * *

有一件事要算伯爵夫人的持久功绩，那就是她体贴巴尔扎克的需要而并不想方设法把情人捆在自己身边。她又第二次使巴尔扎克得以再去意大利旅行，仍用上次那个借口。法警们已经疲于去卡西尼街追踪，最后发现了他在战争街上的秘密住所，于是他不得不躲到普鲁凡斯街的一所住宅性的旅馆去。可就是在那里，他也并不安全，伯爵夫人也看得出他的无尽头的挣扎多么使他苦恼。她从来没有用嫉妒去难为过他，也没有用监视去搅扰他。他是本性难移的，她给他的东西比良言忠告还值钱——就是给他度过两三个月无须发愁的日子的机会。伯爵又一次被她说服，邀请了巴尔扎克充当商务代理人。一八三

七年二月十二日，巴尔扎克穿过了阿尔卑斯山，这次他可是独身旅行，因为他久已厌烦那个相当无礼的马尔布提夫人。泰奥菲勒·戈蒂耶本想陪他同去，到最后一刻又改变了计划。

旅程经过了提辛诺和欧洲最可爱的风景区，驱散了他的忧愁。巴尔扎克具有接受和保留印象的天才，但是他也有善忘的天才。到达米兰的美城威尼斯旅馆中落脚的时候，一切忧愁都已从肩膀上溜走了，这时他已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他已不再是法兰西法院判决过要在这里付款几千法郎、那里付款几千法郎的奥瑙利·德·巴尔扎克先生了，而是一位著名的作家，他的来临各家报纸都恭恭敬敬予以报道，两个钟头之后全城都切望见到他。马飞伯爵夫人请他坐上她的马车；他到斯迦拉歌剧院坐进波尔提亚王子和他姐姐桑斯维林诺伯爵夫人的包厢；他接到了伯尔几奥约苏公主和底里茈尔西乌侯爵夫人的请帖；事实上意大利历史上有着最响亮名字的人都向巴尔扎克这个名字致敬。奥地利军队的军官也没有少宠爱他。总督请他吃饭，部队司令官为他服务。米兰最伟大的雕塑家，布提拿提，请求允许他有给巴尔扎克雕一个肖像的荣誉。后来巴尔扎克这座雕像，不是送给德·韩斯迦夫人，而是送给了桂都邦尼——维

斯冈地伯爵夫人。年轻的波尔提亚王子预计到他的每一欲求而频频送上礼物。当他被邀请在王子和公主的纪念册上签名，而不是，象在巴黎那样，签在借据上，巴尔扎克的骄傲和快乐是可以想见的。

但意大利作家们的招待却相当冷淡。他们看见人们对一位外国作家过分重视不免感到受了侮慢，而巴尔扎克，也因过于受到新结识的贵族朋友们的吸引而没有多少时间去跟工作上的同行周旋。他跟曼佐尼^①的一次会见，成果甚微。巴尔扎克并未读过《约婚夫妇》（“Promessi Sposi”），所以他只谈论自己。

虽然他全神贯注忙于参观和宴会，他并没有忘记人家委托他来意大利的使命。他这个人，只要所办的事务与自己无关，总是一位能干的经纪人。他成功地解决了有关维斯冈地伯爵遗产的未决问题。这一次，一切事情似乎进行得非常顺利，当事务结束之后，他甚至在中途还访问了威尼斯。他早在第一次陪同德·葛斯特利夫人时，后来在陪同德·韩斯迦夫人时，就想看看这个城市了。而这一次，这个城市还为他提供了写《发西诺·卡因》（“Facino Cane”）的

^① 曼佐尼（Manzoni，1785—1873），意大利小说家及诗人。《约婚夫妇》是曼佐尼的最有名的小说作品。

背景。

他第一天很失望。雨、雪、雾使威尼斯一切失色。但是太阳照耀的第一天就激起他对这城市的美丽一种兴奋的赞赏。他各处都去到了，各处都看到了——博物馆、教堂、宫殿和剧院。在飞速的几天中他摄取了这城市的气氛、历史以及生活方式，它的真正的灵魂。虽然他在那里一共只有九天，一半的时间还花费在商业事务和拜访客人上，然而，在曾经描写过威尼斯的无数小说家和旅行家里面——无论是拜伦、歌德、司汤达还是邓南遮^①——没有一个象巴尔扎克在他的短篇小说《玛西美拉·杜尼》（“Massimilla Doni”）里描绘威尼斯那样，具有敏锐的灼见，而且这篇小说还包括整个文学史上最完美的阐释音乐的一个篇章。简直不可思议，在这么短促的时间里，对于当地语言只知道一鳞半爪，他的眼睛却能够如此无误地抓住这城市的本质，使他能够把意大利的高贵美好的精神如此高超地加以提炼，赋以人格。一次又一次，我们已体会到只要巴尔扎克在观察一事物，就意味着穿透了它的心房，在一瞬间便欣赏到它的本质，仿佛是在用一种魔术的手法。

在威尼斯的九天，是意大利之行的高峰。回到米

^① 邓南遮（D'Annunzio，1863—1938），意大利作家。

兰时，他没有受到跟前一次一样热烈的欢迎。他以一如既往的心情进行喋喋不休的轻松谈话，他被高兴的精神和对于听众的天真信任所诱惑，曾当众过于随便地谈到自己的负债和靠写作所能赚到的金钱。这原是他的一种坏习惯，曾经激怒了在维也纳的朋友，现在对米兰人也同样证明这是十分乏味的。但是更使当地人感到痛苦的，是他不无高傲地谈论了拉马丁和曼佐尼。对巴尔扎克不幸的是，当时有几个激愤的小作家在场，其中的一个无事可干，就把他对曼佐尼的贬意评论写成报告送到米兰的一家报纸，在报上，这种对自己所受到的优越礼遇而进行的恶意回报当然激起了人们相当大的愤怒。巴尔扎克很聪明，他不再延长在米兰的第二次停留。他去了热那亚，目的在于经过里维埃拉前往尼斯，但是一场流行病在威胁他，他受到隔离检疫。这事表面看来不过是小小的不便，但后来却引起一场大得多的烦恼。由于我们所不清楚的原因，他改变了计划，中止了继续回转巴黎的行程，他折回里窝那和佛罗伦萨。一直到五月三日，在离开了几乎三个月之后，他才重见巴黎。自从他投身写作以来，这还是他第一次在将近三个月的时间之内没有写过一行文章，也没有校对过一张清样。可是他生活了，学习了，也享受过了。

*

*

*

*

*

邮车驶近巴黎的城郊时，他的情绪多半是不怎么愉快的，因为他很清楚在这无所事事的快乐的几个月之后，会有什么在等待着他。不仅是一叠未付的账单堆在桌上，也不仅是马车和其它可拿的东西已被扣押，编辑们还在等着已经支付报酬的《纽沁根银行》（“La maison Nucingen”）和《出色的女人》（“La femme supérieure”）的稿件，更不仅是动身之前跟新出版商鲍安所谈妥的五万法郎也已化为乌有；他还有更为糟糕得多的事。当魏尔特破产时，巴尔扎克随随便便开出的期票被人拒受，他的债主们已经搞到了逮捕他的拘票。如果他被逮捕，他就将被投入债户监牢。

因此，他所注意的第一桩要事，就是避免被捕。他现有三个住所，——卡西尼街一处是用自己的名义租用的，但已将家具搬走；战争街一处，声称由“杜兰寡妇”或一位神秘的“麦志先生”占用；还有在普鲁凡斯街的房子。可是债主们已胜过了他的一切闪避，不论秘密口令还是假报告，都已失去作用。尽管寓所众多，头上却无一片安全屋顶。他倒十分情愿拿他在意大利所享有的偌大名声去换取遁世无名，使他免遭追踪者的捕获。就是到弗拉柏斯罗去住

在卡罗家——那里有一间屋子留给他随时使用——也有危险，因为他的到达，在他走下马车以前就会传播遐迩。

在进退维谷之际，他就去找曾经在《巴黎时报》编辑部担任他秘书的年轻的德·柏罗瓦伯爵。他请求伯爵给他“一间屋子，绝对的秘密，面包和水，加一盆生菜，一磅羊肉，一瓶墨水，一张床”。他不再要求丝绸挂帘，缎面沙发，或者金质小刀了，只要求一张可以写字的桌子和一张可以睡觉的床。时钟的指针倒拨了十七年，回到他住在莱斯底居耶尔街老屋顶楼的日子去了。

德·柏罗瓦不能供给他要求的这种避难所，于是又是那位桂都邦尼—维斯冈地伯爵夫人前来援救。她对朋友们和相识者们的闲话全不介意，她带了情人到沙姆爱丽赛大街自己的家中，在这里他被叮嘱须严格与世隔绝。决不允许他冒险上街或见到客人。春到巴黎后，他所能看到的仅有的一瞥春光只来自隐蔽处所的窗帘背后。但这种寺院式的隐居对巴尔扎克并无可怕之处，尤其是他与妖娆的情妇的卧室除一门相隔之外别无它物的时候。他安居下来，热情充沛地写作他所短欠出版商的书稿，在短短的两个半月期间就完成了《纽沁根银行》和《出色的女人》，

还写了《笑林》的最后几篇，同时又起草了短篇小说《钢巴拉》（“Gambara”）。

假如不是有一天法警们竟来敲打他这秘密隐庐的大门，他也许就会以极好的精神继续在这儿工作下去了。向来如此，总有一位德利拉会泄露参孙的踪迹^①。伯爵夫人的一位情敌，也许就是卡洛琳·马尔布提，她因没有被巴尔扎克请她同去作第二次意大利旅行而向警察局密告了他的避难所。现在法律的仆役们站在伯爵夫人的客厅里，向他提出严厉的抉择：不是立地还清债务，就是陪他们到债户监牢走一遭。伯爵夫人的慷慨又一次经受了考验。虽然她决不算是富有的女人，却付清了法警们所要求的，他们也就转身走了。

使巴尔扎克苦恼的是，伯爵夫人赎买了情人的自由一事不久就变成了公共财物。从《法令公报》那里，这件窘事传到各家报纸，而巴尔扎克，他还在玩弄那个毫无意义的把戏，向远隔天涯的德·韩斯迦夫人胡说什么他正在过着不快活的、孤单的生活，因此不得不给她写信提供一个解释：

^① 德利拉（Delilah），是大力士参孙（Samson）的情妇，她终于出卖了参孙，使他失去了力量。这是《圣经》里的故事。

“这些家伙，他们的事业就是去寻找债户，将他们投入监牢。这些人依靠一个贩卖行为设法找到了我。使我难过的是，我发现自己连累了好心给我提供避难所的人。为了避免走进监狱，我得立刻弄钱还给魏尔特，结果我就对借给我钱的朋友们欠下了人情。”

他细心地略去了向爱嫉妒的通信人透露拯救了他的这位夫人的姓名。在伯爵夫人和巴尔扎克的关系之间，证明付出勇气和慷慨的总是只有她一个。

* * * * *

每当巴尔扎克走到穷途末路而不知何处才是转机的时候，总有一位女人前来救助。现在，他至少已经解除了最迫切的困难，即逼上门来的债务，而可以昂起头来走出避难所了。在心爱的都兰，马尔冈家的房间在等待着他，他可以在那儿工作，保险没有人打算去侵扰他的安宁，而且伙食住宿也都不用花他的钱。又一次，他对生活为他准备下的烦恼的答复是一部文学杰作。在伟大的资产阶级史诗《恺撒·毕骆都》里，他叙述了一个人的故事。他由于头脑简单，轻信地卷入了灾难性的投机事业而欠了大债。巴尔扎克自己在以往岁月中所经受过的痛苦和屈辱的经

验都重现在这一幅尘世的图画里，它所描绘的世界是法兰西作家从来没有开发过的。奔走告贷的失望，朋友间的无信义可言，债权人毫不宽容的索讨，向那些并非全心全力从事牟取财富、只不过刚刚染指于金钱的初出茅庐者强行勒索凶狠的报酬，律师的阴谋诡计和法律的任意曲解——这一切成分所凑成的小小破产构筑起一场悲剧，一场在不富裕环境里的人的悲剧，它给《人间喜剧》的许多伟大而且常是壮丽的小说作品提供了一篇很般配的对等物。巴尔扎克又一次以艺术的升华作用成功地控制了自己精神所受到的折磨的苦恼。

到了秋天，他身心两健，回到了巴黎。

第十七章

撒丁银矿

一八三六和一八三七两年是巴尔扎克的紧急年头；一件一件祸事紧紧接踵而来。以正常的运气而论，如果巴尔扎克生命中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正常的标准来判断的话，那么一八三八年应当给他带来最后的转折点。上一个夏天，伯爵夫人已为他清理了最紧迫的债务，而《恺撒·毕骆都》也为他挣到了比以往任何收入都大的数目。仅仅是连载版权一笔就得到两万法郎，在那个时代，法郎要比现在值钱得多，而所得税还不为人所知，这实在是一笔巨款。他的作品，读者的需求量是极大的，加上他的无比写作能力和无穷生活原材料的供应，他每年弄到六至十万法郎并非难事。在保持舒适生活水准的同时，还不必过分用力，他就可以在两年后偿清债务。现在既然他的

小说一年比一年有钱好赚，大型的全集本又在积极准备中，他的文名已在整个大陆牢固地扎根，环境从来没有这样更有利过，足以将他的混乱的财源放置于有秩序的基础之上。可是，每当天空放晴，必然会有一阵显然的纯粹荒唐，从他天性最深处的动力中发出，从而召来了新的风暴和乌云。当他的游艇已经看到港口，他总要将船舵掉转，驶回足以吞噬它的狂风口中。在一八三八这一年，正当他的事业开始好转之际，他又一次想出两个极端愚蠢的主意，把井井有条的秩序重新化为一团糟。

很典型的，巴尔扎克所有的蠢事在一开始时都是完全有道理的。他的投机都建立在健全的观察之上，全是精确计算的结果。他的印刷所和铸字所，据接办人证明，都是可以获利的企业。《巴黎时报》，有了那样高明的编辑人员，本也可以成为法兰西数一数二的刊物。毁坏他的商业企业、甚至有时毁坏他的小说作品的因素，乃是他的急躁性格，这种性格促使他总爱以尽可能的大规模来开始，这就妨碍他保持由成熟思考本可得出的正常合理的比例。他的天才中这种具有宏伟性的根本特点，作为小说家是必要的；但应用到即使微小事物也必须仔细衡量的领域时，就会产生悲惨的效果。

巴尔扎克新计划的第一桩事原本发自艺术家的合乎逻辑的欲望，就是要给自己准备一处可以安静工作的地方。多年以来，他都被这个诱饵所勾引，这是所有创造性人物的美梦，即在碧绿的田野间有一座隐庐，在那里全神贯注从事脑力劳动，闯入者是打扰不了的。它就象是伏尔泰的德里斯别墅，卢梭的孟莫莲西别墅或彼特拉克^①的茱克鲁斯别墅那样。在他成长的那些年月，巴黎曾经是他美好的居住环境，因为他能够隐蔽地生活在那里，观察巴黎的活动而自己不被别人观察。而现在他已变成别人好奇心的对象，眼下他的私生活一切细节都被零星售卖给报纸，新闻记者和债主们在他门口争夺门铃。他深深感到他的自由受到的限制，他的艺术专注能力受到的损害。

那么，为什么他还要继续住在巴黎呢？他不得不到编辑部和出版商的办公室去斗争吵闹的时代早已过去了。法兰西的国王可以在布卢瓦或凡尔赛统治国家，为什么巴尔扎克就不能在他自己所选择的远离主要干线的田园胜地来统治出版界和读者呢？不管怎么说，他已倦于同马尔冈家，或卡罗家，或其他

^① 彼特拉克 (Petrarch, 1304—137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和诗人。

友好共度夏日了。在三十八岁上，巴尔扎克希望有一处自己的小小陋室，就象农民或小地主所享受的那样。几年之前，他曾有意得到在都兰的一个名叫手榴弹袋的小小庐舍，他在那里工作同时不放弃他在巴黎的寓所，但是他一直未能筹到所需的款项。他决定节约——他的一切卤莽冒险都以缩减预算开始——于是他放弃了占有两个住处的想法。在乡村里有了一所房子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在巴黎保留一个寓所呢？在首都郊外的某一美丽的农村胜地找到一所庐舍，在那里永久居住下去，可以避免京城在他精力上的过分苛求，而同时又并不太远，随时可以进城去办事或享乐，这样岂不更好些、更便宜些吗？

他用不着到远处去寻找合宜的地点。象他这样记忆力惊人的人，毫不困难就能追溯过去生活中他的眼睛曾经一刹那有兴趣看过的每一座小山和每一座房屋。在到凡尔赛的多次旅行中，最初是去拜晤德·阿布朗台公爵夫人，后来是伯爵夫人，施维尔溪谷和达芜雷镇早已深深印入记忆，就是在这里，他希望能再次找到“一个瑞士山谷所有的清新，树荫、花香和草绿”。那该是多么美妙啊，当他疲倦时从工作中站起来，立在施维尔山巅，游目于广阔的山景和蜿蜒如银带的塞纳河。周围只有葡萄，花园，田野；可是，

巴黎却近在眼前，那个他发誓要征服的巴黎！在这里他可以盖上一所小房，放上最起码的陈设，一所花费不多、合适得象只手套的小房，一所能够安心在内写作，而且一劳永逸免除不知如何交付房租的忧虑的小房。

以他惯有的迅速决策，他就开始在这“遥远的山村”去捕获一所“简陋的茅庐”，这是他在给德·韩斯迦夫人的信上写的。一八三七年九月，跟名叫发勒的一对夫妇签订了合同，巴尔扎克变成了一块约九千平方英尺土地的所有人，上有一所小房和附属房屋，购价计四千五百法郎。按巴尔扎克的标准，这只是一笔微小的投资，从商业的观点来看，这也是一桩谨慎的交易。对于每年赚到五万至八万法郎的人来说，以四千五百法郎就取得地点如此合宜的一块土地，实在是他很容易办到的事。三四个星期他就能挣到这笔费用，从而实现多年的美梦。

不过，在巴尔扎克的一切金钱事务上，他总受到感情冲动的催促。这种冲动总是强逼着赌徒去加倍或四倍地押他的赌注。他刚刚占有了这么一块土地，他那原本不算非分的计划却在假想中扩大了规模。他也不知从哪里打听到的，通向凡尔赛去的、计划中的铁路会经过离他那块小地产不远的施维尔车站，

于是以他的正确直觉，他告诉自己车站周围的田地不久必然会涨价。显然，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再去购买土地。这事他果真做了，不过又操之过急，完全失去了分寸。农夫们和其他地产所有人没有多久就发现，在过度急躁中他会付出他们所要求的任何价钱。他的小茅庐美梦早已忘却，而果园、种植场和一座宏伟公园的远景却呈现在他心灵的眼前。几个星期后，他就成了四万平方英尺左右土地的主人，代价是一万八千法郎，也不曾认真地请教专家来勘察土地，甚至连自己都懒得仔细去看过。

巴尔扎克从来不把开销看做实际支出的金钱，只要这开销还是赊欠的形式。他沉浸在刚刚获得土地所有权的欢乐中，在新屋建造之前，他并不为如何付款而操心。他那支笔，那支顷刻化白纸为千元钞票的笔，俨如魔法的工具，是干什么用的啊？何况，他计划在这片处女地上栽种的果树，单是它们就会给他带来大笔财富。设想开辟一个菠萝种植场怎么样？在法兰西，还没有人想到过在玻璃房里培植菠萝，那就省得从远方输入了。他向他的朋友泰奥菲勒·戈蒂耶说，如果这事办得对头，他就可以获得十万法郎利润，也就是三倍于新房子造价要花的数目。事实上，这并不要他花费什么，因为他已说服了维斯冈地

夫妇来参加他这辉煌的事业。当他建造新居的时候，他们将去布置那所原来的旧庐为他们自己使用，而且还付给他一笔合适的房租。所以，还有什么可发愁的呢？

巴尔扎克无可焦虑，只除了急于在新房屋尽快建成后立即搬进去住。一大群工人出现在场地上。泥水匠，细木工，粗木匠，园丁，油漆匠和锁匠全部立即动工。一道墙急急忙忙筑了起来以维护房基。在别墅即将矗立起来的地方，泥土被掘起了。小路铺上了石子。四十棵苹果树和八十棵梨树已经栽好，并且为了结果树剪枝而搭起了架子。只消隔夜工夫，“遥远的山村”的邻近处已被热闹气氛改了样，这是巴尔扎克需要用来刺激心灵和感情的。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他都喘息着爬上山去督促工人。无论代价如何，一切都得在一八三八年春天完成。如果他有此能力，他甚至会强迫果树在他规定的时刻交出果实，而不必等到秋天。

工程一星期一星期地继续前进，一直到了深冬。墙壁越筑越高，而且随着它们的升高花费也就越来越大。渐渐地巴尔扎克受到轻微的烦恼感觉的袭击。从《恺撒·毕路都》得到的版税已经沉入地下，出版商已被他吸干，从这一方面已无预支的金钱可以期

待。同时，又因急于要搬进新居的焦灼心情而无法继续工作。正与他自己提出的格言一致，新热情移走了一向为旧热情使用的毅力。就象他那次印刷事业，小企业扩大了规模，超出了自己的力量。又象他那次买到铸字所一样，仿佛他总要以一件更大的蠢事去胜过另外的一件，所以现在他又一心向往新的投机，以便把他从地产投资所造成的困境中解救出来。新增加的十万法郎的债务靠点点滴滴的节约，甚至靠文学的劳作，都解决不了；只能依靠一次取得一笔庞大的数目才行。他必须找出一个什么方法来取得一笔突如其来的款项，而这个方法，巴尔扎克认为他已经找到了。在树叶还没有在树上出现以前，他突然不见了，简直踪影全无。巴黎人没有哪个知道他到了哪儿，他对自己的计划也只是泛泛地向人说起，“我将要自由了，再无烦恼，再不必为物质生活操心。我就要阔起来了！”

他怎样计划一步登天变成百万富翁，这个故事实在令人难以相信，如果它被插进小说，就会被谴责为蹩脚的捏造，完全缺乏心理根据。这是一件真正巴尔扎克式的谬妄的荒唐事，假如不是在细节上都有很详细记载的文献材料，那就没有一位传记作家会有勇气将它重述，当做天才人物的反常实例。然而一

一次又一次地，我们在巴尔扎克的毕生经历中，总找到这种看似荒谬而实际却千真万确的古怪现象，它以神奇的精确性一再重复着。这就是，他有这样一副头脑，对他自己创造的虚构世界的一切情景，他都能正确地钻进去窥测到它们的核心实质；而在客观存在的现实世界里，他却以天真孩提般的轻信来行事。他描写一位葛朗台或者一位儒僧庄的时候，他的逻辑观念和心理灼见是举世无双的；然而他却是笨拙的骗子手中的猎物，他的钱袋为了随便一个诱惑的方案就能轻易打开，比最着魔的彩票迷还舍得花钱。他拒绝从经验去学得如何应付屡次发生的同一情况，而在他的小说里却显示出他本人正是善于应付这种情况的权威大师。在同一头脑中并存着睿智和盲目，再没有比这一次巴尔扎克猎取宝藏的故事表现得更清楚了。

一八三六年夏天，他已采取这一题材作为他最卓越的短篇小说之一，《发西诺·卡因》的主题。在这一文学瑰宝中，他描写了在一次结婚典礼上的三个音乐师里面，他如何地特别被那个竖笛吹奏人所触动；这是一位八十岁的盲叟，有着令人尊敬的头脑，他直觉地感到这位老人是某种神秘命运的牺牲品。在两三杯葡萄酒的刺激之下，他把老人引入谈

话，然后从这位老竖笛家那里得知，他是卡因亲王家的最末一代后裔，曾经担任过威尼斯的参议员，还在监狱里消磨过若干岁月。当他打算越狱而打破狱墙的时候，他发现了当地长官的秘密金库，那里堆满了共和国的黄金和白银。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怎样再找到那个地方，但是由于多年的监禁他已双目失明，无法利用他的发现了。他还记得准确地点，如果有人准备跟他一块儿到威尼斯去，他们都将成为世界上最富的人。他一把抓住了同伴即巴尔扎克本人的胳膊，恳求他一同到威尼斯去。

听到这番话的人都讥笑这位愚蠢的老人。其他乐师以前就听到过这个故事，没有一个相信的。巴尔扎克也不相信，他无意陪伴发西诺·卡因到威尼斯去，还要替他出路费。他拒绝了这狂想的建议，离开老人，让他死在盲人院里，毫不企图去寻觅他的遗赠。在虚构的故事里，巴尔扎克把自己的行动描写得并不比其他聪明人缺少理性。然而不到一年之后，当这件虚构的轶事被移植到现实中去的时候，他的行为又是多么的不同啊！

当他一八三七年四月在第二次意大利之行的归途中，巴尔扎克曾不幸受到隔离检疫于热那亚医院。受到检疫是一桩令人厌烦的事。很象是坐在无墙监

狱里。人是自由的，又是不自由的，他不能工作，也不能去散步，唯一可以得到的消遣就是坐下来，跟萍水相逢的患难之交谈天。在巴尔扎克借此机缘结识的朋友之中，有一个名叫约瑟·柏西的商人，他漫不经心地告诉巴尔扎克，有一些宝藏，还可以在他本乡发掘出来。当时他毫无欺骗或是勾引巴尔扎克去干冒险的投机的意思。在撒丁，比方说，那些老银矿已被人放弃，因为一般的意见以为罗马人已经开尽了。这种意见是很流行的，事实上，那些罗马人用落后的技术，只能从铅矿里采出一小部分白银。而那大堆的矿渣，都是在已然全无价值的印象下留下来的，其实却包含着很高百分比的白银，可以用现代冶炼方法加以熔解。任何人只要愿意稍费周章去求得开采权——这只消唱一支歌就无疑地可以买到——那么他不久就会变成富翁。

可敬的柏西先生就这样跟桌旁邻坐的人闲谈，而他说的话倒确是实情。今天的冶金家能够从混合的矿砂里炼出比古老世纪百分比要高一些的贵重金属。两千年前矿主们停止开采的许多矿山现在又被人经营而有利可图。不过，柏西先生并不知道他是向火药桶投去了火星。巴尔扎克，他有能力立刻就看到事物被塑成各种形状，仿佛看见灿烂的白银已从灰

色矿渣里分离出来，垛成高堆，铸成银币，几十万几百万的银币。想到这里，他早已昏昏然，就象给了孩子一杯白兰地。他催促毫不怀疑的柏西将矿渣送请化学专家去检验。为了这桩可靠的投资去招募必要的资本，是不会有困难的。只要为他们自己取得多数股票，他们两个人就会发财，大大发财，疯狂地发财。可敬的柏西先生，被素不相识的巴黎绅士的狂热情绪吓得目瞪口呆，变得有点畏缩、保留了，但是他答应再去深入研究，并将矿石样品送来。

从那时起，巴尔扎克就被幻想迷住了，认定他的得救就将来自撒丁银矿，银矿不但可以支付新居雅尔地（Les Jardies）的费用，还将使他偿清一切未了债务，最终把他变成自由人。在他虚构的小说《发西诺·卡因》里，他把讲秘密宝藏故事的老人看成喋喋不休的傻瓜，而现在他自己却变为同样念头的受骗者。等他急急写完《恺撒·毕骆都》最后几页之后，这是用不了很长时间的，而同时柏西先生也会把他所要求的矿石样品给送来了，那么他就将全力以赴去为资金奔走，并为这个伟大的新事业去约请技术专家。

可是好几个星期过去了，若干星期又拖成了几个月。《恺撒·毕骆都》早已脱稿，而柏西先生却还

未把所许诺的样品送来。巴尔扎克开始不安了。以他毫无机心的热诚，他应自己负责，曾叫那位意大利傻瓜去注意闲置在撒丁地下的财富，而现在这坏蛋无疑正在取得采矿权而把他排挤在外了。现在只有一桩事可做。他必须追上他，在现场考察情况。不幸的是，在这次旅行中所需要的几百法郎的开办费还没有着落，他也不知道到哪里去弄这笔钱。他本可以去找朋友罗特柴尔德家或其他大金融家，把计划呈献给他们。但是他极为天真，或者毋宁说他在自己做生意上是一贯愚蠢的，他竟相信柏西先生只把这个巨大秘密告诉了他一个人，如果他向任何第三者透露一点点这方面的秘密，这个好主意就会被有钱的资本家们偷走，正如《幻灭》里写的大卫·施且尔被骗取了廉价制纸的方案一样。

卡罗司令官是他唯一肯信托的人，因为他想象这位上年纪的军官有时以小小实验来消磨光阴，是位伟大的化学专家，他有“一个秘密方案，用它就能把金银与某些同金银构成合金的元素分离开来——而且成本费用很低”。

善良的司令官认为这主意值得考虑，但他既不准备陪巴尔扎克到撒丁去，也不想在这个计划上面投资。最后弄得巴尔扎克只好向母亲借来部分路费，

因为她总是乐意从她的资金中为某种有希望的投机取出款子的。另一部分旅费则是拿克瓜尔和那位裁缝师傅提供的。一八三八年三月中旬，他动身到撒丁占领银矿去了。

很明显，这次虚无缥缈的旅行必将以可笑的大失败告终。即使计划有着成功的希望——巴尔扎克的原始直觉并无错误——一个平生从未见过矿山的作家，怎么能够在两三天的访问中就判断出这些老工程会不会赚出利润呢？他没有携带技术装备，就是携带了，他也不会使用。他并未曾跟真正的专家讨论过这件事情，他的语言知识也不足以使人听懂他说的意大利语。由于他不愿意把秘密泄漏给任何人，他没有带着介绍信，也没有钱去获取他所需要的情报。他不知道向什么机关去申请他谋求的开矿权利。即使他有了这方面的知识，他也不熟悉商务手续。最重要的，他还缺乏必要的资本。不错，他是宣布过：“我所需要的只是这东西的一块样品。”但是这“东西”得上哪儿去找呢？它又是什么呢？它是不是在现已长满草木的渣堆上呢？它是不是那堵塞在久已不用的矿井中的废矿石？有经验的矿务工程师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去搞清事实真相，而巴尔扎克所依赖的却除了直觉以外再没有旁的。

无论如何，巴尔扎克绝不可能为这桩事业花费几个月的工夫，因为就他而论，时间就是金钱。既然他没有钱，他势必得尽快进行。他以惯常的速度出发，在巴黎到马赛之间的邮车里度过了不眠的五天五夜。他的资金如此短缺，每天只靠十个苏的牛奶过活。不过，严峻的事实却表现得并不顺从他所需要的急切。在马赛，他打听到近日似乎并没有开往撒丁的船。到那儿去的唯一方法就是绕道经过科西嘉，在那里他也许可以找到一条小船载他过海。这是对他的希望的第一个打击，他继续前往土伦，但已豪情大减。行前，他以抑郁的口吻写信给珠儿玛说：

“几天以后，我将很不愉快地又少掉一个幻想。事情往往如此。在你即将到达顶点的时候，你就开始失去了信心。”

经过冒着很不寻常的风浪航行之后，在严重的晕船痛苦中他到达了阿雅克肖。然后又接受了一次耐性上的新的考验。他被迫检疫隔离五天，因为传说马赛发现了霍乱。过了这五天之后，他又得浪费更多的时间去寻找愿意渡海到撒丁去的船夫。他过于焦急烦闷，实在不能在這些等待的日子里工作，于是就

跋涉于阿雅克肖，探望了拿破仑的诞生地，咒骂约瑟·柏西，都是他，引诱自己踏上这次可笑的旅程。最后，在四月二日那天，他总算能够渡海了，坐上采珊瑚的潜水人的小艇，没有食物，除了在途中捕获的海鱼。在阿尔盖罗又碰到坚韧性的考验，又一次五天的检疫隔离，使他如坐针毡。终于在四月十二日，他获准登上岛边，这个岛妒意甚浓，守卫着他所期待着装进口袋的几百万财富。整一个月过去了，而他却还没有瞥见一颗银粒。

现在谈谈银矿吧！它们距海岸不足二十英里，可是自从罗马时代以后，所有的公路都荒废了。在撒丁既无公路又无马车，当地居民，据巴尔扎克所写，并不比波利尼西亚人或者匈奴人更文明些，衣衫褴褛，屋里没有火炉，找不到旅馆客店。所以巴尔扎克，他多年来没有骑过马了，只好被迫将肥胖的身躯委托给左摇右晃的马鞍的慈悲，终于抵达了奴拉。到了这里，种种希望就算是最终、彻底地粉碎了。现在银矿是否有利可图，已不重要；因为他来得实在太晚了。约瑟·柏西，被巴尔扎克的热情所鼓舞，已将他们萍水相逢后的十八个月利用于某种目的。他固然没有，这一点不错，写过不朽的小说，也没有建造过带有菠萝种植园的房屋，但是他却围攻有关各方当局，直到

获得了王室敕令，授权与他去利用弃置的渣堆。巴尔扎克这趟旅行实在没有必要，跟滑铁卢之后的拿破仑一样。他现在唯一的欲望就是赶回巴黎，越快越好地回到“心爱的地狱”去。然而路费却超过了钱包，他只好先到热那亚，再去米兰，为了可以用维斯冈地的名义去借到回转巴黎的盘费。这次他在米兰的逗留实在是桩惨事，既无盛大欢迎，也没有到贵族朋友家去拜访。这位疲惫不堪，垂头丧气，然而精力尚未衰损的“永恒的破产家”终于在六月里回到了巴黎。

在收支平衡表上，他损失了三个月的工作，又自费了一笔本想用来获取更多金钱的金钱。他豁出健康，而且使自己的神经紧张得要命，为了一次无稽的冒险，或者说，一次对他来说才是无稽的冒险。说来真有点悲哀的讽刺味道。就象他的其它一切计划一样，他最早的筹划总是正确的，直觉也不曾欺骗过他。撒丁给旁的人带来了财富。在二三十年之间，银矿十分兴旺，愈来愈有利可图。一八五一年银矿为六百一十六人提供了工作，九年之后，他们雇用两千零三十八人，再过九年，成了九千一百七十一人。世人皆知的 Minas d'Argentiera（银矿公司）正在搜罗着巴尔扎克梦想过的几百万财富。他的本能的识别力永远正确，但是它只能帮他去当艺术家，如果他越

出雷池一步，它就只会使它迷失方向。当他把想象天赋化为文学作品时，它给他不仅带来金钱的报酬，还带来不朽的名声。而当他打算把幻想变成金钱时，他的成就只有增多债务，迫使自己加倍劳作。

离开巴黎之前，他已给珠儿玛写下预言：“我害怕的并不是旅行，而是怕那后果，如果计划竟然失败了的话。”

正如他每次回家时的情形一样，他知道他定将看到未付的账单，逼人的官司，还有无尽无休的工作。这一次则更是把倍利昂山（Pelion）加在奥萨山（Ossa）上^①。只有一桩事情激励着他，使他有勇气去面对这些漆黑的朕兆——可以躲进新居避难，弥补撒丁之行损失掉的时间。但是在这里失望又在等待他。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地面“光秃秃象一只手掌”，房子还没有房顶。他不能在雅尔地安坐下来写作，因为建筑师、泥水匠和掘土工人都在工作中任意调笑。他又一次忘记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跟得上象他自己的那种速度的。他以惯有的急躁开始督促他们。在最后一块木板铺上屋顶之前，他就搬了进去，全然不顾医生的命令。医生告诉过他，如果他住进一所还没

^① 这是荷马史诗里的故事。当巨人想登天时，在奥萨山上又加上一座倍利昂山，使巨人攀登起来难上加难。见《奥德修纪》第十卷。

有来得及吹干的新建房屋，那将妨害他的健康。家具还没有从战争街迁移过来，打铁和锯木头的噪音整天吵闹，因为老房子正从上到下在改建，以备伯爵夫人居住。小路还在铺石子，浇沥青，围墙也在仓猝间筑起，这样匆忙后来被证明是危险的。然而处在这一切混乱当中，巴尔扎克却享受到居住在自己的产业上的快乐，他以未成熟的热忱描写了他的新居：

“我的房子坐落在圣克鲁山的山坡上，这小山向南有一半紧接着御花园。向西凭眺，整个达芜雷城尽收眼底。向南，我俯瞰达芜雷城公路，它沿山直到凡尔赛花园开始的地方。举头东望，纵目漫游于施维尔以外，视野所及，直到广阔的地平线，而在它的背后就是巴黎。都城的烟雾笼罩了著名的麦当山和美景山的山坡。在远处平铺着红山平原和从奥尔良到图尔的公路。这片景色有着稀世的恢宏气魄和诱人的对比性。同我的地产紧相毗连的是从巴黎到凡尔赛铁路的车站，铁路的路堤就在达芜雷城山谷里奔驰，却丝毫不碍于我的视线。所以我可以在十分钟内花上十个苏就从雅尔地旅行到巴黎市中心的马德莲！而从战争街，从沙约或从卡西尼街去，那

至少要花我四十个苏和一个钟头。把这方便条件算上，你就不会说我购买雅尔地是我干的一件蠢事了，因为这地产的价格一定会大涨的。整个产业包括一英亩空地，南边还带有一条一百五十英尺长的梯田，四面都有围墙绕住。现在还没有种上什么，但到了秋天，我们就要把世界上的这个小角落建造成真正的伊甸园，有花，有树丛，有芳香的气息。在巴黎或巴黎近郊，只要有钱，什么东西都买得到，所以，我将去采购生长了二十年的木兰树，十六年的菩提树，十二年的白杨、赤杨，等等。这些都可以在根部带着土块移植。我还要栽种葡萄藤，可以买了放在篮子里带回来，今年就可以结葡萄。真的，文化是可惊异的，今天这土地还真跟手掌一样光秃秃，到了五月，这里就会惊人地变样，我还要在附近再买两英亩空地来造菜圃、种果树，等等。为此我需要三万法郎，但这数目我想在冬天就可挣到。

“这房子又陡又窄，就象鹦鹉笼里一根栖木，三层高，每层有一间主要的房间。楼下这一层是饭厅和客厅，二层是卧房和更衣室，三层是书房。现在我就是在这儿给你写这封信，已经是午夜了，一个象梯子一样的楼梯间从一层导向

上一层。紧绕着房屋四周前一条带顶的走廊，人沿着它可以散步，它通到二楼，支撑在砖柱上。整个这座小楼颇具意大利风味，漆成土砖色，四角由凿石做成，含有楼梯井孔的附加部分则是红色的。在我这座房子里只有刚够我使用的地方。向后走六十步，在朝圣克鲁公园的方向上，是一所外舍，楼下有厨房，有仆人住处，有仓库，等等，还有马厩、车房、马具间、浴室、木棚子等。二层上有一大间，必要时可以出租。三层楼有仆人卧室和一间朋友用的客房。我还有一个喷泉，可以随我使用。它跟著名的达芜雷泉一样好，因为它是由地下水池供水的。我的地产的四周都由愉快的散步小路环绕着。这些房间都还没有家具，但我将慢慢地从巴黎把我所有的东西移过来。……我要留在这里，直到我发了财。我已经觉得它十分适合我的嗜趣。我相信一旦我有了足够的金钱足以隐退的时候，我就会定居于此，在安宁中结束残年。那时我就要告别我的一切愿望和雄心勃勃的计划，再无须敲锣打鼓了。”

这就是巴尔扎克关于新居的描写。可是他的朋

友们和客人们却不是这样叙述的。在他们的报道中我们没有例外地觉察到他们有着无法克制的对巴尔扎克感到可笑的想法。即使是他最知心的朋友和对他唯一有好感的人们，当他以惯用的流畅动人的辞藻来描述他的产业的宏伟时，也很难保持严肃。这座小房，很特别地预现了柯尔布西埃^①和他的学派建筑观念，古怪地酷肖一只空鸟笼。在花园里——这花园巴尔扎克已在梦境中化为天堂了————稀稀拉拉几棵果树将弱枝伸向天空，还没有一片草叶钻出粘土。十月到来了，接着又是十一月，一群工人还在地皮上忙碌，因为巴尔扎克没有一天不想出新花样来让他们装修。他不是计划给菠萝建造玻璃房，就是想栽种匈牙利托凯^②种的葡萄；他打算把菠萝以热得发昏的利润卖给巴黎，而葡萄则可以酿造出以往从未有过的烈酒。再不然就是立起一扇石门，把雅尔地用巨大字体刻在一个绿色拱廊上，从那儿一直通向房屋的前门。

与此同时，他还监督在他住宅旁边为伯爵夫人准备的庐舍的装修，伯爵夫人即将在短暂的间隔之

① 柯尔布西埃 (Le Corbusier, 1887—1965)，法国建筑师、画家、作家。

② 托凯 (Tokay)，匈牙利地名。

后就随着她情夫住到他建造山村隐庐的、据说十分清静的山坡上来。然而，除了典当的利息之外，账单一张也没有付钱，伊甸园里什么也没有生长。然后一系列的惨剧就开始了。

处在对美丽景色的热情中，又被想象中的盛开花朵的果树和覆盖着肥实葡萄藤的乔木所吸引，他就忽略了聘请专家来勘察土质，这土地原是非常松软的滑粘土。一天早晨，一阵轰鸣的震雷声把他惊醒，他立刻奔向窗口。天空是晴朗的，目力所及之处没有一丝乌云。把他从睡梦中惊醒的并非雷鸣，而是花费了昂贵代价的围墙崩塌了。巴尔扎克绝望了，他写信给珠儿玛说：

“对你，我的灵魂的姊妹，我才能诉说我内心的秘密。此时此地，我正坐在最倒楣的悲惨之中。雅尔地的园墙垮掉了。这是建筑师的过失，因为他没有打好坚实的墙基。虽然他该受谴责，可是事情还是落到我的身上。这个人一个苏也没有，虽然我已预付过他八千法郎。”

围绕着巴尔扎克的产业的园墙是他所不可缺少的。这是他与世隔绝的一个象征，而且这围墙能肯定

他的意识，即他的确占有了他立足其上的这块土地。工人于是又被召来重立围墙，过了几个白天、几个雨夜之后，他又被轰鸣的雷声惊醒了。松软的地基又一次垮掉，围墙再度崩塌。这一次情况更加严重，崩裂的石块滚动着碾过邻居的田地，邻人极为愤怒，声称要以打官司来要挟他。Qui terre a, guerre a（谁拥有土地，谁就有仗可打）——这原是巴尔扎克的小说《农民》（“Les paysans”）的主题。正如《幻灭》里那种情况一样，他对自己所描写的题材也有真切的个人经验在内。而且他还得忍受整个巴黎的幸灾乐祸。每张报纸都多多少少带有真实性地登载了关于巴尔扎克房屋的轶事。甚至于还有人说他忘记装上楼梯。跑去观看现场的人回来时万分欣喜地报告说他们得怎样冒着生命危险爬上瓦砾。他们的故事比巴尔扎克园中的花木还滋长得茂盛。

巴尔扎克退居于更严格的遁世生活中，他谢绝邀请客人来访问，但是这并不成功。他的老友法警们和其他的法律宠儿并不因为石路崎岖就怕爬山越岭，而且，在搬走了他最值钱的家具后，给他那拥挤的房间里提供了较多的空间。在他的山村隐居，在那儿他本希望献身于写作并耽赏那美景色的，现在老把戏又开始了。每当他的瞭望哨报告有可疑的

生人在附近侦视，他就把值钱的东西搬到伯爵夫人的小庐里去。等到海岸再次肃清，失望的法警发现这个“鹦鹉笼”中除了一张书桌、一架铁床、几根不值钱的手杖之外并无家具而离去时，巴尔扎克的宝藏就又高兴地被送回原来的地方。

有几个月之久，他都成功地用这方法阻止了债主们的车轮向前行进。在这种事情上他感到天真的愉快，以机智胜过他们成为他从一生挣扎中所能汲取的唯一娱乐。不过，最后，他发现碰上了一位真正的高布赛克^①，这家伙恐怕就是从巴尔扎克自己的小说里学会如何战胜刁恶的债户的。使巴黎所有的是非之徒高兴的是，他提出了控诉，不是针对巴尔扎克，也不是针对他的情妇，而是针对那无辜的戴绿帽子的桂都邦尼——维斯冈地伯爵。伯爵被控告为：

“一方面把巴尔扎克一部分家私隐藏在秘密地方，一方面又把上述人的家私从称为雅尔地的地产上搬走。而且他还处心积虑地参加一个行动，去剥夺巴尔扎克的债权人所有的相当

^① 高布赛克 (Gobseck) 原是巴尔扎克一篇小说的名称。作品的主人公名高布赛克，是个放债的人，小说就是写他如何讹诈欺骗债务人的。

值钱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本是他们的权利的保证，因此他们大受损失，这是他必须赔偿的。”

这就是巴尔扎克美梦的结局。他的“陋室”花了他十万法郎，这数字比在沙姆爱丽赛买一所房子花费还多。伯爵夫人的罪也受够了。她跟巴尔扎克的关系不能再忍受无穷无尽的经济困难的压力，于是她就从鞋上掸净了雅尔地的尘土。巴尔扎克不知该怎么办才好，然而他决不肯完全放弃幻想。为了努力去保持当个产业主的徒然雄心，他又一次使用诡计，以一万五千法郎代价搞一次假拍卖，希望将来转败为胜，但是这也没有成功。他再一次被迫去寻找一处新的避难所，这次选择落在巴士街的一所房屋上。这是他许许多多住宅之中唯一今天还存在着可以让我们去参观、并尊之为“巴尔扎克故居”的地方。

第十八章

戏剧上的投机

“每样事情都越来越糟糕——我的工作和债务都如此。”以这样一句扼要的话巴尔扎克概括了他在四十岁上的处境。他在雅尔地的三个年头完全消耗在徒劳无功的努力上，为了应付房产业务，他卷入了他所承担的许多义务之中。他从来还没有这样辛苦过，然而他最后不得不承认，即使一年写出五部小说也不足以清除他六位数的债务。就是从文件架上把所有曾经开始而尚未完工的作品都汲出油水来也无济于事。他甚至拼凑了一本拿破仑格言集，这是替一位渴望得到荣誉勋章的可敬的手工艺大师做的。在我们面前呈现出一幅可悲的巴尔扎克的画像，在他声望最高的时刻还要匿名出卖文笔去满足一位陌生人的小小虚荣，为了赚一笔小钱。他所需要的款子以

正常的方式是不能挣到的，他需要的是一笔神奇的天降之财。既然撒丁银矿不肯把银子向他献出，他就转向另外一个来源，他盼望能由此取到适当数量的贵重金属，这就是戏剧。

只是在极端压力下，而且十分违反自己的意愿，巴尔扎克才强迫自己去为舞台写作。他十分清楚，完成《人间喜剧》这一组小说才是他的使命。拿出喜剧脚本并不是他的事情。本能警告他，他的才能不会在戏剧方面得到充分的表现。他的小说的特征是人物性格的逐步起化学变化，以及性格同环境的关系，而不是以表现戏剧性的惊奇场面为特征。当他写作时，笔端如洪波翻滚，他需要的是广袤空间，所以每次要将他的小说搬上舞台都归于失败，这决非偶然。舞台场面受人为了的限制使他的人物显得不自然，因为这里没有地方表现色彩的细微差别和逻辑的细微变化。

但是，依靠集中的意志力量和内心全部能力的运用，以巴尔扎克的天才，本来也同样有可能取得戏剧技巧上的成就，象他在小说方面所显示的那样。可是这种集中与一心一意的献身戏剧，本不在巴尔扎克计划之中。他从前的成为一位新的拉辛或高乃依^①

^① 高乃依 (Corneille, 1606—1684)，法国剧作家。

的梦，早已化为乌有。目前他仅仅把戏剧看做容易捞钱的手段罢了。这是一种细加考虑的冷静盘算，比起他放在菠萝种植计划和铁路股份生意上的盘算，在这上面并没有增加更多的艺术价值。在他动身去撒丁之前，他曾以安详的玩世态度写信给珠儿玛·卡罗说：“如果我在目前这个事业上失败了，我就全心全意投身于戏剧。”

除了这“最后一招”他再没有旁的办法了。他希望从这一营生获得比凭书稿卖钱“更为有利的收益”。他已经考虑到一个可能性，即写出一个成功的剧本将给他带来十至二十万法郎。当然他还不能保证在他第一次尝试中就能得到这样一笔收益，但如果他一年能写出十几本戏来，那么长期以后他定会成为优胜者，就可以认为象数学的得数那样稳操胜券了。

这种冷冰冰的计算成败，就是巴尔扎克开始去征服戏剧世界时如何缺乏严肃态度的足够证明。他的意向就是，把剧本掷上舞台，就同赌徒把一个金路易掷向轮盘赌台一样地轻而易举。决定胜负的不是劳动成果，而是碰运气。他的行动计划是简单而毫不含糊的。最重要的一步，对他的雄辩和机敏要求最高的一步，就是得找到一位戏剧经理，能跟他巴尔扎克

签订最有利的合同，他还愿意付给巴尔扎克最多的预支款项。这一步做到之后，剩下的就只有在约定日期交出完成的剧本这件小事了——把这事同从十分勉强的经理手里挤出合意的预付款项（那可是一桩巨人的工作）来相比，这简直是儿戏而已。巴尔扎克主意并不少，书桌抽屉里还放着有一打左右青年时期的劳作。他只要雇用一位“死鬼”来做些文字加工，随便一位愿意廉价工作的年轻人就行。必要的只不过是向合作者解释剧本的布局，再花上一两个夜晚去注射一点必要的活力和加上必要的抛光。这样一来，每个剧本花上不超过三四天的时间，他就可以用左手舒舒服服地在一年之中拿出二十部左右的剧本，而同时他的右手则可以用来从事真正重要的工作——小说的写作，那才是既细心筹划又发愤构思的东西。

*

*

*

*

*

尽管巴尔扎克期待着享受巨额酬金，而他关于戏剧的要求却如此漫不经心，甚至于都不肯麻烦自己去寻找一位通晓舞台技术的合作者。他胡乱地找到了第一个为他卖苦力的人，一位穷途潦倒的波希米亚人，名叫查理·拉萨伊，这个人与戏剧从无瓜葛，他的才能就连最宽厚的批评家也要保持缄默。谁

也不知道巴尔扎克在什么地方拣到这么一个小小的可怜的神经病人，他看上去倒象一张会走路的漫画，脸色抑郁，鼻子巨大，乱蓬蓬的长发披到肩膀，带着一股浪漫忧郁的神情。巴尔扎克大概是在街上或者一家咖啡馆里遇到他的吧。不管怎样，他并不曾站下来问问对方的资历，而是不容分说地拉上这个迷迷糊糊的牺牲品到雅尔地来跟他住在一起。他的决心是如此之大，就在当天，便开始着手一出悲剧的写作。其结果乃是一场大笑话，即使巴尔扎克后来闹的笑话也没有超越过它。

这倒楣的拉萨伊，当他跟着这位善于游说的同伴来到达芜雷城的时候，丝毫不知巴尔扎克到底要他干些什么。他头脑中就戏剧而论是空空如也，对于从事写作一部戏剧的方法，他也没有任何概念。虽然巴尔扎克一路上用计划和设计的连续不断的炮火对他轰击，但到了家里，他的第一步工作乃是为他未来的合作者提供一顿美餐。巴尔扎克正常的吃饭时间是五点钟。餐桌上十分丰盛，忧郁的客人面前堆满了好酒，都是一辈子从未品尝过的。在热情的款待之后，他显著地兴奋起来。筵席既终，他大概也确实达到了能向主人贡献启发性忠告的境地。但使他吃惊的是，巴尔扎克六点钟时就从饭桌起身，命他上床

去。

拉萨伊，他的日子一向是从太阳落山的时候开始，也许自从童年以来就没有在六点钟上过床，这时却不敢违抗。他让自己被带到卧室，顺从地脱下衣服，钻进被窝，由于喝下了那么多的酒，一会儿工夫他就酣然入睡了。

午夜光景，当他睡意正浓时，他的肩膀被人猛摇。他猝然惊起，看到巴尔扎克好象一个鬼站在床边，穿着一件白色袍子。他受命立刻起床，因为已到开始工作的时候了。

可怜的拉萨伊，颇不习惯于巴尔扎克的昼夜颠倒，以一声长叹镇定了一下神志。他没有勇气以自己的意愿去对抗新主人的意愿。新主人在自己桌边给他安排了一个座位，于是一直到了清晨六点钟，他都倦眼迷蒙、心神恍惚，倾听巴尔扎克关于委托给他写作的戏剧的说明。然后巴尔扎克允许他再回到床上去。在白天，当巴尔扎克写他那本手头上的小说时，拉萨伊就该起草最初几场戏，到了晚上，他就应该把稿子交出，以便共同修改。

午夜再度来临之时，拉萨伊处于战栗状态。在等待这个滑稽时刻到来时，他睡不安枕，作品当然不得不让他大受其罪，比睡觉的欲望要厉害多了。他带到

会议桌上的可悲原稿，在夜间开会期间受到了批驳，他得到了更新的指示。后来的两三天，他绞尽脑汁，巴尔扎克的佳肴对这可怜的奴隶已全无滋味；从六点钟到午夜，他眼巴巴躺在床上，一心只害怕即将来临的讨论。一天夜里，当巴尔扎克来唤他的时候，发现人已不见。桌上放着一封信：

“我不得不放弃您这番极端的好意委托给我的工作。我度过这一夜，一点也想不出有什么值得写在纸上的东西，来满足您计划中的戏剧所需要的。我不敢当面把这情况奉告，但是继续吃您的面包已无用处。不过我也十分绝望，我的脑袋里是如此贫乏竟这样毁灭了我的良好愿望，因我希望已久，原以为由于一次意外的好运气我能使自己摆脱困境。……”

这个逃亡如此突然，使巴尔扎克得不到时间再去寻求一位合作者。为了取得文艺复兴剧院已经答应的一千法郎的预支，他只得亲自来完成这个剧本。当他还在写作《第一小姐》（“La première demoiselle”）或者后来改称《家政学校》（“L’école des ménages”）的最后一幕时，不少于二十个排字工

人被雇来排印第一幕，以便使他的合同得以尽早签订。几天之后，他就能交出完成了的剧作。但是现在他发现了，他的小说家的名气在戏院经理身上并无分量，这些人的脑筋全受票房收入的统治。文艺复兴戏院的经理直率地拒绝接受剧本，于是巴尔扎克赚得容易钱的这另一个美梦又被现实世界的冷风吹散。他只不过给他自己的幻灭故事又加上了一章罢了。

换一个人一定会觉得屈辱，至少会豪情大减，可是巴尔扎克的失败只能产生使他加倍努力的效果。同样的事情不是在他的小说问题上也发生过吗？他们当初不是排斥过他，尽量使他气馁的吗？他的迷信天性甚至竟在这个初次挫败中看到了未来成功的保证。他给伯爵夫人写信道：“我在戏剧方面的前程定会走上我在文学方面所走的同一道路。我的第一部剧本必定会遭到拒绝。”所以他必须再接再厉！他必须研究，在为取得新合同这件事上还有什么应该做的！

鉴于巴尔扎克的这种不可救药的方法，即把对话戏剧化以后就管这结果叫剧本，我们认为已没有什么希望使他的新剧本能改进多少。可是新合同却的确要强得多。从第一次的经验中得出合乎逻辑的

结论之后，他决定不再使自己受到剧本被拒绝的屈辱，而哈瑞尔，圣马丁戏院的经理，也同意接受排演，虽然在这之前他并没有看到稿子。由于碰巧的机会，巴尔扎克听说哈瑞尔需要一个能够吸引观众的剧本，而且很着急，于是他提议把他的《伏特冷》（“Vautrin”）加以剧本化。哈瑞尔极感兴奋。多谢《高老头》和《幻灭》，它们使伏特冷已经变成一个如此出名的人物，他在舞台上的出现，尤其是如果这角色由弗雷德里克·勒梅特尔^①扮演，一定会造成轰动。合同圆满签订，双方心中都饱存幻想，以为金钱即将滚滚而来。

这一次巴尔扎克费事更多。为了监督哈瑞尔，他离开雅尔地几个星期，住到李希刘街他的裁缝布伊松家去，这地方离戏院只有几分钟的路程，他的意愿是要出席所有的排演，为即将到来的巨大胜利做好准备。他开始在出版方面下功夫，展开了大规模的宣传，还跟演员们讨论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人们每天都看到他穿着工作衣和宽大的、剪裁得很差的裤子，不戴帽子，皮鞋舌头耷拉在鞋外，气喘吁吁走到戏院去跟角色们谈论某些特别动人的场景，或者为朋友们

^① 弗雷德里克·勒梅特尔（Frédéric Lemaître, 1800—1876），法国著名演员，以演莎士比亚、雨果等人的作品及政治滑稽歌剧著称。

定下包厢，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坚持全巴黎的社会名流和知识界名流都要出席他的首场演出。在所有这些忙乱中，却有一件小事好象是从他脑子里溜掉了，他忘记了去撰写剧本。经理曾听过他叙述剧本大意，每一位演员对于自己所要扮演的角色都曾听过他面授机宜，每件事都准备停当，只等候第一次排演。但是哈瑞尔还在等待他的书，而演员们也在等待他们的台词。巴尔扎克答应，二十四小时后他们的要求就会满足；一切都已准备停当，排演明天就能开始。

泰奥菲勒·戈蒂耶，在他的几个同时代人中，他的记载是没有夸大嫌疑的一个，曾为我们描述过巴尔扎克以什么方式来实现他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写出一部五幕剧的诺言。他邀请了四五位可靠的朋友，他们是他选择来当他的执行班子的，要他们到布伊松先生家中他的住处开一次紧急会议。泰奥菲勒·戈蒂耶是最后一个出现的，受到了白袍主人喜悦欢笑的迎接，主人象笼中狮子那样在屋里踱来踱去：

“啊，你来了，泰奥，你这懒家伙！老是迟到，瞌睡虫！赶快行动！你一个钟头之前就该来的。我明天早上就得向哈瑞尔宣读一本五幕剧。”

然后就来了有趣的一个场面，戈蒂耶曾在他的《人物志》（“Portraits”）中这样记载：

“那么，你要问我的意见吗？”我问道，舒服地坐在一张圈椅里，打算倾听长篇朗读。

巴尔扎克从我的安详态度猜到了我的思想，用天真的风度回答：“剧本还没有写呢！”

“见鬼！”我嚷了起来。“那么朗读就得延期六周了！”

“不，不！我们马上把它打磨出来，好收现钱。我有一笔紧迫的债务要应付，不能再等了。”

“可是你怎么能在明天就搞出剧本来呢！连抄写的时间都没有啊！”

“我告诉你怎么办。你写第一幕，乌里亚克写第二幕，洛朗—扬写第三幕，德·柏罗瓦写第四幕，我自己负责第五幕。明天中午我就要把整个剧本念给哈瑞尔听，照约定的那样。每幕戏不会超过四五百行，一个人一天一夜可以写出五百行对话。”

“你给我题目吧，告诉我你希望情节按照什么路子展开，尽量跟你一样精确地描写人物的性格，我就开始工作，”我回答，感到相当迷乱。

“噢！”他喊道，态度十分轻蔑，神气象是被这一要求压倒。“要是我必得告诉你们具体细节，我们就绝对不能准时交卷了！”

我决没有想到，问问他剧本写什么内容竟是很不得体的，但是巴尔扎克却认为这只是一种无聊的好奇。

费了好大气力我才从他那儿挤出剧旨的简略指示，然后坐了下来写出一幕对白，其中只有几个字保留在最后的版本上。当然可以想象出来，第二天剧本并没有念给哈瑞尔听。我不知道其他的合作者们都是怎么干的，只知道唯一认真插手此事的乃是洛朗—扬，因此这剧本后来也就献给了他。

看了这一段开场白，你自能想象这部剧本是个什么样子。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法兰西舞台上几乎不可能找到象巴尔扎克的《伏特冷》这样一部七拼八凑的可怜的作品，然而哈瑞尔已在广告上预告它是一部杰作。尽管满怀希望的作者包下了戏院中的一半座位，而头三幕都是在冰冷的、甚至是难堪的沉默中演过去的。他真正的朋友们看到他的名字竟同这样一桩骇人的愚蠢表演联系在一起，也感到同样的难

受，正象今天当我们看到这位伟大的文学天才连这个可笑的过失也印在他的全集里面所感到的一样。戏演到第四幕，暴风雨发作了。为了使伏特冷以一位墨西哥将军的扮相出现，弗雷德里克·勒梅特尔选择了一副假发，它十分可疑地酷似路易·菲力浦所爱好的发式。于是观众中几个保皇党员开始吹口哨，表示不满，同时奥尔良亲王也气势汹汹地离开了包厢。演出在一场混乱中结束。

第二天国王禁止此戏搬上舞台。为了挫败巴尔扎克的抗议，艺术部私下送他五千法郎做为补偿，但他却骄傲地拒绝了，为的是至少能从失败的废墟上补偿到某种精神胜利。然而即使如此惨重的灾难还是未能教会他改弦易辙。他又试过四次运气。《桂诺拉的富源》（“Les ressources de Quinola”）和《帕梅拉·基罗》（“Paméla Giraud”），虽然这两篇质量稍好，也都是失败的货色。《继母》（“La marâtre”）亦复如是。只有《阴谋家》（“Le faiseur”），唯一的一部还算配得上他天才的剧本，在他生前并未演出过。他痛苦地想起聪明的诗人海涅给他的明智忠告。那是在《伏特冷》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公演之前，他有一次在路上遇到海涅，海涅劝他限制自己只写小说：

“您一定要小心！一个惯于在布雷斯特服刑的人是不会习惯于土伦的。坚守你所熟悉的监狱。”

雅尔地的建造，撒丁银矿和剧本的制作，这是三大愚蠢表现，它们证明巴尔扎克在四十岁上，在办理世俗事务方面，比起十年或二十年前来，其幼稚和不可救药的程度并没有怎么减少。他的放肆行为确实实增大到更为疯狂的规模。他似乎变得受制于更大的冲动，只想去做蠢事。但是我们，我们既能从若干年后的今天所提供的角度去观察他，也不宜于追随那些甚无礼貌的同时代人，只去强调他那盲目挥霍的倾向，而抹杀了他心灵的清澈本质，这种本质是使他有本事写出创造性的著作来的。

在那些年头里，当报纸兴高采烈用添油加醋的故事渲染他在雅尔地的计划和失败的时候，当批评家、新闻记者和群众都在幸灾乐祸地等待着他在戏剧上失败的时候，他却毫不气馁地继续撰写《人间喜剧》。他创办自己的期刊的企图，在不动产上的投机，烦人的诉讼对他的纠缠，这些都不曾阻止他以毫不动摇的坚韧把他的头脑和笔杆贡献给对他来说是最为真切的世界。当工人们在埋头干活时，当房屋四周

的围墙崩塌时，他完成了《幻灭》宏伟的第二部分，同时还继续写作《妓女们的盛衰》（“Splendeurs et misères des courtisanes”）和《古物陈列室》（“Le cabinet des antiques”），以及那本雄心勃勃设计的、然而写得并不很成功的小说《柏阿特里斯》（“Béatrix”）。他还写出两本十分完美的作品，即政治小说《一桩可怕的故事》（“Une ténébreuse affaire”）和非常写实的《搅水姑娘》（“La rabouilleuse”）；还有《两个新婚女郎的回忆》（“Mémoires de deux jeunes mariées”）；短篇音乐故事《玛西美拉·杜尼》（“Massimilla Doni”），它是这类作品中的杰作；《错误的情妇》（“La fausse maîtresse”）；《雨儿胥·米露埃》（“Ursule Mirouet”）；《马尔卡斯》（“Z. Marcos”）；《毕爱丽黛》（“Pierrette”）；《夏娃的一个女儿》（“Une fille d’Eve”）；《卡迪昂王妃的秘密》（“Les secrets de la princesse de Cadignan”）；《地区的才女》（“La muse du département”）；《加尔维尼教的殉道者》（“Le martyr calviniste”）和《皮埃尔·葛拉苏》（“Pierre Grassou”）。另外，他发表了十二篇杂文，准备好了《乡村的教士》（“Le curé de village”）的初步轮廓，起草了《夫妇生活的小悲剧》（“Petites misères de la vie conjugale”）的几个片段。

在这风狂雨暴的四年中，他的文学产品又一次在分量上和价值上都足以与任何一位其他作家的毕生成就相匹敌。没有任何浸透了生活的外部混乱的痕迹侵入了他那创造性的清醒梦境。从这些著作中丝毫看不到他那颇受嘲笑的性格上怪癖的痕迹，当他一心从事写作这些作品时，他被深深吸引住了，因而排除了其他的一切。其中有很多篇，无论在文风的精炼上，还是在松散赘语的克制上，都超过了他所有从前的故事，尤其是后一种毛病，他过去是常常不能自己的。事情仿佛是这样的，落在他命运上的失望与失败的秘密创伤，已经把那令人作呕的伤感情调给慢慢地吸收、中和了，而这种情调在他早期作品中曾显示出那个时代的矫揉造作的浪漫气味。他在艰苦的人生学校里越向前进，他的作品就越加写实。他以日益敏锐的和怀疑的灼见，深入到社会组织的核心，对构成社会整体的互相交织成分的理解也越来越带有先知性。四十岁上的巴尔扎克比他三十岁的时候更加接近于今日的世界。十年的间隔带他走近了一百年。

这一时期他的文学成就是如此宏伟，却远远没有罄竭他那迅速恢复的精力。虽然在埋头工作，他却从垂下的窗帘后面以留心的目光向外观看，不只一

次地被诱去试图抵抗他在外界社会所面临的那些顽固事情。在巴黎，一些作家终于做了一种尝试：为了保护他们的职业利益而联合起来，建立了一个叫做“作家协会”（Société des gens de Lettres）的软弱的小团体。它的会员们偶尔聚集在桌旁通过议案，而这些议案他们却懒于履行，结果就放在各部的文件柜里积累尘土。巴尔扎克第一个认识到，如果作家们真正联合起来，意识到自己的使命，他们就能在国土上代表一种力量。以他惯有的急躁性，他立即致力于把这软弱的组织改变成为保护作家权利的有效武器。

巴尔扎克在被愤怒激恼时是最为能干的，而且他也确有其个人的理由大发雷霆。他写的每一本书都在油墨未干之前便被比利时人翻印了。比利时的出版商从来不曾从利润中付给他一个苏，却向欧洲每一个国家洪水般送去他们的翻印本，这些版本他们卖得要比合法版本便宜得多。因为没有作家的报酬要付，并且书本都是马马虎虎印出来的。不过，巴尔扎克并不把这件事情当做个人损失来追问。他关心的是他的行业的声誉和地位，于是他起草了一份《作家协会文艺法典》。这部法典，在文坛上是一本具有历史重要性的文献，其地位等同于《人权宣言》之在法兰西共和国，《独立宣言》之在美利坚合众国。他

到鲁昂发表演说，多次努力将同行作家们组织起来，以求一致行动。但他的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他必需去抗争的阻力和无聊的争论，对他来说未免太强了，于是他就退出了这个其大不足以容纳他的思想、其活跃不足以适应他的强烈性格的协会。

他能影响他那一代人的本领又一次经受考验。他在对无名公证人柏伊特尔的支持上又一次被发现在这方面是没有本领的。柏伊特尔以杀死妻子和男仆的罪名被判处要上断头台，而这个判决有很大可能是公允的。柏伊特尔，他从前是个新闻记者，在经过持续的经济困难之后，终于娶了一位斜眼的然而却是富有的克里奥尔^①女人为妻，这女人过去的生命是不堪入耳的谣言的话题。据说她父母家中的男仆是她的情人，她嫁给柏伊特尔的时候，将这男仆一块儿带了来。一天夜里，她和这男仆在从邻近村庄回家的中途被人谋害。柏伊特尔，在受到尖锐的审讯后被迫承认是他杀死了男仆。如果只是这一桩事情，他也许会得到从轻发落。但是陪审团一致认为，他利用这个良好机会只是为了摆脱妻子，因而能够继承他的产业。

^① 克里奥尔 (Créole) 指在西印度、西班牙美洲和美国南部原属法国、西班牙诸州的欧洲或欧非混血后裔。

几年之前，巴尔扎克曾与柏伊特尔熟识，那时他们是在《猎禽报》的同事。他对这案件在心理方面感到兴趣。也许他还受到另一想法的诱惑，就是要继承伏尔泰在卡拉斯事件^①所建立的传统，这个传统后来由左拉在德雷佛斯案件^②上如此辉煌地继承了——法兰西作家就是这样作为公民权利的捍卫者，无辜被告的辩护人。巴尔扎克把工作推到一边，跟卡发尔尼一同出发到柏里去会见罪犯。他那极易点燃的想象力很快就使他相信柏伊特尔是为了自卫才放了那致命的一枪，意外地击中了在黑暗中逃走的妻子。他立刻坐下写出给上诉法院的备忘录，这是一篇充满法律灼见和法学逻辑的杰作。不幸的是，上诉法院拒绝接受任何非官方送来的文件，只考虑被告律师送来的无效请求。呈递国王恳求宽恕的呈文亦复如是，也被驳回了。巴尔扎克，他不惜时间、金钱、精力去

① 卡拉斯（Calas）事件，卡拉斯（1698—1762），法国图卢兹城一个商人，加尔文派教徒。他在长子失踪后隐瞒其自杀的真相，法庭指控他为阻止儿子皈依天主教而犯下谋杀罪，被判处死刑。伏尔泰帮助他的家庭打赢了一场证实判决错误的官司，一七六五年卡拉斯得到昭雪。

② 一八九八年，左拉曾为被诬陷判处徒刑的法国军官德雷佛斯（Dreyfus）辩护，认为他并无间谍嫌疑，并发表著名的《我控诉》一文。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德雷佛斯案件。

帮助一位他认为无辜的人，又一次遭到失败，柏伊特尔还是被处决了。

不过他接着还得有一次警告要接受，为了他的坚持到底。四年工夫已足以使他忘记《巴黎时报》的惨剧和他在那个冒险里所损失的金钱。而且归根结底，他还是抑制不住他的强烈愿望，要直接向他的同胞说话，宣布他的文学、社会和政治各方面的见解。他知道，巴黎的各期刊编辑和出版商们是不会允许他自由写作的。他曾以独立不羁的态度冒犯过他们。他企图要把他的意见发表在他们所控制的刊物上，其结果或是无人理睬，或是被肢解得面目全非。假如他不想让思想过多地闷死的话，最重要的，就是不时给自己提供自己具备的喉舌。

这一次他管它叫做《巴黎评论》（“La Revue Parisienne”）。他深信它会很成功，因为他打算亲笔来写全部内容。巴黎和全世界决不能够拒绝倾听：当奥璘利·德·巴尔扎克，法兰西唯一自由、独立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一周又一周地评论时事；当奥璘利·德·巴尔扎克亲自评论所有重要的新书籍和剧本；当奥璘利·德·巴尔扎克，欧洲的首席小说家，在自己的期刊上发表他的作品。这是成功的唯一通途。什么也不能留给别人。他把五个人的工作集于一身，不

但合并了编辑和编辑部的工作，甚至连财务方面也要照管。他校读清样，跟印刷商办交涉，督促排字工人，监视报刊分发，从早到晚，从排字房到办公室，不停地流着汗水跑上跑下。或者只穿着衬衣坐在肮脏的桌旁，在人声嘈杂中赶写文稿，同时还向部下发号施令。三个月之久他一直这样工作，写出足够印成三四本正规书籍的文稿。然而不久他的幻想又一次破灭了。巴黎也好，外面的世界也好，都没有表现出什么特殊的好奇心去注意巴尔扎克对政治情况究竟说了些什么；同时，他的文学、哲学和有关社会的观点也都遭到冷遇。三个月后，他离开了编辑的位子，在又一次耗费了巨大劳力之后，却没有拿出任何东西来。

* * * * *

但是他的努力也并非完全没有结果。如果说，《巴黎评论》在这短短期间仅只发表了巴尔扎克关于司汤达的《巴马修道院》（“La chartreuse de Parme”）的评论这一篇文章的话，那么这一篇也就足以应该在《法兰西文学年鉴》里占有一席之地。巴尔扎克的慷慨大度和他的艺术灼见从来还没有这样卓越地表现出来过，他在这篇文章里热情称颂一位无名作家的无名著作。象这种出自本能的同志式的感

情，就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找不出几个例子。巴尔扎克以这样一种自发的豁达，自由地，完全出于自愿地，将棕榈叶（指荣誉。——译者）归于他在小说界的最大竞争者，而且，远在司汤达成名的时代几十年以前，他就想为司汤达赢得他所应得的声名了。为了估计这一精神的真实价值，我们应该比较一下这两个人在同时代人眼里所处的地位。当时，巴尔扎克的声望早已从欧洲的这一端传到了那一端，而司汤达还全然不为人所注目。甚至在他死的时候，他的讣告总共也没有在报刊上出现过几次，还把他的笔名误为“司汤哈”（Stenhal），又把他的姓氏误为拜尔（Bayle）^①。他从来没有被列入法兰西作家的行列。期刊上用来充塞篇幅的是阿尔丰斯·卡尔^②、于勒·雅南、桑多、保罗·德·考克^③以及其他玩儿命写作的粗制滥造的撰稿人的赞颂和批评，这些人的作品现在已被遗忘，而当时却销售过几万册。可是司汤达的

① 司汤达（Stendhal）是笔名，刊物上把其中的“d”漏掉；他的真名为 Marie Henri Beyle，刊物上误把“Beyle”拼作“Bayle”。总之连姓氏带笔名都被搞错。

② 阿尔丰斯·卡尔（Alphonse Karr，1808—1890），法国作家兼记者。

③ 保罗·德·考克（Paul de Kock，1793—1871），法国作家。

《爱情》（“l'amour”）卖出的总数只有二十二册，所以他自己戏称为“一本圣书”。因为没有人敢触摸它。就连《红与黑》，当他在世时也没有出过第二版。

职业批评家看不上他。《红与黑》首次出版时，圣伯夫认为它不值一提；当后来他提到这书的时候，也是相当蔑视的。“他的人物，”他说，“都不是活着的，他们都是精巧构造出来的机器人。”《法兰西杂志》评论道：“司汤达先生不是傻子，虽然他光写傻书。”歌德在同爱克尔曼谈话中对他表示的赞许在当时并未引起注意，直到司汤达死后好久才被人察觉。然而，巴尔扎克从他最初的几本作品就认出了司汤达的特殊品质和他对心理方面的精心掌握。他利用每个机会去向这位作家致敬，他认为这人在写书时只为了自己的愉快，而在出版它们时并不怀有获得成功的野心。在《人间喜剧》里，巴尔扎克谈到爱情的结晶过程，而这却是司汤达第一个描写的。他还提到司汤达的意大利游记。司汤达过于谦虚，没有能够在这些友好表示的基础上去接近这位著名的同行。他甚至于没有给巴尔扎克送上他的新作。幸好他的忠实朋友雷曼·哥伦布这样做了，这才引起巴尔扎克对它们的注意；同时他还请求巴尔扎克支援这位作家的事业，因为他还未能被批评家们所欣赏。巴尔扎克立

刻在一八三九年三月二十日回信说：

“我已在《宪政报》中读到《修道院》的节录，它使我犯了嫉妒之罪。是的，当我读到那一段关于战争的高超准确的描写时，我被一阵嫉妒击倒了。正是这战争，我曾为我的《军旅生活之场景》梦想过的，把它写出来，乃是我曾经做过的最难的一件事。我沉醉，懊恼，着迷，我简直被这一小段文章弄得绝望了……您可以相信，我确是诚诚恳恳地说出我是怎样看它的。这个片段引起了我的期待，它会使我在要求上更加严格。……”

看到自己的下一本小说，一次拿破仑战役的描写的主要场景已被另一位作家以尽善尽美的技巧写了出来，器量小的人定会感到气恼。十年来巴尔扎克一直在脑子里构思《战争》的布局。他不要传统的英雄、伤感的画面，而打算表现现实的情况，忠实于历史事实，细节确凿，渗透时代精神。现在他已太迟了，司汤达已经捷足先登。一位艺术家，其思想充满财富，其创造天才永不枯竭，是可以慷慨得起的。他还有一百个题目可以加工，体现在他的作品中嘛！巴尔

扎克并不曾因为同时代人中有一位写出了他心里本来要写的杰作而感到烦恼。所以，他毫不吝啬地去称颂《巴玛修道院》，称之为“意识文学的杰作”。

“这部伟大的作品，其构思、着笔只能出自一位五十岁的人，他春秋正富，精力正强，才具成熟。”

他对这部小说的内心活动的杰出分析，加上他认识到司汤达对于意大利精神的各种形式、各种变体是有深刻理解的，他的评论至今还未被就此题目写作的任何一位批评家所超过。

司汤达大为奇怪和惊慌，当巴尔扎克的评论闯进了他的孤独生活的时候；那时他正在契维塔韦基亚被任用为领事。最初他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一向至今，他的作品除了不足取的评论外，再没有别的。但是这次却是一位他所尊敬的人的声音。巴尔扎克把他当做同自己品第相等的作家来向他祝贺，而司汤达所写的谢函也流露出他那无从抑制的一种困惑之感。他开头写道：

“昨天晚上我大吃一惊，先生。我想任何人

都不曾有过让他的作品这样地被人在杂志里讨论过，而且还是由这问题的最高的法官来进行的。您的怜悯落在一个曾经被人弃之街头的孤儿身上。”

然后，他就表示感谢，为了“一篇令人惊奇的文章，从来没有一位作家从另一位作家手中得到过的”。

他本人也有着跟巴尔扎克同等的艺术灼见，他接受了向他伸来的兄弟援手。他知道，他们两人都是为比他们晚些的时代去写作的：

“等我们死去，我们就跟这些人交换任务了。只要我们还活着，这些人就具有绝对的权力来统治我们迟早要朽坏的身躯；然而过此之后，他们就会永远被裹入遗忘之中了。”

感谢物质的某种神秘的亲合力，心灵得与心灵相通。在当日的蜉蝣文学的吵闹与混乱之上，这两位不朽者都宁静地彼此相望，他们心中有数，他们是与众不同的。以往巴尔扎克的直觉很少比这一次表现得更超卓。在当时出版的几千本书里，他竟选择了其

中最不为人注意的一部来特别加以称颂。可是他对司汤达的爱护并没有在同代人当中引起回响。它为当日学人所忽视，正象他为柏伊特尔所做的辩护也被上诉法院所批驳。他的炽热的呼吁又复徒劳无功，如果一件伟大的道德行为，不管是否成就辉煌，都可以被说成徒劳无功的话。

* * * * *

徒劳！徒劳！这两个字巴尔扎克经常对自己使用，也更经常体会到这句话的真实性。在四十二岁时，他的自强不息的头脑已经出产了一百部书，创造了两千个人物，其中许多都将流传不朽。他已从自己头脑里构造出整个世界，但是他所居住着的那个世界却对他一无所酬。在四十二岁时他比过去更穷。在莱底斯居耶尔街，他至少在幻想上还是富有的，而现在就连这些也都烟消云散了。工作什么也没有给他带来，除了债务之外。他为自己建造了一所房屋，但已被抄押去了。他创办了刊物，但它们辜负了他使它们出版下去的努力。经商事业已经失败，进入政治舞台的活动也被不友好的选举人阻挠，进入科学院的候选权也遭到拒绝。他从事过的每件事情都已落空，或者似乎已经落空。他的身体的耐力，过分兴奋的头脑，过度紧张的心脏，是否都能长此以往抵挡这几乎

无法忍受的负担呢？他还有力量去完成《人间喜剧》吗？他还出得起钱再休息一个时期吗，可以跟其他的人一样出去旅行而摆脱焦虑？巴尔扎克生平第一次受到了一阵阵气馁的打击，于是他当真动了离开巴黎、法兰西、欧洲的念头。他考虑到巴西去定居，那儿有一位名叫彼得罗的皇帝，他也许会援救他，给他安一个家。他弄到有关巴西的一些书籍，脑子里翻转着这个问题，又做起将来的美梦。事情不能再象从前那样继续下去了，这一点他是深深相信的。总会有个什么神迹把他从不结果实的劳作中拯救出来。那他一夜之间就会从奴隶生涯里获得解救，蠲除了已经使他忍受不了的重担。

但是这种神迹可能在第十一小时^①来临吗？巴尔扎克不大敢希望这种事了。居然在一大清晨，即一八四二年一月五日，当他彻夜工作完毕从书桌旁站起的时候，仆人送进了邮件。其中一封信，那笔迹是他早已熟悉的，但这一次纸上却加了一个黑边，火漆印也用的是同样的哀悼颜色。他撕开信，获悉德·韩斯迦先生已经逝世。那位女人，那位跟他订过山盟海誓的、他也起过誓要永远爱怜的女人，现在是寡妇了，还继承了丈夫的几百万家财。他那一半已被遗忘的

^① 第十一小时，即最后关头的意思。

美梦突然实现了。新生活就要开始了，那快乐的、无忧无虑的、平静的生活！巴尔扎克最后的一个幻想又已成形，这是他所有幻想中最后的一个。在这个幻想里他将度过余生，在这个幻想里他将辞别人世。

第 五 卷

《人间喜剧》的作者

第十九章

追求德·韩斯迦夫人

巴尔扎克一八四二年一月五日收到的信表明是他一生中最后一个转折点。过去突然变成了现在，还要统治将来。从此以后，他的意志力就集中在独一无二的目的上了。他跟德·韩斯迦夫人的关系本已日趋淡薄，现在必须重新恢复，秘密的订婚应完成于结婚，许诺应该兑现。

这个目标的完成需要的不只是平常的努力，因为在前次会晤之后的年月里，他们的联系已被转移到刻板公式的基础上。通信越来越冷淡、越来越不诚恳，因为归根结底我们不能破坏自然法则。他们互不谋面已长达七年之久。由于经济困难，或许也由于他和伯爵夫人的关系，巴尔扎克未能到维埃曹尼亚去旅行；同时，德·韩斯迦夫人也未能，或者不肯，游

说丈夫再去西欧旅行，只有到那儿才会有机会同旧日情侣会面。

因为如果要爱情持续，就需要两人的亲近，正象火焰要以氧气催活能力才能长旺不熄，而他们之间的热情却已逐渐熄灭了。巴尔扎克试图在情书里维持旧日的神魂颠倒的腔调，但是谁也不比德·韩斯迦夫人更清楚地知道，这只不过是一种矫揉造作的温情。她在巴黎的亲戚朋友们从未忽略过向她报告，桂都邦尼——维斯冈地伯爵夫人在雅尔地就住在他隔壁。他和马尔布提夫人的轻荡行为已成了评论的题目，甚至传到了遥远的乌克兰。如果德·韩斯迦夫人为巴尔扎克的甚不忠诚所激怒，或者她感到实在难于吞下那声嘶力竭的悲诉和永恒爱情的保证，那是并不奇怪的；偏偏巴尔扎克就是用这些倾诉和保证去消除她的种种狐疑，而事实上却已都被巴黎的每个长舌妇所知道的情况一清二楚地证明了的。一种尖酸刻薄的腔调潜入了他们的来往书信。德·韩斯迦夫人显然不能再隐瞒她的恼怒，因为她被期待着去相信他告诉她的所谓寺院生活。她多半也肯定用了直截了当的言辞去表达过对他所谓真诚的怀疑；因为巴尔扎克，在神经紧张的当儿，也给她寄过一封信，信里的字句丝毫未加修饰。他已不再能够忍耐被

这个女人傲慢地斥责为做出了“放纵的蠢事”，而她却在丈夫身边过着安逸生活，即使有过烦闷却不知道什么叫做忧愁。他在这种悲愤之下于是向她大发雷霆：

“我请求你，决不要干预，称赞也好，责难也好，那些人的事情，他们是落水灭顶、正在挣扎着露出水面的人！富人绝无本领了解那些不幸的人的困难。”

有一次，当她谈到他的“轻浮天性”时，他写得更加暴躁了：

“我怎么轻浮了？是因为过去十二年来我毫不休止地献身去完成一桩巨大的文学事业吗？是因为十年以来我心房中容不得一个以上的爱情吗？是因为过去十二年来我日夜辛劳地去偿还巨债？那是我母亲的无情的蓄意的策划加在我头上的啊！是因为，尽管受尽磨难，却仍然没有憋死自己，没有击碎脑颅，没有投河自尽吗？是因为我从不间断地工作，并且试图用各种新颖的方式，去缩短我被罚的苦役时间吗？请解

释！是因为我躲避社会，因为我孤独自守，为的是集中于我的唯一热情，我的工作，和我的债务偿付吗？……轻浮天性，一点不错！说实在的，你的举止就象一位地道的资产者所为，当他看到了拿破仑左转右转从各个方向去视察他即将作战的地方，然后评论说：这家伙就不能牢固地待在一个地方！他简直缺乏固定的主张！”

这一对七年未见，各自习惯于自己生活方式的情人之间的来往书信，早已中断了情韵和理性了。德·韩斯迦夫人有一个正在长大的女儿，她可以向女儿倾述衷肠，她不再需要在给巴尔扎克的信中寻找发泄，而且在她的安定的、有限度的生活圈子里她也没有什么秘密可以向人表白。巴尔扎克呢，在他这方面早已厌倦于长期等待，开始淡忘了那个显然注定不能够实现的誓约。一八三九年，他给珠儿玛·卡罗写信，请求她想着他的事，如果她碰到一位拥有二十万法郎的女人，哪怕只有十万也行，“只要她的陪嫁可以用来解决我的事情。”他早已停止梦想到天仙公主，因为事实已很明显，德·韩斯迦先生不会很快就抛下几百万家财撒手而去。他已准备把凝聚在可望而不可即的北极星上的目光收回，而去迎娶任何一

一个女人，只要她能还清债务，举止象一位巴尔扎克夫人的样子，照管雅尔地的家务就行了。在四十岁的年纪，这位现实主义者已经放弃他在婚姻方面想象力的过分飞驰，而回到他早年的公式：“一位女人和一笔家财”。

同德·韩斯迦夫人的通信本有可能就在这一点上寿终正寝。通信本也可以渐渐稀疏成为涓涓细流，就象珠儿玛·卡罗的那种情形一样，由于她更大的忠实要求，巴尔扎克对她也感到不满。可是巴尔扎克和德·韩斯迦夫人双方都不愿意断绝彼此的关系。当日这位最伟大的小说家对她的谦卑献身，这使她感到的自豪已成为几乎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她没有理由自愿放弃如此令人满意地扇起她的虚荣心的通信。而另一方面，巴尔扎克也不能免除自我描绘的习惯，这已成了他的第二天性。他需要有一个什么人，可以向其倾吐烦恼，描述作品，计算债务。正象她私下里计划着保藏他写给她的信，他也因想到有人把他的信件藏在什么秘密所在而感到不胜喜悦。

他们继续互相通信，虽然随着时光流逝而日益稀疏，偶然间他也会埋怨“寄来的信件太少”或“两信之间相隔太久”，而她也会责怪他写信不够经常。

对这后一种责难他是要发火的。她怎么敢于将他在通信上的分量去跟她的相比呢！她整天无事可做，她生活在“深沉的幽静中却没有多少工作”，而他则一直是时间紧迫，每天必须有十五小时用来写作和校对。他给她写的每一页信，都是从那些时间里挤出来的，本来可以用来撰写已经预支过稿酬的稿件，或者用于争分夺秒的急需的睡眠。他无需迟疑地让她知道，无论什么时候，她，这个滚在金钱堆里的女人，收到穷情人的一封长信，它就代表几百法郎的损失，这笔钱他本来可以用写给编辑或出版商的同样字数而赚到的。所以，这并不是对她过分的要求，如果他期待每两星期收到她一封信。她对此的回答象是一篇宣言，她只愿在他写信给她时才给他写，她只能一信还一信。他发吼道：

“哼！我终于发现了你小心眼儿已极，这证明你确是这个世界上的一名女生物！哼！你中止给我写信，是因为我写给你的信不够频繁！好吧，我的信不多，因为我没有钱去付邮资，虽然我本不想告诉你。是的，我已陷得如此之深，甚至于比这还要深。这很可怕，也很烦人，可这却是真的，就象你所居住着的乌克兰一样。是的，

我还有过这样的日子呢，我一面沿着大马路步行，一面满不在乎地吞下一个面包圈儿！”

这种小争小吵日趋尖锐，两信之间的间隔也日益增加，直到最后，在这封命运攸关的带着黑印的黑框信件到达为止，巴尔扎克已有整三个月不曾执笔了。我们可以觉察得出，他们早已开始在互相刺激着对方的神经。他们肆意指责对方冷淡、倦怠、诡诈的程度。两人都在指控对方应对如此退潮负有罪责，当初以“fortissimo”（最强）和“prestissimo”（最快）开始，而如今已失去“appassionato”（热情）^①了。

其实两人都无过错。错处在于那个特殊的不正常的关系，他们从一开始就陷进去了。他们本来期望只有短期的离别，然后结缡就是长久的了，他们认为这事为时不会太远。当他们在她丈夫尚在人间而以这样奇怪的方式来订结盟暂时，德·韩斯迦夫人提出的条件是，巴尔扎克必须忠贞于她。她唯一允许的让步就是，他可以到那种操神女生涯的女人那里去寻觅肉体要求的满足，她们的职业本来就是提供此种需要的。然而德·韩斯迦先生又活了八年，于是德·韩斯迦夫人的嫉妒，其实那只不过是受了冒犯的

^① 这三个词都是音乐术语，作者有意用此作调侃语气

骄傲心肠，就变成她与遥远的情郎恶化的根源。在长期冒充恪守诺言之后，他直截了当地给她写信：

“听着，听着：男人不同于女人，他能是女人吗？你不能想象一个男人可以从一八三四到一八四三年一直同女人在一起，你会相信吗？你当然早就懂得，从生理方面说，如果那样，他将要退化为阳痿和低能了。你说到‘妓女’。我本来可能成为 G 的朋友在罗马时的那种情况的^①。但你应当衡量一下那些整天工作的富有想象力的人在娱乐上的主要要求，他们的艰苦，他们的疲倦，等等；再考虑一下你挑剔我所持的那一点理由，和惩罚我所用的残忍方式——那么，你就不会一味叨念着过去，而只能为我们被分处于两地而伤心了。”

他的坦白言谈并无效果。虽然她也确信他那血气方刚的男性精力，但她却不肯宽恕他跟其他女人的越轨行动。虽然他并不是一位职业性的色鬼，而且他还向全世界证明了他献身于伟大文化事业的严肃态度，可她还是谴责他性格中的无常与轻浮。她舒适

^① “G” 是何人，不详。这句话的内情也不清楚。

而富足地生活在丈夫身边，丝毫无须做出些微牺牲，但她仍坚持苦恼的巴尔扎克必须生活得象和尚一样贞洁，象小职员一样节俭，不允许他有任何消遣和小小浪费，只能整夜里再加上半个白天都去写作，等待，再等待，也许到了那一天——只不过是也许——德·韩斯迦先生死了之后，她会决定去奖赏他的苦行和坚忍。当然，她也有一定的理由去埋怨他；可是，他本应该坚持自己的权利，去过自己的自由生活，做出摆脱她要控制他的行动的尝试。但他却计不出此，反倒瞞住要害问题，装出与他本来面目不同的另一副样子，并且说了许多关于他跟伯爵夫人以及其他女人的笨拙的谎话，就象一个怕挨打的小学生。为了某些不可解的理由，他竟不能采取勇敢态度去对付她在他的忠诚问题上的强横要求；对于这些事，不能以一位颇具信心的艺术家的尊严风度去应付一位俄国外省的专制贵妇。但是在他的小小遁词和不实之言当中，有一点他倒是十分诚实的。他一再保证说，远远不是为了寻找爱情冒险，他唯一的愿望就是要逃出他生活于其中的不安定的现状，而能求得宁静与稳定，这对他却一向是无缘的。他已开始厌倦这永无休止的挣扎，经过二十年不停的风浪搏斗之后，他所希望的最好的事情就是驶入平静的水面。他的冒

险已经够多了，女人也够多了，跟女人来往他只能在一部书写完与另外一部书开始的空隙中才有点时间，再加上幽期密约的不便和背后有个柔顺丈夫存在的不便。远在一八三九年九月，他已给珠儿玛·卡罗写过信，他对她决不敢说谎，语气无疑是诚恳的：

“我对您发誓，我已经把一切希望，一切奢念，一切野心都收起来了！我想过牧师生活，简朴、平和的生活。一个家财三四十万法郎的三十岁的女人，如果性情随和，外表雅致，会发现我是很愿意娶她的，只要她也愿意嫁我的话。她将为我还清债务，五年之后，她将以我的收入得到补偿。”

这原是他在德·韩斯迦夫人身上期待着产生的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认为还把希望都放在这样一位女人身上，既住在千里之外，而且又不再是六七年前他所结识的情妇了，那简直是无法忍受的事。北极星相距太远了，照不亮他的生命。不知不觉，他这位“爱情伴侣”再次变回到那位他曾以秘密美梦相告的“不知名女郎”的身分了。倾诉忏悔的法术也失去了魔力，因为它已退化为例行的公事，只消过一

段时间他就对她表白一次，无非漠然行事而已。一八四一年九月，在那封命运攸关的信件到达之前的三个月，他给她写了大概可以说是最后的一封信。他已不再抱着可以当上德·韩斯迦夫人的丈夫这种幻想了。爱情和财富上的美梦已成过去，可以把它同其它的幻灭归到一处了。

* * * *

当他撕开带黑边的信封，读到德·韩斯迦先生已于一八四一年十一月十日逝世的消息，血液从他的心脏中直冲出来，他如此激动，双手都发颤了。不可想象的事，或者说，他已不敢再加想象的事，居然发生了。他曾经向她保证过永恒爱情的女人已经自由了。她现在是寡妇了，是拥有他曾梦想过的一切财富的寡妇，是他的理想的妻子，是一位贵族的、仍然年轻的、聪明的、在社会上能够被人接受成为奥璠利·德·巴尔扎克配偶的、能够清偿他的债务、使他得以全力从事真正重要的工作、培育他的天才、增高他的名望、满足他的情欲的女人。他一度曾经爱过这个女人，她也爱过他。在这得知她已获得自由的闪电似的一瞬间，他的热情又从微弱的灰烬中燃烧起来。他颤栗的双手拿着的这张纸片已经改变了他的生命。他所曾经希冀过、渴求过的每一件东西都已突然成

形，这就是德·韩斯迦夫人的形象。他认识到，目前该由他去做的事只有一桩。他曾一度迷惑过的这位妇人必须再度加以征服，这一次自然是永远的了。

他被激起的深情可以从给她的回信中看出。这是一封诚挚的男子汉气概的信，信中他没有做出虚伪的态度去试图安慰这位遗孀蒙受了损失。他知道她并不很爱或者根本不爱她丈夫。他也不使用造作的词句去颂扬死者的优点，或者假说为他的死他至感悲恸。他只将自己限于反驳一切可能的非难，说他曾经这样渴望得到她，在他心中本有希望看到她居孀的愿望：

“就我而论，我最崇拜的亲爱的，虽然这件事把我近十年来热烈追求的东西带到了我身边，我还是能够在您面前和上帝面前宣称，我心中从未怀有别的念头，除了完全服从的念头以外。而且即使在生活最痛苦的时刻，我也从未心怀恶念以玷污灵魂。人往往不能阻止自己沉溺于偶然的非意愿的幻想，我常常对自己说，‘跟她在一起，我的生活将会多么轻松愉快！’人没有希望，是不能够保有信念，固持精神，或维护他内心的纯正的。”

单是一件事就使他在这个事态变化里感到快乐，他现在可以直抒胸臆给她写信了，他向她保证，他在哪一方面都没有改变。从新沙特尔之后，她就一直是她生命的一切。他恳求她“写信来告诉我，你的生活今后将整个属于我，我们将非常幸福，没有一块可能发生的乌云会投下阴影”。

一封信寄出立刻又接上一封。这么多年之前他定下的婚约一夜之间忽然变成了现实。现在还有什么东西会出来阻挡他们的最后结合呢？一切东西都突然以不同的光彩呈现在他面前，连他自己也不例外。十二个月之前，他还以哀怨的语调把自己描写成一个白发老翁，很疲惫，肥胖得很讨人嫌，不能够集中思想，深受充血之苦，颇有中风之虞。而现在，他以最诱人的颜色向未来的新娘描绘自己。雪白的头发已经变黑，疲惫也已消散：

“头上星星点点只有几茎白发。由于我细心的生活方式，我保养得很好，只除了肥胖，由于久坐的职业，这是无可避免。我不相信从维也纳回来后我有什么改变。我的心如此年轻，它使我的身体也保持年轻，尽管我过的是寺院式的严格生活。我多多少少还可以有十五年的青春，就

跟你一样，我的亲爱的人。此刻我倒愿意在老年期中拿出十年来加速我们得以重逢的时刻。”

他的迅速的想象力已经制定了他生活的未来道路。为他的女儿，他劝告她尽早去找一位“务实而能干的丈夫”，愈早愈好。尤其重要的是，他应当“足够富裕，能在你答应承担嫁妆的要求之前先付出一笔大款”。然后可免受物质上的拖累，就象她在法律上和道德上也是自由的一样。于是他们就能象他所常梦想的生活在一起，比他们曾经敢于想象的还要快乐。现在连一天也不需要浪费了。他将立刻清理他在巴黎的事务，到德累斯顿去，在那儿他将更接近于他的无边爱情的对象。他已准备停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准备。他爱她，也比以往更加热烈。从他的书信里非常明显地看出，他还从来没有用这么急不可耐的心情等待过什么，象他现在这样要她从唇边吐出一句话，叫他到她那儿去。

她的回信于二月二十一日到达了他那里，即在他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六个星期。我们不知道其中的确切内容，因为她已把它跟其它的信件一同销毁了；但我们确知，它包含着对他的求婚的严厉驳斥，断然拒绝他要立即到她身边的请求。他本以为这

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她却以“冰冷的宁静”取消了彼此之间发过的盟誓，还将他并不想要的自由给了他。“您是自由的，”她以犀利的明确语气写道，并显然继续详述了她如此决定的理由。她不再相信他了，因为七年光景他都从来没有想去看她的愿望，虽然他倒不难找出时间和金钱去进行好几次意大利的旅行，而在那里他又不是无人陪伴的。因此他已无疑地还在其它场合破坏了他们之间的互相保证的条款，所以一切都已过去。她打算把余生贡献给女儿，女儿是她永远不会离开的。“如果可怜的孩子被人家带走，我就去死。”从巴尔扎克绝望的回信里判断，她的信一定同斧子一样锋利，一击之下就把他的希望砍倒在地，这一击砍到了他这些希望的根上。

德·韩斯迦夫人的“不！”是最后的、详细考虑过的呢，抑或只是一种试探的方式，由她的骄傲和虚荣指使，目的在于让他更加热烈地来追逐自己的一种装腔作势呢？这是一个关键问题，非常难于回答，因为它涉及了他们之间复杂关系的核心，还包括，由于有着各种环境所需要的细致的心理考虑，她自己对于巴尔扎克的态度这个问题的研究。问题并不是在两个简单的判断之中选择一个——她是爱他呢，还是不爱？这种处理问题的办法只是避开了要点，而

且很不公正，因为这样的结合无论内在外在两方面，都要受抑制和矛盾的统驭。女人身上的痴情热恋，其特征乃是无穷的顺从能力。就这个意义而言，德·韩斯迦夫人是不可能很热情的——至少不能对巴尔扎克有热情。她浸染贵族的自豪感，作威作福，自信极强，又任性多变，不能容人，她就是这么一个人。因此，她要求他的爱情乃是一种贡品，要么她慷慨接受，要么侮慢拒绝。我们从她的信中可以看出，她自己的顺从愿望也由于不断的抑制作用而受到阻挠。她从一开始就把他的社会地位看做是低她一等的，她的顺从意味着降格到他的水平上。而巴尔扎克呢，在他这方面倒是接受了给她规定的低等地位。当他自称农民或她的奴才时，他已在自己的态度上下意识地承认了甘受虐待的滋味。他跟女人们的关系往往以缺乏男人式的自信为特点。他把自己整个安放在德·韩斯迦夫人的轭木之下。在他的信里，我们看到他那不断的屈膝姿态，狂热的崇拜，对个人尊严的全盘否定，那往往是使人痛苦的。同时也非常可怜，我们看到这位亘古的伟大天才之一竟然谦卑地低下头去吻她的鞋子长达七年之久，五体投地于一位妇人之前，而她其实不过是一位在俄罗斯外省的平庸贵族妇人而已。如果有事情足以用来引起

人们对德·韩斯迦夫人的性格和机智——这种机智是她的拥护者惯于称道的——表示怀疑的话，恐怕就不只是她纵容和鼓励巴尔扎克向她屈服这件事，而甚至于是她强求他屈服的这一事实了。如果一位女人，真正看到巴尔扎克的伟大，而同时又看到他自以为合适而采取的这样不恰当的举动，决不会不感到难堪。她一定会从膝盖上把他扶将起来，允许他平视着她的眼睛。当机会到来的时候，她定会甘心情愿，顺从他的意志。德·韩斯迦夫人的爱情无疑是够不上这种水平的。成为巴尔扎克的崇拜对象，这令她快乐，满足了她的自豪。在某种程度上他对他的情感也是爱情，但是——这是关键的因素——总带有不算太少的屈就色彩。正是她，从宝座上走将下来，用恢宏大度的神气颁赐恩宠。“很乖的巴尔扎克”或“可怜的巴尔扎克”——这是她给女儿信中提到他时所用的腔调，这就告诉了我们所要知道的一切了。她确是够聪明的，认识他所值几何，她也足够女性，足够性感，会享受他那风暴般的男性威力。她对他深感怜爱，尽管她也识透他的弱点和不足信赖，但是归根结底，她所爱的只是她自己。她感到刺激的是使她成为女主角的这次爱情冒险，是能给她的平庸存在投掷上一股妖娆魅力的炽热而浪漫的崇拜，但是她冷

静的理智却跟不上，不能对巴尔扎克的热烈追求做出同样热烈的反应。如此沾染阶级偏见的女人不会软化到把禁令投向清风、毫无限制地贡献自身的程度。她展现过的唯一真正爱情是对于她女儿的。就是当她和巴尔扎克过着夫妇生活的年头，他也从来没有成为她最亲密的知己。她唯一能倾诉衷肠的人只有那愚蠢的小女儿，而与此同时，巴尔扎克却始终是低贱的闯入者，对于他，她心灵最后的堡垒总是牢牢紧闭的。

然而当丈夫活着的时候，她却接受巴尔扎克做她的情人，而且走得尽可能的远，只要不危害她的婚姻，和损坏她在社会上的名声就行。现在，严厉考核她的真正感情的时刻来到了，由于德·韩斯迦先生的死，使她能够在两种尊贵方式中自由选择，或者是地位与财富，或者是天才与名声。她本已常常怀着恐惧的心情等待着必须做出这一决定的时刻的来临。虽然她写给她兄弟的信（迄今还没有得到原稿可据以考查）不能够认为在细节上完全可靠，倒是有一封确能很有效地描述她关于这个问题的思想状况：

“有时我感到高兴，我尚未被迫决定是否要嫁给那个你唯恐他当了妳姐夫的男人。但是我

知道我爱他，恐怕比你所想象的更甚。他的来信是我孤单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我心急如焚地等待他的来信，我急于在这些信件上读到充满字里行间的赞美，我很自豪，我对他是至关重要的。以往任何女人在他眼里都不是这样的。因为他是一位天才，法兰西所产生过的最伟大的天才之一。每念及此，各种其它的考虑就都烟消云散，都融化在一种自豪感里，这种自豪感充塞了我的灵魂，只要我一想到我已赢得了他的爱情；虽然我是非常地配不上他。然而，当我们单独在一起时，我就无法避免去注意某些不协调的地方，而且痛苦地想到，别人也会看到这些不协调，并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在这种时刻，我总想为我的爱情和我的骄傲而放声痛哭，还想责骂那些人，他们竟看不到对我来说是如此明白的东西。我宁可不去想象，假如德·韩斯迦先生死去了，我的地位将复如何。我很希望，我会知道如何象我一向所努力的那样去尽到责任，按照父亲所教导的。但是也许在我心灵深处很感快乐，因为我还不必立即拿定主意，同时还能在某些时刻忘记人世上的任何事情，只除了一件，就是这位伟人准备为我牺牲一切，而我却没有

什么可以回报给他。”

巴尔扎克的一切希望都建立在他们的共同盟誓之上，这对于她是长期不宁的根源。

所以，很自然，她的第一个下意识的冲动该是将不可避免的决定向后推延，并且拒绝允许那位急躁的情人——他的巨大的说服能力她是很害怕的——赶到她身边来。她的行动自由决不象远在巴黎而一厢情愿的巴尔扎克所想象的那样不受限制，因为紧接着丈夫的死而来的是讨厌的家庭对她的注意。住在附近田产上的叔伯姑姑，以及住在她家里的外甥女们，跟圣彼得堡和巴黎的亲戚们，都清楚她对德·巴尔扎克先生的浪漫性的依恋。现在他们联合一致，在恐惧之中生怕漂亮的维埃曹尼亚庄园和她所继承的几百万家财都要落到一位冒险家手中，一位法国作家，他用感伤的词句迷住了这位寡妇的头脑。一个亲戚立即提起诉讼，来抗议德·韩斯迦先生的遗嘱，而根据遗嘱，财产是德·韩斯迦先生和妻子所共有的。这件案子送到基辅，在那里审判的结果是对德·韩斯迦夫人不利的，她不得不到圣彼得堡去，向最高法院提出控诉，并禀告了沙皇。

同时，德·韩斯迦夫人又受到其他的亲族男女

四面八方的围攻，他们竭尽其所能以恶意的流言谤语促使她同巴尔扎克对立。这些人中最起劲的一位就是人所共知的姨母罗沙利，这个人，巴尔扎克和所有其他的法国人都有理由憎恨她。法国革命时期，她的母亲被当做间谍而上了断头台；她孩提时代就跟公西耶惹利监狱有了来往，那儿是恐怖时期监禁死刑罪人的；她的外甥女有可能嫁给一位巴黎公社社员儿子。这就助长了她对德·韩斯迦夫人的不断劝告并试图用其它方式对她施加影响，与此同时，也就加深了她的仇恨的激愤心情。即使德·韩斯迦夫人当真愿意巴尔扎克到俄罗斯来，在这件事上她也无法顺从自己的愿望。而且那样一来，她将在法院里使她的诉讼案件蒙受损害，她的处境将在总体上变得恶劣，如果她带着那位举止不雅的、粗鲁的、奢华而稚气的肥胖绅士突然出现在圣彼得堡的贵族圈子里，并还得把他介绍给她的家族的话，她将会使自己大受社会嘲弄。所以，她没有什么可选择的，只能拒绝他的要求。她把对他的拒绝裹在如此粗暴与尖锐的词句之中，或许乃是一种试探他的爱慕是否真挚和坚韧的方法吧。

* * * * *

她的信好象晴空霹雳击中了巴尔扎克。他已整

装待发，要到德累斯顿去了。他已认为不太必要再向德·韩斯迦夫人提出忠告，让她怎样最好地为女儿保住财产，而她去享用利息。他早已放纵他的想象力让它去奔腾，写信谈论即将到来的结婚，将要共同出游的旅行，以及所要居住的大厦。现在却来了这么一封信，明确、干脆地说“您是自由的”，直截了当、无可和解地说：“不！”

然而，巴尔扎克却没有心情接受一个“不”字。他已很习惯于受到人们的反抗，而且这反倒更能增强他的进攻。每个星期，几乎每天，他都写去急切的恳求信，蛊惑她务要相信他的永恒性宣言，向她刮去一阵阵保证恩爱的台风。当初作为他写到新沙特尔和日内瓦的书信里的特征，那种爆发了的神魂颠倒，在长久沉寂之后，现在又再度迸发了：

“你不会知道我爱你之心有多么强烈。为了人类的一切目标——爱情、友谊、雄心、成功、自豪、浮华、记忆、快乐、信心——而依恋于你，而且依仗对你的信心，关于这一点，我是把它置于世间一切美好事物之上的。”

他宣称，自从他们初次邂逅之后，他所写作的一

一切都只是为了她才写的。他的思想里只有她，她向来都是“celle au nom de qui tout s'est accompli”（那样一位女人，一切一切都是在她名义下完成的）。

他说，他已做好准备，肯做任何让步。他们的誓约不一定明天或后天就要履行，但是她能不能规定一个日子，随便哪个日子，某一特定的日子，甚至于某一特定的年头，使他能有个盼头，最后实现他的希望呢？

“唉！我心爱的天使，我恳求于夏娃的，并非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只不过要求你说，‘十八个月以后，或两年以后，咱们就快乐了。’我只不过要你说声‘咱们’，再给我规定一个等待的期间罢了。”

他恳求她留给他一线希望，一个诺言，答应他定会在她身上得到他所寻求的安宁，不然的话，他就活不下去了。

“经过十五年不断的辛劳之后，我再也不能独自一人支撑这场奋斗了。Créer, toujours créer！（创造，永远创造！）上帝只创造六天，到

第七天他也要休息的。”

他们的最终结合，这唯一的想法象醇酒一样涌入他的脑海：

“噢！亲爱的人，终于心心相印地生活在一起，每人都为了对方，没有任何束缚！我常有这样的时刻，一想到这些就令我发疯。我常自问这十七个月的光景是怎么过去的，我在此地而你在那么遥远的地方！金钱的力量多大啊！看到最美丽的感情竟依附于它，这是多么伤心的景象啊！看到自己被拴在、钉在巴士街，而一颗心却远在五百里格^①之外！多少天以来我沉浸在梦境里。我幻想着，一切困难都已消除，‘王后’的智慧、谨慎、技巧已经获胜，消息已经送来，‘来吧！’我好象已经动身上路。在这种日子里，朋友们都不认得我了。他们都问我是怎么回事。……我答道：‘麻烦快结束了，我有了希望。’他们说，‘他疯了！’”

刚一听到她已搬到圣彼得堡去料理她上诉事宜

^① 一里格等于三英里。

的消息，他就开始计算从巴黎启程的旅途需要多少日子，需要多少花费。从勒阿弗尔到圣彼得堡要四百法郎，回程也要四百。从勒阿弗尔到巴黎又要二百法郎。他匆忙中找了一些荒唐之极的借口，使他的旅行显得非常必要。他宣称早就该到俄罗斯的首都去了，去筹建一座法兰西剧院。然后他谈到他的妹夫计划创立的轮船公司，目的是以低廉价格制造船舶，以及他接到要去圣彼得堡向有关当局呈递文件的使命。突然之间，他发现了——或许由于他一只眼睛盯着俄国的邮件检查吧，当他的信件被拆阅的时候——他对沙皇颇有感情，因为沙皇是全欧洲君主之中唯一纯正的贵族。他还宣称，他“对于改当俄罗斯的臣民丝毫没有反感”。

事情就这样继续下去，一封信接着一封，真正急躁和暴烈的炮火。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整个夏天，整个冬天，直到春天和夏天又周而复始，他还是没有得到他一直等待着的恩准。德·韩斯迦先生过世已经一年有半，他的遗孀还是没有发出巴尔扎克所渴望的信号：“Viens!”（来吧！）最后，到了七月，信号终于来了。从初次晤面，一八四三年七月，整整在十年之后，他从敦刻尔克到达圣彼得堡，他的第一步是走向库泰索夫，当时德·韩斯迦夫人正住在这

里。这座房子位于一条叫做“大百万”的街道上，这倒颇有点儿象征意义呢。

第二十章

《人间喜剧》

在四十三岁上，巴尔扎克深知要想获得安宁，从而完成他已着手的伟大事业，唯一希望就在于重新赢得德·韩斯迦夫人。他把一切都寄托在这孤注一掷上。在她让他伫立久待，要过十八个月才准许他到圣彼得堡来会晤的这段时间里，他不顾死活拼命努力去提高自己在反对者家族眼里的求婚人的声望。文学声望再高，也不足以抹去他的资产阶级出身的污点。他们这一伙在这一问题上特别骄横。他在姓氏前面插上的那个“德”字并不能使他们无视于他是农民的孙子这一事实。他们对待他总有一副居高临下的恩赐神气。但是，假定他被选进议院，获得政治影响，使自封的贵族称号得到国王的批准，说不定国王还要封他更尊宠的爵位呢！假定他当上了法兰西科

学院院士呢？这种荣誉就会赋予他以尊严，那就会使得把他当做个人嘲笑对象的企图完全成为不可能的事了。而且作为院士，他还可以每年领到两千法郎的俸金，如果他被派到编纂字典的委员会去当委员，一个一旦被委任就不会被撤除的职务，薪金将有六千。他可以穿上饰有棕叶的著名礼服，因而即使德·韩斯迦夫人的娘家卢赤芜斯迦家里，也无须为他们的婚姻门户不当而感到羞愧了。

为了争得同德·韩斯迦夫人相等的社会地位，这两条路他都去探索了。但每一条路他都发现步履艰难。因为他没有最低数目的必要资金去登记列入候选人名单，进入议院的雄心于是受到阻挠。在科学院的候选事宜上他也没有得到多大成功。他在四十名不朽人物中要求一个席位本不会引起严重反对，但是各色各样把他排挤出去的借口却很容易找到。据说他的经济状况未免太乱七八糟了，神圣穹隆下的席位不能给予一个这样的人，他的门外总有法警和放债人躺着等候他。他经常离开巴黎，也被当成不能入选的理由。最老实的言论来自他的劲敌之一，这话把他的嫉妒表露无遗：“德·巴尔扎克先生块头太大了，我们的圈椅容不下他。”巴尔扎克把这些人都贬为无足轻重之辈，除了维克多·雨果和拉马丁是

例外。

还剩下戏剧这个并非上策的办法可以解决他的迫切困境。他匆匆忙忙写了两部剧本，第一部《巴梅拉·基罗》（“Paméla Giraud”）被茱德维尔戏院拿去上演。这部剧本五分之四是他的两个“捉刀人”拼凑出来的。另一部《桂诺拉的富源力》（“Les ressources de Quinola”）也同时在奥德恩戏院演出。巴尔扎克下定决心要在这出戏上赢得不同凡响的成功，让人们忘记他在《伏特冷》上的惨败。

象以往一样，他又把力气用错了地方。第五幕还没有写完，排演就已开始，这事激怒了主要女演员，著名的德奥发利夫人，她退出了。巴尔扎克最关心的，就是要使首演成为巴黎从未见过的美奂美轮的景象。巴黎的每一位贵族和名流都将在第一晚出席。入场券要严格防止落入恶意的捣乱者之手，他们会以怪叫和嘘声来破坏优美的气氛。所以他同戏院经理议妥，在他亲自同意接受者之前，首场公演的戏票不得发售。他把本可以更有利地用来修改剧本的时间都花费在徘徊于售票处了。

他的行动计划制定在很大的规模上。正中包厢将由大使们和内阁部长占用，正厅座位分派给圣路易骑士和贵族，二楼看台给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们，

三楼看台给财政界名人，四楼看台给资产阶级富商。正厅中要充分地点缀着百媚千娇的女人，她们要坐在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而艺术家们也都受到委托，前来使这次在首都历史上一切年鉴里都找不到堪与匹敌的景象成为不朽。

巴尔扎克的最初算计是正确的——每次都是如此。关于即将出现的演出盛况的传言已轰动了巴黎，售票处被重重包围，处处有人愿意出高价购买戏票。可是，巴尔扎克总是把弓绷得过紧，其结果必然是弓要断在他手里。他并不接受提高一倍两倍票价的建议，却想进一步提高群众的兴趣，因而放出风声说全场戏票都已售光。他希望观众由于不能出席首场演出而感到悲哀，以期买后几场演出的座券作为安慰。

当一八四二年三月十九日夜晚来临，剧场大门敞开准备接纳显赫的观众时，四分之三的座位由于巴尔扎克的错误策略竟都是空的。那些原本想莅场来交口称誉的看客从一开始就精神沮丧了。李勒，戏院的经理，在最后的时刻请来一群捧场者，火速地把戏票免费送给愿意来看戏的任何人，然而一切都已徒劳。要避免这场惨败已经太迟了。戏在舞台上越演越悲，而台下的观众却越来越嬉笑。后来的几场演出吸引来的只是那些想来起哄的观众。有人吹喇叭，有

人吹口哨，还有即兴编成的合唱：

巴尔扎克真胡闹，
把事搞得一团糟。

巴尔扎克本人在首场演出的晚上一次也没有被召到台前谢幕，但无论如何，他确是由于用自己选择的观众来填充戏院的座席而筋疲力尽，散戏的时候，他竟然在包厢里睡着了。空中的楼阁通过舞台地板上的活门扇而沉落下去了，而命中注定的另一个沉重打击又一次把他驱回真正的命运上来。当他对德·韩斯迦夫人埋怨说，如果《桂诺拉的富源》竟然失败的话，他将撰写另外四部小说时，我们倒不必分担他的悲痛，因为他在1841至1843年间写出的故事乃是他笔下出现过的最有力的作品。假如那些蹩脚闹剧当初竟然获得成功，我们也许就得不到这些收获了。

* * * *

在他这个最最成熟时期的小说中，他逐渐地摒弃了时髦社会的胃口，这种趣味往往败坏了他的初期作品。他已经学会洞察社会，圣日耳曼镇的沙龙已失去了对他的诱惑力。现在能鼓舞他的创造性天才

的已经不是伟大人物的虚荣和渺小雄心，或者渺小的侯爵夫人和伯爵夫人的伟大雄心，而是平凡男女的动人感情。巴尔扎克越是从经验和失望里尝到苦味，他也就越接近于真理。那个玷污他最优秀的初期作品中的令人作呕的伤感情调，就象是一滴油垢污染了考究的衣着，现在正在蒸发了。

随着视野日益开阔，焦点也就更加集中。在《一桩可怕的事情里》，他在拿破仑政治场景背后投去了一道搜索的灯光。在《搅水姑娘》里，他揭示了关于性问题的大胆看法，那是他同代人中没有一个赶得上的。性变态与性束缚问题，从来也没有人象这样放胆地在鲁志医生这个角色身上描写过，这是一位七十老叟，他抚养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子充当情妇，还有老人的儿子这个角色，他成了女孩的自愿牺牲品。在菲力·布里都这个人物身上，他又创造出多么惊人的形象啊，他的寡廉鲜耻不亚于伏特冷，然而却非闹剧性的，而是完全忠实于生活！而且，在这三个年头里面，他还完成了《幻灭》这幅伟大的壁画，产生出笔调轻松的《雨儿胥·米露埃》，这本作品由于招魂术的编造降低了它的真实性，然而却有着高度可信的人物描写。他还以《错误的情妇》、《两个新婚女郎的回忆》、《亚尔塔·萨伐龙》（“Albert Savarus”）、

《初入人世》（“Un début dans la vie”）、《奥瑙琳娜》（“Honorine”）、《地区的才女》以及十多篇未完成的片断作品丰富了他的成就。

既然现在巴尔扎克已在认真地考虑清理他的事务，那么应该考察一下他那难以计算的丰富创作，也已经是时候了。尽管债主们的压力很大，他却总保住他最后的一个经济资源不被触动。他一直谨慎地保留自己出版全集的权利。不论多么困窘，他都无例外地避免出让版权，至少使它不超过一定版次。尽管他在其它方面如何慷慨和懒于开动脑筋，他总是拒绝割让他最宝贵的财产。一直要等到那个时刻，即他能够向朋友和敌人炫耀他那不可磨灭的创造性的全部值得骄傲的范围和内容的时候。

现在要向财主寡妇求婚了，向全世界显示财富的时刻已经到来。他要刊行全集的打算刚一宣布，至少有三家出版商联合起来，愿为这件重大事业投资，这项出版事业每年都会有新作品加进去的。合同签订于一八四二年四月十四日，把出版权授予杜保晒、福尔纳和赫齐尔三家出版公司：

按照他们的判断，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刻，他们有权刊印两版或三版所有迄今为止已经出

版了的著作，或在本合同有效期间可能发表的作品，第一版均为三千册。这个版本为八开本，包括……约二十册的篇幅，这篇幅可多可少，视全集的需要而定。

巴尔扎克接到了一万五千法郎的预支，进一步的版税则须在卖出四万册之后按每册五十生丁计算。这样一来，他就保证有了固定的收入来源，这收入肯定还会逐年增加。合同中唯一的限制条款倒是他很愿接受的。如果清样校对费用超过了每页五个法郎，他就得自掏腰包偿付。因为他抵抗不了润色文字的诱惑，只要印刷商愿意送去另一次校样，巴尔扎克的校对帐单便积累到了五千二百二十四法郎又二十五生丁。出版商不喜欢“全集”这个名称，这名称过于平常，不足以引起读者的注意。他们要求他想出一个书名，它必须强调有同样人物再现的名册之间的系列性和能体现出在高度和深度上都很高明的社会小宇宙。

巴尔扎克同意了。十年之前，在他帮助菲力士·达凡准备写小说集引言时，他已经意识到，他的目标是面向着人类社会整体的。在这总体中，每一部书代表着这个结构的一个阶段。现在的问题就是要找到

一个书名，它要表达这部作品的整个范围。他盘算了各种建议，最后，还是运气帮助了他。德·柏罗瓦，他的朋友和前任编辑秘书，刚从意大利回来，他在那里研究意大利文学，读过原本的《神曲》。这给了巴尔扎克一个想法，把他那些收集在一起的故事表现为世俗的喜剧，来跟但丁的神圣的喜剧^①对比，拿社会大厦来跟神学大厦对比。Eureka!^②还有什么书名能比《人间喜剧》更合适呢！

巴尔扎克非常得意，出版商也同样高兴。不过，他们还要求他，为这部全集写一篇序言，向读者解释为什么他选择了这个新书名，否则读者可能认为书名有点自夸。巴尔扎克不想做这件事，因为还有更赚钱的工作在等待他的笔。他认为菲力士·达凡当初为《十九世纪风俗的研究》所写的旧序就足够向读者点明，他的目标和意向是怎样的了。这篇序言十分之九就是出自他本人的手笔。然后他又提出乔治·桑的名字。她同他是很友好的，也许愿意写出出版家所坚持的新序言。最后，他，完全违反了自己的意志，被赫齐尔一封机智的信给说服了。赫齐尔劝他不可

① 但丁名著《神曲》的原文意为“神圣的喜剧”。

② 意为“找到了”。这是阿基米得找到测量王冠的合金程度的方法时所喊出来的一句话。

抛弃自己的儿子，还对这篇序言的写法提出了一些真正有用的意见：

“尽量把它写得谦虚而客观。这是唯一的方法，用来炫耀您完成了您所完成的工作之后本应感到的正当自豪。话应当说得十分冷静。要设想您是一位老人，通过已往岁月的回顾注视自己，象您自己笔下的人物那样说话，那么，您就会写出一篇很有价值的东西。去写吧，mon gros père^①，请宽恕一个卑微的出版人用这种方式对伟大的阁下说话。您知道，我确是深怀好意才这么办的。”

巴尔扎克坐了下来，写下了那篇著名的《〈人间喜剧〉序言》。的确，这篇文章比起我们平时所期待于他的要更加平静而客观些。以务实的明智，他认识到赫齐尔的劝告是很有道理的。他也很成功地在他的主题的广博宏伟与人们教他要实行的个人谦卑之间，找到了中庸之道。当他告诉德·韩斯迦夫人说，这十六页的序言所花费的气力比他写一部整书还要多的时候，大概并不是过甚其辞。他在序言中阐述了

^① “我的胖老爹”。

一个人类社会体系，用来同杰佛洛阿·圣提雷尔^①和布丰^②的体系相比较。正象在自然界中各种不同的兽类依据环境而发展为专门的生物那样，人类也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之下有所发展。如果有人要写一部“人类的心的历史”，其中包含三四千个人物，那么每一社会阶层，它的每一个形式和每一种感情，都应当有一个角色去代表，而艺术家的创造力则应该献身于以这样的方式去联系每一个人物和故事，使他们能够“构成一篇完整的故事，其中的每一章都是一本小说，每一本小说都是一个时代”。

鉴于人类天性的无穷变化，艺术家只需要观察，于是，巴尔扎克这样发挥他文章主题的核心：

机会是所有小说家中最大的。要想有创造性，一个人只有去研究机会。法兰西社会是真正的历史学家，我不过打算指导它的笔杆罢了。记录了社会上善与恶的清单，选择了社会事件中最重要，以连结几个同样构成的角色而铸成典型。我恐怕已写成了道德的历史，这方面很多

① 杰佛洛阿·圣提雷尔 (Geoffroi St. Hilaire, 1772—1844)，法国动物学家。

② 布丰 (Buffon, 1707—1788)，法国自然学家。

历史学家都忘记去做了。

他的努力就是要为十九世纪法兰西写一部作品。不幸得很，这部作品，并不曾由罗马、雅典、孟凡斯、波斯或印度传给后世。他想要描绘他这一世纪的社会，并同时揭破这社会的秘密动因。在这里巴尔扎克公开宣称，小说家的事业应当是现实主义事业，但是他也明白地加上，如果它不在每一细节上坚持真理，则小说将是毫无意义的。但他应该同时无意识地发出要求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呼声。他的计划的大轮廓是：

《私人生活之场景》描写童年和青年，说些他们常办的错事。《外省生活之场景》表现冲动、算计、自利和野心的年月。《巴黎生活之场景》最后描写各种不同的趣味和恶行，加上一切放肆的行为方式，这是各大都城礼仪和道德的特征——因为正是在这种地方善与恶相遇时，其反响最强。

……在这三部分里描写了社会生活之后，我还面临着另外的任务，就是表现那些处于例外环境中的人们的生活，在他们身上，吞没了一

切人或许多人的利益，然而他们，可以这样说，却又逍遥法外。这个任务引导我去写《政治生活之场景》。完成了这一幅社会巨大图景之后，我是不是应该揭示社会在它最猛烈的方面是如何行事的呢——当社会越出了自己的范围，为了或者是自卫，或者是征服？关于这一方面，我写在《军旅生活之场景》里了。在我的工作中，这一部分完成得最少。我已在全集中给它留下了篇幅，到时机成熟时它就可以补入。最后是《乡村生活之场景》，它将在我长期劳作结束之时出现。如果我可以这样称呼它，那么在这里呈现于读者面前的乃是社会的戏剧。在这一部分里，可以找到我的各色人物中最纯洁的一个，以及法律、政治、道德的伟大原则的应用。

巴尔扎克在结束他的序言时奏响了有力的和弦：

这个计划不只包括了社会的一段历史和对它的批评，还包括了一个对于社会罪恶的分析，社会原则的阐述，我相信，它的难以测量的规模使我有理由给我的作品加上现在它以之出现的

名字：《人间喜剧》。这是不是太狂妄呢？它果真配得上这个名称吗？在全书完成之后，读者们自会裁决。

*

*

*

*

*

后世自有定评。书名并不狂妄，尽管我们今天所有的这部作品仍然只是躯体而缺乏四肢。当他还在着意把他的理想构成完美的整体时，死亡夺去了巴尔扎克的手。这跟他喜欢先开空头支票等到将来再说的习惯一样，当他谈论他笔下的“三四千个人物”的时候，他夸大了实际情况，《人间喜剧》包含的只有——我们真不愿使用“只有”这个字眼——两千个左右的人物。不过，其他的那些也已经处于巴尔扎克的无穷无尽的头脑深处的创造过程之中了，这从巴尔扎克于一八四五年预备的一张单子即可看出，这张单子上他列举了已经出版了的小说名称和还没有写出的书名。我们今天读到这目录时是深感悲哀的，一如我们读到失传了的索福克勒斯的剧作名单或者看不到的达·芬奇的绘画目录所感到的那样。在他提到的一百四十四种书名里，始终是有目无书的至少不下于五十个。然而，即使是这个计划，已经足够表明他这高超建筑师的技能。他就是用这个在脑海

中详细构思，成为各色各样的人类社会的巨大结构设计。

第一本计划中的小说叫做《孩子们》（“Les enfants”），第二本和第三本分别以女生寄宿学校和男生寄宿学校为背景。另有一册专用来描写戏剧生涯。巴尔扎克还计划着去揭露外交界、政界、学术界和政党幕后的实情。在他计划中要描写的关于拿破仑时代的法国军队的《伊利昂纪》——埃及战役、阿斯本和瓦格兰姆战役、从莫斯科的败退、莱比锡与各国联军的战役、在法兰西本土的战斗以至于囚禁法兰西俘虏的狱船等等——将不止十二本小说，而其中只有《朱安党人》一部见了天日。农民、法官、发明家，各种人都要有一本单独描写他们的书，而且这些描写性的篇章还要由解释性和分析性的论文作为补充——一本《社会病理学》（“Pathology of Social life”），一本《教育界的解剖》（“Anatomy of the Teaching Body”）和一本《有关十九世纪的完美性的哲学性和政治性的对话》（“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Dialogue on the Perfection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毫无疑问，如果他活下去的话，他本会写出这些作品来的。以他所具有的富于幻想的能力，任何呈现

在他想象之中的东西都毫无例外地会被他勾画出形态和姿容。要完成这个计划，他所缺少的只是时间，而时间在他那短促忙乱的一生中总是不够的。

巴尔扎克在向世界宣布他毕生的作品行将问世的时候，心里一定充满了宁静的自豪感。这是第一次，他揭示出他所趋向的目标，在自己和同时代作家之间画出了一条畛域分明的分界线，这些人之中没有一个有勇气和抱负敢于想到这样的巨大事业。他已完成他所计划的五分之四了。再有几年，这座结构就可完成。只要《人间喜剧》最后一本出版了，各项事务便已就绪，他就有了时间，把精力转到满足于一个一直躲避着他的愿望上面，从而得以休息、生活、享受并得到快乐了。

第二十一章

一些警告的迹象

巴尔扎克本来希望，德·韩斯迦夫人只要等一年守寡期过后就会履行他们做过的保证。但是一个月一个月不断地流逝，她总不答应他的迫切祈求，允许他到圣彼得堡来会见她。她处境困难。巴尔扎克名声过大，不可能神鬼不知地来到俄罗斯。自从迦德琳女皇在位以来，还没有一位驰誉世界的法兰西作家在涅瓦河旁的城市逗留过，巴尔扎克的到达必将引起轰动。所有的目光都要朝他射来，也要向她射来，因为她是上等社会中一分子，曾受过沙皇接见；说长道短是无法避免的。丈夫在世时，巴尔扎克的访问可以被解释为对这个家庭的社会性的应酬。可是，专程前来与遗孀会晤，就会被人看成订婚的法定的确证。就算是德·韩斯迦夫人在结婚问题上也跟他一样着

急（事实却绝非如此），她也绝不可能自由自在地追求她自己的意向。依据当时在俄罗斯行使的法律，与外国人的婚姻必须得到沙皇的准许。财产如果不经特许，是不得转移到国外的。所以她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处理自己的财产，象她自己所愿望的、象巴尔扎克天真地想象的、象除了俄罗斯以外任何其他国家里都办得到的那样。用一个近代术语，她的钱财乃是“禁锢卢布”的形式，除非求助于非法途径是不能带出国境的。娘家人的反对更不会使事情变得容易。尤其是姨母罗莎莉，她不理睬巴尔扎克的天才，只把他看成一个外国穷汉，名声放荡，他外出猎取财富，正在竭尽力量去使一位富孀晕头转向。夏娃也许——我们并不确切知道——曾经下定决心去克服贵族亲戚的阻力，但是她不得不想到她那尚未成亲的女儿，那是她最溺爱的。如果她结下了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社会就会背弃她们母女两个，女儿的婚姻前景将因此而大受影响。

所以并不是，象被大家所误认的那样，她的恶意或者清高，使得巴尔扎克等待长久。相反，她允许他登上征途前来圣彼得堡，这已是一大勇敢行动。因为这事至少提供了他们的意向的一个信号。巴尔扎克清楚，他不能只靠信件去使她改变主意，如果要她接

受他善于游说的威力，象她在日内瓦那次那样，他必得同她亲自面谈。他把一切可以弄到金钱的稿件全部卖掉，还有一两篇尚未动手的剧本也预支了钱。在七月十七日那天，经过令人不适的海上旅行之后，他在俄罗斯的京城登岸。

当巴尔扎克和德·韩斯迦夫人分别八年之后而再度相遇，这必然是在库泰索夫宫雅致的客厅中的一次非同小可的晤聚。他改变不多，胖了一点，头上添了几茎白发，但是他的仪容神态仍同从前一样热忱有力。富有想象力的天性具有永葆青春的秘方。不过在女人的生命中，八年光景毕竟是一个长时间。就连达芬格尔在维也纳为她绘制的肖像里——当然这幅画是意在捧场的——她也呈现出具有主妇身分的神态了。不过如果巴尔扎克的书信是可以相信的话，那么此刻她在他眼中却比以往更加年轻美丽，尽管她曾经生过七个孩子。他的举止也好象在长久分别之后对她的肉体愿望更加狂烈了似的。也许她本来希望，当他重见她本人之后，发现她已不再象他在这长久间隔的年月里只凭他所想象的那个样子了，就会放弃他的目的。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他催促她跟他结婚，一切计划都已办妥，甚至他口袋里已经揣着可以授权领事去执行婚礼的必要文件。

她继续摆脱他。她并没有，似乎是，直截了当地拒绝他，只是通知他，结婚决不可能，只要她女儿还没有找到丈夫。这反倒意味着，无论如何，总有一个确定的日期了。他能够有所期待，一年，或者顶多两年。雅各曾经服侍了拉结七年^①，后来又是一个七年。巴尔扎克为了德·韩斯迦先生的让位，已经等足了他的七年。现在将是第二个等待时期，要等到她的女儿平安地有了着落的时候。

关于巴尔扎克在圣彼得堡的逗留，记载很少。夏季里，贵族们都到乡间田产所在的地方去生活了，首都简直成了空城。他好象没有参观什么，甚至连赫尔米达慈博物馆及其藏画都没有提到。可以这样认为，在他脑子里除了把他带到俄罗斯来的那个单一的目的之外，就没有考虑其它事情的空隙了。当他离去时——这一次由陆路经柏林回转巴黎——口袋里至少带回了一个许诺。

* * * *

十一月间他回到巴黎，立即照例地卷进了漩涡。在他同时间的不停地赛跑中，四个月已经失去。在他离开的期间，事态也并无好转。一直替他照料家务的

^① 这是《圣经·创世记》里的故事。雅各（Jacob）是拉结（Rachel）的丈夫。为了娶到爱妻，雅各作了长时间的等待。

母亲，“继续在折磨我，真象一位夏洛克^①”。他的剧本《巴梅拉·基罗》（“Paméla Giraud”）在他出国时上演过，他本想依靠它不仅偿付在俄罗斯的开销，而且还指望它在他回来后能享受一阵清闲日子。但他还在途中时便听到了这演出失败的消息。虽然不象《伏特冷》那样平庸，也没有《桂诺拉的富源》那样浅薄，可批评家们却忘不了心中那股怨气，因为他曾攻击巴黎新闻界的腐败，于是他们就猛烈反击，使剧本不得不撤下台来。命运象是联合一致跟他作对。他在北国铁路的股票——为在这上面投机他不知从哪儿弄到的钱——如今在交易所里跌了价。他的忧愁也决不能由于与清算雅尔地的地产有关的困难而减轻。他又再次面临着全盘经济崩溃，又不得不以彻夜工作去偿还这次短暂休憩的代价。

他的不幸又一次成了我们的大幸。戏剧上的失败逼着他回到小说上来，《人间喜剧》的新篇章正以极快的序列源源而出，头两册是《私人生活之场景》和《巴黎生活之场景》的修订本。他又商量以连载的方式刊行《农民》，这本书他已写了几年，它将成为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但是，每当他想完成一项计

^① 夏洛克（Shylock），莎士比亚剧本《威尼斯商人》中一个放高利贷的犹太人。

划，而又耽擱得太久的時候，那事情总是不保險的。他已在算計，以每行六十生丁計，這是他曾得過的最高稿酬，如果把分期登載權賣給《新聞報》（“La Presse”），他可以得到一萬四千法郎。然後還可以從單行本的版權得到一萬二千法郎。《新聞報》刊出了預告，他也已經寫成了幾章，而此刻他却突然中斷了。彈簧拧得太緊了，即使是巴爾扎克的精力也有限度，他的活力已應付不了他所作出的無盡無休的要求了。

健康的虧損已慢慢開始。樹干仍然顯出巨大精力的外表，仍然結出豐富的果實，叢簇的葉子每年仍然更新一次；但蛀蟲已在核心咬蝕。精力衰退的怨嗟暴露了變化已在進行，正如一八四四年四月他所寫的：

“我已陷入抵抗不了的昏昏欲睡的境地。體力已經拒絕服從意志，它要求休息。它已經對咖啡不再有反應了。我喝的咖啡成河，希望能夠完成《謙虛的米依》（“Modeste Mignon”），但效果並不比喝白水強多少。我三點鐘醒來，但又睡下。八點鐘吃罷早飯，又被睡魔制伏，終於又昏昏睡去。”

他脸部的肌肉经常痉挛地收缩，他也大受肿胀、头痛、视神经抽搐之苦。他开始怀疑他是否还有力量去写《农民》的第二部分：

“我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可怕的神经不安，咖啡过量所促成的胃病。我必须完全休息。这些前所未有的剧痛折磨了我三天。病初发时，我以为只是一时的小事。……噢！我疲惫得无法形容。今天早晨，我算算这两年我所写的共有多少——四大卷《人间喜剧》。今后二十多天里我什么事情也做不了，除了坐上邮车离开这里。”

不久之后，他又写道：

“你看我，精疲力竭，就象雅各跟天使搏斗以后似的。现在还有六卷和更多的作品等我去写。整个法兰西的眼睛和耳朵都盯着这即将出版的著作。根据书商的巡回推销员的报告和我所收到的信件，这个事实无可置疑。《新闻报》又获得另外五千订户。群众在等着我——而我却觉得象一只空袋子。”

这不仅是体力的疲劳。头脑也已磨损。“Avoir du repos”，尽可能地休息，这是他的迫切需要。他感到，只有德·韩斯迦夫人能够拯救他：

“常有这样的时刻，一个人失去了理性，因为他的期待被拧紧到了这种程度。我现在就是弄到了这个地步。我的整个生命都集中在这个目标的成就上，以致我的内心已损伤破碎了。”

现在他对自己正在写着的东西已不感兴趣，因为他的思想远不在此。他不是去构思他书中角色的命运，而是梦想着构成自己生活的途径：

“到一八四六年，我们可以占有巴黎最优美的房屋中的一所，我也不会再有一个苏的欠债了。《人间喜剧》这件工作到时候可以让我挣到五十万法郎，这还没有把我以后可望得到的版税计算在内，那数目也会有这么大。所以，美丽的夫人，如果天假以年，我将是一位理想的配偶，有一百多万法郎在我名下。如果，象你所说，我跟你结婚不能严格地算是娶了一位穷女人的话，那你也不算是嫁给了一个穷小子。我们将是

迷人的一对老夫老妻，不过，如果两人相爱，这也没有多大关系。……只是我们之中无论谁活得更长都是痛苦的！生活对于后死者肯定是艰难的！”

* * * * *

但是，让我们再回到一八四四年来。一线希望的光芒露出了地平线。德·韩斯迦夫人决定离开乌克兰的旷野，搬到德累斯顿居住。七月里，女儿安娜同一位富有的青年贵族乔治·梅尼齐克订了婚，于是乐观的巴尔扎克认为，最后的障碍也已扫除了。时机已到，雅各可以把新娘带回家了。但是他还得忍受再一次的失望。德·韩斯迦夫人坚持她的决定，要跟女儿和未来的女婿在德累斯顿过冬，而巴尔扎克要她准许到她那里去看她的几次请求都是徒然。是不是她仍然害怕看见她还有可能在这德国城市遇到的本国人或亲戚，是不是她已经对他的外貌起了厌烦之心，还是她急于要把婚期推迟到他认定了是已经确定的日期之后，这个问题只好让我们去揣测了。不管怎样，反正她拒绝了让他前来相会的要求。她开恩送来的唯一的信任象征就是委托他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给他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她把她的女伴派到巴尔扎克那里，就是她女儿从前的瑞士女教师，亨利爱特·保勒尔，他们早期书信往还中的那位“莉勒黛”。亨利爱特突然宣布了她的意愿，要离开德·韩斯迦家皈依修道院。对一位瑞士的加尔文派教徒来说，这实在是个惊人的决定，其背后显然有隐藏着的动机。德·韩斯迦先生的死亡对她象是突然而来的严重打击，这或者是因为她感到在某一方面特别依恋于他，或者是因为她受到良心谴责，过去曾参与了促成他妻子的与人私通。不管是哪个原因，她与德·韩斯迦夫人之间的关系已变得十分紧张，在她那方面已发展为一种潜在的仇恨。这事在巴尔扎克的《贝姨》里是看得出来的，在这本书里巴尔扎克一定程度地曾把她当作模特儿。德·韩斯迦夫人不再需要她的服侍了，为了帮助这位神经质的老处女完成心愿，便把这件苦差事交给了巴尔扎克。他相当殷勤地招待她，因为他觉得欠她的情。德·韩斯迦夫人也要求他对她备加关注，一切必要的手续都要办妥，使她得以进入罗马天主教会。他花费了宝贵的时间去拜会重要的教士和修道院的当权人，终于他的努力得到成功。他参加了她的罩上面纱的出家典礼，于是他的小说《外国无名女郎》的开头几章里的同谋人就这样地消失在修道院的高墙后

面了。

最后，一八四五年春天，他收到了通知，德·韩斯迦夫人愿意见他。他把书稿往抽屉里一塞，完全不管成千上万读者，他们等待着他正在撰写的连载的下文；也不管那些编辑，他们一想到已经预付过稿酬就对他的失信更加愤怒。他把一切扔到一边，动身到德累斯顿去了。他自己的生活故事要比他为了别人的欢乐而创造出来的故事重要得多。他留下母亲去跟债主们争斗，留下编辑基拉尔丁去敷衍读者。他工作得已经够多了，现在他要生活，就象其他的人所能生活的那样。

现在没有留下书信，可以告诉我们巴尔扎克在德累斯顿的思想和经历，但在那些日子里肯定是快乐、惬意、无忧无虑的。他跟梅尼齐克伯爵和安娜相处得极好。梅尼齐克不算特别聪明敏捷，事实上，他倒是有点蠢。他的主要爱好就是搜集昆虫；但他脾气温和，同喜欢享乐的安娜一样，总是跟你一起开怀大笑。很容易想象，巴尔扎克正是上天在他们烦闷之中赐给他们开心的。他同他们一道享受轻松的生活。他记起在巴黎看过的一出喜剧，于是就给这个小圈子起了个雅号，“Saltimbanques”：街头艺人。他们漫游欧洲，象一个喜剧班子，所不同者，他们没有观众去

款待，却让这个世界来款待他们。

他们一块儿游览康斯塔特、卡尔斯鲁厄和斯特拉斯堡。他甚至说服德·韩斯迦夫人访问巴黎，虽然她非得匿名不可，因为巴黎是俄罗斯臣民的禁地，沙皇是不许他的臣民到法兰西这块革命土地上去的。不过，巴尔扎克在克服这类困难的技巧上却是大师。德·韩斯迦夫人假充他的妹妹得到旅行许可证，安娜就以欧也妮出现，作为他的外甥女。在巴黎，他为她们租了巴士街上的一座小房子，以指点首都的景色为赏心乐事。他是一位无与伦比的向导，陪着她们以新鲜的眼光来观赏巴黎，从而自己也分享到乐趣。八月里，他们向枫丹白露进发，又到奥尔良和布尔日去。他引导她们周游图尔，他的出生地，从那儿又到鹿特丹、海牙、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在那里他们暂时停下来，让巴尔扎克回到巴黎一个短暂时期。九月的时候，他又匆忙地赶到巴登巴登去同她们会合，在那里他们停留了两个星期。然后，他们就动身到意大利去旅行。十月的时候，他们到达马赛，过境到那不勒斯去。

在整个这段时期里，他一丁点儿事情也没有做。朋友、出版商和编辑们，他全忘掉了。至关重要的只有他是正同他希望娶到手的女人在一起，以及他是

自由的。就连《人间喜剧》也无足轻重了。既然他有着那样向内心汲取和向外界传达印象的巨大本领，他必然要痛痛快快地大大享受一番了。在多少年来从不停息的创造性活动之后，那些年月他是毫不吝惜地贡献出自己的一切的，现在他可要补充精力，恢复气力了。他很快乐，所以他就缄默了。作为一位艺术家，他只是在环境的逼迫之下，才有所创造的。

在这个生活插曲中，他的债务和其它应当由他承担的义务却是我们搞不清楚的。就所能证实的而言，至今还没有人成功地在巴尔扎克财务迷宫中找到一条出路，反正他的费用如果从他自己的口袋里支付，那是很不可能的事情。好象在他们之间已有了一种安排，可以分享他们所有的财产。尽管德·韩斯迦夫人还没有下定决心嫁给他，但她却愿意把自己的生活命运同他联系在一起过上一两年，只是不得有损于她的最后决定。她觉得最美妙的是能够跟巴尔扎克、女儿和未来的女婿一道，以这种无忧无虑的方式到处游览。在所有的东西之中，她所最怕的或许就是单独跟巴尔扎克相处了。

第二十二章

收藏家巴尔扎克

假如巴尔扎克在一八四五和一八四六年所写的信被送给某一位从未听说过他的人，而问他关于写信者的职业和嗜好有何看法，他定会以相当的自信回答说，这些信乃是古董商或者藏画家所写。也可能有其它的猜想，认为写信人是个不动产投机家或是个房产经理人。他绝不会想到，这些信出自一位小说家之手。巴尔扎克对完成他的《人间喜剧》所操的心，远逊于他用在房子上的心思，这座房子他将为他未来的新娘以她继承的资财和他自己的劳动果实来建造。

这一次，他又是把车子放在马的前面，或者说，他把空车子放在马匹本该站的那个地点的前面。在一八四五年，他既没有房子，也没有在上面建造房

子的地基。当然他也没有钱去买一块适合于建造他头脑中计划着的那座大厦的地皮。然而他却热切地为他的空中楼阁进行装备。他被搜集古董的狂热攫住了。他要将新娘子领去居住的房子必须是珍宝库、画廊和博物馆的三位一体。他着手安排，要跟卢浮宫^①、赫尔米达慈^②、乌菲济^③和欧洲的王宫一比高下。他要有贺尔拜因^④、拉斐尔^⑤、凡·戴克^⑥、伦勃朗^⑦和华托^⑧的名画挂在墙上，珍贵的地毯铺在客厅的地板上，还要有古代的家具，雅致的瓷器。他梦想着一切可以从阿拉丁（Aladdin）神灯^⑨里跳出来的宝贝。

搜集宝贵的艺术珍品却缺乏相当的资金，这当然大成问题，但是巴尔扎克的解决办法倒很简单。他

① 巴黎的王宫，十八世纪改为博物馆。

② 已见上章，圣彼得堡的博物馆。

③ 乌菲济（Uffizi），佛罗伦萨地方的公共画廊，所藏主要是意大利绘画，以乌菲济的私人收藏而得名。

④ 贺尔拜因（Holbein，1456？—1524），与其子（1497？—1543）均为德国画家。

⑤ 拉斐尔（Raphael，1483—1520），意大利画家。

⑥ 凡·戴克（Van Dyck，1599—1641），佛兰德斯画家。

⑦ 伦勃朗（Rembrandt，1606—1669），荷兰画家。

⑧ 华托（Watteau，1684—1721），法国画家。

⑨ 《天方夜谭》里的故事。

买下所有在旧货店里碰上的杂乱旧货，随后就宣称他发现了一位古代大师或者一件古代工艺杰作。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投机癖眼下在猎取古董上得到了发泄。每到一城，必往各处搜索便宜货。好象是落进了他所不能控制的魔手。在一个地方他买上几张画，又到另外一个地方配上画框；这一回他成了许多花瓶的骄傲的主人；另一回则是大蜡烛台。从德国、意大利和荷兰源源不断地弄来大筐大筐的宝物，为了布置他未来的寓所。对于采购来的物品的真正价值他并没有丝毫概念，他可以受到这个行业里随便哪个生手的捉弄，仿佛自己在失魂落魄地行动着。他的心灵全被即将发财这一信念给控制了。他给德·韩斯迦夫人的书信就是一连串的公告，为了让她立即获悉他的最新收获。

德·韩斯迦夫人自己并不是一位多么俭朴的妇人。她和她女儿两人采买物品已经着魔，和平街上的珠宝店从她们手上大发其财。她特别喜欢梳妆台上的贵重物品，那都是嵌金的。不过，她虽然花钱大方，却知道计算价值。她好象曾经把十万左右的法郎交给巴尔扎克随便使用——他们称之为“Trésor LoupLoup”（“老狼金库”），按照他们的通信，“老狼”是巴尔扎克的绰号——为的是他能用来购置并装修一

所房屋。依照往例，他的基本观念总是合理的。他打算获得优美的古董家具。本来，假如他肯等待着有利时机来临从而拣到便宜货的话，他不仅可以用这笔钱得到一所漂亮房屋，而且可以舒适地甚至奢华地把它装备起来。可是，他不能够等待。一旦开始购买，他就再也收敛不住了。他从一位偶一为之的买主竟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成为一位收藏家，尤嗜投机性的购买。贯穿他的一生，总是在冷静的推理和愚蠢的奢华之间有一条十分微妙的分界线。德·韩斯迦夫人日益不安，警告过他应当谨慎，但是他却以一大堆详细的计算向她证明，他对自己的生意经是多么精明，他是多么经济地使用她放手让他使用的钱财。

他的信件的读者都会发现，他在自我欺骗上惯用的机巧工夫是令人厌烦的。但如果你跟着他的一桩买卖去观察他是怎样设想从中获利的，也未尝不无某种乐趣。比方说，他买到一套供九人使用的古瓷餐具之后，便洋洋得意地宣称：

“我买它只花了三百法郎，而仲马则花了四千买了类似的一套。它至少要值六千。”

最后，他终于不得不承认他原以为是中国出产

的瓷器，却是荷兰仿造的：

“它并不比我本人更多一点中国气味。”

他还悲伤地接着添上一句：

“请相信我的话，搜集古董是一门学问。”

这也并未能妨碍他继续以轻率的心情来追求这门困难的学问。仅在一八四六年二月十五日这一天的时间里，他就买了这样又买那样：

“整整三个钟头，我跑遍各处买到不少。第一：黄色杯子（花了五法郎，它至少值十个；一件杰出的工艺品）。第二：蓝色塞弗尔^① 杯子，帝国风格，它曾经属于达尔马^② 所有；颜色绚丽得不可想象，上面还带有一束花朵，单是它就值二十五杜卡^③（我只花了二十法郎）。第三：六张地道王室手艺的靠椅。我要保留四张，把那两张改

① 塞弗尔（Sèvres），邻近巴黎的一个城市，以出产瓷器而有名。

② 达尔马（Talma），拿破仑时代的法国名演员。

③ 杜卡（ducat），古代欧洲的货币名称。

成睡椅。镀金极佳！布置小客厅有它们就够了（花了二百四十法郎）。”

同一天，他又在漫游中找到：

“两只塞弗尔花瓶——它们本来值五百到六百法郎（一个字也别告诉人家，我才花了三十五！），这是我碰上的最大便宜货。人们并不认识他们的巴黎。只要有时间、耐性，在这儿没有你找不到的东西，而且极其便宜。当你看到我只用五法郎得来的黄色瓷器时，你会不肯相信我的。”

与此同时，他又洽谈着一笔烛台的生意：

“它曾经属于德国皇帝，重达二百磅。结结实实的黄铜制品，单是这金属每公斤就值两法郎二十生丁。我将只出铜价就买到这烛台——四百五十法郎。”

所以，这烛台其实没花费他什么钱。进一步说，整幢房子都会这样装备起来：

“你将生活得象一位皇后，周围都是艺术所能提供的王族气派的豪华，处于最可能的豪富与典雅之中，然而我们仍能使财产保持着原有的价值。”

他深自相信他比谁都更能买到便宜东西：

“我要你认识，你的‘老狼’是多么能干的经理、大生意人。我把巴黎的角落已搜索遍尽。真正的好货每天都涨价一倍。”

偶尔他也上个大当，不得不承认：

“我发现了一幅塞维嫣夫人的微型肖像，乃路易十四时代所画。花了一百法郎。你愿意要吗？它是一幅杰作。”

第二天他就承认了错误：

“那肖像非常蹩脚。”

不过，还算运气得很，他口袋中又掏出另一件宝

贝：

“我发现了你的姑祖母的肖像，玛利·勒辛斯迦，法兰西的王后，极为逼真，是柯依贝^①所画，至少也是他的学生之一所画。我对自己说：‘我们一定得占有它，老狼！’我买了它，花的钱不比那框子的价钱高。”

一个星期之后，他知道了这并不是柯依贝，而“只是”朗克列^②的。幸而他还能把框子卖给一位商人，得了八十法郎，而整个东西只花了他一百三十法郎。有的时候，当人们看他用这样的语调写信时，的确要疑心他是不是发疯：

“这一张小山水画是雷斯达尔^③的。米维尔嫉妒我那张纳图瓦^④，还有那张花三百五十法郎找到的贺尔拜因。”

① 柯依贝 (Coytel, 1661—1722)，法国画家，雕刻家。

② 朗克列 (Lancret, 1690—1743)，法国画家，雕刻家。

③ 雷斯达尔 (Ruysdael, 1628—1681)，荷兰画家。

④ 纳图瓦 (Natoire, 1700—1777)，法国装饰画家。

这时候他正在《邦斯舅舅》（“Le Cousin Pons”）里讨论贺尔拜因图画巨大价值，他的每一张画都值得好几千法郎。说来令人难以相信，他竟一次也不问问自己，为什么画商们会愚蠢到如此地步，让他用这样微不足道的数目就买到一张贺尔拜因。他似乎没有从这方面去考虑问题，只是兴高采烈地继续做着美梦，攫取被忽视了的珍宝。每一条街角上都有狂想的机会在等待他。“巴黎就是由这许多便宜货铺垫起来的！”

当巴尔扎克的遗物在他妻子死后于杜鲁奥旅馆拍卖时，事物的反面就显露出来了。没有提到过什么贺尔拜因和雷斯达尔，今天哪里也找不到一张有点价值的图画，标有“来自巴尔扎克藏品”的记号的。他所谓贵重的物品达到的卖价都是很可笑的。除了他在雅尔地上面的经验，这块地产花了他十万法郎，后来只能以一万五千给处理掉，至少，还有一段插曲，它应当教会了他，买东西要比卖东西容易得多。

一八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他在一家古董店里看到一张书桌和一个旧框子，它们多半是典型的意大利出品，随便就可以找到几十个。可是他以神奇的直觉——这种直觉是能使他在杂货堆里把一架平平常常的时钟看成一度“属于英格兰亨利埃达皇后”

的——竟毫不犹豫地断定：

“它们都是王宫里出来的优美东西——在佛罗伦萨为玛利亚·德·梅迪西^①制造的写字台和柜子。上面带着她的徽章，结实的紫檀木，嵌着珍珠贝，花纹的富丽精致真能叫已故的索默哈尔先生^②销魂。我真感到困惑，这两件东西原应当放到卢浮宫去的。”

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足以说明巴尔扎克的直觉是怎样牢不可分地同投机狂热结合在一起。热情总跟唯利是图相混杂，虽然他的第一天性总是审美性，而且也并非不带有爱国主义色彩：

“这些属于曾是鲁本斯^③保护人的王后的纪念品，必须从资产阶级手里拯救出来！我要写一

① 玛利亚·德·梅迪西 (Maria de Médicis, 1573—1642)，法国国王亨利第四的第二个妻子。

② 索默哈尔 (Sommerard, 1779—1842)，法国考古学者，生前收藏名画，设私人博物馆。身后收藏品为国家收买，正式建立博物馆，由其子任馆长。

③ 鲁本斯 (Rubens, 1577—1640)，佛兰德斯画家。佛兰德斯这个小国后并入法兰西。

篇关于它们的二十页的文章。”

用同一口气他又添上了一句：

“从投机的观点来说，这里有一千法郎的利润好得。”

第二天，他花了一千三百法郎买下了这两件家具，并且他的快乐又因进一步的高明见解而更加增高了：

“我有了一个惊奇的历史发现，将于今晨确定它的细节。属于玛利亚·德·梅迪西的只有柜子。写字台上带有刚齐尼或德·埃柏尔依公爵的徽章，但是它还有两个‘M’字母美妙地缠结在边缘上。这证明玛利亚·德·梅迪西跟某一位或另一位心爱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她把自己的柜子送给了他，又为他制作了一张写字台。德·安克尔元帅——虽然他作为元帅外表有点滑稽——用珍珠母在上面镶嵌了枪炮等等军事标记。”

这些无稽之谈中只有一点是真的，那就是，刚齐尼（他后来成了德·安克尔元帅）的确曾经受过王后的宠爱。其余一切，都是巴尔扎克想象力的虚构，但是这样一来却立刻增高了他的发现的价值，要找一位买主也不困难：

“单是这柜子就值四千法郎。我要把它卖给国王，拿去放在桑梅拉尔博物院，但我打算留下写字台。”

当然，利润将投资在下一次的生意里。

“如果我能以三千法郎的价钱把柜子卖给路易·菲利浦，我将非常高兴了。我可以获利一千六百五十法郎，这笔钱可以当作一笔小小基金，让我继续在古董世界里发掘，还能增加我们的宝库。”

德·韩斯迦夫人颇感怀疑，这些买卖是否真的那样明智。她就其“家具狂”提出劝告，而他却回答说：

“我已经作出指示，应当把这两件家具中的一件按照我为两件家具付出的价钱卖出。这样我就不费一文地白得一件，同时手头又有些钱去买一个烛台了。”

象精明的商人一样，他也利用了报纸广告的力量：

“不久的将来你也许就会从报纸上看到，我的发现已引起轰动！”

二月十一日，《消息报》上出现了一条报道，是巴尔扎克自己写的：

“我们的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他也是一位大古玩鉴赏家，偶然间发掘出一件有高度历史趣味的家具。这件东西是一个柜子，它曾经装饰过玛利亚·德·梅迪西的卧室。这件家具，人们可能想象得出的一个最完美的艺术品，是由坚实的紫檀木制成的。”

国王好象并没有被这件曾经属于法兰西著名王

后的上选家具所打动。终于，有几位商人，受到报纸广告的诱惑，前来看货了。这一下子巴尔扎克可到了七重天上：

“一位买主来了。他愿意出一万法郎购买这两件佛罗伦萨家具，再以两万法郎转卖给国王。他已答应给经手人杜孚尔一千法郎佣金。但是我只打算把柜子出手。人们从四面八方，其中甚至有古董商人，蜂拥而来，在对家具的赞赏上他们完全一致。”

所谓大群欣赏者的赞赏，先不必说有可能的买主，恐怕后来也就逐渐冷落下来了。到三月过后，还没有一次交易成功。换了旁人，必会承认自己的直觉是个错误。而巴尔扎克却不这么想。相反，他倒提高了价格：

“我要自己留下的那一件，现在就在我的寓所。它超出了一切赞美之词，它太美妙，太卓越了，简直不能以文字来描述。顺便说一下，我并不要无限期地保留其中的任何一件。一位最知名的古董商人估计，这一件值六万法郎。修整写

字台的木匠说，仅是手工钱就值两万五。根据他的意见，当初至少花了三年时间才把它做好。镶嵌的花卉图案如此高明，就连拉斐尔也不会不承认。我想看看，伦敦的桑特兰公爵，或者一位爵爷，或者某一位罗伯特·皮尔^①，或者其他什么人，是不是愿意拿出三千金镑。有这价钱，我愿意出手，这笔钱够我还债的了。在此之前，我就把它留在自己房间里。”

又过了一个月，英国贵胄方面并无任何出价的信号。巴尔扎克并不气馁。以他那决不屈服的坚忍不拔，他又想出了一个新计划。他将把这两件家具制成雕版画送到《家庭博物馆》去刊载，这家杂志将付给五百法郎的刊登费，可以用来补偿他为这柜子和写字台所付出的代价。

春天让位给夏天，夏天又在秋天面前引退。《家庭博物馆》并没有刊出这幅雕版，也没有什么可能的采购者出现在地平线之上。十月间，忽然出现了一道曝光：

“好消息！罗特柴尔德对我的佛罗伦萨家具

^① 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1788—1850），英国政治家。

感到兴趣，他要来访我，目的无疑是来看这两件家具。我将索价四万法郎。”

尽管大做广告，在过了十二个月之久也未能找到一位买主，而来自一位大名鼎鼎的银行家的一个礼貌姿态却又足以使他把价钱再次提高。后来并没有听到罗特柴尔德预定要来拜访的消息，但我们发现他曾谈论到德凡柴尔公爵，还叹息道：

“唉！但愿能有点结果！这将是可喜的转机！”

然而又是毫无结果。第二年他又在荷兰国王身上做了最后一次努力。在挣扎之中，他竟提出荒唐透顶的价钱，七万法郎。他还动员他的朋友泰奥菲勒·戈蒂耶帮忙去办成这桩交易：

“我需要高提埃为我写一篇有关这两件佛罗伦萨家具的文章。我们只有一星期的时间去准备印刷，我将把清样寄给荷兰国王。必将引起轰动！”

轰动并未成为具体事实。他到底也没有能处理掉这个柜子和这张写字台。他倒是也省得知道，后来在杜鲁奥旅馆拍卖时，从这两件东西所收回的价钱是少得多么可怜啊！

* * * *

家具、瓷器、篮子、柜子，堆着摞着，很不容易躲过目光锐利的债主们的魔爪。是时候了，该去买一座房子，用德·韩斯迦夫人的名义登记，就可以避开他们的攫取。巴尔扎克以相当小规模的方式开始，因为他们打算在巴黎过一种“*existence excessivement simple*”（“特别俭朴的生活”），即使如此，他们的开销每年至少也得四万法郎。便宜一点是不行的，因为维克托·雨果花两万法郎，“日子过得象只老鼠”。

买座房子，就巴尔扎克而论，并不仅仅意味着得到一处用来居住的场所而已，还应当是一笔好生意：

“拥有一所房子，这个念头在我脑子里已有三年之久，主要是出自经济上的考虑。购进房产该是一件有利的买卖，这毕竟是很自然的想法。”

他到处物色，而每当他看到什么合适的东西，他

就想出补偿部分价钱的方法。巴士有一所标价十万法郎的房子。他七搞八搞，实际上这房子只花了他六万：

“他们正在巴士修一条新路，以便绕过小山，这条路经过房子所在高地下面十二英尺左右。当局必得从我们手中购买部分土地，据我听说，这样我们就能得到一万法郎作为补偿。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把佛兰克林街的土地卖出三万法郎。”

十二月里，他到莫苏去视察房子的建筑工地：

“我们无疑能使本钱加倍。”

后来他又在蒙巴尔拿斯街发现一所房子：

“它真合适，就象一只手套。”

只有一些小事须加考虑：

“有一部分应该拆掉。”

室内需要重新装修，这将支出十二万法郎。不过，这笔花费用一个简单办法就可以轻易地收回，那就是买进后再转售可以获利的场地。这不过是回到他早年的老办法，当年他买进印刷所去维持他的出版公司能够站住脚，再买一个铸字所去防止他的印刷所垮台。

到了春天，他的眼光又转到了乡间，在那里他们不但不花什么钱就能够生活，同时还可以在太平和安宁中等待时机，直到将来地价高涨之时。他们只需要等待就行了，金钱自会落入荷包。生活原来竟是如此简单！

“芜夫利的一块葡萄园，它的收入就足够我们生活了，它不过只值两万到两万五千法郎。”

可是在芜夫利买葡萄园是件蠢事，如果他们本可以买一座城堡，带有全套葡萄园、果树、台地，还能眺望罗瓦尔河的壮丽景色。诚然，这大约要花二十万到三十万法郎，但巴尔扎克经过仔细计算后发现，这实际上并不花费他们一文钱：

“听了我将要告诉你的事，你一定会高兴得

跳起来。蒙刚杜尔打算出售！我梦想三十年之久的事已经实现，或者，即将要实现了。”

最多只要付八万法郎的现钱，但是部分土地可以单块出售：

“单是这产业上的葡萄园——根据十年的平均产量所作出的非常准确的计算——就可为本钱带来有把握的百分乏五的利息。如果我们想处理掉这些葡萄园中的十亩，它们将不难卖到四至五万法郎。用这办法，我们就可以收回全部的购买费用。”

他以抒情诗的文采来结束这封信：

“你还记得蒙刚杜尔吗，那座有着一双小塔映在罗瓦尔溪水中的小城堡？它俯瞰整个杜尔兰。……”

一位从前的同学为他去办交涉，但是就连这计划也显得规模太小。巴尔扎克竭力为他的财产越大、价钱就越贱的理论辩护：

“小产业贵得荒唐，因为小康之家太多。要做真正的大生意，你就得选择真正的大产业。”

为什么不买圣葛拉田城堡呢？它属于德·古斯丁先生，他在这产业上破了产，正象巴尔扎克曾在雅尔地上破产一样：

“圣葛拉田花了他三十万法郎，但是他告诉我他愿意以十五万法郎卖给他的第一个主顾。……到了最后，他会白送给人家。”

可是德·古斯丁先生却不是巴尔扎克，好象他一点也不想把城堡白送给人家。

巴尔扎克继续物色，到了一八四六年秋天，他终于找到他在寻觅的家了。它就是幸福街的保庄楼，这是一所十八世纪的房子。革命之前，一度属于一位富有的 *fermier générale*，即国家税务农人。送到这座新居来的，有豪华的家具，珍贵的瓷器，贺尔拜因和雷斯达尔的画，一座铜烛台。这房子等着要变成 *Musée Balzac*（巴尔扎克博物馆），他的私人的卢浮宫，他的从无到有的艺术杰作的创作纪念碑。可是后来当弋蒂耶看了这座房子而惊呼巴尔扎克一定已在短期内

变成百万富翁的时候，他却忧伤地答道：“不，我的朋友，现在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穷。这些豪华之物没有一件属于我。我只不过是这所公馆的门房和管家罢了。”

他并不曾立即住进保庄楼。在眼前这时刻，为着提防债主们，他仍然留在巴士街的卑微寓所，那里他保留着他的书桌，而正是这座简单的寓所，而不是充满地毯、铜器和烛台的保庄楼，才是我们的真正的Musée Balzac（巴尔扎克博物馆）。人类生活的一个无可争议的定律乃是：即使最伟大的天才们，也往往愿意让人家来夸奖那些比起他们的真正成就来本属微不足道的事情。在收藏家巴尔扎克身上，我们就看到这个奇怪定律的一个杰出事例。

第 六 卷

论 定 与 盖 棺

第二十三章

最后几部小说

在不得安宁的这两三年里，巴尔扎克失去了，至少是暂时地失去了，能置其它一切于不顾的、集中于创造性劳动的原始力量。他变成了收藏家。这不仅是一般意义的，而是按照这个字眼的精炼意义。他搜集的不只是打算用来布置新居的具体的舒适用品和奢侈用品，而且还搜集生活一向对他关门的体验——长时间的悠闲，跟倾心相慕的女人宁静的散步，在异域土地上不受背后丈夫威胁的恋爱的夜晚。创造虚构图景的专心致志，由于为自己的生活故事寻求一个快乐结局而让步了。

效果从写作中可以看得出来。就在紧接这一段生活插曲的前几年，他曾写出《一桩可怕的事情》，一部宏伟的政治小说，里面有政治阴谋的活生生的描

写；又写了《搅水姑娘》，用现代的眼光去看待性问题；又写了《幻灭》的结尾部分。继这些卓越作品之后的乃是《妓女们的盛衰》，此中文学的世界与财政的世界紧密相连。伏特冷这个人物又回到了台面上。他把早期小说的主题都结合在一起，构成一幅宏伟的全景。虽然有一些偶然的耸人听闻和侦探故事色彩，但他正是在这部小说中比其它任何地方都更成功地装进了巴黎精神和巴黎社会。然而他却无力完成《农民》。它是研究城乡斗争这个重要社会问题的一个尝试。城乡对立，这在巴黎被人看做是市场、股票交易的事件或者是文学的一个题材，而在农村，却保留着其原始的初级形式。其价值决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而就在土地本身，就在每一片一片的土地上。巴尔扎克为这部小说已经花了好几年工夫，他觉得这部书注定会成为《人间喜剧》总体中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本。他一次又一次地回过头来写，甚至于先把第一部分刊印出来，以此督促自己有责任去完成它，但是他还是不得不把它搁下。他把笔触投到一些分量较轻的主题上去了。小说《柏阿特里克斯》，其中只有最初几章有点儿文学价值，后面被加上一个毫无生活真实的感伤结尾，还写上许多琐事，就跟《夫妇生活的悲剧》一样，这本书不过是旧作《结婚生理

学》的改写，虽然也加上了不少机智和魅力。短篇故事《谦虚的米昂》，其题材是德·韩斯迦夫人（他把这部书献给她）提供的，也完全可以由一位模仿者来写。书中丝毫不见狮爪的痕迹。他自己有一次说过，艺术家只要离开了工作室一段时间，就需要相当的时间才能再次得心应手。巴尔扎克在他寻求房屋和在古董铺搜索的那一阵子，把工作耽搁得太久了。在他这一时期的信件里，有许许多多页数一字不提他正在写作的书或者未来的文学计划。

巴尔扎克深知自身的变化。他知道，由于放纵自己去耽溺于“懒洋洋的享受生活”，他既已丧失了匠人的技巧，也丧失了工作的乐趣，在一八四六年一月，他给居住在那波利的德·韩斯迦夫人写信说：

“我的脑筋已不灵活。……我对一切都感到厌倦乏味。”

他已不再以未能在《农民》或《小资产阶级》（“Les petits bourgeois”）两书上有所进展而感到烦恼。他现在写作只是为了清偿债务，而人们也常常觉得，他在艺术方面的兴趣已经停止了。三月里，他突然放弃一切，到了罗马。

回到巴黎后，他又一封一封地写信给德·韩斯迦夫人，总有照例的保证说他要如何如何“拼命工作”。他再一次被一个信念抓住，就是，如果他日日夜夜写上三个月的话，“一点不停顿，或者至多间断两个星期去结婚”，他就一定能够成功地付清所剩下的债务——现在他不过只欠六万法郎而已。然而还是一字不提艺术灵感。可是最后，到了六月一日，他告诉她说：

“四天以来，我被耗尽精力的活动给抓住了。……”

到了十二日，他报告道：

“我正在拟定《农民》的大纲，此外，还构思了一个短篇。”

到了十四日，他居然能够宣布两部新作品的计划：

“我打算写下列这些作品。第一，《可怜的亲戚们的故事》（“L’histoire des parents pau-

vres”），包括《邦斯好好先生》（“Le bonhomme Pons”），将占《人间喜剧》三或四个印张，和《贝姨》，将占十六个印张。第二，《王家检查官的恶行》（“Les méfaits d'un procureur du roi”）。”

两天之前他所提到的短篇现在变成了两部故事书，但是这两部故事书将取得的广度和深度他在当时却并不自知。他仍想把它们写成较短的故事体而不是小说。他也考虑到它们的长短，那意味着他只在关心由此可以得到的报酬。然而突然一下子他昔日的雄心忽又燃烧起来。当他着手写初稿时，他已意识到它们的潜能，而创造性成就的喜悦又回到他身上。六月十六日，他指出了这件工作的规模：

“上天此刻对我的要求是，我应该写出两三部第一流的作品，它们将推倒低劣文学的虚假神奇，并从而显示我将比以往更年轻、清新、伟大。《老音乐家》（“Le vieux musicien”）的主角是‘穷亲戚’，他被恶运摧毁了，但他却是一位心灵纯洁的人。《贝姨》中的女主人公是个女‘穷亲戚’，也遭到不幸的逼迫。她在三四个家庭

的府邸中度过一生，终于为她的全部苦难报了仇。”

在关于金钱事务、地产投机、铁路股票、瓷器餐具的种种饶舌之后，又看到他去创造艺术作品的复苏了的意志，真令人愉快。当然，他还在执著于同出版商交涉关于取酬的前景这一套可悲的做法，而没有时间去考虑小说该写多长；但是，这事一旦解决了，他就投身于他的工作了。他又回到了旧日习惯，把黑夜变成白天；在他的信件里有一处谈到过他感到日常生活常有使他分心和激动的事，特别是古董商不断地送货，真是一种恼人的烦扰：

“我真希望这些箱笼立即打开，马上结束。这些我等着要看的美丽物品，我急于想知道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才能送到，这一切对我都有着强烈干扰，尤其是在我目前的情况下，我现在已被灵感的火焰弄得精疲力竭了。我能指望在星期一把《老音乐家》完稿，如果我天天都能象今天这样一点半钟就起来的话。你看得出来，我又回到从前的工作时间了。”

这部小说以如此高的速度写出，这在巴尔扎克也是很特殊的。六月二十日，我们发现他已在发表评论，其方式在他更是罕见的：“我对《老音乐家》非常满意。”

此后，我们又是只听到某张图画运来时被擦坏了，或者他买的铜器原来是赝品，以及关于债务和裁缝的事情。六月二十八日，他发出一声欢呼，那是多年来人们没有从他口里听到过的了：

“亲爱的心肝！我刚刚写完了我要管它叫做《寄生虫》（“Le parasite”）的这部书，这是我一直称为《邦斯好好先生》、《老音乐家》等等的手稿的最后定名。这书，至少在我看来，乃是那些第一流的书籍之一，它极为简洁，但其中却包容了整个人心。这部书和《杜尔的教士》一样伟大，甚至更为流利，同样令人断肠。我心中充满热情，我将立即把校样寄给你。

“我即将开始写出《贝姨》，这是一部冷峻可怕的小说，因为主角是由我的母亲德斯保尔特——发尔摩尔夫人和你的姨母罗莎利的性格综合而成的。小说将叙述许多个家庭的故事。”

他对母亲的愤怒，以及有关莉勒黛的命运——她是他跟德·韩斯迦夫人的早期不法爱情的见证人——都在《贝姨》里有所反映。当他从事撰写这部小说的同时，他又忙于校对《邦斯舅舅》的清样，按照他的习惯，这实际上就等于重写。艺术家的急性子和商人的合流，从而使他不去颂扬上天赐给他的天才，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创造出如此的杰作，他反而为进展的缓慢而哀叹：

“已经是七月十五号了，唉！……完成这部《穷亲戚们》全仗我额头的大汗。这本书将给我带来约一万法郎，包括印成书本在内。”

但如期脱稿并不可能，一直到了八月底，这部书还未写完，尽管在这个月十二号这一天他就写了不止二十四页。好容易在稿尾写上个“完”字，艰苦的清样校对工作马上又开始了。但他身体已被损害得达到极度枯竭的状态，使他的医生大为震恐。正如巴尔扎克自己所记：

“他和他的任何一位医药同行都不能想象能使一个人的脑筋承担得起这样过度的劳累。

他告诉我后果十分有害，他以阴沉的脸色一再重复这个声明。他恳求我至少要把这种‘大脑超额劳作’——这是他的用语——打断一个时期。他看到我在《贝姨》上使自己承受的紧张程度，这本书只花了我不足六星期的时间，他极感震惊了。他说：‘大难即将临头。’事实上我也的确感觉到，我有些地方不对劲了。谈话时我总得寻觅字眼儿，而且有的时候还很吃力。是时候了，我真该休息一下了。”

九月里，一面还在修订清样，他去了一趟威斯巴登，到德·韩斯迦夫人身旁去休整一下。他有理由得到休息，因为当年夏天他已经写出了自己最伟大的杰作。那两部小说，《邦斯舅舅》和《贝姨》，它们是从《穷亲戚》的腹稿演变而来的，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他在盛年，就到达了艺术顶峰。他的灼见从来没有这样深刻过，他的艺术匠心从来没有这样老练过，写法从来没有这样尖刻过。他是在长时期的停顿之后写出这两部书的，其中没有任何虚假的理想主义或腻人的伤感情绪的痕迹。它们反映了实际生活的艰辛，是对这个世界的真实理解。眼睑上的阴翳已经落了下来，他再也不会被成功的外表所迷惑，也不会

为辞采的奢华和纤雅的表现所诱了。在《高老头》和《幻灭》中，他已显示出描写幻想破灭的本领，正如我们在莎士比亚的《李尔王》里所看到的；同样，他的最后两部小说也有着《珂里奥兰诺斯》^①的全部锋芒。

巴尔扎克表现得最为高大的时刻，是当他超出时代之上的那一段时候。这时他能创造绝对的价值，而一点不考虑去迎合同时代人的趣味。《邦斯舅舅》和《贝姨》两书都取景于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巴黎，这并没有多大重要性。它也可以移植到目前的法国、英国、德国或美国，移植到任何国家、任何时代，因为巴尔扎克在书里所关心的乃是基本的情感。在他作品里那些囿于某种固定观念的人物画廊中，由于有了色情狂雨洛男爵和收藏家邦斯而显得更加丰富了。在《妓女们的盛衰》里，继那个相当带戏剧性的妓女朵尔庇耶之后——这是一位令人过于密切地联想到茶花女的绝妙的堕落女人，装扮得适合巴黎人的趣味——他又描绘了一位天生妓女的画像，这就是马尔纳夫夫人，一位市民妇女，她把自己卖给任何一位来客。作为她们的反面，他创造了无与伦比的贝姨，一位转移到与恶魔同样水平上来的莉勒黛，她是

^①《Coriolanus》，也是莎士比亚的一个剧本。

老处女，从生活中得不到健全的感受，而只能羡慕别人，却在秘密私通事件中充当中间人，去寻求乖戾的、罪恶的快乐。“穷亲戚”的悲剧可以从邦斯舅舅身上看到，他只在还能保留一些旧日的光彩的情况下才被人容忍。贪婪行为的推动力可以在看房人西保的身上看到。我们还见到一些狡猾的浪子，他们的唯一欲望就是弄钱，他们总在欺骗无辜、纯洁的心灵。以晚期这几部小说的戏剧紧张性来同早期的作品对比，那么早期书中伏特冷的形象就显得过火了。这些小说的现实主义，感觉的逼真程度，对原始感情的分析，至今在法国文学里还没有人能够超过。

*

*

*

*

*

就这样，他与艺术作了伟大的告别。我们本可以据此来衡量《人间喜剧》所能达到的高度，假如巴尔扎克还能得到十年以上，即使五年也好，使其业绩更加成熟的话。那么，他就能在《农民》里表现出城乡的最终对立，表现出真实的农民，就象表现真实的巴黎那样——而并非一个象卢梭所描写的馨香风景区，由大自然的天真儿童们居住着。在《战争》和其它军旅生活故事里，他也就会描写出战争的一切赤裸裸的暴行，而不是与此恰成鲜明对照的、在《乡下医生》里所写的拿破仑颂歌。在《一桩可怕的事情》

里，他本已超过了历史的传奇观念，但假如命运对他有所怜惜，他本可以完成关于戏剧、学术、外交、政治等等方面的图画。一八四五年拟定的目录包含有五十部书都是他没有来得及写出的。在剧本方面，他曾效法过拙劣的模式而发现自己陷进了闹剧的沼泽，他这时确已即将立足于坚实的地基上。《阴谋家》，后来改称为《梅尔迦特》，是一部描写欠债人胜过债主的剧本，是他在这个领域的第一部独立著作，此剧在他身后获得了其它剧本都没有得到过的成功。他的本领集中到了最高程度。很清楚，在戏剧上，跟在小说方面一样，他完全感得到他对自己天才所负的责任。不过，无论在身体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他都需要有一个休止。他再一次感到休息的需要，一次彻底的、治疗性的休息，要让他走得远远的，越远越好。这也是一个权利，是他正正当当挣来的。他于是离开巴黎出去旅行；——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横渡了地球表面的四分之一——到了遥远的乌克兰，到了维埃曹尼亚，到了德·韩斯迦夫人身边。

第二十四章

巴尔扎克在乌克兰

到了一八四六年秋天，有一阵子巴尔扎克似乎终于快要走进他渴望已久的休憩港湾里去了。德·韩斯迦夫人长久以来用来逃避问题的那个借口，已经不复成其为理由了。她一直坚持说在亲爱的女儿妥善地嫁出以前，她是不能考虑结婚的；而安娜和梅尼齐克伯爵的婚典已于十月十三日在威斯巴登举行。巴尔扎克亲自参加了，他的心再次充满希望。他以令人歆羡的预见给自己弄到了公民婚礼所必要的个人文件，伪称他需要文件是为了接受荣誉勋位。他又大事准备，打算使婚仪在梅斯（Matz）秘密举行，在那里他和德·韩斯迦夫人好象都没有熟人。梅斯的市长，巴尔扎克与他已先打了招呼，并被争取赞同了他的计划，而公民的婚仪，只在法兰西才有效，这

将在市政厅暗地举行，公开场面将尽量减少。两位证人，医生拿克加尔的儿子和另一位朋友，将从巴黎专程前来，而德·韩斯迦夫人将留在德意志领土萨尔布吕肯，一直等到指定的日子，还只能在夜间到达梅斯。宗教仪式嗣后将在德意志举行。梅斯的主教或巴士的牧师将预先批准，然后他们在威斯巴登的教堂里由牧师主持婚礼。这种复杂的步骤显然非常重要，以避免他们结婚的消息传到俄罗斯官方人士的耳朵中。巴尔扎克催促着要她立刻同意：

“我正在等待你下一封信。我告诉你，天天每一个钟头我都只在你心中生活。这句话现在有双重的真实意义。”

情况也加重了迫切性的需要，因为他们在意大利互相消磨在彼此怀抱里的婚前的几周快乐时光并不是没有后果的。德·韩斯迦夫人虽然已是四十五岁的年纪，却指日可待要有一个孩子出生了。巴尔扎克，以他那过早的乐天性格（这原是他的特点），已在相信一定是个男孩子，并且已经决定为他取名为维克多·奥瑙利。

不过，德·韩斯迦夫人还是不能够拿定主意。她

不能克服勉强离开女儿的那种不情愿的心情，因而她并不去进行自己的婚事，反而陪伴这一对年轻夫妇去度蜜月。巴尔扎克只好把他费了许多心思得到的文件放回皮包，放弃了巧妙安排的秘密婚礼，回到了巴黎。在那里，《邦斯舅舅》和《贝姨》的清样正在等着他校对呢。不管人们在德·韩斯迦夫人到底是不是真地爱上了巴尔扎克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如何，有一件事却是毫无疑问的，即每当她在他和她女儿之间决定取舍的时候，取得胜利的总是女儿。无论是安娜的婚姻还是她自己的婚事，即使当她必须最后采取决定性步骤的时候，也一丝一毫不会影响存在于这两位妇女之间的亲密关系。她们两个对待丈夫或情人都带着某种冷淡态度，甚至是有些厌烦。

次年二月，德·韩斯迦夫人突然决定到巴黎去，这样巴尔扎克就得到伏尔巴哈去护送她。既然她要求他来陪伴，他当然就得服从。工作么，则可以搁一搁。他总是把一切都抛到一边，急急忙忙跑去会她，不管她在什么地方。只要她一招呼，他就会奔向瑞士、意大利、奥地利，多少日夜消磨在颠簸的邮车上，焦急地计算每一分钟，直到能再看见她为止。

她第二次在巴黎逗留的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至今还是囊中奥秘。她的孩子不是死胎，就是生

后不久就死去了。由于众所周知的理由，这件事情人们所知甚少。孩子是个女儿，巴尔扎克带着做父亲的坦率天真，写信说这一点减轻了他的悲哀：

“我本希望得到一个维克多·奥瑙利。一个维克多是不会抛弃他的母亲的。我们原本可以享有他，让他陪伴我们二十五年，这正是我们，你和我，可以期望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时间。”

但是德·韩斯迦夫人仍不准备下决心采取步骤。她找出一个接一个的借口来做进一步的推延，一直诱导着我们不得不相信，在进入这种不可挽回的结合上，她是十分勉强的，而且随着她对他认识的深入，这种勉强也愈益加深了。这一次，她宣称她必须回到维埃曹尼亚去料理事务，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他只好伏伏帖帖地陪她回到伏尔巴哈，然后才再次在巴黎的书桌旁边安坐下来。

他本希望毫不迟延地一径跟了她去。他手边只有《农民》需要完成，除了再写一部剧本，好让他能够还清欠他的老朋友维斯冈地夫妇的一万五千法郎债务；但是健康状况从中捣乱，医生们警告他不可过度工作，他对自己也毫无把握，而出版商和编辑们也

日感不安了。《新闻报》编辑基拉尔丁已经两度在他的报纸上刊登《农民》的片段，他很信任巴尔扎克的工作能力，那是全巴黎都闻名的。巴尔扎克也从不让出版家或者编辑陷入十分窘困的境地，因为即使到了糟而又糟的时候，他总会拿出一些东西来去代替他原已承诺的稿件的。这一回却赶到点子上了。当基拉尔丁坚持必须全部稿件到手然后才同意第三次印行这本小说的时候，巴尔扎克平生第一次不得不投降了。他平生第一次不得不放下笔说道：“我不能写了！”为了在自己眼里遮盖这一失败，他不知怎么设法竟弄到了金钱，把从基拉尔丁那里领到的预支偿付了。这是为了自由的赎身钱，是逃到维埃曹尼亚去的自由，从那儿他将把新娘带回新居。

这是他目前唯一关注的事。为了这件事，他跟母亲和解了，虽然她是他从心眼儿里厌恶的人。在他的书信里，即使是最刻薄的语言，也没有不能用在他母亲身上的。但是这位七十高龄的妇女却是能在他离家时可依靠的唯一的人，去给他看守珍贵的财产，正如他逃出卡西尼街寓所时就曾托付她去照应过一样。她是一个严格的管家人，所以每当他需要真正可以信赖的人，他就求助于老母亲了。他留给她的指示非常古怪，念起来很象一段小说。他说，她应该时不

时地对仆人们进行恫吓，要告诉他们德·巴尔扎克先生三两天里就要回来。这事每个星期都要照办。“这样做有助于维持他们的工作紧张勤快。”她还得张大眼睛，看着他贮藏全部财宝的“小房子”，因为，正如他给他妹妹的信上写的：

“德·韩斯迦夫人非常关心那所房子，那里面藏着那么些个宝贝。这是六年来撙节的结果。说不定会发生抢劫之类的灾祸！”

对母亲，他以满意的心情说：

“仆人们没有一个会读书写字。您是唯一认得我的笔迹和签名的人。”

在这些时刻，他明白除了这位老妇人，他没有别人是可以完全信任的。把一切事情交托给她之后，他就踏上遥远的征途，向乌克兰出发。

* * * * *

到维埃曹尼亚的旅程在那个年月可算是一次探险。

“我跨越了地球表面的四分之一。假如我走了双倍的路程，就该发现我自己是在喜马拉雅山的那一边了。”

旅行的正常时间至少需要两个星期，但是巴尔扎克一路不停，比一个星期多不了一点就到达了。他的出现是出人意料的，因为他用来通知的信件又过了十天才到达维埃曹尼亚。

他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极端快乐。他的热情总是很容易点燃的，可是再没有旁的东西比外表的阔绰更使他倾心的了。关于维埃曹尼亚女主人的财富，那是无可置疑的。他现在已经亲眼见到这位女友生活于其中的富丽堂皇。这座拥有巨大套室的大厦在他看来可以跟卢浮宫相比。这座产业可不是寻常的产业，简直就跟法兰西的一个省份一样大。他赞叹乌克兰的沃饶厚实的土壤，这种土地无须施肥五谷就会丰登。还有属于德·韩斯迦一家的广阔森林以及一大群仆从。在巴尔扎克的反应中，他以快乐的心情描写这些仆人：“在走到一个人面前时，的的确确匍匐地上，用额头叩地三次，还吻人家的脚。只有在东方，人们才知道卑屈是什么意思。只有在那儿，‘权力’这个字眼儿才蕴有真正的涵义。”

他观察着这些多到无可再多的银器和瓷器，心想在这些人周围，什么奢侈品都有，一定是什么烦心事也没有的。他们的祖先领有的土地竟有半个法兰西那么大。梅尼齐克伯爵在自己的产业上还拥有不下于四万名农奴，不过如果他打算垦植他全部土地的话，他还需要十倍于这个数目的劳力。贵族地主的生活跟大自然一样奢侈。这种生活规模是符合巴尔扎克的梦想的，在维埃曹尼亚的德·韩斯迦大人的庄园里，他简直感到宾至如归了。

这是他平生第一次不必去考虑金钱。什么东西都应有尽有——饮膳、住房、仆人、马匹、车辆、书籍。这里没有债主来打扰他的安宁，信件也很少转来。然而人总不能蜕下自己的皮，巴尔扎克因而也总免不了从金钱角度来考虑问题。正象作曲家把感情、思绪转化为音乐，巴尔扎克把他所见到的一切也都归结到钱财的计算上。他始终保持着那种死不悔改的投机家的本性。甚至在到达维埃曹尼亚之前，还在庄园的森林中穿行的时候，他端详着那些大树，就在用如何发财的眼光考虑着这些树木的主人将有多少收益。昔日打算着一举而成为巨富所遭的失败早已被遗忘得一干二净，他随即给梅尼齐克伯爵送上一份开发这片取之不尽的林木而使之变成现金的计

划。国境上正在修筑铁路，不久以后这条铁路就可以使俄罗斯连接法兰西。巴尔扎克迫不及待地用铅笔在纸上画出了一条线，把维埃曹尼亚的森林和法兰西的木材厂连结起来：

“法兰西目前需要巨量的橡木去制造铁路枕木，然而我们没有橡木。我知道橡木的价格大约涨了一倍，无论是为了建筑还是为了制造家具，都一样需要它。”

然后，他就开始计算利润和损失。从布罗迪到克拉科夫的运费需要考虑。从克拉科夫起铁路已通到巴黎，虽然途中有不少中断的地方，因为易北河在马格德堡还没有桥梁，莱茵河在科隆也是如此。所以乌克兰的枕木在这两段路上就得靠摆渡过河。“六万棵木料的运输非同小可”，而且还会增加运费。不过他们可以努力去使银行家们关心这项计划，也可以去把法兰西铁路公司的董事们说服，就可以减少运费，如果计划能证明也符合他们利益的话。这样，如果森林主在每一棵木料上只弄到五法郎的利润，那么，在扣除一切费用之后，他们仍有几十万法郎可赚。“这事值得仔细考虑。”

也许，我们没有多少必要去记录巴尔扎克这个投机天才的这一最后的产儿了，因为它始终只停留在初步讨论的阶段。

他消磨在维埃曹尼亚的几个月中，巴尔扎克只让自己尽情享受。在跟女人们同到基辅去的一段描写里，他叙述在乌克兰的京城中如何如何受到注意。那里有一位俄罗斯富人，每星期都点上一支蜡烛来为他祷告，还答应给德·韩斯迦夫人的仆人们一大笔礼物，如果他们通知他巴尔扎克什么时候有意再来，让他能有机会见到他。在这所房子里，他被分到归他个人使用的是

“一套令人满意的住处，包括一间客厅，一间书房，和一间卧室。书房是用粉红色刷的浆，还有壁炉，超级地毯，舒适的家具。窗户装配着大块明亮而平滑的玻璃，使我能朝各个方向观赏风景。”

他计划进一步远足，还要到克里米亚和高加索去作长途旅行，不过这些却不幸都没有实现。至于工作嘛，实际上他什么也没有做。在最近几年里，他总也不能安下心来从事严肃的写作。当他得陪伴德·

韩斯迦夫人的时候，对于她，以及她的女儿和女婿，他已经成了“消遣品”，一位有趣的伙伴，可以帮助他们消磨烦闷无聊的时光。在同卡罗夫妇或马尔冈夫妇相处的时候，他总因为是艺术天才而受到敬重。除非他需要他们陪伴，他们从不侵占他的时间，而是让他独处，所以住在他们家里时，他总能够写作。在维埃曹尼亚就不一样了。围绕在这些被娇宠坏了的慵懒女人的气氛中——她们一生从来都不曾为自己有过一举手之劳——总有一些什么东西使他觉得难于集中力量去从事创作。

一月里，正当俄罗斯的严冬，地上冻着二十八度^①的冰雪，他突然后程要回转巴黎了。表面上是去处理有关亏损铁路股票的款项，大概他对于他的新房子也有点不放心吧。德·韩斯迦夫人，不消说，是同意让他独自旅行的。大家也不再提什么订婚、结婚了。她的犹疑程度似乎随着熟识程度而日益增加。在乌克兰，她能一无牵挂地生活，大概她已得到了结论，在巴黎跟一个她深知其奢侈生活和赌博本能的丈夫在一起，她是很难找到平静宁谧的安息之所的。她没有怎么踌躇就同意他走，尽管他健康不佳；只不过在告别时，给他肩上披了一件俄罗斯厚皮衣。

^① 这是华氏温度计的度数，约当摄氏零下七度（-7℃）。

*

*

*

*

*

每当巴尔扎克离家一段时间归来的时候，他早已习惯于在跨过门槛之前就会听到新的困难消息。这次从维埃曹尼亚回来当然也不例外。不过这次困难倒不是他自己惹出来的。他刚刚重新踏上法兰西国土，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就爆发了。君主政权被扫除，紧接着，由于他曾公开发表过合法派的政见，因而也就丧失了投身政治生涯的任何机会。的确，他是曾在三月十八日的《宪政报》上发表过声明的，如果有人这样要求，他准备充当众议院候选人。但是正如我们可以期待的那样，并没有谁前来正式邀请。一个巴黎俱乐部，叫做普遍博爱会的，是唯一有意把他列入候选人名单的，条件是他必须提供关于他政治信仰的自我陈述，这一点他骄傲地拒绝了，理由是要他到议院去代表他们的人们应该早已从他的文集里归纳出他的政治信仰。巴尔扎克非常典型的性格是，尽管在他的著作里他总能非常清楚地预见到即将发生的社会变化，而且在描绘这些变化所处的不可避免的环境时表现出极其明智的眼光；然而，在政局危机来临的时候。他却会把自己安置在一个错误的位置上，正象他在经商方面也总是这样行事的。

失望之事接踵而来。他的铁路股票又下跌到更

低的水平上。戏院也不比从前对他更恩厚些。他不能够如约交出剧本《彼得和凯瑟琳》（“Pierre et Cathérine”，但他却从俄国另外带回一部“心理的剧本”叫做《晚娘》（“La marâtre”），后来于五月二十五日在历史剧院（Théâtre Historique）上演了。巴黎还处于政治纠纷的阵痛中，这部剧本也就没有引起什么特殊的注意。他最重要的剧本，《梅尔加特》（“Mercadet”），已经被法兰西剧院的审查委员会“全体一致”通过，但演出却得暂时延期。我们很少听到他在这一时期的小说或者写小说的计划，仿佛巴尔扎克在全心致力于戏剧。他设想的主意之一就是组织一个杰出的戏剧家协会，以便大家合写剧本，用来丰富法兰西的舞台。

不过，很可能，他的脑筋并非真正为这些事情所吸引。他已不再为文学的雄心所鼓舞。唯一使他感到兴趣的东西还是那座房子。在他这一段出门的时候，关于房子已经做了不少事情，然而它仍然没有准备好。他准备装修房子所达到的奢华程度跟他本人的穷苦程度之间的对比是异常鲜明的。出版商们把他们的钱袋封锁得比任何时候都紧，他也没有新的书稿可以供给他们，他还深深受到他最近的出版商苏微连的钳制。新闻记者们对他仍然怀有敌意，有的时

候他竟有些感到读者们已经把他给忘记了。基拉拉丁——巴尔扎克动身到俄国去之前，已归还了他尚未完成的《农民》的预支稿酬，只差微不足道的七百二十一法郎八十五生丁了——一听到巴尔扎克回来的消息，就来要他清账。两星期之后他就控告巴尔扎克欠债不还，法院也支持这一要求。巴尔扎克每行文稿索价六十生丁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他的短篇小说《初入人世》只好以低廉价格处理给家庭博物院，这才使他能够填饱肚皮。他从来没有这么穷过；长期出门在外，使他的收入源泉干涸了。

巴尔扎克被羞愧之心所阻止，他不想在为幸福街的房子挥霍金钱时去向人家借债。这座房子客厅的墙上要挂上锦缎，门户也要加上雕刻或者嵌上象牙。为了书房里一个书架，一件嵌有龟甲的难看的家具，他就花了一万五千法郎，而在杜鲁奥旅馆的拍卖场上，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到一位买主肯出五百法郎去买它。楼梯上铺了昂贵的地毯，所有空处都填上了中国瓷瓶和孔雀石的盆盆罐罐。不过，他最得意的地方，要算那“大画廊”了，这正是他选中这所房子的原因。保庄楼的平面设计非常笨拙，而画廊却是一大间带玻璃屋顶的椭圆长厅，墙壁上涂着雪白和金黄两种颜色。十四尊雕像排成圆圈形，还有各种珍奇古

玩都陈列在紫檀木的橱子里，其中真正的艺术品和显而易见的假货混杂在一处。墙上悬挂着六十六张画，即所谓巴尔扎克的珍藏，其中有据说是瑟巴斯提阿诺·德·毕恩波^①的作品，和一张更加可疑的霍贝玛^②的山水画，还有一张肖像，巴尔扎克毫不犹豫地称它为丢勒^③之作。

疯狂奢侈和个人贫穷之间的冲突正是家庭纠纷的根源。不同家人说实话，他反而经常编造新的理由去解释德·韩斯迦夫人为何一再拖延婚期。有一次他宣称已直接向沙皇上书，请求准许，然而却遭到拒绝。有时候他又谈论到那些妨碍德·韩斯迦夫人离开俄罗斯的诉讼。他一直声称她处于严重经济困难之中，最初说这是因为她已把财产归属于女儿名下，因而自己不能支配；后来又说由于庄园收成遭了火灾。其目的就是要在家人眼里减轻德·韩斯迦夫人和他本人之间立场上的分歧。事实上，双方的家庭都不赞同对方。德·韩斯迦夫人的亲戚，以难说话的姨母罗沙莉为首，她不断游说外甥女不要跟一位不足

① 瑟巴斯提阿诺·德·毕恩波（Sebastiano del Piombo，1485—1547），意大利肖像画家。

② 霍贝玛（Hobbema，1638—1709），荷兰画家。

③ 丢勒（Dürer，1471—1528），德国画家与木刻家。

信赖的法兰西的败家子作家打交道，这种人最后只会牵累她，使德·韩斯迦一家的财富掷诸沟壑。老巴尔扎克夫人和她的女儿在奥瑙利的未来新娘身上只看到一位傲慢自诩的贵族，一个冷酷自私的女人，她只会要他手忙脚乱地趋奉服侍她，还会让他奔波于半个欧洲，而丝毫不考虑他衰弱的健康状况。

虽然巴尔扎克的母亲耐心地承担了幸福街守门狗的任务——这是一件需要老妇人付出全部勇气和毅力的不讨好的事情——她却没有任何幻想，在新寓所布置停当，新夫妇舒服地安顿下来以后，她的待遇如何。她很清楚，保庄楼的繁华富贵中决不会有她一席之地，她肯定会跟最后的一粒尘土一起被扫出门外。她甚至于不敢期望被准许在门口迎接新婚夫妇——而她的担心到了时间也并未落空。德·韩斯迦夫人从来丝毫没有注意到这位妇人的存在，既没有写过一行字致以一般的问候，也没有为她的操劳说过一个谢字。所以，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她对未来儿媳感到的愤慨与日俱烈，日益突出的问题乃是，她是否能出得起钱乘马车到絮伦去看望女儿。尽管她为德·韩斯迦夫人监管着几万几万法郎的开销，可是在她个人的财务上，就连几个苏的花费也是一笔可观的数目。巴尔扎克还没有偿还从母亲手里拿

来的借款，他和德·韩斯迦夫人也都还没有想到至少应该给她准备一笔养老金，以尽到自己的责任。德·韩斯迦夫人显然是很勉强地确认婚约的，尽管巴尔扎克找出种种借口来遮盖这个事实，但也瞒不过他的母亲，她认为这是德·韩斯迦夫人骄傲的表现。另一方面，人们也不能指望德·韩斯迦夫人带有多大的愉快心情期待着去定居巴黎，因为到了那里，她就得同巴尔扎克的母亲和妹妹接触，更不必说他其余的那些小市民亲戚了。巴尔扎克新居金光闪闪的豪华气象将不会使他得到多少真正的享受。

* * * * *

巴尔扎克在这几个月里所抱的希望，即房子一旦准备就绪，德·韩斯迦夫人的想法就会迅速转变，现在看来都已幻灭了。出为事态日益清楚，他的永久结缡的愿望并不是她所愿意共同享有的，而且她也丝毫无意以维埃曹尼亚的舒适环境会换取保庄楼的缥缈前景。不管好歹，他必得决定在九月底回到俄罗斯，好赶在严冬来临之前。因为一月间他回巴黎时，严冬可让他吃了不少苦头。他还得再作一次努力，亲自登门，去说服他执拗的情妇陪着他走到祭坛前面举行婚礼。

动身之前，他又到法兰西科学院去碰碰运气。夏

多布里昂和另一位已经不知姓名的“不朽者”的逝世，留出了两个空席位，而巴尔扎克已经宣布了自己的候选要求。按照惯例，他应该挨家挨户去拜访那三十八位健在的院士，以获取他们的支持；但是他没有时间去做这件事，因为他必须在冬天来临以前到维埃曹尼亚去，所以他就只能把选举留给命运去随意决定了。结果是可悲的，虽然从我们的观点看可悲的反倒是科学院而不是巴尔扎克本人。《人间喜剧》的作者只得到两票。圆穹顶下面的席位和绣有棕榈叶图案的外衣奖给了德·诺埃伊公爵和另一位外士，而他们对文学的不朽贡献则早已为后世遗忘。我们应当以赞赏巴尔扎克的态度把这事记录下来，他是以尊严和镇静来接受这第三次挫败的。他仅仅请求一位朋友替他调查那两位敢于支持他的人的姓名，以便他能向他们致谢。

* * * * *

十月间，他又一次到了维埃曹尼亚，但这一次他的情绪显然是低落了。这里已不再是天堂，而是“一块沙漠”，他写信给他母亲：

“啊！如果你在乌克兰这里过上两星期，你就会认为幸福街是愉快的地方了。”

他用心良苦地强调着他所受到的欢迎是热烈的，但人们可以察觉，他在着重地坚持这一点时，几乎用的是惶恐的语调：

“跟我在这里同住的人们都对我非常热情，但我到底只不过是一个受娇惯的客人和一位照字面意思的所谓朋友。他们认识我家中的所有成员，而且对困扰我的种种忧虑都特别感到兴趣，但是一个人对不可能的事情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好象德·韩斯迦夫人已经屈尊降贵，承认他有一个母亲和妹妹生活在巴黎这一事实，但是人们在不便公开直说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在维埃曹尼亚发生了某些不妙的事情。他所指的“不可能的事情”大抵是从德·韩斯迦夫人的愤怒中被逼拶出来的，因为他为了一座她或许永远也不会住进去的房子而花费了那个疯狂的数目。她的态度并非没有道理，于是巴尔扎克也开始勒缰控马了。他写信给他母亲：

“我这样说就足够了，一个人情愿做出的牺牲是有限度的，再说一个人也不该把负担加在

即使是最亲近的人身上。为了房子而招来了还不清的债务，这当然是由于带来了不良印象而惹起纠纷；如果还会有其它困难接踵而来，那么我整个的前途在某种情形之下就会发生问题。”

德·韩斯迦夫人并不经常隐藏她的气恼：

“她大发雷霆，因为我花费了这么一笔大款。”

她又学到了一个教训，就是巴尔扎克的投机算计必须加以控制。在这座房子上，并不象他最初的估计，需要花费十万法郎，而现在它已经用了三倍那个数字；连象德·韩斯迦夫人这样资财富有的女人也禁不住感到不安了。维埃曹尼亚的烦躁气氛变成了传染性的，巴尔扎克写家信时心情恶劣，他母亲也用同样的情绪回信。当其中有一封信落在德·韩斯迦夫人手中的时候，风波就更大了，其结果是巴尔扎克把结婚计划的失灵归咎于家人头上。已经传出幸福街的房子有准备出卖之说了：

“在这里，她有钱，有人爱，有人尊敬，她

什么也不缺，所以，她当然不愿意拿这样的环境去换取另外一个，在那儿，又能看到什么呢？只有烦恼、债务、大手大脚地花钱和陌生的面孔。她的孩子们都为她颤抖了。”

巴尔扎克同样日益感到焦虑，突然被节约的冲动给攫住了。他忽然指示母亲把女仆解雇，因为他供不起她的工钱和伙食了。只要佛郎苏，他的随身仆人，去照看他的财宝就行了。他甚至走到更可笑的极端，给住在絮伦的妹妹写信，问她能不能在他回到巴黎以后每个星期一派她的厨子来，以便给他和他的仆人买好够吃一个星期的肉。他的预算被降到非常微小的数字：

“我只剩下最多不超过二百法郎了，这笔钱花完之后，就什么也没有了，除了还可能从剧本上收入一点。就是在戏院方面，我也能看出，连杰作也未必赚得到钱的日子快到了。”

这一类的沮丧情绪我们以往从没有在巴尔扎克那儿碰到过，这说明他的自信心已经破灭。他已不再是他自己了。他的活力已经大大削弱，身体也终于在

他久已经受的紧张生活之下崩溃了。过去的警告都不受重视，直到身体情况到了这步田地，不用费事就会完全崩溃了。就连第二次到维埃曹尼亚的旅行也是不明智的，因为他这位杜尔兰的子弟并不习惯于俄罗斯的冬天。支气管炎的发作使人不再怀疑他的心脏的不良状态，七年前他的好朋友拿克加尔大夫早已对此大摇其头了。当他终于能够离开床榻时，他发现自己已不能自由行动了。他每走一步都得喘气，连说一句话都很吃力。他变得“又跟一八一九年一样瘦弱”了，疾病使他“衰弱得象个儿童”，根本休想坐下来工作。“整整一年我没有挣上一文钱”。这该是个象征，他把心爱的僧袍都搁在一边了：

“病中我总穿一件浴衣——它现在要永远地取代我的卡尔特白袍子了。”

现在不必去想在俄罗斯的冬季回转巴黎的事了，就连原已计划的基辅和莫斯科之行也都得放弃。他完全操于两位德国医生手中，克诺特大夫和他的儿子，他们的治疗方式似乎超越了他们的时代，因为他们用的是柠檬治疗术。这只能带来暂时的解脱，因为他身上多种器官都有了问题。他的眼睛出了毛病，

温度又高了起来，再次受到肺炎复发之苦，这在不久之前刚使他躺下一次。

虽然我们没有多少证据来说明当巴尔扎克病在床上时德·韩斯迦夫人是如何行动的，但有一桩事情总是确凿无疑的。这位著名作家，从前她曾以充沛热情欢呼过的，而作家的爱慕也曾满足过她的虚荣心，现在已经只不过是一位有趣的同伴罢了。当他不能再用笑话来取悦她们的时候，他就变成了累赘。这两位游乐成性的女人，母亲和女儿，几个月来一直都在盼着基辅一年一度的大交易会。她们已经在城里租了寓所，仆人已被打发用马车把家具运送前去，她们也为了这次大的社交场合而更新了衣橱。由于巴尔扎克的病情，计划不得不推迟，虽然道路的难以通行的状态也许部分地要为她们的失望负责，于是他或者他们由于这种情况所能取得的唯一娱乐，就是当他躺在床上的时候，她们穿上新袍子来让他检阅。

在他的家信里，他还继续热烈地谈论着他的神圣的夏娃和她天真的女儿，不过他一定已经感觉到了包围着他的凄凉的孤独气氛。他一定已经感觉到了他身处于异域，旁边是几位被娇宠坏了的女人，她们天天只想到一己的快乐；因为他突然间惦念起老朋友来了。几年以来，德·韩斯迦夫人已经占据了

他思想中的主导地位。他差不多已经停止给珠儿玛·卡罗写信了，这是他所曾倾心过的女人中对他最忠实、最体贴的。但是，当他躺在病榻上，他又回忆起她的温情脉脉，想到在他需要帮助之时她本来会怎样地来看顾他。她久已不存在于他的脑海中，以致他曾惯用的“*chère*”或“*cara*”^①这些昵称都不再轻易地来到笔下，因而他把信的开头写成“我十分亲爱而仁慈的珠儿玛夫人”，好象往日的恩情已经冷却，成为一般的友谊了。然而接下去没有一会儿，他又恢复了当年知心人的语调，他用来向她汇报希望和憧憬的字里行间也就浸染了悲哀情绪：

“我从外甥女和妹妹那里两次得到关于您的悲痛消息，如果我没有早点写信的话，只是因为 I 简直不能够执笔了。我非常接近死亡了……毛病是十五年过度工作形成的严重心脏病。因此我已在这里住了八个月，由一位医生来照料，这在乌克兰的旷野里要算是奇事。这位先生是一位大医生，是我居停主人的朋友，他们很有交情。他原来给我的治疗由于一种可怕的高烧，叫做‘摩尔达维热病’的，而间断了。

① “*chère*”意为“心爱的”，“*cara*”是对卡罗的昵称。

这种热病起源于多瑙河的沼泽，传布到敖德萨，从那里又肆虐于草原。我所得的热病叫做间歇性脑感染，这种病要延续两个月。我从这个病复元到足以重新治疗慢性心脏病，才只有一个星期。

“前天收到我外甥女的信，信中说，您，亲爱的珠儿玛，希望能保留您在佛拉柏斯罗的房子，虽然您要把那里的土地出售。‘佛拉柏斯罗’和‘卡罗夫人’这些字眼强烈地唤起了我的回忆；虽然我被禁止操劳，甚至即使是写信的劳累，但我却要告诉您，为什么从去年二月以来除了一些事务上的通信以外我就没有给您写过信。我一定要告诉您，您不要以为一个人会忘记真正的朋友，我还愿意您知道，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思念您，爱您，即使在此地也常谈到您。这里的人们从一八三三年起就认识了我们共同的朋友保尔志……

“站在五十岁的高峰上去观察人生，会是多么地不同啊！我们怎么总觉得离开原先希望达到的目的还是那样远啊！您还记得在佛拉柏罗斯我怎样送德斯格勒斯夫人入寝吗？后来我又送过不少人入寝了。但自从那些日子之后，我已

经放弃了多少多少幻想啊！除了还在增长的对您的感情之外——它还在增长着——我没有什么进步。恶运展开得多么迅速啊！插足进来阻挠我们幸福的障碍又是多么多啊！真的，生活给人们带来多少突变啊！三年来我为自己筑了一个窝，这件事，糟糕的是，花了我一大笔钱。——然而该去占据这窝的成对的鸟儿却在哪儿呢？他们什么时候搬进去呢？岁月流逝，我们也都衰老，一切都在褪色，连我那小窝里的装修也褪色了。亲爱的，您看得出来，即使对那些似乎生活在好运中的人们说来，也不是每件东西都是玫瑰色的……”

他也给德兰诺瓦夫人写了信，她常常帮他还债，而他至今还没有正经地向她感谢过。他好象被一个下意识的愿望所驱使，要在大限来临之前就把他在情谊和感恩方面的还未了结的义务都处理好。也许他已感觉到他将不久于人世了。

第二十五章

结婚和还家

不管巴尔扎克自己是否体会到病况的严重性，在医生们的思想里却毫无疑问，他是绝对不能够恢复健康的了，而且我们可以认为，他们已经把得出的结论通知了德·韩斯迦夫人。在确知这场婚事只能维持短暂期间的情况下，她决定使这个人实现他最后的愿望，这个人追求她已经这么多年了。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他不可能再放纵他赌博的本能，也不能再纵容那种败家子的天性了。“好人巴尔扎克”已经变成了“可怜虫巴尔扎克”，她受到屈尊礼下心情的支配，就象高贵的妇女对待一位为她服役而趋于老迈的门客那样。婚礼订于一八五〇年三月里举行。

典礼定在别尔吉切夫城举行，这是最近的一个较大的省城。然后他们将动身到巴黎去，保庄楼已经

最后准备停当，可以居住了。没有别的任何东西比那些写给母亲的详细指示更能表现巴尔扎克的急躁天性的了，他详述母亲应做的一切准备以迎接他的新娘到她的新家庭里来：

“在最高一层的第一个房间里，即带镶嵌饰物的客厅隔壁，有个立在棕色橱上的中国式的大容器，在那里您可以找到商姆爱丽赛一家花店的地址。养花人曾于一八四八年来过，我们谈过两星期一次送花来装饰房间的一些问题，他还告诉过我定期一年费用大约是六七百法郎。当时我正要离开巴黎，于是就推迟了安排，因为这事只能等我有了钱，以及那位同我有关的妇女情愿的时候才可以考虑。我现在知道了她喜欢花。一旦这位养花人承担了房间的装饰，您心里就要有个底，去跟他交涉一个合适的价钱。您得留心要他提供确实是好看的鲜花，要让他知道我们爱要的是什么。

“下列几项装饰一定要做到。第一，第一个房间要有一张摆花的桌案；第二，日本式客厅里要有摆花的桌案；第三，带圆顶的那间屋子要有两个花架；第四，屋顶下那个灰色房间的壁炉台

上要有用非洲木材制做的小花坛；第五，楼梯子台上要有两只大花瓶；第六，要有木制的小花插子放在费谢尔安装的两个盆里。”

这些都是巴尔扎克在结婚前发出的指示，日期是在他打算迁入他为新娘布置的房子之前的几个星期。虽然已是病人，他的想象力却跟从前一样敏锐，记忆力也还保留着摄影般的能力，使他能够追忆一切最微小的细节。每件家具，每只花瓶，每个花架都记录在脑子里，他清楚每一件东西都放在什么地方。婚礼和归家的长途旅行还未到来，但他却已飞翔在思想的翅膀上，在醒着的梦境中他已安居于幸福街上了。

三月十四日，在乌克兰的别尔吉切夫城圣巴巴拉礼拜堂，巴尔扎克同德·韩斯迦夫人结了婚。婚礼是严格保密的，因为他们不愿引起人家注意。没有宾客，没有人得到通知。当日早晨七点，天色还有点灰暗。齐杜米尔的主教原本被邀请来证婚的，届时却没有露面，但是巴尔扎克至少还是很高兴，他竟能被一位贵族教士，一位查鲁斯基伯爵，把自己引入神圣的结合。仅有的证人只是教士的一位亲属和梅尼齐克伯爵，他这时已成为巴尔扎克的女婿了。典礼举行完

毕，这对夫妇立即返回维埃曹尼亚，在当天深夜十一点钟到达，这时他们已疲惫欲死了。

过了两三天，巴尔扎克坐下来起草这份最后的、最伟大的胜利公报。幸福似乎已经恢复了他的健康，他写信给母亲、妹妹、拿克加尔大夫和珠儿玛·卡罗。珠儿玛又一次得到保证，“当人家问起我过去的的朋友时，你的名字总是我第一个提到的。”他用下列词句向她报告他结婚的消息：

“三天之前，我同我唯一爱过的女人结了婚，我现在更加热爱她了，我将永远爱她直到我死的那一天。我相信，这次结缡是上帝特地为我保留的奖赏，用来补偿我这么多的磨难，我所遭受和克服了的这么多年的艰辛和困苦。我的童年很不幸福，我的春天从来没有花朵来缀饰，可是现在我该享受一下明亮的夏天和最甜美的秋天了。我这次幸福的婚姻，从这一观点来看，也许可以给您一些个人安慰，因为它向您证明了，在长期受苦之后，上天的确藏有他愿意在最后颁赐出去的宝贝。”

当他封上这些信的时候，头脑里只剩下一个念

头——尽快地跟着这信前去，跨进他自己家的门槛。他还是不能在信中附上一行来自妻子的问候，一直到这会儿，妻子还不能够被劝服给母亲表示这么一点小小礼貌，于是他只好写上支吾的解释：

“我妻子本想在信后加上几行，不过信差已在等候，而她却还起不了床。她的手因为风湿而浮肿得拿不了笔。她将在第二封信里向您致敬。”

巴尔扎克为了新获得的快乐是要付出代价的。他不可能就向巴黎首途，因为道路深埋雪中，无法通行。即使这个障碍并不存在，他也不能够在目前的健康状态下踏上旅程。他给幸福街的房间订购了花朵实在为时过早。他的虚弱的身体又在经受更多的考验：

“我的心脏病又一次严重复发，还有肺部发炎。本已取得的进步又失去了多一半，原来那一阵子还真象是取得了不少进步呢。……我的眼前总有一块黑帘子不肯消散，遮住了一切，因而使我不能写字。……自从晴天打下那个霹雳以

来，今天我是第一次提笔。”

也许至少现在可以希望妻子利用机会给母亲写几行信，可望平息她对儿子的忧虑，但巴尔扎克还是小心翼翼地加上了一句：

“我的妻子连一刹那的自由时间都没有，除了双手吓人地肿起以外。起因就是潮湿。……”

两星期以后，四月十五日，他又一次做出努力，给母亲写信：

“我写这些字时连字母都难于辨清。我的眼睛的状况事实上已使我无法写字、读书了。”

对于妹妹——她还病在床上由老母亲护理——他也被迫捏造了一些支支吾吾的理由，虽然他还真地写上了妻子要他“带给您她的问候”。关于自己，他说：

“我不大健康。心脏和两肺都生了病。每走一步都要气喘，也没有力气说话。”

* * * * *

最后，他们决心动身了。旅行非常艰苦。到了波兰国境上的布罗迪，巴尔扎克被极端衰弱给压垮了。他没有胃口，总是大汗淋漓，这就更加降低了他的体力。这时见到他的熟人几乎都认不出他了。五月十一日，他从德累斯顿报告说：

“我们用了整整一个月才到达这里，而不是通常的六天。不是一次，而是一百次，生命遭到危险。我们常常要找十五六个人来帮忙，用绞盘把我们拉出泥潭，在泥潭里我们能一直陷到车窗为止。不过我们到底还是到达了这里，而且都还活着，虽然十分疲乏，还生了病。这样的旅行能使人一下子老上十年。您可以想象那是什么滋味，总是骇怕我们之中有一个人就会死在另一个人的怀抱里——尤其是正象我们那样处在热恋之中。”

在万分疲劳和一半失明的状态下，他总算勉强支持到达了德累斯顿。他连台阶都登不上去了，很怀疑还有没有气力继续前往巴黎。

“我的情况险恶。……这次可怕的旅行使我的病更恶化了。”

虽然视力衰退，他还得亲手来写这封信，他再次为妻子做出解释：

“她很高兴您在信里说到的她的一切，但是她双手的情况使她不可能亲笔给您写信。”

倒也奇怪，风湿症并不妨碍她去拜访德累斯顿的珠宝店，在那里她花二万五千法郎买了一串漂亮的珍珠项链，而肿胀的手指也不妨碍她以丰润清晰的字体把购买的细节描述给女儿。当巴尔扎克躺在旅馆的病榻上的时候，她竟能集中思想在一串珍珠项链上，这只能是冷酷无情的表示，而她在这封信里竟称他为“那位亲爱的好朋友”也足以说明问题了。他成了她的负担，不过她肯忍受，因为她知道自己不会再忍受多少时候了。

我们只能够模模糊糊地推测，在被迫停留于德累斯顿期间，两人气质上是有过冲突的，但巴尔扎克却必须把角色扮演到底。他指示妹妹说：

“我只有依靠你了。你一定要设法使母亲记住，当我到达时她不要留在幸福街。”

他遥想这两位妇人的见面情景而深感惶惧，关于这一点他用这种笨拙的托辞来解释：

“假如我们打开行李的时候她也在场，并且还来帮忙，那么母亲的尊严定会大受伤害。”

老妇人的怀疑完全有道理。那几个月里，她时刻睁大眼睛看守着他们的财宝，监督仆人，照顾钱财事务；尽管她深深相信那位高傲的俄罗斯贵妇是会希望她在他们到来之前就离开这座房子的。她只还有一桩事情要办。一旦把鲜花都安置妥当，等着迎接新婚夫妇，她就无事可干了，除了轻轻地在背后把门关上。佛兰苏可以站在门口，引导新主妇走进她这座王族之家。各个房间和门口台阶都应灯火通明，以迎接新娘，但是巴尔扎克的老母深知，那里是没有她插足之地的。一俟她的任务办理完毕，她马上就溜到絮伦去了。

* * * * *

巴尔扎克命运上的苦恼即使在他归家的当儿也

不放过他。落在命运上的点滴幸福都要向他索取贡品。还有一个项目正在等待着加在他已经失去的幻想的总和之上，因为他这次回到保庄楼来，正好有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值得他花费笔墨去加以描写。旅程的最后一段是通过铁路运行的，而火车却误了点。深夜时刻马车驶到幸福街房屋的大门前。巴尔扎克迫不及待，急于视察他的指示是否在最小的细节上都遵照执行了，鲜花啊，灯火啊，还有佛兰苏是否手拿分权烛台站立在门口。

马车终于停了下来。佛兰苏执行了他的命令。全楼从上至下灯火辉煌。巴尔扎克拉了门铃，但是没有人来开门。他接二连三地拉，但大楼在光耀的窗后仍然一片死寂。几位邻居聚拢了过来，巴尔扎克提出了问题，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答复。妻子端坐车中，车夫匆匆去找锁匠。当大门终于撬开时，一幅阴惨的景象进入了眼帘。

佛兰苏，他的仆人，蹲在一间屋子里——他彻底发疯了。命运恰好选择主人归家的这一瞬间来剥夺他的理智，他不得不在午夜时分被送到疯人院去。胡言乱语的佛兰苏被人强行带走的时候，也正是巴尔扎克引导新娘走进了他为她准备妥帖的家的时候。

第二十六章

曲终人逝

控制巴尔扎克一生命运的定律一直到最后都在起作用。他的梦想只能在他的书本里化为现实，决不能实现在自己的生活里。花费了难以言语形容的辛勤劳动，做出了令人绝望的牺牲，怀着炽烈的期待，他安置了一个打算安度他最后“二十五年”的家，并陪同着那位最后终于顺从了他的他所追求的妻子。在一切准备停当之后，他搬进了他的家——不料却是去死。他给自己设计了完美的书房，打算在那里完成他的《人间喜剧》，其中五十部已经构思完毕，但他却一行也没有在这书房里写过。他的视力完全垮了，我们所能看到的发自幸福街的唯一书信，是写给泰奥菲勒—戈蒂耶的，信是他妻子的笔迹，只在信后附有巴尔扎克勉强画上的一行字：“我已不能再写字

读书了。”

他本已布置好一间漂亮的图书室，但在这间屋里他却从未翻开过一本书。客厅里挂着为招待巴黎社会而设置的金色锦缎，但招待会却从来没有举行过。医生禁止他做最轻微的活动，甚至不许他谈话。他心爱的画廊——这本来会成为轰动全巴黎的大事，如果人们见到他竟能搜罗到这些无人堪与比拟的收藏的话——本应该陈列出来，一件件向朋友们、作家们、艺术家们亲自进行解说的，然而当雨果来看他的时候，他却只能请求妻子带朋友去观看了。他本曾梦想王宫，如今王宫却变成了监狱。

他孤单地躺在大房间里，母亲不时象畏缩的影子飞进屋来，看看他需要什么。妻子呢——一切目击者在这一点上完全一致——表现出同以前一样地缺乏真诚挂念，同以前一样的残忍冷漠，这些，从她在维埃曹尼亚来到这里的旅途中，在德累斯顿的停留中，早已显露过了。

她这种态度从她当时写给女儿的信件中无可辩驳地得到证明。她竟自天真烂漫地闲谈花边、珠宝或新衣服，很难从信里找到对濒死的丈夫露出焦虑的一行字。到了这时她还称他的绰号，那是他用笑话来取悦她们一家时被人起的绰号：

“‘玩意儿’到达这儿时身体比从前更坏了。他已经不会走路，受制于不断的昏厥。”

见到他的人毫不怀疑他已死期在望。但他自己却拒绝相信这一点。他那不可动摇的乐观精神，竟能在旁人只看到死亡必然到来的地方体察出康复的希望来。他一向习惯于嘲笑困难，总要使不可能的事变为可能，所以他并不放弃斗争。当偶然的少许好转恢复了他的嗓音时，他就集结衰微的气力去同客人谈话，一面讨论政治问题，一面表示他有信心不久就可以重新站了起来，而且还力求说服别人，一边也说服自己，他还保留着他的老当益壮的精力。从前的那种高昂精神的最后一缕微光有时竟然迸发出来。

夏天没有过去多久，医生们发出了裁决。从拿克加尔、路易、卢和福基埃四位大夫会诊的报告看来，非常清楚，他们所能开出的只是缓和剂，偶尔再给一些轻微的兴奋剂。至于其它，好象他们已觉得没有希望了。巴尔扎克自己也开始发愁了。他痛心《人间喜剧》的不能完成，还谈论到死后他的著作将会遭遇到什么情况。他逼着拿克加尔大夫坦白告诉他，他还剩下多少时间，而从老朋友面部的表情他已明白了事实真相。也许是真的，也许只是一个虔诚的传奇，人

们传说在他思想混乱的时候，他曾呼唤过霍拉斯·毕安仓，这位医生，他曾让他在《人间喜剧》里创造过科学奇迹的，他喊道：“毕安仓要是在这儿，他能救我！”

解体的步伐迅速地行进着。维克多·雨果在回忆录里描写过他最后一次拜访垂死的巴尔扎克：

我拉了门铃。月光透过了大块乌云。街上阒无人影。没有人应门，我又拉了第二次门铃。门开处，女仆拿着蜡烛。“您要见谁？先生！”她已泣不成声。我通报了姓名，被领进楼下的客厅。在那里，大卫·德·安几尔雕刻的大大理石的巴尔扎克巨大胸像立在架子上，放在壁炉对面。一盏灯在房间中央一张富丽堂皇的桌子上点着，桌脚是六只包金小雕像，风格极其高雅。另一位妇女，也哭泣着，进来说道：“他就要死了。太太已经回到自己的屋里去了。大夫们从昨天起已不再管他，他左腿上有伤，肌肉已经坏死。大夫们已经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们说水肿带来了脂肪性病变，肌肉和皮肤都已经脂肪化，所以也没有法子叩诊了。一个月之前，他撞在一件家具的突出部分上，那是家具上的一个装饰物。

……从今天早上九点钟起，他就没有说过话了。太太派人去请牧师，牧师来了，举行了涂油礼。他做了一个姿势，表示他已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一个钟头以后，他伸手给他的妹妹德·苏维尔夫人。十一点起，喉咙一直咕咕地响，只怕他活不过今天夜里了。如果您愿意，我去把德·苏维尔先生请来，他还没有睡觉呢。”妇人离去，我等了一会儿。灯光微弱地照着客厅里的家具，还有挂在墙上的波尔布斯和霍尔班的宏伟图画。大理石胸像微微发亮，好象就是这垂死者的幽灵。屋里充满着尸体似的气味。德·苏维尔走了进来，证实了女仆所告诉我的一切。

我们沿着走廊走去，登上楼梯，那上面铺着红色地毯，装饰着各色的艺术品，雕像，花瓶，图画和珐琅器皿，又穿过另一个走廊，走廊上有一扇开着的门。我听到响亮、不祥、急切的声音。我走进巴尔扎克的卧室。他的床放在房间中央。床是桃花心木的，床头床脚都装有革制的纽带和横着的木杠，那是为病人翻身用的器械。巴尔扎克躺在床上，头部靠在枕头堆上，上面还加上一个从长椅上取来的锦缎靠垫。他的脸色呈深紫色，几乎是黑色的了，正朝右边歪着。胡髭没

有刮，头发是灰色的，剃得很短。眼睛睁着，向
前方凝视。我看到他的侧面，看上去很象皇帝^①。
一位老妇人（她是这位小说家的母亲）、一个女
护士和一个男仆站在床的两边，床后一盏灯放
在桌子上，门边的柜上点着另一盏灯。床头柜上
放着一只银瓶。护士和仆人在惶恐的岑寂中肃
立，倾听他临死前喉部发出的格格响声。床旁边
的灯光把跳动的火焰投向挂在壁炉附近的一幅
面容清秀、含笑的青年人的肖像上。从床上飘过
一阵令人作呕的强烈气味。我掀开被子，握住巴
尔扎克的手。满手汗珠。我紧紧握他，却没有一点
反应。……

护士对我说：“他天一亮就会死。”我走下楼
梯的时候，脑子里印着这张色如死灰的面容。穿
过客厅时，我又见到胸像，静止不动，没有知觉，
意态昂扬，发射出泛泛的光辉。我不由得要在死
亡和不朽之间做出对比。

巴尔扎克逝世于一八五〇年八月十七日夜间十
点半钟。母亲是唯一在场的人，妻子则早已退出去
了。结局十分凄惨孤寂。

^① 皇帝，指拿破仑。

葬礼于八月二十二日举行，祈祷仪式安排在圣·菲利浦·德·鲁尔教堂。在倾盆大雨中遗体被送往墓地。他妻子肯定是很不了解他的内心的，因为执绋者除雨果外还有亚历山大·仲马、圣伯夫和巴洛慈部长。这三人之中没有一个曾同巴尔扎克有过亲切的友谊。圣伯夫曾经是他最刻骨的敌人，是他唯一真正恨过的敌人。墓地在拉齐士神父墓园，这是巴尔扎克一向喜欢的地方。他作品中的人物拉斯迪额就是从这里窥视都城，提出对巴黎的挑战。这是巴尔扎克的最后的家，唯一的家，人们说过，他可以在那里躲避债主，获得安息。

维克多·雨果在墓边发表了谏辞：

现在被葬入墓穴的人，他是受到举国哀悼的人物之一。……从此以后，人们的目光要注视的将不是统治者的面孔而是思想家的面孔，当这些面孔之中有一个从他们身边悄悄失去，整个国家都将为之颤栗。今天，人民哀悼一位才子之死，国家悲痛一位天才的损失。巴尔扎克的姓名将长留于我们这一时代，也将流传于对后世的光辉业绩之中。……

巴黎由于他的死亡已陷于昏迷。他回到法

兰西不过几个月。他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希望再次见到祖国，就象在长途旅行的前夕人们一定要去拥抱母亲一样。他的生命虽然短促，却是充实的。他在工作方面要比在生活方面富足得多。唉！这位惊人的、不知疲倦的工作者，这位哲学家，这位思想家，这位天才，当他在我们中间逗留时，经历了充满风涛和斗争的生活，这本是一切伟大人物的命运。今天他安息了。现在他已远离了冲突和仇恨。在他进入坟墓的这一天，他同时也进入了荣誉的宫殿。从此之后，他将在我们这个国家的许多明星之间闪烁，高高地远在我们头上所聚集的乌云之上。站在现场的诸位，你们能不羡慕他吗？然而，无论我们由于这个损失所感到的悲痛如何巨大，让我们顺从这些不幸的遭遇吧，让我们接受它们，以及它们包含的残忍的痛苦吧。这也许是一桩好事，也许是必要的事，在我们这种时代，伟大人物的逝世往往不时地会引起宗教感情的波浪掠过我们的灵魂，而我们的灵魂已被怀疑心肠磨蚀殆尽了。苍天是明白它所做的事情的，当他以如此高超的神秘来冒犯一个民族，从而驱使它去思考死亡，在这件事上倒是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

当一个崇高的英灵庄严地走进另一个世界，当一位以肉眼可见的天才翅膀久久翱翔于群众之上的人物，忽然伸出我们一向没有见过的另外的翅膀消失到不可知的境界里去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容不下别的，只能产生严肃和真诚的思想。不！这不是不可知的境界！我从前曾在类似的悲痛场合说过，我也永不厌烦地还要再说——这不是黑夜，乃是光明。这不是终局，而是开端。这也不是虚无，而是永生。我说的难道不是真理吗，听我讲话的人们？象这样的坟墓才是永垂不朽的明证。

这些话，当巴尔扎克活着的时候，是从来没有人这样说过的。正象他小说里的人物一样，他就要从拉齐士神父墓园出发，去征服巴黎了。

关于斯蒂芬·茨威格

吴小如 程毓徵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消息传来，花甲刚过的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同妻子一道，在巴西离里约热内卢不远的佩特罗波利斯，双双自杀了。在那里，他度过了他一生的最后半年。大概他们是感到无家可归、孤独寂寞、精神疲惫，并以此表示对纳粹的反抗吧。

不久以后，人们出版了他的乡思缠绵的自传《昨日的世界》（1943）和这一本脍炙人口的《巴尔扎克传》（1946）。这本书是他在巴西写成的。另一本在巴西写成的杰作是他的中篇小说《象棋的故事》。

茨威格于一八八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生于维也纳。他是犹太人的后裔，父亲是富裕的工厂主。他曾就读于维也纳大学和柏林大学，专攻哲学与文学，获有博士学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漫游欧、亚、非、美诸洲。他在比利时加入了诗人埃米尔·凡尔哈伦（Emile Verhaeren）的小集团，并译其诗为德文。他

还普遍结识文艺界的著名人物。一九一八年与许多作家一道，包括寄居瑞士的罗曼·罗兰，进行反战的斗争。战后他返回奥地利，隐居在萨尔茨堡，埋头著作。一九二八年访问苏联，与高尔基结识。纳粹主义、反犹太主义兴起后，他于一九三四年去英国，住到伦敦，一九三八年曾到美国讲学。在他取得英国国籍后，于一九四〇年再往美国，住在纽约州的奥斯宁。一九四一年八月，他离开美国赴巴西，就在次年二月离开人世。

茨威格的创作生涯开始很早，十九岁就出版了第一部诗集《银弦》（1901）。几年后又出了一本诗集《往日的花环》（1907）。

他的第一本重要作品是诗体剧本《耶雷米尔》^①（1917），在这本书中他大声疾呼战争是最大的疯狂行动。当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更是一位积极的和平主义者。

从一九一八到一九三三年，即他离开祖国以前，重要作品有：《三位描摹自己的诗人：卡萨诺瓦，司汤达，托尔斯泰》（1919）；《三位大师：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1920）；《罗曼罗兰传》

^① 耶雷米尔是公元前七至六世纪的希伯来预言家。此名常用来指对现状悲观，预计灾难即将到来的人物。

(1921);《与魔鬼的斗争: 霍尔德林, 克莱斯特, 尼采》(1925);《精神治疗法》(1931);《玛丽·安托瓦内特传》(1932);《鹿特丹人埃拉斯穆斯的胜利与悲哀》(1934);《玛丽亚·斯图亚特传》(1935)等。

茨威格的作品以传记、中短篇小说、散文最为著名。除了上面提到过的人物以外, 他还研究过麦哲伦, 约瑟夫·富歇, 弗洛伊德, 奥国心理学家弗朗兹·安东·梅斯默尔, 美国宗教领袖玛丽·贝克·埃迪。

他写的中短篇小说, 由于深受奥国医生兼作家阿瑟·施尼茨勒和弗洛伊德的影响, 常有十分复杂的精神分析, 这一点在《燃烧着的秘密》(1911)、《发疯与改貌》(1912) 和《冲突》(1926) 等篇中尤为明显。

此外, 茨威格还会改写十七世纪英国桂冠诗人本·琼生的《伏勒波尼》(1927), 使它更容易被当代人接受。一九三二年, 他还为理查·斯特劳斯的歌剧《沉默的女人》撰写过剧本。但是他的一切作品都受到纳粹分子的反対。

茨威格的文风被认为富有敏锐感, 扣人心弦; 但有时不免过于华丽、琐细。